

康乃馨译丛

文学系列

还魂曲

Requiem por Irina Ostrakoff

贾乐安 / 著

喻慧娟 / 译

林宝娜 / 评介

澳门文化司署
海南出版社

东方葡萄牙学会
三环出版社

葡语作家丛书



RODRIGUES LEAL DE CARVALHO

REQUIEM POR IRINA OSTRAKOFF

SÉRIE LITERATURA

澳门总督等上流人物正在参加一个招待会，在招待会的入口处，一个在澳门避难的异国女子突然意外死亡。由此引发了一个跨越俄罗斯、上海、巴黎、香港，最后发展至澳门的爱情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悲剧和亚洲地区的流血冲突构成了这一故事的时代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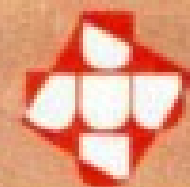
自始至终，读者都会被这一引人入胜的故事所吸引，还会了解到澳门这座位于中国南部的小城，过去总是向避难者敞开怀抱的。

ISBN 7-80645-305-9



9 787806 453056 >

ISBN 7-80645-305-9/1·34 定价: 21.80 元



康乃馨译丛

文学系列 20

还魂曲

Requiem por Irina Ostrakoff

贾乐安 / 著

喻慧娟 / 译

林宝娜 / 评介

澳门文化司署
海南出版社

东方葡萄牙学会
三环出版社



还魂曲

贾乐安著

喻慧娟译

责任编辑：黄宪萍 顾问：余 安

澳门文化司署 东方葡萄牙学会 出版发行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570105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博诚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年2月第一版 1999年2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5

字数：190千字 印数：10000册

书号：7-80645-305-9/I·34

定价：21.8元

•

献给我的孩子保拉和若昂，
他们对我的信赖远在我的希冀之上；
献给我的姐妹们，
她们一直支持我至今仍步履蹒跚的文学创作；
献给我永难忘怀的母亲。

还

魂

曲



评价：作家与作品

贾乐安的作家生涯开始较晚：1992年，他发表了我们现在用中文出版的这部小说《还魂曲》，以后又发表了《帝国缔造者》（1996）、《第四次远征》（1996）及《效忠女皇》（1997），如今还在创作另一部作品。他的上述所有作品都以澳门为背景，不仅着力描写了澳门的自然风景，而且以澳门作为其作品中人物和故事发展的真正舞台。

贾乐安 1932 年生于大西洋的亚速尔群岛，毕业于里斯本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他在自己的

家乡担任共和国检察官，从而加入了法官行列，为此，他赢得了走遍葡萄牙过去的各海外省的机会。他曾先后到过圣多美和普林西比（1958/1959），澳门（1959/1963），几内亚（1963/1966），第二次到澳门（1966/1971），安哥拉（1971/1973），莫桑比克（1976/1975）。1976年，他又回到了澳门，先后担任过检察长和助理总检察长（1976/1996）等重要职务。贾乐安现为审计法院院长。

贾乐安的法官生涯使他具备了对各种人物和各种复杂环境的极其细致入微的分析能力。澳门是他文学创作的伟大的起点：这块镶嵌在中国南部珠江三角州上的弹丸之地是一块奇妙的地方，各种不同文化，各种不同生活方式在这里共存。

1552年，葡萄牙人来到了这个小港口。由于中国官员的仁慈，他们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商站。

在那遥远的年代，甚至直到我们这个世纪，中国人与西方人通婚还被禁止。为此，最初来到这里的葡萄牙人不得不到马六甲和印度的果阿寻找女人，随即产生了“澳门土生（或称大地之子）”，而葡萄牙男人和中国女人之间的接触所产生的“澳门土生”则很晚才出现。澳门就是这样逐渐形成了人们相互忍让、和平共处的多种文化相融的城市。

贾乐安的小说正是展示了澳门历史上这种不同人群的汇合及其和睦相处的种种复杂的侧面。不过，尽管人们能相互忍让，但不同文化之间仍存在着区别，能迈出自己世界的寥寥无几，只有男人可以在他们出生和生活的基督城及中国城区自由出入，可以去中国城区寻欢作乐，谈情说爱。这些是贾乐安文学创作中更为喜爱的题材之一。他用其特有的辛辣笔触剖析小说中各个社会代表人物的不同的道德行为。

不过，几个世纪以来，澳门也是因遭受各种不幸而来此寻求栖身之地的人们的收容所。这类故事也是贾乐安选择的题材之一。正是在本部小说中构筑的两个故事中，他讲述了澳门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所发挥的作用。

小说的主人公伊利娜是一位几次从战争中逃出来、几经辗转与丈夫伊戈尔一起来到澳门的俄罗斯难民。

通过对伊利娜及伊戈尔的遭遇的描写，作品展现了我们近代历史上那些神奇的而又勾起人们痛苦回忆的支离破碎的时代和地方：从沙皇俄国到“美好时代”末日的巴黎，从世界大都会上海到世界末端的城市澳门。

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品展示了一幅内容丰富的画

面，其中多少往事令我们对世界上近年来发生的冲突的历史根源颇有启迪。请看看巴尔干地区混乱的状况吧（“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人、黑山人和其他种族人之间始终纠纷不断：这已不是新闻”），更不用说各地的难民都不同程度地处于悲惨和绝望的境地。

因此，伊利娜是这类历史牺牲品的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他们长途跋涉，以图找到一处栖身之地。她和伊戈尔与其他难民一样，永远背井离乡，永远大失所望，却又不不停地寻找早已彻底失去了的时代和地方，他们保存着伊利娜作为自己对俄罗斯贵族家庭永久回忆而珍藏的两枚戒指。

故事大量引用历史资料，尤其是在讲述伊利娜的经历的时候：从1910年起在俄罗斯帝国接受教育的时代到1914年结婚和巴黎的蜜月之旅，从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在上海的生活到1941年至1945年逃难到香港后来又到澳门，从1945年至1949年再次在上海，到1949年最后回到澳门直至六十年代，即主人公在澳门死去和本部作品的结尾。

作者引用这些日期是以拉开舞台的帷幕，读者从中看到了一系列的事件，它们构成了塑造主人公伊利娜的重要背景和决定性因素。

然而，作者认识到，对于学识渊博的读者，无须过多地描写当时的历史画面——书中的人物，特别是伊利娜和伊戈尔，不能理解这些变迁，并且（可以想象）出于他们出身于贵族阶层，不能看到时代的特点，所以当遇到突然的社会动荡时便惊惶失措，惶惶然不可终日，作者稍显重复地（只能认为是为了使伊利娜的故事更加自然）对这些盲目的流浪者们不谙时事加以评论，他们始终没有从遭受沙皇俄国垮台和熬德萨辉煌地位完结的打击中清醒过来。

尽管他们辗转经过许多地方，但实际上澳门是他们的目的地。作者把伊利娜在聚集了澳门上流人士的总督酒会门口的死亡作为其故事的开始，并加以细腻的描写。可以认为，这是贾乐安的文学创作的主线：作为其小说的悲剧素材始终贯穿着对澳门社会现状和虚伪的嘲弄及讽刺。

女人是作者讽刺的中心目标。在这一方面，第一故事非常典型。其中玛利娅·马法尔达和巴尔贝斯库伯爵夫人所处的境遇相同，她们都是讲究虚荣、尔虞我诈的世界的受害者和肇事者。伊利娜的法国家庭教师的情况也是如此，作者也没有把她放过：“她还是爱他的，想到这点，她不由得流下了眼泪。不过，她还是控制住自己，她不愿让泪水破坏自己用了一个多小

时才涂好的脂粉。”

就伊利娜或者贝格·贝姐来说，尽管她们都轻而易举地成为社会阴谋的猎物，但对她们的讽刺不算刻薄。例如，可以注意以下的对比：伊戈尔极快地适应并且取得了相应的成功，而伊利娜却完全不能适应，这使她不得不在寻找所失去的熬德萨的时光中度过一生。又如，她为了对塔西济奥的爱恋而受尽折磨，而对塔西济奥来说，艳遇只不过是一时的风光，为的是各方高兴而又不伤害任何人”。

无论如何，这部作品中的女人们就其总体来说都是依附于他人的（甚至贝格·贝姐对伊利娜的崇敬也是如此），这在熬德萨、巴黎、上海或澳门相差无几的社会逻辑之中只能如此。

然而，男人们则不同，他们表现出较大的评判能力，这来自他们在社会组织中的活动性。伊戈尔和塔西济奥可以自由出入基督城和中国城区。然而，女人们则被封闭在属于自己的世界，禁止上层社会的妇女们同除中国佣人们以外的任何中国群体的接触。

男女之间的这种差别使塔西济奥这个人物显得非常突出，虽然他是个次要角色，但在故事的整个布局中起着关键作用。他贯穿两个故事，而在两个故事里又把主要位置让给了女人，即玛利娅·马法尔达和伊

利娜，不过，他的形象是通过在家庭以内（从玛利娅·马法尔达的丈夫的角度）和家庭以外（从陈安娜的长期情夫和伊利娜的偶然情夫的角度）的特点刻画出来的——这就使他成为描写得最深刻的人物形象之一。这样就揭示了两个故事之间的深层联系，它们相互补充，完成由相邻又不相交的各个小群体构成的陌生人世界的画卷。

这样，澳门就成了世界末端（就他们的辗转而言），来自世界各地、相互陌生的人都聚集在这里。可以看到故事中没有对中国人的描写（只有偶尔出现的佣人或情人的身影，还有一闪而过的商人）。书中出现的却是因为各种各样原因（政治、贫穷、战争，总之，为生活所迫）出逃的难民，他们的各个群体都沉湎于自己的回忆和情感之中，不愿相互打开心扉。俄罗斯人的群体便是这种极端自我封闭的典型（一个俄国人在这世界的末端又能干什么呢？），这不仅是因为与其出生地距离遥远，而且也因为他们来自一个已经消亡了的制度。

这种互相疏远、冷漠的现象在这块殖民地随处可见，作者特别在第一个故事中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在两个故事中都表现了格格不入的奇怪特点，如外国人难以忍受的酷热（“我来到这里六个月了，虽然本

市有让我着迷之处，但我总是难以适应这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潮湿和闷热”，而中国人则相反（“他们身穿灰色长袍和肥大的裤子，似乎对炎热的天气不以为然”）。

仅仅这些就足以再现出殖民地当初的景象（住宅建筑的不同，人们对冷饮的享用……）和那些永远让人无法适应的一切。

讽刺手法还用来表现人们之间相互陌生，尤其是在突出描写各种怪诞现象的时候。塔西济奥从父亲那儿继承的，妻子极其重视的冰岛领事一职就是这种现象。对这个领事头衔重视到荒唐的地步，的确是小说中展现的澳门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善意也好，恶意也罢，澳门是世界末端的弹丸之地。在这里，冰岛（就像冰岛人心目中交趾支那一样）必须设有一个领事；一位俄国舞女可以成为巴尔贝斯库伯爵夫人——每个人都能编织自己的梦想（当然也可以圆一圆破碎的梦）。

小说于是变成了比喻。它不是玛利娅·马法尔达、伊利娜、伊戈尔或塔西济奥的故事，而且展示了人们永无休止地寻找安命之所的状况，它不是描写熬德萨、巴黎、上海或澳门，而是描写了这个不是任何地方的乌托邦。因此，这本书值得一读。“请来作客”，贾乐

还魂曲 □

安向人们发出邀请。尽管这可能是为我们每一个人吹奏的还魂曲。

林宝娜

还

魂

曲



充作前言的几句话

50年代来到当时的海外的澳门，我立即为这座城市和它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它的人民所倾倒。或者是命运注定，或者是地缘政治使然，这块小小的飞地熔不同文化和不同种族为一炉，成了世界各地人们的避风港。他们出于形形色色的原因来到这里：冒险精神和易于发财的野心，逃避本地区的政治、社会动荡和把人们投入水深火热中的疯狂的战争，躲避种种个人或家庭问题，或者徒劳无益地企图脱离各自所在的领域。还有，更普遍的是，由

于海外事务部某个混乱不堪的办公室决定的行政调动，因为当时出于帕索宫蓬巴尔式的专制制度之下。我便属于这后一种情况。

我就是这样来到这个小小的世界的，这里的人们令我着迷：熙熙攘攘而又勤劳的中国人，他们固守着其古老的文化（依我看来，他们纯真又不肯忍让，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而又稍显粗鲁），在那个年代尚不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澳门土生群体在财产方面已经衰落，但仍然表现出某些挥霍的习气，并且显示出鼎盛时代的贵族气质；小小的宗主国葡萄牙人群体以其所谓纯正的亚利安血统和占据行政官职而有点趾高气扬；其他的人则属于不同的国籍、种族和文化，他们是因为生活中的种种遭遇来到澳门的。

有多少妙趣横生的故事可讲啊……

我听到过一些这样的故事，由于职业的原因，我必须与其他职业的人接触。有许多故事已经忘记了，多数故事记在了心里，准备将来有一天讲出来。

现在我带给诸位的故事有着真实的依据。像多数“讲故事的人”一样，事实的真实性是后来以想象构成的。认识上的空白，记忆方面的缺陷，把生活中不连贯的故事线索连接起来的需要以及写出一个“有条理”的故事的愿望使小说作者求助于想象和个人经验，

以便在没有可能了解第一手材料的情况下设想应当怎样创造和描写出事实及其人物的感情和反应。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它有着真实的基础。

从本人经历的或者非常可信的人对我讲述的事实出发，我开始撰写掩盖合情合理、趣味无穷、妙趣横生和扣人心弦的故事。但愿它最终能让爱好欢乐的普通读者在轻松阅读中度过几个小时的时光。

因此，它既没有任何主题，也不想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传达什么思想。敬请严肃认真和思想深刻的读者们原谅。

不过，要是他们偶尔从中看到了对正在消亡或者也许尚未消亡的社会进行批判的意图（“晚宴上的波默里酒”），或者为难民们的痛苦处境进行的呼吁（“伊利娜·奥斯特拉科夫的还魂曲”），当然，这些应属更大规模作品才有的主题，那么，谢谢他们，非常感谢他们。

目 录

评价：作家与作品	林宝娜 1
作者的主要作品	1
充作前言的几句话	1
晚宴上的波默里酒	1
伊利娜·奥斯特拉科夫的还魂曲	55
第一章 女王寿辰	57
第二章 伊利娜的遗物	64
第三章 马德莫依塞尔	75
第四章 盲目的敖德萨人	86
第五章 巴黎充满欢乐	124
第六章 法兰西酒店	152
第七章 澳门插曲	174
第八章 美国大兵酒店	282
第九章 堕入地狱	295
第十章 请柬	345
第十一章 墓志般的结局	357

还

魂

曲



晚宴上的波默里酒

1

可怜的奥斯特拉科夫太太
(注：伊利娜·奥斯特拉科夫这个逃亡到澳门的白俄女人生前死后的情况是另一篇故事的内容。)她的一生确实灾难重重。而现在，到了生命的尽头，又死在最糟糕的季节。当时正值令人窒息的6月，一连几场倾盆大雨，天气既炎热又潮湿，气温高达35度，湿度在90%以上，空气停滞了，变得沉

重、粘黏、难以呼吸。人们大汗淋漓，衣服紧紧贴在身上，使汗水又蒸发不了。那时候空调还是少数人的奢侈品，而电风扇呢，即使开到最高速度也只能送来一阵阵热气。

其实，奥斯特拉科夫太太完全可以几个月以前或者几个月之后死去，让尚在这里的人更舒服一些，可是，这一事实已经发生，既不可逆转也不能取消：她死了，人们必须对她的遗产进行登记并贴上封条，因为她是外国人，孤身一人在澳门生活（丈夫与她分居，在新喀里多尼亚的努美阿郊区管理一座庄园，不想带她到那里去，提出的理由是那里气候恶劣），从法律角度必须照看她留下的遗产，交给她的配偶或者其他可能的继承人。

这样，尊贵的法官带着因打搅他人而产生的明显歉意在下午三点把我们召集到死者生前居住的地方，那是高士德大马路上一间寒酸的地下室。它所在的楼房已经陈旧，房间又很小，卫生间既狭窄又肮脏，是从临街的凉台的一端用一块粗糙的松木板隔出来的。

像一切意想不到的突然死亡的人家里一样，那里一片狼藉；屋子没有收拾，衣服胡乱扔在破旧的椅子上，该洗的餐具堆在一个塑料盆里。

“伊利娜·奥斯特拉科夫，已婚，64岁，生于现苏

联的敖德萨。”

在填写学历的空格里，她以很规矩的英文小字写着：

“鉴于我出生于敖德萨的名门贵族家庭，一直由家庭教师辅导学习，因此没有正式学历。但是，除了母语俄语之外，我还能讲德语、法语和英语，并略通中文。”

在申请书的其他部分还更详细地证明她所说的贵族身份，比如本世纪前二十五年拍摄的几张照片：一家人当中有肥胖的帝国军官，头戴饰以羽毛的大帽子，身穿高雅的紧身绸衣服的贵妇，还有穿着长及膝盖的臃肿的水手服的孩子。凭着我与奥斯特拉科夫太太生前的简单了解，很难把她与那些把头发卷成圆筒形、上面系着花结的姑娘们当中的任何一个等同起来；但是，在另一张更接近现在的照片上已经能看出某些相似之处，照片下面没有写说明，是一对高雅的夫妇骑在马上，男人穿帝国军队制服，女人则穿着马裤和皮靴。

她丈夫的律师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多斯·雷梅迪奥斯博士是当地品行端正的绅士，出身于本地古老世家，他证实死者受过良好教育，然后，为了不打扰慢慢腾腾的财产登记，压低声音对我说：

“这些女难民当年都是贵族，她们的经历使我想起

了我的舅母玛利娅·马法尔达和罗马尼亚女伯爵巴尔贝斯库的故事。你从来没有听说过？好吧，今天下午到旅维利酒店和我喝杯威士忌，到时候我把她的故事讲给你听。”

2

下午7点，天气依然闷热，南湾大街高大的树冠上尖利的蝉鸣吵得人心烦意乱；但是，在旅维利酒店底层凉台上要稍微好一些，因为宽大的窗户敞开着，相邻的大厅里的吊扇吱扭吱扭地吃力地转动着。最热的时候那种昏昏沉沉的倦意已经消失，几位上层社会的澳门土生围坐在两三张桌子旁边，一边晃动着手中苏打威士忌酒杯里的冰块，一边批评着行政当局。从新马路路口吹过一阵微风，此时的风已经不太热，所以角落里那张桌子便成了常客们最理想的所在。它曾是“旅维利元老”在这里与朋友们聚会的地方。

我穿过大厅的时候，雷梅迪奥斯博士已经坐在一张桌子旁边，斜靠在藤椅上独自饮着苏打威士忌，表情忧郁，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我像虚脱了似的一屁股坐到大椅子上，向身穿白色短外衣的中国侍者要了

一杯冰镇啤酒。

“这天气好像一年比一年糟糕。今年夏天一直很热。你是从圣多美来的，大概已经习惯了。那里的天气怎么样？”

“不像这里这么热。另外，那里有海风，山上甚至还冷呢。不过，我不是来和你谈论非洲情况的，而是想听罗马尼亚女伯爵的故事。今天下午处理的事情使我很伤心：生活的道路多么无情！说不定哪一天有人写出伊利娜·奥斯特拉科夫的故事呢。”

“你知道，澳门一直是难民们的避风港。躲避政治，躲避贫穷，躲避战争，总之，躲避生活。这正是它变得如此迷人的原因之一。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制度之前，这个地区经常有各大城市的冒险家们光顾，既有男的也有女的，还有通过香港和澳门逃出来的人们。有些人留在这里，另一些人不知道到什么地方闯荡去了。在内港那边的筷子基和巴波沙区，不是还住着一些因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上海陷落而逃来的白俄女人吗？她们是些不幸的女人，尽其所能在贫困中挣扎着生活。

“好吧，现在我们来讲讲我的舅母玛利娅·马法尔达和罗马尼亚女伯爵的故事。你没有见过我这位舅母，对吧，她可是当地社会知名的人物，一年多以前刚刚过世。尽管她爱出风头，行为怪僻（已经到了生命的

尽头)，但我还是很怀念她。

“她是我的舅母，因为与我母亲的兄弟达希西奥·德·帕依瓦·古特雷斯结了婚。雷梅迪奥斯是我父亲那边的名字。我舅舅是位业主、商人、工业家，总之，是位至今还活着的为数不多的葡萄牙大企业家。你肯定知道他。”

3

玛利娅·马法尔达·德·梅德罗斯·博特略·德·阿尔布克尔克在签名的时候也冠以“诺德拉”这个贵族称谓（并且以古代拼写法书写），但其合法性尚待证实。她出生在亚速尔群岛，与岛上一个小小的贵族世家诺德拉男爵有点亲戚关系。

当时，姑娘们，尤其是亚速尔那个令人窒息的社会的姑娘们，都学一门专业，但也只是学学而已，要说有什么学有所成，那也只是对婚姻有所补益。在那样的时代，玛利娅·马法尔达利用在里斯本的外祖父的亲戚、也算她的舅舅——诺德拉男爵及其妻子——提供的帮助到首都去学习文学专业，学习不大努力，成绩非常差。她对德国语言学问题毫无兴趣，但足以弥

补这种冷漠态度的是她对网球和桥牌充满热情。舅舅教她打桥牌是为了让她在每星期四的聚会上代替既健忘又耳聋的男爵夫人。

玛利娅·马法尔达虽然不算漂亮，却也引人注目。她高高的身材，一头金发，灰色的眼睛十分明亮，白白的皮肤泛着粉红色，长得比预想的更加令人喜欢一些，有点荷兰年轻女子的气质。这或许是亚速尔出产大量牛奶和她法亚尔的一位佛兰德先祖的遗传所致。

当葡萄牙还迟迟不肯放弃紧身衣的时候，她已经决定穿伦敦时兴的运动服了，那是她在桥牌俱乐部翻阅《伦敦图片新闻》时发现这种时尚的。

她举止潇洒，迈着富有弹性的大步，身穿运动服，脚蹬时髦的半高跟鞋，更显出其外国人的风度，而且受到卡什凯什草地网球俱乐部那些同样游手好闲但已不那么年轻的成员们的青睐。

玛利娅·马法尔达是在卡什凯什举行的一场网球比赛上认识达希西奥·德·帕依瓦·古特雷斯的。这位澳门青年有着运动员似的健康体魄，是个富家子弟，正在里斯本拖拖拉拉地学习法律课程，像一切无须为每月定时收到慷慨的生活费而担心的人那样过着轻松的生活。他还经常光顾首都各网球场，打球技术还说得上过去，足以常常参加当地的比赛。

小伙子迷上了玛利娅·马法尔达北欧人似的白皙的皮肤，迷上了她那灰色的眼珠，迷上了她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一头金发。除了对方好看之外，“半个东方人”带着个如此“外国人”的妻子招摇过市的虚荣心也起了作用。

对马法尔达来说，除了共同爱好体育之外，尤其是对方经济上宽裕、大大方方地请她饮贝纳多或塔马里斯茶，使她非常喜欢；其次，也喜欢他那双稍稍有点像巴旦杏的黑眼睛和他那平静而显得老实的性格。

他们从相识轻而易举地成了伙伴，从伙伴轻而易举地成了朋友。不过还没有成为情人，因为对社会习俗的敏锐感觉阻止她那样做，而小伙子由于有些腼腆也不表示反对。

当时，几个月以后达希西奥向她提出要结婚的时候，玛利娅·马法尔达现实地向他提出了一些诸如未来的前途、他们在哪里居住、生活来源、如何处理已忘记一大半的课程等问题。他对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没有明确的想法，不过，估计每月丰厚的生活费用仍然会保持，并且，为了供养家中增加的人口，费用会增加一些。姑娘劝他首先探听一下父母的想法，达希西奥同意了——他绝不会想到过不同意——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他想跟一位年轻姑娘结婚，此

人出身名门，差不多是贵族，长得像个英国人，可惜经济上不够富裕。

在澳门，他的父亲恩里克·古特雷斯和他的母亲唐·莉维娅·巴纳雷斯·德·帕依瓦对儿子学业上的前途已经不抱多少希望，从这桩婚事上找到了一种培养儿子责任感的方法。他们不再相信儿子拖拖拉拉、糊里糊涂地学习法律课程会有什么成果，甚至眼下连取得学士学位的可能性都没有；每月定时给儿子生活费对父母来说倒也不是什么沉重负担，他们担心的是，儿子远在葡萄牙，花天酒地、无所事事，越来越对公司的利益漠不关心。尤其是现在，他唯一的姐姐玛利娅·卡尔门与上海富商雅辛托·雷梅迪奥斯结了婚，没有人继续管理在澳门的企业。

因此，他们回信告诉儿子，说看到儿子终于决心成家非常高兴，并且对方家庭极好，还会使血统更加纯正。所以他们同意这门亲事，但实际上是因为，一方面看到儿子继续学业没有多少前途可言，另一方面，父亲已经心力交瘁，公司的利益也要求他来到澳门，于是提出的条件是婚后夫妇二人必须在澳门定居，让达希西奥逐渐担负起领导公司各项事务的责任。

玛利娅·马法尔达则要求考虑几天。她征求了在亚速尔的家人的意见，家里不阻碍这门婚事，因为小

伙子和她未来的公婆经济状况优裕；她还征求了在里斯本的舅舅和舅母的意见，他们的态度倒有些犹豫：舅母是由于小伙子祖上是东方人，这一点有可挑剔之处；舅舅想的是，一旦外甥女离去，他就不得不再找一个打桥牌的伙伴。

究竟是平分秋色还是打个小满贯呢，玛利娅·马法尔达冷静地考虑了达希西奥的先祖是东方人这个实际问题。她觉得，达希西奥长相一般，黄褐色皮肤略带橄榄色，非常黑的巴旦杏眼，头发又黑又密，微微一笑就露出整齐的白牙齿，人们很容易把他当成欧洲南部人，或者至少当成阿根廷人。另一方面，他身材高大，腰板挺直，俨然一副运动员的模样，喜欢运动，总是那么朝气蓬勃，也符合她的喜好和性情。她认为此人是个名副其实的运动员和绅士。另外，从未见过的东方的诱惑也是一个冒险的刺激，这不会使她讲究实际的精神感到不快。

玛利娅·马法尔达得出了结论，她爱达希西奥。毫无疑问，并非充满激情地爱，但足以让两人共同生活，一种既不狂热又不会坠入妒忌深渊的生活。对于两人结婚而言，这就足够了。

婚礼简朴而别致，先在小教堂做弥撒，然后在她舅舅的贝拉斯庄园的花园举行招待会。《葡萄牙画报》

对婚礼进行了简短的报道——玛利娅·马法尔达认为过分简短了——并附有一张有些模糊的夫妇二人的照片。

出席招待会的宾客不多，但都是从最好的亲朋中挑选出来的，尽管与这些人关系并非最密切，例如一些男爵和网球及桥牌俱乐部的伙伴。当然，他们个个出身高贵。

新郎的亲戚都没有参加婚礼，因为他的父母认为，没有必要让他们长途跋涉打乱他们平静的日常生活。他们提出的理由是，父亲必须管理公司，不能脱身，而莉维娅太太身体欠佳，实际上她因为爱吃澳门多汁的饭食而易肠胃胀气，肚子里常常咕咕作响，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病症。不过，他们如数把资助婚礼的钱提前汇到了。当然应该这样。

新娘的父母和兄弟从亚速尔来了，他们要认识一下这位家庭新成员；新郎的慷慨大方很快让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舅父母有些沮丧，但玛利娅·马法尔达却没有表现出多么伤心，她在圣阿波罗尼亚与他们告别的时候祝男爵赢个大满贯，接着便与达希西奥上船在欧洲进行新婚旅行，然后直接前往东方。在当时的世界首都伦敦和巴黎作了短暂停留之后，他们在马赛乘上一艘

前往香港的邮轮。途中曾在苏伊士下船游览金字塔，但这座古老城市和其他任何文明国度的兴衰没有引起这对年轻夫妇的特别的注意和深刻的思考。游历了繁华兴旺的欧洲各国首都之后，开罗的炎热、尘土和贫穷只能使他们感到扫兴。

这次旅行——可以预料，费用由公婆支付——令人满意。他们所住的特别头等舱的房间宽敞舒适，食物极佳，船上还安排很多娱乐活动：玩纸牌，舞蹈茶会，还有打桥牌；晚上在正式舞会上可以度过令人惬意的时光。这对夫妇年轻，善于交际，不难溶入这临时组成的高贵的小社会之中，玛利娅·马法尔达在其中虽然算不上什么头等明星，但也感到如鱼得水。

4

对澳门的头一个印象是压抑！

他们是5月底到的，那时的天空阴暗、低沉、乌云密布，不时泻下一阵瓢泼大雨。香港港口失去了往日的颜色，远处的山峰成了黑糊糊的令人胆寒的阴影。由于天气不好，不能参观那座城市，于是决定乘夜间的渡船直接前往澳门；达希西奥和父亲办理托运行李

的时候，玛利娅·马法尔达住进了预订好的香港酒店的房间。这样，初次接触这个具有传奇色彩而又充满神秘的远东名港就仅限于一个维多利亚式酒店阴暗的门厅，他们在那里喝了杯半凉不热的茶，吃了块已经有些发硬的烤饼。

前往澳门的旅途没有驱散她最初的坏印象。渡船破旧，也不干净；上船的时候，玛利娅·马法尔达扭过脸去，以免看到挤在三等舱里的平民，他们被栅栏门挡住，不能到上面甲板上来，一个劲地朝这对夫妇张望。

当他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心情依然不好，再加上天气还是那样阴沉，所以还是立即到家里去为好，不在船上等待天明。乘自家的克莱斯勒汽车很快便到家，这短短的路程不能使她的印象有所好转。

她觉得码头上的有虫蛀痕迹的桥板既很肮脏又不够安全；在黑暗中经过的新马路两旁的房屋显得寒酸、陈旧，甚至位于龙嵩正街上的丈夫家的那座为迎接他们而重新粉刷过的大房子，她也觉得很凄凉。

在以后的几天里，这种凄凉的感觉有增无减。

她已经习惯于色彩斑斓的里斯本，习惯于湛蓝的天空和干燥的气候，并且由于匆匆游览欧洲各国首都和参加法国邮船上的热闹的社交活动而头晕脑胀，所

以更觉得这座城市肮脏和破旧。气候炎热而潮湿，天空低沉而压抑，像每年这个季节一样不时下一场倾盆大雨，使她觉得这里更加破败不堪。更糟糕的是，这座城市有一种奇怪的气味，至于究竟是什么气味，她也弄不清楚，反正她不喜欢。

像民众的贫穷一样，这里不讲公共卫生显而易见。

所有低矮的小屋，甚至富人区的大宅院，全都需要粉刷，因潮湿而出现的一片片黑色弥漫开来，像一个得了难以启齿的病症者脸上出现的一块块疮斑。

对于公婆的大住宅，她似乎也产生了同样凄凉的印象。达希西奥的姐姐玛利娅·卡尔门前往上海之后，一个个锁着门的大房间一直没有一丝声响，使这里显得更加沉闷；屋里的家具很贵重却不舒服，红木家具太多，既沉重又阴森，一面面大镜子因为气候的关系和年长日久而模糊不清了。

公婆很好地接待了她，显得有些客气，而她没有做任何努力来改变公婆的这种客气态度。他们本来想，达希西奥是唯一的儿子，应当和父母住在一起，为此，他们准备了一个窗户向着大街的大房间，里面摆上家中最好的古色古香的桃木家具。这些家具本来是生活富裕的标志，但不符合习惯于在里斯本生活的儿媳所期望的在腰缠万贯的公婆家里能享受到的现代舒适的

标准。

度过了最初的心灰意冷的时刻，她用务实的精神开始反抗了。她说，作为儿子和儿媳，他们打搅了父母宁静的生活，况且，在这座大宅院里也不能进行她所希望的社交活动，不能组织打桥牌和同代人参加的晚餐会，否则就会影响老人们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而他们是有权保留其生活方式的。就这样，她轻而易举地说服了丈夫，必须有自己的房子，按照自己的喜好装饰的、有利于他们两人未来生活的房子。在经济上没有什么困难，因为他的家庭是澳门当地社会中最富有的家庭之一，在全市各地有好几处房子，有些租给他人，另一些被公司各业务部门占用。在感情方面也没有什么障碍，对父母来说，儿子长期在里斯本，女儿去上海已经几年，他们已经习惯于单独生活，所以他们会乐于恢复原来平静而有规律的生活。

无需多说，达希西奥就完全同意。他早就发现了妻子与澳门、与父母及这古老的住宅刚一接触便产生的沮丧情绪。他本人也还没有能把被前往里斯本而剪断的生活之线连接起来。他还发现，父亲和母亲，尤其是莉维娅太太，虽然待他们很好，但对儿媳总是保持着某种客客气气的态度，他猜想，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儿媳对他们冷淡，与他们有隔阂。达希西奥虽然从

心底里敬重父母，但要说想有自己一个单独的小家也不会感到为难。况且，在一个像澳门这么小的城市里，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再到一起生活，这样可以防止长期住在一起所造成的一些小小的不愉快。

于是，还没有把决定告诉父母，达希西奥便辞退了司机，自己开起那辆克莱斯勒车来，两个人开始兴致勃勃地“视察”他家的各座住宅了。

玛利娅·马法尔达现在已经以另一种目光、另一种心态看待这座城市，恢复了头几天失去的热情；她用与其说是居民倒不如说是旅游者的兴趣看着一条条葡萄牙式的窄小街道，看着在广场上和马路上投下巨大阴影的枝繁叶茂的大树，看着富人区一座座住宅和大房子，看着巴萨尔区寒酸的低矮的房屋，看着历经几个世纪而变得黑糊糊的庙宇，看着熙熙攘攘辛勤劳作的居民。她开始怀疑自己原来的想法，最后不无犹豫地承认，澳门可能有某些迷人之处。过些时候设法抓住它。过些时候……

5

他们衡量了各处可能居住的房子的利弊。两个人

都认为，“他们的”住处应当符合某些条件：要宽敞并且位置要好，所谓位置好即在本市一个“好的”地区；其次是风景要好，还要有个花园，花园小一些也可以。除此之外，达希西奥又以他东方人祖传的心理增加了一条：风水要好。所谓风水，即所处的位置、大门和窗户的朝向和各种自然因素的组合形成的一种难以捉摸、飘忽不定的东西，它的好坏将关系到他们夫妇二人能否得到家里的神仙或者能让他们生活幸福、兴旺的其他神仙的保佑。

他们首先排除了已经出租的房子，因为让房客腾出房屋既耗时又费事，况且，他们对所有出租的房屋都不中意。他们也排除了那些用于公司业务的房屋，因为从其大小、位置或者重新装修的困难程度来看均不适合他们夫妇二人居住。最后，他们把目光集中到两处，一处是洗衣房旁那座近乎被遗弃的住宅，另一处是南湾街那座旧房子，房子的底层是航运和进出口公司所在地，同时也是冰岛象征性的领事馆的办公地点。因为恩里克·古特雷斯老人还担任着名誉领事的职务，冰岛是为了感谢老人帮助该国生产的大西洋鲱鱼打开东方市场而授予他这一头衔的。房子的上面两层是办公室和仓库，但并没有充分利用。房子前后两面都有宽阔的凉台，凉台都有带殖民风格的拱门。那房

子只要进行一番彻底的装修，就能成为理想的住宅。

达希西奥表示更喜欢洗衣房旁的住宅，但玛利娅·马法尔达却提出不同意见，说那里远离市中心，交通不便，与世隔绝。她说，住宅应当离丈夫的工作地点近一些，必须让公司的门面符合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她就这样毫不费劲地说服着丈夫，他们可以占用上面两层，把底层留给领事馆和公司主要办公室。丈夫看到妻子的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芒，自从来到澳门以后她就没有这样兴奋过。这时候玛利娅·马法尔达向他描述未来的住宅了（她没有使用“家”这个词，认为它有点土里土气）。房屋正面仍然保持原来的设计，因为它显得比较雄伟；底层的橱窗是后来为航运公司打开的，应当重新堵上，代之以原来的拱门，和上面两层相一致。还要拆掉那个很大的红色灯光招牌，用一个写着斜体字的金属牌钉在公司大门旁边，就像她在巴黎奥斯曼大街看到过的一样。

但是，第二层和第三层的内部要彻底翻修。二层是休息室、餐厅、书房、餐具室和厨房，三层是卧室、浴室和一间小休息室。家庭佣人住在花园最里面，这样就不难建一个面积正规的网球场。

玛利娅·马法尔达兴奋异常，给丈夫描绘两个人的未来：经常举行社交活动能促进公司的业务发展，并

且能提高达希西奥的地位。总之，他们将重新开始在里斯本的生活，而且更加光芒四射，是那段生活让他们亲近起来的。

妻子的兴致马上感染了达希西奥。就在当天吃晚饭的时候他提出了这件事，当然，方式颇为讲究，因为他不想让父母伤心。

令他吃惊又让大家松了一口气的是，父母没有提出任何有分量的异议。母亲当下就痛痛快快地表示同意，按照玛利娅·马法尔达的看法，她答应得过分痛快了。父亲稍稍表示出一点儿犹豫，但莉维娅太太一反往常唯命是从的态度，站到了儿子一边，说强迫像儿媳这样的年轻女子住在这座阴森森的大房子里陪着两个老人，既不合情理也不会令人愉快的，因为她习惯了年轻人的热闹和里斯本上层社会五彩缤纷的生活。恩里克·古特雷斯没有再提出什么异议，同意了。

6

改造南湾街住宅的浓厚兴趣使玛利娅·马法尔达明显地变了样。达希西奥偶尔帮助她一下，虽然也兴致勃勃，但总是有点心不在焉。他们从香港雇了一个

葡萄牙血统的装修设计师，此人对这座房子赞叹不已，建议恢复其正面原来的设计风貌，只是根据当地气候对粉刷的颜色稍加改变。但是，玛利娅·马法尔达坚持房子正面要刷成白色，装上深绿色的百叶窗，和她父母在亚速尔的房子一样（因此，当地好事者后来给它起了个外号，叫“绿窗户博物馆”）。仍然归公司使用的底层和仓库内部不加改动——公爹执意不让改动——但第二层和第三层按照她的意见进行了（或者说遭到了改建）。设计师提出了一个又一个草案，随后又根据玛利娅·马法尔达的要求一次又一次修改。终于开始施工了，但她总是指手划脚，强行干预，弄得设计师、承包商、工头和工人们无所适从，只能干着急。

达希西奥只是有节制地关心工程的进展情况，他更感兴趣的是熟悉公司的业务。小伙子身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吊儿郎当的大学生现在变成了一个全心全意而又机灵的新商人。他接触企业的各个部门，与各个部门的负责人交谈，千方百计地了解每一位职员并与他们建立个人关系。他善于博得众人的好感，处处表现出好学的愿望，使人觉得这位未来的经理和业主没有架子，不那么威严。他到处了解情况，微笑着承认自己对商业一无所知。

尽管头脑中也有些想法，但他从不提出什么意见，

而只限于观察和汲取知识，然后，在与父亲单独在一起时才向他报告自己所看到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他也和父亲谈到他在企业中的职务问题，父亲建议他担任股东并兼任两个经理职务当中的一个。他满怀感激地同意了，但对父亲说自己既没有商业知识也没有经验来管理公司的所有商业活动，况且公司的业务范围现在更加扩展了（各种商品的进出口、保险和旅行公司、印染厂、冰岛领事馆名誉领事），因此，他想逐步接触各个部门，在父亲监督下一边工作，一边向各部门的负责人学习。父亲对儿子的态度很是满意。于是，家中原有的隔阂便随之烟消云散了。

7

虽然玛利娅·马法尔达一再兴致勃勃地干预，南湾大街那所房子的改建工程进展迅速；几个月后便开始购置家具了。尽管公婆愿意赠送，但他们只要了几件欧洲人特别喜欢的蓝白相间的中国瓷器，没有接受龙嵩正街那所大房子里任何家具。这倒也没有让莉维娅太太产生什么不快。

玛利娅·马法尔达和丈夫到香港去了一趟，这一

次只是两个人去的，住在九龙半岛酒店。夫妇二人——妻子比丈夫更加主动——根据装潢师的建议购置了家具、窗帘、小地毯和瓷器等等。

既然对开支没有明确限制，并且商店里的货物应有尽有，所以他们精心挑选，不管多么昂贵。玛利娅·马法尔达看不上当地生产的中国式和西方式家具，喜欢从欧洲进口的产品以及波斯和天津的小地毯、伍斯特的瓷器和波希米亚的水晶器皿。

购置物品的帐单直接送到了公司，公爹虽然一向慷慨大方，但对儿媳如此挥霍他的钱财也感到心中不快，不免要进行指责。不过，这女人轻而易举地让老人安静了下来，她说儿子的幸福和为返回这座令人昏昏欲睡的大宅院而付出的代价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至于佣人，有一部分是从公婆那里转来的，是公婆临时“出让”给他们的，另外还有从外面雇来的两个女佣（达希西奥的老奶妈拒绝前去）。

至于厨师，他们通过家里的老厨师找到了一个原来在军人俱乐部食堂干活的人，但此人听葡萄牙语很吃力，做的饭食更加糟糕。不久他们找到另外一个人代替他，让大家松了一口气，厨师本人也松了一口气。

洗衣工也作厨师的下手。花匠是在市政厅花园干

活的一个很能干的临时工，兼职管理这里的花园，因为夫妇二人暂时放弃了建造网球场的打算，以免拖延住进新家的时间。

以澳门的标准来衡量，所用人员并不算多，但她认为这样反而更好：付给他们高工资，要求他们干得出色。她相信，只要严加监督，就一定能做到。

8

经丈夫建议，两人决定在新住宅为家人举行第一次招待会，玛利娅·马法尔达也不温不火地同意了，因为改建和装修房子的一切开支都记到了公司的帐上。

他们当面邀请父母参加招待会；对于关心他们的其他亲属和朋友则发出请帖，请帖上印着被邀请者的名字。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按照当地习惯带孩子们来参加，玛利娅·马法尔达认为这是个令人无法接受的陋习。由于达希西奥一再坚持，还邀请公司的高级职员、几位商人和原来的同事携夫人参加。

招待会采取当地饮下午茶的方式，摆上各式各样的澳门小吃。玛利娅·马法尔达并不喜欢这些食品，觉得太油腻，而且没有什么特色。但一开始作出一些让

步也必不可少，但愿就这一次，下不为例。

这次聚会还算成功。食物丰富并且花样很多，样样都带着汤汁带着油水。还有很多种酒，极为丰盛。

在原来家里的佣人帮助下，新家的佣人干得还算得心应手，打破的餐具和玻璃器皿比预想的要少（玛利娅·马法尔达决定把英国瓷器和捷克斯洛伐克水晶器皿收藏起来，所以现在使用的器具都是公婆给的）。这次聚会没有往常那种孩子们的喧闹，没有弄坏聚会厅里的油漆木地板（小地毯早已撤掉了，以免弄脏）。

绅士们酒足饭饱，一个个拖着疲软的身子来到凉台，坐在垫着彩色软垫的印度硬木椅上，饮法国白酒，抽哈瓦那皇冠牌雪茄烟；凉台上中国式大瓦盆里的小棕榈树与白色瓷砖墙相辉映，使夜晚显得更加凉爽。

年轻的女主人恰如其分地扮演了她要扮演的角色，彬彬有礼，不卑不亢，神态高雅。她穿行于众人之间，对每个人都说出句亲切的话语，报之以淡淡的微笑。

人们的意见不一。尽管所有的人都认为饭菜丰富、可口，服务效率极高，齐声赞叹房子的装潢豪华、得体，但是，当绅士们夸奖女主人高雅出众、富于魅力的时候，那些别有用心或者心直口快的女人们则说她趾高气扬、装模作样。

对家庭和公司尽过义务之后，玛利娅·马法尔达总可以致力于开发她在自己身上发现的天赋了。她将成为澳门最突出的女主人、最高雅的女主人。

而达希西奥也支持妻子的兴趣，这不仅因为看到她有事可做，而且也由于这种生活有利于公司的威望——现在已经改称恩·古特雷斯父子有限公司了。

他表现出杰出商人的才能：尊重公司里最有能力的职员的意见；考虑其他职员的意见并向他们解释为什么做出这样或那样的最后决定。他小心谨慎地逐步实行他认为适当的改革而又不影响正常的贸易业务；改善最富于开拓精神和最努力的职员的待遇；开始向跟不上公司蓬勃发展步伐的职员发放小额退休金；关心公司人员的家属，见到每个人都友好地打招呼。

在与外界交往中，他也表现出同样的朴实无华、和蔼可亲。对年长的商人，他毕恭毕敬，请他们提出建议但并不一定总是采纳，倾听他们的意见但并不一定总是赞同；对于年轻人——他们是企业中生机勃勃的力量——他总是有求必应，表现出同乡的情谊，这都冲淡了妻子那高雅的冷漠造成的影响。

父亲逐步把公司的贸易业务交给儿子管理。他承认自己老了，力不从心，对职员们缺乏耐心。他为儿子的成就感到高兴。儿子受到职员们的欢迎，被这块

小小的殖民地的商界所喜爱，他并不嫉妒。虽说儿媳并非他原来所希望的“那样的人”，但他仍然为这桩婚事而感到庆幸。这桩婚事毕竟使儿子脱离了游手好闲的放荡生活，回到了他的身边，走上了正路，让公司在他们世代居住的这块土地上继续发展下去。

他也考虑辞去冰岛名誉领事这个没有报酬、纯属个人性质的职务。但是儿子在儿媳鼓动下坚持让父亲继续担任，说它便于公司开展对外贸易。玛利娅·马法尔达觉得无需挑明心中的想法：在不久的将来就能看到达希西奥接替的这一职务，作为正式外交代表大放异彩。

玛利娅·马法尔达已经是澳门最有前途的年轻商人高雅的妻子，但她认为这个地位倒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她正在发现自我、实现自我。

她扩大了自己的社交圈，除了本来就喜爱的网球和桥牌之外，她开始对官方在当地举行的慈善事业感兴趣，而且，这方面的兴趣还越来越浓厚。她参加救济拍卖活动，在圣诞节为穷人捐款。虽说她认为贫穷的百姓大都不能正确估价她所做的努力，但她感到这样做无愧于良心——其实她从来未曾感到过有愧于良心——并且能让她名正言顺地与本殖民地的第一夫人及妇女界要人一起出头露面。

虽然内心感到厌烦，但她还是开始参加宗教节日的茶会，并且心不在焉地出席在岗顶戏院举行的文化晚会。她对宗教不感兴趣，但这不妨碍夫妇二人参加官方举行的重要宗教仪式。

如果说朋友圈依然如故，那么她的社交圈扩大了。除了网球场和桥牌桌上的伙伴之外，现在她又逐渐与军人和公务员那个不大的世界里的重要人物和他们的夫人们建立起联系。她举办的聚会上开始出现一些土生葡人，虽然为数不多，但都是些在财富、家庭或魅力方面突出的人物。

她招待会的豪华晚餐开始受到本市葡萄牙语群体的重视和评论——当然仅限于当地狭小的上层社会。

在厨师的人选方面，经过多次试验得到一次次令人失望的结果之后，终于使香港酒店的一位老厨师同意到她家工作。

老厨师之所以肯来，一则是由于这里薪金丰厚，另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年迈，已经被香港酒店辞退。

这位阿王厨师很有烹调经验，根据从英国殖民地买来的那本法国菜谱，又对当地市场上缺少的一些原料作了适当的调整，他们总算做出了还算说得过去的法国饭菜。公司是葡萄牙和法国葡萄酒及奶酪的代理商，为她提供最好的葡萄陈酒和新鲜奶酪。

她不喜欢四对或六对以上的夫妇参加的聚会——大家都参与的高雅的谈话最理想的是不超过 12 个人。她设法让客人当中有几个是单身的，那样谈话的气氛就更加令人振奋；她还设法邀请兴趣不同的客人，免得没完没了地谈论与他们职业有关的话题；由于当地地方很小，所以她总能邀请到一些有一点艺术修养、精明、善谈、有地位或者举止高雅的人。作为对丈夫的让步，她也邀请一些商界人士。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有教养，懂得“该怎么做”。

她喜欢别人称赞她的房间布置得体、服装入时、饭菜丰富可口、招待周到，但又不过分恭维。

晚餐上，她常常拿出法国香槟，乐于让客人辨认出这种名酒并且赞扬一番。

9

虽然公爹很不乐意，她还是利用他的领事头衔在冰岛国庆日那一天为澳门和香港为数不多的领事馆的最主要人物组织了一次晚宴。她说旅维利酒店和佳景酒店不够舒适，而对公婆来说龙嵩正街的大房舍又有不方便之处，这就足以说服两位老人让她在南湾街的

住宅里举行晚宴。

她邀请了澳门的主要官员、驻当地的各领事馆领事全都出席，驻香港的部分领事也应邀前来（因公来澳门要列入代表机构费用，所以总是参差不齐），出席的还有社交界的显赫人物。华人群体中的半官方代表人物头一次受到邀请。

地方虽然不宽敞，但招待会举行得很成功。客厅布置得朴素典雅：灯光柔和，蜡烛和鲜花摆放得当；凉台上式样新颖的家具和各种热带棕榈交相辉映，还为年长的客人专门准备了小桌子；菜肴桌上是精心挑选的西方清淡食品，只有两种当地小吃供外国美食家们品尝：薄壳螃蟹、卤煮童子鸡、凉熟肉、肉饼、奶油冻、肉冻，还有冰岛产的大西洋鲱鱼，葡萄牙和其他国家的点心和冰激凌，以及公司提供的葡萄牙奶酪和葡萄酒。

用波默里酒和陈年波尔图葡萄酒为葡萄牙国家元首和在场的其他宾客所代表的国家元首干杯（恩里克·古特雷斯老人虽然不大情愿，但仍然担任着冰岛代表的职务）。

晚宴的服务没有出什么差错，侍者在从旅维利酒店“请”来的服务生帮助下干得尽心尽力，还算说得过去。为这次活动雇来的本市乐团两位吉它手分别在

两个凉台上演奏轻松的流行乐曲。

女人们穿着长裙、男人们穿着晚礼服或者军服，显得豪华而高雅。玛利娅·马法尔达身材苗条，坦胸的长裙上镶着的珍珠与佛兰德人稍显玫瑰色的白皮肤正相匹配，与身上唯一的一件宝石胸针相得益彰，那是公婆送的结婚礼品。她巧妙地担负起（用不太客气的说法是篡夺了）领事夫人的角色，对每位宾客都潇洒地打个招呼，祝愿他们过得愉快。她并不算漂亮，但毫无疑问成了晚宴上的女王。

在整个晚宴过程中，只有一个不和谐的音符使招待会一度失去光彩：古特雷斯老人举起香槟酒杯，再次重复那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背诵下来的话，为宾客们代表的各国元首干杯时，他旁边的莉维娅太太有点紧张（她毕竟是冰岛领事夫人），神经性消化不良又发作了，忍不住突然打了个响嗝。

丈夫的讲话稍稍停顿了一下，客厅里一时间有些尴尬，玛利娅·马法尔达不知如何是好，愣了几秒钟，但马上又笑脸盈盈地在宾客之间穿行，走到婆母跟前，以儿女特有的孝顺小心翼翼地帮婆母扶到餐具室，让她能随便一些，休息一下。

虽然领事夫人造成了短暂的难堪局面，但那次晚宴成了进入香港社会的阶梯。从此以后，他们的晚宴上总是有香港为数不多的外交界的一两对夫妇出席，他们也经常收到其他领事馆的正式邀请。玛利娅·马法尔达也通过丈夫邀请那个殖民地商界的一些人物，尤其是英国人。这样一来，葡萄牙宾客的数目越来越少，而中国宾客就几乎没有了。况且，在社交方面，来自宗主国的葡萄牙人群体和华人群体都闭关自守，互不来往。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那时候西方人在澳门华人社会中的影响还很小）都不利于这种接触，再说他们也不设法进行交流。

然而，玛利娅·马法尔达的丈夫与中国工商界人士有着经常甚至紧密的贸易关系，他以此为借口一次又一次在本市中国酒店举行只有男人参加的午餐或晚餐会，并且每次时间都拖得很长。达希西奥很乐于进行这种交往。他性格温和、热情诚恳、天真善良、善于交际——这些都集中在一个文化水平没有多大提高但在当地度过童年的中国人身上——使他轻而易举地

进入了充满东方特点的男人世界。这些场合虽然没有女人，但他可以随随便便，自由自在，毫无顾忌地大声说话，甚至可以讲些带刺激性的笑话，多喝几杯威士忌和香槟酒。

虽然达希西奥并不喜欢听“琵琶钗”们唱歌（他头脑中仍然充满西方音乐价值观），但承认她们能使晚餐别有风味，并且符合东方男人至上的观念。

后来这类轻松愉快的关系不仅能进行所希望的商业交流，而且——这一点只限于自己内心承认——对于在南湾大街住宅举行高雅聚会那略带压抑的气氛也是一种调剂。请不要怀疑，达希西奥并非完全没有虚荣心。他为招待会的高雅而沾沾自喜，乐于发现别人钦佩妻子的美丽和她处心积虑表现出的才干、与众不同的矜持的魅力。

但是，“活见鬼”，在广东式的晚餐上他也很高兴。中国酒店里人声嘈杂，甚至桌边还放着痰盂，他们只穿汗衫，无须顾及社交礼节，说话不用字斟句酌；娇小的“琵琶钗”身穿异国情调的衣衫，上面的金属饰片闪闪烁烁，她们装腔作势地用童音哼哼唧唧，用歌声讨好着充满虚荣心的男性客人。

玛利娅·马法尔达对他参加这些聚会并不干涉。虽然她被排除在外，但这不会影响她的生活方式。她

利用丈夫不在的时间进行别的社交活动，例如与她那个狭小的朋友圈子里的某个人打一场网球，到香港买买东西，在南湾大街住宅的凉台上举办个茶会。

她还跟耶华学校的老师林森·乔先生提高英语水平，以便纠正在里斯本文学院未能改过来的口音。如果还有空闲时间，她就读一读香港的凯利·沃尔斯最新的成功之作。当然，只是泛泛地阅读，但这已经足以让她能在聚会上顺口褒贬几句。

对丈夫经常去参加商业性午餐和晚餐，她既不嫉妒也不怀疑。而她本人也从未有过与来自宗主国或当地的许多男朋友建立什么情感关系的念头。她审慎和冷漠的态度人所共知，马上就能把任何不适当的或者居心不良的关心拒之以千里之外。对于夫妻关系，她要求不高，相当满意，虽然这种关系从来不曾有过多少激情。

她过去和现在都不关心道德、知识或社会方面的问题，也不想关心，她所考虑的尽是一些世俗之事。值得庆幸的是找到的丈夫宽怀大度，对她的这些考虑完全同意，无不满足。对这一点她从来不曾意识到，但认为不应当反对丈夫自己确定的生活。

雷梅迪奥斯博士摇着第二杯威士忌，杯中的冰块喀喀作响。炎热已经减弱，下午正在过去；酒店的凉台笼罩着令人惬意的阴暗，因为粗心的服务员还没有打开乳白色球形灯罩内稍显温热的灯。他淡淡一笑：

“玛利娅·马法尔达舅母是个无可救药的假内行，十足的假内行。可这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不得不承认人们各不相同。她就是这样，无法改变。再说，她的厨师们是第一流的，酒是高档货，客人也都是精心挑选的。

“我带着装在锌皮筒里的毕业文凭从葡萄牙来到这里的时候对法学的各个门类一无所知，可这位舅母热情地收留了我。请注意，这里我没有用双关语。

“我那时还年轻，相貌堂堂——人们都说我长得像达希西奥舅舅——爱说话，来自欧洲。不错，我在伦敦住了一段时间，按她的说法是给她带来了旧大陆文化的清风——这指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说句实话，我从来没有发现自己身上有什么文化修养。

“可是，我人微言轻，怎能对玛利娅·马法尔达舅

母斩钉截铁的判断提出异议呢？我毫不费力地进入了她的圈子里，对此我不后悔，因为这对我并无坏处，我可以借机进行一些有益的交往。我成了公司的律师；通过达希西奥舅舅，我又成了澳门和香港一些商人的律师；通过玛利娅·马法尔达舅母，我成了几个领事馆的律师。

“生活倒是满不错的，至少报酬相当好，肯定对我这样没有什么经验的人来说算是丰厚的。当时我和母亲在一起生活，她寡居之后就回到了澳门。我经济上没有什么困难，属于澳门的‘上层’社会，会打桥牌、打网球！这足以让舅母把我看作她社交棋盘上一个有用的棋子：她桥牌桌上缺人时让我去凑数，晚宴即将开始时有人缺席就让我去填补，甚至有时还和我说说心里话，但这种情况极为稀少。不管怎么说吧，但愿她不因为我的世俗习气而厌恶我。

太平洋战争之前的生活，那是多么美好的生活呀。”

雷梅迪奥斯博士停顿了一下，心不在焉地望着南湾大街上的枝繁叶茂的树木。前边是新口岸的填海地，尚未利用；褐色的大海风平浪静，海那边的大小渔仔岛已经连接起来，在徐徐降临的夜幕下那两个墨绿色的阴影像两条盘起来沉睡的龙，一半沉入水中。他若

有所思，仿佛遥望着 20 年前从大萧条中复苏的 30 年代的社会，那时人们无忧无虑，以歌舞升平著称，他有幸在香港认识的诺埃尔·科沃德演唱的极为幽默的歌曲就是那个时代的写照，玛利娅·马法尔达舅母喜欢读原文的萨默塞特·莫姆写的小说中对那个时代也描述得淋漓尽致。我冒昧地打断了他的沉思默想：

“雷梅迪奥斯博士，巴尔贝斯库伯爵夫人现在怎么样？我对她很感兴趣。不过，我们该走了。”

“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吃晚饭，我就给你讲讲她的事。利维旅酒店的饭菜不能和玛利娅·马法尔达舅母家的相比，但有时候它的平鱼很新鲜，要是你愿意的话还可以加点咖喱。我今天没有约会，这次谈话引起我对那个美好时代的思念。我不喜欢独自一个人呆着。”

对此，我这方面没有什么异议。一则我不想打断他回忆一个我不了解、仅凭别人讲述想象出来的世界而感到的喜悦，二则我们的厨娘阿桂虽然尽心尽力，但她的烹调技术远非出类拔萃。接受这个邀请算不上什么为难的事。

我们就在凉台的那张桌子上吃了晚饭。洞穴似的厅里只有一对上了年纪的美国夫妇和一家中国人，我感到很奇怪，因为当时还难得见到中国人在西餐酒店

吃饭。

12

那时，1941年开始的太平洋战争结束不久。太平洋战争时期澳门的情况我就不谈了，你一定听说过不少。我们都遭受了许多苦难，当然生活方式也大大改变了。不用说，由于战争期间物质匮乏，玛利娅·马法尔达舅母也不可能保持她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水准。不过，她像我们一样，只能适应当时的状况，总算活下来了。尽管如此，对于不至于饿死的阶层来说，社会生活相当活跃。

战后，达希西奥舅舅的公司恢复了原来的地位，并且威望有所提高，因为他和舅母曾帮助过香港和上海的英国难民。另一方面，舅舅在战争期间以他的运气或者远见从未拒绝过以港币付款，港币由于日本人占领香港而急剧贬值，但战后的英国政府立即果断地恢复其兑换率。

虽然当时有种种局限，玛利娅·马法尔达舅母重新开始举行晚餐会。只要受到邀请，我都乐于出席。

一天下午，她打来电话请我去参加晚宴。她从来

不曾想到因为在最后一刻才发出邀请而请求原谅，也不会想到我当晚是不是已经另有约会。这一次她想向我介绍一位新结识的女友，此人是当时仍住在里斯本的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的妻子卢贝斯库夫人的朋友，为逃避战争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政权来到这里，虽然在财富上家境衰落，但仍不失为非常杰出的罗马尼亚贵族。

玛利娅·马法尔达如获至宝，兴奋异常。在此之前，与她共同进餐的人不少，有政治家、高级军官、法官和几位骑士，甚至还有一位勋爵、几位爵士，还有几位大小不等的勋章得主。

但是，她还从来没有接待过、至少没有亲自接待过王室成员，虽则是罗马尼亚卡罗尔国王的王室成员，同时，不仅仅是与她共进晚餐，而且在她家停留很长时间。

我当然很想结识这位夫人。她的生活、经历和使她漂泊来澳门的冒险该是非常有趣吧。

我马上接受了邀请。这一次，与其说是为了舅母家妙不可言的烹调，倒不如说是出于这种好奇心。

我到了那里的时候，伯爵夫人还没有下来。其他客人在凉台上一边聊天，一边饮着威士忌和当时很时兴的苦啤酒。达希西奥舅舅以感激和赞叹的口气谈论

着香港政府使该殖民地在战争期间发行的货币恢复币值的决定，重新繁荣起来的证券交易所和外币买卖。他承认自己一生福星高照。不错，他当然也感受到了战争年代的困难，但命运对他网开一面。他长胖了，但魁梧的身材不难掩盖稍嫌臃肿的体态，并且使他具有了维多利亚家族家长的庄重，也抚平了脸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的皱纹。头发依然浓密，只是两鬓有些发白，而这又使他显得高贵和与众不同。那张微黑的方脸因为惯有的善良表情和常常微微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而显得很亲切，使人产生一种信任感。总之，有一种富有而又沉默、谦逊的风度。

在职务上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之处，企业各个部门都在发展，没有出现什么大的纰漏。

随着时间的流逝，夫妻关系自然相应冷淡。两人虽然已经分别住在各自的卧室，但仍然保持着友情和相互尊重，至少表面上如此。我舅母从来不曾设法干预他的业务活动，也没有发现——或者明智地佯装没有发现——他在夫妻关系方面偶然犯下的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的过错。她也没有发现或者佯作不知丈夫几年来一直与一个逃难的中国女子保持着关系；战争初期丈夫把那个女子从饥饿和“比死亡更糟糕的命运”中拯救出来，把她安置在植物园一带的一个住处，

那女人对这一切心满意足，感激涕零。

玛利娅·马法尔达舅母对自己的体态却不那么如意。尽管每晚都在脸上和胳膊上涂抹厚厚的一层“旁氏”脂粉，她那白白的皮肤明显地苍老了。佛兰德人的体格就是如此，只能听其自然。香港一位理发高手让她总是精心保养的头发恢复了因战争期间物质匮乏而失去的色泽。她从来不曾有多少美丽，但善于充分利用大自然赋予的一切。她总是保持腰板挺直。虽然经过了战争时期，并且注意饮食，但仍然胖了许多，不过，她决定用精心打扮的雍容华贵来代替当年的苗条。

在我准备喝第二杯威士忌的时候，伯爵夫人终于下来了，她一出现便引起了注意。她身材高大，像玛利娅·马法尔达舅母一样的大骨架，但相当瘦。突出的颧骨与其说像拉丁人倒不如说更像斯拉夫人，使她那双涂着眼影和贴着长长的拱形假睫毛的眼睛显得凹陷、更大了。那张大嘴和红红的薄唇掩饰不住一口糟糕的牙齿。更有甚者，那头火红火红的卷发显然是假的，我怀疑是她自己染过的。

她身穿翠绿色衣裙，看上去剪裁得当，但式样已经过时。她没有戴首饰，两只大鞋的高跟都有些歪斜。

她坐了下来，交叉起两条静脉曲张的长腿，露出瘦骨嶙嶙的膝盖和一段细长的大腿。不能不承认，她

立即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她话不多，声音低沉、嘶哑，但不能说没有一点魅力，说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口音，不时夹杂着一些法语。由于是罗马尼亚人，我想她也能说罗马尼亚语。

侍者们又拿来威士忌，立即为每位宾客斟上，因为玛利娅·马法尔达舅母有些性急，不喜欢拖拖拉拉。

我几乎一直坐在伯爵夫人对面。在整个晚餐期间，她很少说话，但胃口很好，酒兴更浓，不断让侍者斟威士忌，而我的舅母却不同，总是根据每一道菜挑选不同的酒。她有点不拘小节，这种随随便便的态度有点让我看不惯。玛利娅·马法尔达舅母一再设法让她谈谈卢贝斯库夫人和卡洛尔国王，这位伯爵夫人却不肯接上话茬，仅仅说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们了，不过知道他们仍然住在里斯本，而她只是偶尔到里斯本去一下。

我有点神魂颠倒了。她的样子很特别，我恍恍惚惚产生一种有点令人不安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或许从前在某个类似的场合见过她。人们知道，那些转瞬即逝的回忆出现在脑际的时候，我们越是要集中注意力去思考它，它却越飞快地消失。她身上有什么东西我仿佛觉得熟悉呢？莫非是她那件绿色的衣裙？我怀疑玛利娅·马法尔达舅母身材瘦的时候曾经穿过，当然

现在不能再穿了。莫非她与过去电影中的某种倒霉的女人有点相似？莫非她到葡萄牙看望卢贝斯库夫人时我在凯什卡什的宫殿里见过她？究竟什么时候、在哪里遇到过她呢？

无论如何，我无法摆脱这奇怪的印象，只得强迫自己把目光转到别的方向，尽管这样做似乎不大合适。

端上了烤牛排，这是已故去的阿王厨师的儿子和继承人阿梁做的，做得无可挑剔。这时，玛利娅·马法尔达舅母让侍者拿波默里酒来，因为伯爵夫人曾表示过喜欢这种酒。实际上，直到这时她才放下威士忌酒杯。现在用的是高脚细酒杯，我舅母喜欢用它喝香槟酒。伯爵夫人把酒杯举到眼前，对着灯光欣赏它清澈透明的漂亮颜色，杯子里闪闪发光的泡沫像是在活动一样；她饮了一口，用的时间很长，这不大符合讲究的规矩（我本指望她会用舌头发出啧啧的赞叹声，但没有出现），接着断断续续地低声说：

“噢，波默里酒……我太喜欢喝波默里酒了！”

我心里一惊。明白了，我明白了。是在沙面。

这是战前两年的事了。我来到澳门不久，经常与一伙无所事事的人在这个酒店吃饭，就坐在里边那张桌子上。其中有一个人是医生，人称马尔克斯·达·科斯塔博士，他对古陶瓷和中国新陶瓷很感兴趣。当时我开始收藏瓷器，还有点缩手缩脚、小心翼翼，因为刚刚进入社会，不想过多地依赖母亲。

马尔克斯·达·科斯塔通过他认识的古董收藏家阿明老人了解到，在广州的一家古董店里有一座18世纪的法国钟表。当时买古董的人不多，价钱也合算。他问我是不是肯去一趟，我没有别的事可做，就同意了，但心里想，除非有什么便宜货，否则坚决不动心，所以就没有带多少钱。

我们乘夜班船沿江逆流而上，第二天早晨便到了广州，准备乘半夜的船返回澳门。

我们到古董店一看，大失所望。那个钟表——如果就是他所说的那座的话——既不是法国货也不是18世纪产品，而是19世纪末的美国货，并且向大胡子欧洲人马尔克斯·达·科斯塔索要的价钱高得惊人。

我们继续沿广州的街道寻找瓷器，虽然我下定了决心，但在傍晚时还是被印度公司的一个很漂亮的玫瑰红大盘子、一个汤盆和一个长盘吸引住了。价钱都比我想花的钱贵得多，但我没有能抵挡得住诱惑。

我们在北边的一家酒店吃了晚饭，吃的是味道极佳的北京烤鸭，饭后我提出立刻返回船上，因为买了这些东西之后口袋确实空了，但马尔克斯·达·科斯塔没有买成钟表，钱还在，心里痒痒，马上表示反对我的主意。从现在到开船这段时间我们干什么呢？现在就走，简直是胡闹；再说，沙面区的金龙酒店有舞会，还有妙不可言的陪舞女郎，价钱非常便宜。

我承认他说得有理，于是把汤盆和长盘分别夹在两个腋下——马尔克斯·达·科斯塔慷慨地为我拿着玫瑰红大盘子——朝沙面走去。沙面是珠江里的一个小岛，由一座小桥与城市相连，那里有各国领事馆、租界、最好的酒店、舞厅、外国人住宅。总之，是人们享受生活的地方。

金龙酒店里的舞场，宽敞豪华，金碧辉煌，还镶着许多镜子，挂着淡红天鹅绒。屋顶上带水晶饰物的大红灯笼照得屋里忽明忽暗。

在四周偏僻的角落，摆放着供两人使用的小桌子。两个乐队在轮番演奏，一个是菲律宾乐队，一个是欧

洲乐队。中间是舞池，乳白色的地灯从下边往上照，使跳舞的人表情千变万化，有点像妖魔鬼怪。最里边是酒吧，沿酒吧两边镶着镜子的墙壁，陪舞女郎们一字排开，她们大都是个子不高、身材苗条的中国姑娘，个个亭亭玉立，身穿极为合身的绣花旗袍，旗袍两边的开口很大，露出一大半柔软的大腿。

还有几个高加索一带的女人，难以确定她们属于什么民族，大概是1917年革命后逃出来的俄国人，也许是难民的后裔。她们当中有一个火红头发的女人最为突出，她已经不太年轻，身穿翠绿衣裙，一直不停地吸着烟。可以肯定地说，她很华丽，在半明半暗的灯光下远远看去，显得满不错。那天晚上马尔克斯·达·科斯塔对娇小的中国姑娘装腔作势的哼哼唧唧不感兴趣，便打发侍者把她请到我们桌上来。

她那张大嘴巴的红红的薄嘴唇上露出机械的微笑，坐下来，交叉起双腿，深深地吸了一口当时还不带过滤嘴的切斯特菲尔德香烟。我的朋友问她喝点什么，她抬起涂着浓浓眼影的眼睛对待者说：

“一瓶波默里酒。”

对于她这昂贵的喜好我没有在意。她是马尔克斯·达·科斯塔的客人，而马尔克斯·达·科斯塔没有买到那座18世纪的钟表，还有足够的钱支付她随心所

欲的花费。

那女人举起漂亮的淡黄色香槟酒杯，望着带气泡的波默里酒，眯缝起眼睛，喃喃地说：

“啊，我太喜欢喝波默里酒了。”

乐队正在演奏“修女”，这支乐曲当时非常走红，直到今天人们还能听到。她请我跟她跳舞，这使马尔克斯·达·科斯塔有点扫兴。我跳得不好，但她却是个很好的舞伴。她把手搭在我的脖子后头，身体紧紧地贴在我身上，我的手掌分明感到她那薄薄的翠绿色衣裙里面的瘦骨嶙嶙的后背。我们跳起了贴面舞，她把嘴凑到我耳边，用稍带沙哑的嗓音低声说：

“亲爱的，你很漂亮，比你那个粗俗的伙伴……漂亮得多……”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她又说：

“你愿意……嗯……愿意到我住的地方去吗？我们一起安安静静地喝酒，听柔和的音乐……”

她决不是我要找的人。尤其是我想起了从印度公司买了价格不菲的汤盆、长盘和玫瑰色大盘，钱包里已经所剩无几了，并且还要买回澳门的船票。

“说心里话，我非常愿意，但我必须很快就走，因为不想误了去澳门的渡船……”

“噢，这不太可惜了吗？下次再来，好吗？”

“我会非常高兴……”

我们坐了下来。马尔克斯·达·科斯塔不满地望了望我，站起身请她跳舞。我看着他们，他们跳的是“头贴面”舞，因为她几乎比马尔克斯·达·科斯塔高出整整一头。不过，马尔克斯·达·科斯塔虽然又矮又胖，但舞跳得很好。他踮着脚，脚跟几乎碰不到舞池那乳白色毛玻璃地板。他真是个卑鄙小人：要么是为人品德低下，要么是作为舞伴身材矮小，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她低下头，在他耳边嘟囔了句什么。我几乎能猜到：

“亲爱的，你很漂亮，比你那个混血伙伴……漂亮得多……”

他们走过来的时候，我站了起来，以为他们要坐下，但马尔克斯·达·科斯塔仍然拉着那姑娘的胳膊，用葡萄牙语低声对我说：

“我要跟她一起出去。你来付钱吧，等回到澳门我们再算帐……”

他一直紧紧拉着那女人的胳膊不放，不等我回答便挺着胸脯走了出去，仿佛想用身体的宽度弥补高度上的不足。我惊呆了，站在桌子旁边，守着冰桶里没有喝完的波默里酒，不知如何是好。

□ 康乃馨译丛

侍者看到只剩下我一个人，殷勤地走了过来，用他那混杂的英语问道：

“想再找个姑娘吗？欧洲姑娘？”

“不要，谢谢。”

“要个年轻的中国姑娘？非常好……”

“不要，现在不要……”

“再来一瓶酒？”

“不要，谢谢。”

他看了我一眼，目光中带着明显的、几乎摸得着的蔑视：

“或许想要个男孩子？”

“给我拿帐单来，滚开！”

我出了一身冷汗。刚才已经对你说过，我没有带多少钱去，买那几件餐具已使我捉襟见肘，现在又碰上这等事！

我望着银白色冰桶里露出的酒瓶颈，它威风凛凛、冷酷无情。我顿时感到嗓子发干。事到如今……我又把酒杯斟满，一饮而尽。看来我不得不把从印度公司买的汤盆和长盘留在金龙酒店，为马尔克斯·达·科斯塔那个混帐东西和他那红褐色的蝴蝶所欠的帐作抵押了。说不定还要把玫瑰色的大盘子也搭上呢！

酒店帐单上是 70 元港币，这在当时，即 30 年代

初，是个了不起的数目。我焦急地打开钱包，如释重负地出了一口气。不多不少，有 84 元港币，正好够付酒店的帐和回澳门的渡船钱，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船票是 12 元港币。

我付了帐，又丢给侍者两个港币，作为对他傲慢无礼的报复，虽然两只胳膊夹着昂贵的瓷器行动不便，但我尽量神气活现地朝门口走去，看也不看他一眼。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手掌上那两张皱皱巴巴的港币。

幸好到澳门的渡船码头离那儿不远，就在沙面岛上，时间还充裕。我拿着那几件瓷器，狼狈地朝码头走去。

14

为巴尔贝斯库伯爵夫人举行的那次晚宴之后不久，我就前往葡萄牙，利用这个机会到欧洲作长途度假旅行，自从来到澳门就一直没有回过欧洲。我想访问一些曾到过的国家，重返各大都会，按照玛利娅·马法尔达舅母的说法，去进行一次文明和文化沐浴。

我积攒了一些钱，法院的事情也不多，一位同事

也肯代替我的工作。因此，我能离开三四个月的时间，直到把积蓄花光。度完假之后，我又回到澳门，重新过那令人昏昏欲睡的单调乏味的生活。

回来后不久，玛利娅·马法尔达舅母便邀请我参加为达希西奥舅舅的一位外地客户举行的晚宴，此人是位来自马尼拉的菲律宾商人，出身显赫，还与某位部长沾亲带故。晚宴质量很高，这我们已经习以为常；那位菲律宾人兴致勃勃，胃口极好，而且非常健谈——我舅母并不喜欢这种类型的人，但天长日久，我们只能与各种人周旋。他喜欢吃这里的菜肴，尤其爱喝莫西尔酒，这种酒配上虾肉香菇馅酥饼和黄油拌竹笋，妙不可言。

我把斟满清凉透明的淡黄色莫西尔酒的波希米亚式高脚杯举到唇边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巴尔贝斯库伯爵夫人，我回来以后还没有见过她呢，于是就问起她现在的情况。

玛利娅·马法尔达舅母的脸阴沉下来，颌部变得僵硬了，本来就不厚的嘴唇显得更薄了，一时间那表情比拿到桌子上来的莫西尔酒还冷漠：

“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这倒好，眼不见为净！”

我发现，我随口提出的这个问题触到她的痛处，就没有再问。达希西奥舅舅抬起头，那张善良的脸上似

乎闪过一丝微笑，那双圆圆的黑眼睛里出现了揶揄的目光，但转瞬即逝。

一阵沉寂，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沉寂。菲律宾部长的亲戚发现了气氛不对头，但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我正准备无话找话谈谈天气——这是缺乏想象力的人们遇到难堪的沉默时惯用的办法——不料玛利娅·马法尔达舅母在强忍着怒火考虑了这个问题之后显得更加威风凛凛——因而也显得更加楚楚动人——完全把教养抛到脑后，决定用葡萄牙语发泄一通，她相信那菲律宾人什么也听不懂：

“好一个伯爵夫人，竟然对我干出这种事来！你想想，虽然我张开双臂欢迎她，让她住在我家——甚至还给了她几件我穿过的衣服，你可以相信，那些衣服还是蛮新的——，她还这样作弄我。我先是发现银餐具盒里的餐具少了，第一次发现少了一把餐刀，后来又发现少了一把餐叉……开头我以为佣人们弄丢了，但也觉得很奇怪，因为从来没有出过这种事；后来又一再发生，我就不相信是佣人们的事了，小伙子们向我保证他们从来不曾丢过任何东西，你知道这些佣人在家里做了多年，值得信赖。当银糖罐不见了的时候，我忍无可忍了，请警察局长埃斯坦尼斯劳·德尔加多派来一位侦探，我们一起东跑西颠，到新桥和关前后

街的破烂摊下去找，到当铺和古董店去找，终于在福隆新街一家当铺发现了银糖罐——你想想，我，我竟然不得不到那种地方去！侦探问当铺老板是什么人典当的，那个中国老板说是个又高又瘦的欧洲女人，涂着浓浓的脂粉，头发是红的。侦探又问，她叫什么名字，那中国人找来一个肮脏的记事本，他说出典当者的名字“玛利娅·马法尔达·古特雷斯。”你可以想象，当时我是多么吃惊和愤怒！”

玛利娅·马法尔达舅母几乎是一口气说下来的，这时候她像是中了风似的，把身为部长亲戚的菲律宾客人忘到了脑后。她深深地叹了口气，喝了一口水。达希西奥舅舅一直盯着桌子上的菜盘，厚厚的嘴唇上还挂着那丝笑容。舅母又威风凛凛地接着讲：

“不用说，我马上发现是伯爵夫人干的！我立即返回家里，你会想象到，我当时怒气冲天，把她赶出了家门。但在此之前先让她把我给的衣服还给了我。那些衣服我当然不会再穿，打发人统统烧掉了。好一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她又停顿了一会儿，喘了口气，喝了口水。菲律宾人不知道她说了些什么，只好一声不吭，茫然地看看这个，望望那个，也许以为是他惹起了这场风波呢。达希西奥舅舅终于恢复了那种莫测高深的表情。

“当时我准备把这件事交给警察处理，但是后来清醒过来一想，觉得那样做会造成丑闻，会把我的身份降到她的水平，还是不张扬为好。我请德尔加多不要把这宗案件提交法院，他后来把大部分餐具都给我找回来了，并且主动查清了那个伯爵夫人的情况。”

说到这里，玛利娅·马法尔达舅母完全失去了应有的风度，眼睛里闪着金属似的火花：

“什么伯爵夫人，my foot（去你的吧）！”（她使用了她所懂语言中最简单明了的这个英语词组。）

“她从来不是什么伯爵夫人！只不过是香港或者上海餐馆里一个表演歌舞的俄国女人，靠耍小聪明东拼西凑地混日子，在赌场里输了个精光。你可以想象我气成个什么样子！”

“丢了那些银器还在其次，最可笑的是我把她当作巴尔贝斯库伯爵夫人和罗马尼亚国王卡洛尔的女友介绍给众人！一个与筷子基和巴波沙区那些俄国女人一样的下贱东西！好一个伯爵夫人！并且，你看，还是个俄国人，不是罗马尼亚人。俄国女人！”

我听着玛利娅·马法尔达舅母气急败坏的谩骂，她脸上没有一丝微笑（本想她会露出微笑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再提起我在另一座城市曾和伯爵夫人跳过舞的事，她随着“修女”舞曲跳得简直太好了。

我望着波希米亚水晶高脚杯，杯上的雕花闪闪烁烁，杯中的酒白色透明，稍稍带点淡黄晶色，很是漂亮，像香槟酒一样。我叹了口气，把酒杯举到唇边；虽然只不过是德国莫西尔酒——招待这个菲律宾人、部长的亲戚，用这种酒就够了——但我却冒出了这么句话，让舅舅和舅母大吃一惊：

“噢！我太喜欢喝波默里酒了……”

还魂曲 ☐

伊利娜·奥斯特拉科夫的

还魂曲

还

魂

曲



第一章

女王寿辰

1

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伊莎贝尔二世陛下的诞辰，官方定为6月18日。这完全是由于考虑到伦敦那不同于远东的气候。按照传统惯例，香港总督要邀请在该殖民地享有声誉的重要人物出席在总督府花园里举行的庆典。此时，身着燕尾服和各色雪纺绸衣衫的人们都会聚集在这里。总督要在庆典上为友善

的中国富豪、法官、政府官员和当地政界的杰出人物颁发来自伦敦的荣誉勋章。

大不列颠驻澳门总领事一般只举行一个酒会，搞一次小型的外交活动。不过，与当时这个海外省的面积和重要性相比，这已经算有相当的规模了。

总领事的官邸——一个楼顶具有中东建筑风格的白色楼群——高耸在妈阁山半坡上。透过树丛，可俯瞰宽阔的海滩，眺望泥浆翻滚的海湾和对面两个山坡几乎已经连在一起的氹仔岛。因官邸建在山坡上而没有足够大的庭院，乔纳森·皮尔斯·史密斯先生只得在官邸一楼的客厅——称不上大厅——举行简单的酒会来代替定型的英国式庭院庆典，酒会时间定在17点~19点。这是印有英国狮子和独角兽以及烫金斜体字的请柬上写得清清楚楚的。

尽管这活动具有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但从烹调的角度讲还不值得列入当地的名册。酒会上，人们可以喝到存放5年的威士忌（皮尔斯·史密斯先生不相信这是挥霍英国纳税人的钱财），对大部分女士来说，这是一种低度柔和的滋补饮料，但吃的东西却不怎么样。澳门当时承办宴席水平不算高，皮尔斯·史密斯夫人又从未展露过自己无论是生来就有还是后来学习的烹调才能。此外，那位中国厨师的手艺也实在

太蹩脚。

由于午后的天气很闷热，从利维旅酒店和澳门酒店租来的几张长沙发椅变得更加松软，摆在桌子上的几只水晶小盘里放着一些核桃仁、腰果、花生米、榛子、杏仁果和开心果等，仅此而已。

客人们分散在客厅里。由于阿拉伯人遗传下来的习惯，葡萄牙人按性别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女士们坐在椅子上，心不在焉地议论着别人的装束打扮；男士们则站在一旁，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以及死水一潭的葡萄牙政局发表着不痛不痒的评论。为数不多的外国客人聚集在一起寒暄着，等待着机会接近葡萄牙政府官员；有的已急切地盼望着招待会快些结束，以便早一点回到香港那更富有刺激性的气氛中，或者回到佳景酒店宽敞的大凉台，舒舒服服地仰靠在转椅上，一边饮着威士忌，一边享受着傍晚的安逸与宁静。

总之，所有人都对这种长时间的外交活动感到厌倦了。

招待会的高潮是为女王而干杯。总督到达后稍停片刻，完成那些必要的礼节后，总领事便请求大家肃静，以非常简单的（和用来招待客人的食品一样简单）讲话，提请为最尊敬和伟大的女君主的健康干杯。总督在和嘉宾们干杯后，便离开了客厅。这如同一声

撤离的信号，大部分葡萄牙来宾也随即离去。总领事和夫人满脸堆笑地站在大门旁边，与来宾们一一送别。女士们好不容易舒了一口气，赶紧钻进从香港买来的小轿车上；那些已经辞掉了家庭厨师的人们，只得去利维旅酒店或佳景酒店再要上一盘三明治，然后随心所欲地抨击英国人的吝啬。

2

总督是不久前刚刚来到本地任职的。他原是骑兵团的军官，身材高大，风度翩翩，目光犀利，善于辞令，充分展示了他同女人交谈的天赋才能。澳门的女士们视其为美男子，经常应他的邀请来圣珊泽官邸聚会的香港葡萄牙社团的女士们也认为他非常潇洒英俊。他自己也觉得自己仪表堂堂，很懂得用自己的魅力来赢得别人的青睐。他的确是位令人心乱的男人。在他那让女人们不知所措的微笑后面，还隐隐约约显出一丝骄傲的神情。他在其他场合很讲究准时，但作为澳门的最高权威和葡萄牙官方机构在当地的代表，他懂得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例外。

这天下午，在夫人的不断催促下，总督决定按时

前往，因为这毕竟是另一个主权国家代表所举行的官方招待会，而且该国素以恪守礼仪和准时著称。然而，这对奥斯特拉科夫太太来说却是不祥之兆。当总督的专车——这届政府从香港新购来的豪华卧车——到达大不列颠王国总领事官邸的大铁栅栏门旁时，奥斯特拉科夫太太正气喘吁吁走到通向官邸的上坡路段的一半。她听到了专车在慢慢拐弯时发出的沉闷的声音，便加快步伐想走完最后的几米路程，因为她不想和总督阁下同时到达，那样太不合适，自己毕竟是第一次被邀请出席这样的招待会。这时，获悉总督到达的总领事皮尔斯·史密斯夫妇已经迎候在大门口。

然而，奥斯特拉科夫太太的努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她的年龄和虚弱的心脏所能承受的能力，这是难民救济署的老大夫卡尔内罗早已提醒过她的。她感到心脏突然一阵绞痛，踉踉跄跄地走了几步，那只汗手不由自主地扶住此时正停下的总督明亮如镜的专车上。当总督由仪表端庄、身材瘦高、穿着夏季制服的侍卫迎出车外时，奥斯特拉科夫太太张着嘴、上气不接下气地又走了几步，便一头栽倒在正紧紧握手的总督和总领事的脚旁。

她就这样去世了。

里里外外顿时一片慌乱。领事馆里的中国佣人手忙脚乱地将奥斯特拉科夫太太从后门抬进里面的小厅，作为医学界代表出席招待会的卡尔内罗大夫了解她的病情，立刻为她进行心脏按摩。

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大夫只得打电话给仁伯爵医院请求派来急救车。

客厅里，出席招待会的来宾们已经感到发生了什
么不祥的事情。主人和总督夫妇带着满脸慌乱的神情，
急匆匆走了进来，引起在场的人们一阵低声议论。

“一位太太晕倒了… …”

“… …不知道是什么人… …好像是一位英国女人… …”

“去了医院，卡尔内罗大夫陪着… …”

“不知道是谁… …”

“… …真不吉利… …”

“… …真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 …”

“可怜的女人！… …”

“真可惜！现在谁都不想吃什么了… …”

由于发生了令人悲痛的事情，招待会草草宣布结束，人们才稍微松了一口气。大家只是简单地为英国女王干杯，总督阁下连给女士们展示口才和露出一口漂亮牙齿的机会都没有，只是向周围的来宾点了点头，跟总领事握了握手，对皮尔斯·史密斯夫人作了一个吻手的示意，便乘上他的专车离去了。而司机早已小心翼翼地擦去了死者留在车上的汗手印。

还

魂

曲



第二章

伊利娜的遗物

1

伊利娜·奥斯特拉科夫是外国籍人士，在澳门又没有任何继承人（据说她的丈夫在新喀里多尼亚的某个地方），自然对其遗产要进行查封。

我是几个月前才来到这里的。尽管对这座小城非常喜欢，但却难以适应这里的酷热，难以适应那仿佛从房屋、树叶和一切东西中散发出来的潮湿和憋闷。即

使刮起微风，也是热乎乎难以忍受的热空气，尤其是在台风来临之前。

正是在 1960 年 6 月的一个难以让人喘气的午后，我们无奈地来到死者生前最后在高士德大马路居住的那间狭小破旧的小房间。

或许 30 年前这是一座令人愉悦的住所，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长久受到潮湿气候的影响，加上房主和一代代房客的不善料理，它已经变得腐朽不堪。

伊利娜·奥斯特拉科夫住在底层的一个房间。在房间的凉台顶头，不知是哪一位三等设计师竟然违背本地城市建筑和公共卫生的管理条例，不负责任地、草率地搭建了一处肮脏不堪的卫生间。

在这个狭小而破旧的房间里，一个角落的一只木箱子上支着一台中国式单口煤油炉子，就成了厨房。一张能折叠的小餐桌，一张油漆已经脱落的铁架床，一个衣柜和两张新加坡木椅，这就是房间里的所有家具。在房间的另一角，一只过去人们用于海上远途旅行的大箱子被死者用作了床头柜，上面放着一台小收音机，一只台灯和几幅生活照片。

这里除了贫穷以外，更令人感到压抑的是显示主人孤独、绝望、无奈和对生活毫无兴趣的零乱不堪。整个房间里的家具和椅子上、甚至地上到处都杂乱无章

地堆放着衣服、餐具、报纸，天晓得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不禁想问，奥斯特拉科夫太太怎么能排除当地的社会障碍，竟然获准参加海外省这样一次特殊的社交活动——大不列颠领事馆为英国女王陛下诞辰举行的官方招待会？

2

调查员枯燥乏味的声调，说明高士德大马路上的这间破旧小屋里的气氛令所有人厌烦和疲倦。受在吕宋岛西部形成的台风的影响，这里没有一丝凉风，只有停滞的空气和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的闷热。大树上的叶子纹丝不动，枝头的蝉儿烦躁地厉声尖鸣。蝉鸣声也会突然停止，犹如听从某根看不见指挥棒的指挥一样，然而，几秒钟后它们又照样声嘶力竭地鸣叫起来。

支在大箱子上的小风扇吹出的也是热乎乎的风。可就连这点微不足道的小风，在房间另一角也很难感觉得到。

调查员——清点着家具，临时任命的估价人——

法官的汽车司机——以低廉的价格报着每一件物品的价值，这里也确实没有丝毫值钱的东西。

“… …一张油漆脱落的铁床，20 澳门元；一张新加坡木头桌子和两张椅子，10 澳门元；一个煤油炉，5 澳门元… …”

清点就这样继续着，还是那样枯燥乏味和令人困倦。

我检查着死者生前仅有的那点证件。没有护照，也没有外国人居住证，不过有一份资料能说明她的身份。这是一份准备递交给美利坚合众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申请报告的草稿，内容是请求准许作为移民或难民进入该国。

“伊利娜·奥斯特拉科夫，已婚，64 岁，无国籍，出生地点：俄罗斯敖德萨，现住地：澳门… …”

在有关学历的那一部分，她用娟秀的笔迹写道：

“鉴于我出生在敖德萨的名门贵族家庭，一直由家庭教师辅导学习，因此没有正式学历。但是，除了母语俄语之外，我还能讲法语、德语、英语，并略通中文。”

证明她贵族身世的是一些本世纪初留下的黑白照片。在一栋豪华住宅前面的花园里，几位雍容华贵的夫人，穿着带有花边的紧身丝绸长裙，高耸着羽毛的

大帽子下面露出浓密的秀发：几位皇家军官身着佩戴肩章的军服，显得威风凛凛；两位穿大衣的绅士身材肥胖，嘴边挂着胡须；一群神情严肃、脸色不悦的孩子，或者穿着荷花边童裙，或者穿着海军式童装，脚蹬皮鞋，头上系着花结。

根据对死者——我相信在澳门街上曾碰到过一两次，但从未与其交谈过——仅有的这点了解，我无法从照片上的姑娘中认出她来。她们每个人都是卷曲的头发，都系着花结，都用忧郁的目光心不在焉地盯着镜头，我想她们是盯着照相机的黑布和三角架。不过，还有一张年代稍近一点的照片，照的是一对骑在马上的人，男子穿着军服，坐在他身边的女子穿着合身的上装和宽松的马裙，带着手套的双手轻轻地拉着缰绳，头上的小帽檐上挂着网罩。我从这张照片上认出了死者秀丽的瓜子脸。没有一张照片上留有文字记载，可我猜想马背上的这位男子就是她的丈夫，也就是申请书上提到的那位伊戈尔·瓦希利维奇·奥斯特拉科夫，现在在新喀里多尼亚为一位法国巴黎人经营着一份产业。

有一位名叫古特雷斯·多斯·雷梅迪奥斯的绅士，拿着死者丈夫的一份电报要求作为继承人代表。他是个古董收藏家，也是当地的律师。法官同意他为那

位可能的继承人代理有关事宜，条件是必须及时按法律手续确认授权。

我们原以为外面会有一点凉风，便来到凉台，继续观看里面对遗物的清点。

我对这位看上去应是生活在另一个社会层面的奥斯特拉科夫太太竟然生活在这种破烂不堪的条件下感到惋惜。与她生前有所认识的律师说，她具有很高的修养，从她的个人简历资料中也不难看出这一点。

此时此地谈论这些未必合适，尊敬的法官也不愿意中断对死者那点财产的枯燥乏味的清点。因此，雷梅迪奥斯博士答应在另一个时间里给我讲述他所知道的关于奥斯特拉科夫太太和另一位在澳门呆过不长时间的巴尔贝斯库伯爵夫人的故事。

（注：巴尔贝斯库伯爵夫人的故事也是《晚宴上的波默里酒》的主人公的故事。）

3

尽管各件遗物的价值微不足道，但财产清点还在仔细缓慢地进行。

轮到清点那只大旅行箱子里的东西了：冬天的厚

衣服，一条棉被，下面是过去穿过的已经没用的旧衣服。

“一条已经穿烂的丝绸连衣裙… …”

对中国双绉丝绸分辨不清的清点员用手指提起一件裙边用金线和紫色丝线绣着花纹的黑色连衣裙。这是 30 或 40 年代流行的高雅华贵的时装。然而，由于气候潮湿和虫子咬蛀，它已经变得像清点员展示的那样毫无价值了。

法官用不满的口气对笔录说道：

“一件已穿旧的中国双绉连衣裙，毫无商用价值… …”

还有一件晚礼服，几件丝绸绣花衬衣，一件风衣，一条狐皮毛领。清点员伸着胳膊抖落着上面的浮尘，以显示自己清点这类物品的经验。

“一条没有商用价值的破烂皮领… …”

“喂，你别抖落了，我都打喷嚏啦。”在场证人：“一条保存不善的旧狐皮毛领。估价人呢？”

那位临时任命为“估价先生”的司机皱着眉头说道：

“谁也不要的东西，连垃圾虫都不会要… …”

“… …毫无商用价值。”法官补充道。

下午的时辰仿佛停滞了一样。我们一个个困意绵

绵。酷热丝毫不减，清点工作也没完没了。大家都盼望着早点能离开这凄凉穷困的地方，到某个稍微令人轻松的地方喝上一杯清凉饮料。

鉴于遗物的微乎其微的价值，我建议统一按类折价，因为这些东西很快就要交到作为唯一继承人的死者丈夫的代理人手中。雷梅迪奥斯对着他将要接收的东西做了个怪样，手续也逐渐加快了。

“这里是什么？”

法官对着清点人从大箱子底下拿出的一个沉甸甸的方形灰色纸包问道。原来，里面包着的是一个绿色丝绒盒子，上面印有“上海施奈德兄弟公司”的烫金商标。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套不完整的供12人用的银制餐具。

“嘿，这可是没想到的事！”

我们都好奇地凑了过去。如果说在这个穷困不堪的地方意外地找到这件值钱的东西不是不可思议的话，起码也是很不协调。餐具虽然已不齐全，但其价值还很昂贵。看得出银制餐具的工艺是第一流的，份量也不轻，还有享有盛誉的名牌商标。“施奈德兄弟”当时可称得上是香港最好的珠宝厂商，其产品很可能与上海同类厂商的工艺不相上下。

“她从哪儿弄到这些东西的呢？”

“这应该是她在过富贵生活时留下的，”雷梅迪奥斯博士解释说，“他们在上海曾经生活得相当不错……”估价人不知如何估价，这玩意儿已超出他那点商用估价经验的范围。法官记录了整套餐具，他确认估价人已没有能力估出价值，便让证人把东西交存法院保险柜由他负责保存。清点继续进行。

半个下午过去了，大家已经厌倦透顶了。在发现餐具时的一阵兴奋过去后，又回到枯燥无味的清点工作中。

全部清点工作快要结束，法官环视了一下整个屋子，看看是否漏下什么东西。这时，清点员翻出一只已经生锈的旧铁盒。

“这里是什么东西？”

“破烂……”

盒子里装着不少乱七八糟的假首饰，假珍珠项链，黄铜手镯，一只坏手表，不成对的耳坠子，各色假宝石戒指和别花。我真想建议别为这些东西费神清点了。我叹了口气，看了看雷梅迪奥斯博士，只见他无奈地耸了耸肩膀。在这样一个令人喘不过气来的下午，伴着清点员对那些假首饰一一报数的单调的声音，大家都快要打瞌睡了。我提议第二天再清点，反正还需对那套银制餐具进行估价。于是，大家把所有门封上，证

人把餐具放在安全的地方，等待第二天带上一位首饰匠或珠宝商来给银制餐具估价，或许还能鉴别一下那堆“首饰”。

我的建议被采纳了，这才结束了一下午的工作。

4

第二天上午，清点工作继续进行。台风还没有刮来，天气仍然那样酷热，令人窒息。

草堆街某首饰行的一位中国籍中年男店员成了今天的估价员。那中国人穿着一件灰色长袍，一条肥大的裤子，似乎对炎热的天气不以为然。他掂了掂银制餐具的重量，估价值5千澳门元。在当时，这相当于我薪金的5倍。随后，他又到“首饰”盒旁边，朝那些乱七八糟的“首饰”看了一眼，不屑一顾地逐一放到了一边。最后他拿起两只又黑又脏，其中一只还已经断裂了的戒指，举起放大镜，仔细地查看起来。

他把它们放远了一些看了看，用不太肯定的口气低声对雷梅迪奥斯说：

“是玻璃的……”

这个中国人又走到凉台，调了调放大镜，用左眼仔细地端详着戒指，又分别把两只戒指放在自己的指头上旋转了一阵，然后用广东话对证人说了些什么。证人翻译道：

“那只大的戒指是一只近 10 克拉的钻石戒指，小的也是只近 5 克拉的钻戒。根据戒指的状况，大的起码值 1 万 2 千澳门元，小的也值 7 千澳门元左右。”

房间里一阵寂静。我似乎屏住了呼吸，也无须发表任何议论。我们大家的眼睛都盯着那两只差点被忽视了的戒指。把银制餐具和首饰加在一起，总的价值几乎是我两年的薪金！这可都是从那破旧凄凉的地方找出来的！

还

魂

曲



第三章

马德莫依塞尔

1

马德莫依塞尔·克洛迪娜·阿乌贝格·迪朗的少年时代并不幸福。但她没有让这不快乐的少年时代影响自己或者妨碍实现自己的理想：她下定决心要风风光光地出嫁，而且一定要让自己进入贵族阶层。

她出生在南锡，父亲是法国军队中一名普通的陆军连长，名叫弗朗科·迪朗。不过，父亲因

为吞入一根鸡骨头而无声无息地死去了，留下了父姓为阿乌贝格的迪朗夫人和她这个 14 岁的女儿。

当时正在“马利娅圣心”修道院念书的克洛迪娜将被迫中止学习，跟随不能自食其力的母亲到斯特拉斯堡的姨妈家暂住。姨父是位腊肠商，没有子女。他好心地让姑娘继续留在教会学校，直至中学毕业。这是因为“圣心”修道院的修女们尽管想把那些上等社会的女孩子培养成贤妻良母的愿望经常失败，但每月也要按时给她们发放费用。

克洛迪娜永远不会原谅父亲，因为他的愚蠢和贪嘴使她成了孤儿，并且很可能使她丧失自己丰富想象中的光辉灿烂的前程。不过，她没有一蹶不振。她没有像腊肠商姨父希望的那样去寻求“黄花闺女”需要掌握的奥妙，却用了很大的精力参加严格的教育制度所允许的各种有趣的社会活动，并且与家庭地位优越的、尤其是来自巴黎地区的同学广交朋友。

她生来就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只是学校那封闭和压抑的教育制度使她无法拥有施展的可能。即使这样，她也曾多次对修道院的花匠暗送秋波，只是那位害怕丢掉饭碗的男人总是用牧师般严肃和乏味的声调和她说话，像躲瘟神一样（幸好两人都没有想到是因为她那又矮又胖的可怜身材）回避着她。她甚至柏拉图式

地喜欢过那位文静的塞希莉修女，一位身材矮小、年轻美貌、声音悦耳的音乐教师。然而，恬静而待人热情的教师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自己竟然引起这种罪过的情感，不管它是多么短暂。

克洛迪娜结束了学业，各门语言和钢琴的成绩格外优异。她激动地告诉大家要保持永久友谊，还说要去巴黎看望最要好的女友玛丽·昂热·贝尼埃（有名的肉类加工厂老板贝尼埃的女儿），就这样愉快地告别了修女们去了斯特拉斯堡。

尽管能与对她悉心照顾的母亲同住，还有姨妈和姨父的善待，但克洛迪娜对新的生活并不感到满意。对家庭里的一切她毫无怨言，只是一位省城小资产阶级腊肠商的社会地位无法让她达到自己期望的社会和经济阶层，更不能让她实现自己对未来的宏伟理想。

于是，在姨父姨妈的帮助下，她终于实现了去巴黎看望玛丽·昂热的旅行，并且在贝尼埃家的那座宫殿里轻松愉快地逗留了下来。

经过贝尼埃的极力推荐，克洛迪娜到里昂一位肉店老板家当了家庭教师。不过，这件事曾一度让她担忧过，因为天晓得，她是不是命中注定要嫁给某位肉店老板，那样就必定误了自己的远大前程。

她在这家干的时间并不长。尽管那一家人把她当

自己人对待，但她还是觉得像在斯特拉斯堡那样压抑，城市死气沉沉，毫无生气；这一家也没有她渴望的富丽堂皇；再说，她也没有机会出席当地商人联谊会仅有的一些社交活动。

她被这家男主人介绍给和他生意上有过接触的勒阿弗尔的一位老富婆当陪伴。克洛迪娜兴奋不已，她马上想到自己将能乘上豪华客轮或软卧包厢作环球旅行，住的当然是早就预定的国内外最好的酒店。在那里，她可以用自己的聪颖和妩媚，甚至敢穿上难以蔽体的裙衫让全世界的男性精英们神魂颠倒。然后，就与某位如意郎君结为秦晋之好。

为了实现这一美好的理想，第一步，她慷慨地追认已故的父亲为骑兵团的将军（这可作为她的一件出色的武器），并且把父亲的死说成是在与法国萨拉的柏柏尔人作战时中箭而光荣阵亡。

她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了母亲的娘家姓，又用一道横线连上一个象征贵族名门的“德”。于是，她就成了为捍卫法兰西帝国的荣誉而衰败的某个家族的后代——马德莫依塞尔·德·阿乌贝格·迪朗。

她用这个名字印制了不少名片，带着它们去了勒阿弗尔。

可惜，老寡妇是个难以打交道的人。死气沉沉的

大宅院位于一条冷冷清清的街道上。尽管要她干的活很少，但这里的生活也很快让她感到失望。女主人不喜欢旅游，却对宗教信仰虔诚得令人难以忍受，待人又苛刻又吝啬。她不许克洛迪娜穿着大开领的或者色彩鲜艳的服装，还不许外出，除非陪她去参加宗教活动。偶尔来访的几个客人也是与老人年龄相仿的虔诚的教徒。沉闷寂寞的环境，冬天漫长的夜晚，海港城市终日弥漫的大雾，这一切都令克洛迪娜陷入异常沮丧的境地。

陪伴老夫人的日子当然长不了。

就这样，她一有机会便换个新地方，从一个家庭到另一个家庭。她就这样几乎每月都在更换工作：要么是雇佣她的那个家庭不具备她所要求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要么是不能给予她自认为有权享受的待遇，不可能使她得到自己渴望的婚姻。

在她这段不太平坦的人生道路上，也曾有过多谈情说爱，只是因为她有为人师表的责任，只好悄悄地进行。她一直把婚姻作为目标，因而总是拒绝已婚男人和没有财富、或者没有社会地位、不会有理想前途等单身男子的追求。

然而，她的一次次恋爱，总是在她进一步向对方暗示缔成婚约时——而且每次都是她主动提出——便

不了了之。克洛迪娜不得不难过地承认，真正实现美满的婚姻比梦想实现要困难得多。

于是，她在对求婚者进行苛刻的选择时，去掉了贵族这一条件，但不能放弃财富这一因素。虽然作了这么大的让步，她还是不安地发现，局面并没有好转：她喜欢的男人看不上她；看上她的男人（比她想象中的差得太远），她又瞧不上。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马德莫依塞尔虽然极不情愿，但还是带着惊恐的心情迈近 30 岁——这是未婚姑娘的关键年龄。克洛迪娜下定决心要在 29 岁以内解决问题，也顾不上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岁月了。

老实说，她百思不得其解。她对着镜子仔细端详，里面自然影现出一位娇小女人，那粉红色的小嘴，那微微翘起的小鼻梁，那双周围用名牌眼影描过的水汪汪的眼睛，都是让人动心。她也承认，自己的身材稍微胖了点，缺少点高度，缺少点华贵。但女人总是秀气点好啊……。她真不明白，为什么那些追求她、向她献媚的男人只图一时的寻欢作乐和不负责任的男欢女爱，而只要一提到或要求结婚，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实际上……

2

1910年夏天，马德莫依塞尔当上了博尔德卢塞男爵家的4个孩子的家庭教师，居住在德阿维尔租来避暑的别墅里。博尔德卢塞家是一个真正的贵族家庭，虽然支付给她的薪金并不多，但让她同桌就餐，甚至让她参加一些聚会，因为她常常可以用自己模仿卓别林的表演，以及用那不算难听的女低音富有情感地演唱意大利歌剧中的咏叹调为聚会锦上添花。

尽管这一家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相处得也不错，但夏天沐浴的季节即将过去，克洛迪娜还没有预见到什么可喜的结果。

正是在博尔德卢塞的别墅里，她认识了奥尔科夫伯爵夫妇。他们是俄国敖德萨的贵族，年迈而富有。他们带着一位俄罗斯女佣来欧洲度假，顺便也处理一些事务，下榻在他们所熟悉的“富豪酒家”。

伯爵唯一的孙女伊利娜当时随舅母留在基辅。他想为她聘请一位家庭教师，最好是法国人，那样可以辅导小姑娘的法语，因为，虽然家里经常使用法语，可是伊利娜由于和佣人们过多的接触而产生了許多语法

错误。另外，他们想挑选一位年轻活泼的女教师，那样可以为奥尔科夫沉闷的大宅院增添一丝活力。因为在他们的独生儿子去世后不久，年轻的儿媳也随其而去。于是哀伤和凄惨的阴影就一直笼罩着这个宅院。

克洛迪娜的心情非常激动，这个机会真是太难得了。毫无疑问，这是上帝的恩赐，——要知道，上帝一直关心着她那屡遭失败的婚嫁计划。不管命运怎样安排，这个位子专门留给她的。活泼，是不用说了；年轻，也是当然的，为什么不是呢（她早就确定了在29岁前解决问题）？她还充分掌握了法文不规则动词的令人费解的奥妙之所在。她不是渴望引起上流社会的注意吗？现在，就有一个文文静静的女孩子要她去教，就有一座豪华住宅要她去焕发生气，就有一个高贵富有的男人世界等着她去征服。

在法国，她所向往的婚姻没有呈现丝毫鼓舞人心的可能性。她已度过了第一青春期，但女人最妩媚迷人的时期——她对自己的以后更有把握——还没有过去。可以断言，用她巴黎女郎的魅力（当然要使用得当），用她的欢快和活泼，还有她在法国从未有机会展示过的社交天赋和高贵的贵族身世（因为名字上有个“德”字，她当然没有为自己的做法感到任何不安），不愁在辽阔的俄罗斯帝国找不到追求者，这些追求者肯

定拥有不计其数的财富、豪华的宫殿式住宅、小国家似的产业及前呼后拥的侍从。她仿佛已经看到对敖德萨的保守社会来说梳妆打扮得有点过分的自己，在奥尔科夫家高悬着吊灯的富丽堂皇的大厅里，被某位潇洒的贵族绅士、某位伯爵、某位像克雷苏斯一样富贵的王子或者某位大公爵（俄罗斯帝国不是到处都有这样的人吗？）搂着，伴着华尔兹舞曲飞速地旋转着，而她那双与其说像法国女郎还不如说更像西班牙女郎的动人勾魂的黑眼睛定会使对方堕入情网。

克洛迪娜摇了摇头，打断了自己脑海中丰富的思绪（即使是想象，为什么不可以呢？）

海滩别墅的房间里，临时安置了一面梳妆镜。她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娇小而又丰满的身影，腰肢依然那样婀娜多姿，高耸性感的胸脯仿佛要扑向某个壮实白净的肩头，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承认自己这双动人闪光的眼睛里带着让人捉摸不透既像是承诺又像是拒绝的机灵和精明的神情。怎么就不可能是那样呢？……即使不是大公爵，也总有某位伯爵或男爵会成为自己猎捕的对象……

克洛迪娜下定了决心。

第二天，她精心为自己的嘴唇和眼睛化了妆——脸蛋本来就红朴朴的——也没有通报博尔德卢塞家一

声，就去“富豪酒店”找了奥尔科夫伯爵夫人。

她们很顺利地见了面，但伯爵夫人表示有点为难，因为她担心男爵家以为是他们挖了墙角，起码是认为他们的这种做法不友好，或者会认为马德莫依塞尔本人背弃了主人。克洛迪娜真想反驳说自己并不是博尔德卢塞家的私有财产，再说，作为一名打工者，可以去任何她愿意去的地方。然而，她本能地提醒自己，对一位俄罗斯封建社会的年迈的贵夫人这样回答是不合适的，于是她谎称事先已得到了主人们的允许（事实上，她是在确保了新的位置后，才客客气气地慎重地向主人家提出辞职的。说到底，她毕竟是个有教养的人……）

协商结果，马德莫依塞尔随奥尔科夫夫妇走，但还要过一段时间，因为伯爵在巴黎还有事务要处理。这样，她可以有时间和家里人告别，准备行装，然后在10月初同他们一起出发。

到这时他们才谈起报酬，薪金尽管不像克洛迪娜想象的那样可观，但也能说得过去。

博尔德卢塞夫人友好地同意了孩子们的家庭教师的辞职请求，只是为她的离去感到惋惜——当时找一个好的教师太难了，不过她承认自己无法与奥尔科夫家提供的优厚的条件竞争，而且他们还是朋友。再说，

她不想让伯爵夫人为难，何况克洛迪娜已经为伯爵夫人开脱了全部责任。她们之间没有因中止合同而支付任何赔偿，女主人只是按照惯例给家庭教师出具了一张鉴定证明。（以前勒阿弗尔的寡妇也为她写过一张，克洛迪娜差一点因为对里面的措辞不满而当手纸用了，只是那纸太粗糙了。但她还是把它撕得粉碎，气愤地扔进了厨房的垃圾桶，那才是它的归宿。）

马德莫依塞尔大胆地在巴黎时装店挑选了两件连衣裙，一堆围胸，两顶大羽毛帽子和一双阿斯特拉罕羔羊皮手套（她的经济条件还不容许她购买更昂贵的皮货）；她致信给母亲和姨妈姨父，告诉他们自己的去向，最后流着眼泪同玛丽·安热告别，并发誓要给女友写信。就这样，克洛迪娜带着一箱子个人行装，两只装有长途海上旅行不可少的日用品的手提箱，两盒名片，跟随奥尔科夫伯爵夫妇启程前往大俄罗斯帝国。她的心中激荡着对未来的无限希望。

还

魂

曲



第四章

盲目的教德萨人

1

旅行并没有如马德莫依塞尔想象的那样。乘坐火车旅行的想法没有得到奥尔科夫夫妇的赞同，对他们来说时间太长，会精疲力竭、全身不适，因此他们决定乘坐豪华客轮经勒阿弗尔、维哥港、里斯本、中东和黑海回去。伯爵夫妇乘的是一等豪华包厢，但也慷慨地为马德莫依塞尔要了个一等普通房间。女佣的房间在

二等舱，这样可以避免出现佣人和主人即使不同桌也在同一餐厅用餐的反常和尴尬的局面。

克洛迪娜事先曾美滋滋地想象这会是一次能给她带来许多机遇的浪漫旅行，因为客轮上一定会有许多有财有势还有趣的人。她暗暗庆幸自己买到了两件价格昂贵、款式开放的连衣裙。天晓得，说不定在客轮上就能获得她期望得到的一切，那样或许不用长途旅行到遥远的俄罗斯呢！

不过，命运对她还是太残酷了。从未乘过轮船的马德莫依塞尔受尽了晕船的痛苦。刚刚离岸时她还为离开那位不善的老寡妇居住的城市勒阿弗尔而兴高采烈，可踏进船舱不久就感到一阵不适：尽管在一等舱内，但船上的气味让她感到恶心。她强忍着，陪伯爵夫妇去用晚餐（伯爵夫妇邀请她同桌用餐）。不过，客轮正驶入拉芒什海，而10月末的海浪格外的汹涌澎湃。刚一进餐厅，马德莫依塞尔看着杯子里的液体来回的晃动，便感到一阵眩晕……。她再也忍不住了，脸色变得铁青，急忙说了一句谁也没有听清的道歉的话，就跑回自己房间，一阵撕心裂肺的呕吐，一阵剧烈的头疼。

以后几乎是天天如此。她整天躺在床上，只是要去两个房间共用的洗手间时才起来。稍微吃一点水果

胃里就感到难受，她只能见到伯爵夫人的女佣——对她来说幸运的是轮船上客人不多，她的房间里的另一张床一直到马塞时才住上客人。伯爵夫人也天天来探望，老夫人难以明白马德莫依塞尔怎么整天躺在床上而不去享受这旅行的乐趣。克洛迪娜简单地解释着，心里只希望夫人赶紧离开，只盼尽快结束旅行的痛苦，不管以何种方式，不管是到达敖德萨还是中止家庭教师的工作，还是自己突然默默地死去。可是，生活还在继续，不久一阵新的难受又袭击过来。伯爵夫人赶紧告辞，在答应给她拿来一些蛋糕——这又使她一阵痉挛——后走了出去。

在沿途各港口的短暂停留，使她的痛苦有了一丝缓解。克洛迪娜总是等轮船停稳后才起身下床，总是那样虚弱不堪、头发蓬乱、脸色苍白。为了陪伯爵夫妇去浏览市容，又不让他们等待，她只能匆匆收拾一下，然后默默地跟着他们。他们参观一个个著名的旅游景点，不过一想到还要回到轮船上受罪，还要过那么多天才能到达敖德萨，她的兴趣便全然消失了。对于她来说，那些四轮马车，那些宫殿、花园，那些异国风情和脚下的他乡大地，都散发着轮船上的柴油味，都在无情地来回晃动。

经过了维哥港、里斯本、马赛、热那亚、那不勒

斯(在那儿马德莫依塞尔没有陪同伯爵夫妇去卡布里,因为这样可以不用再过海峡)、皮雷乌和伊斯坦布尔,他们终于幸运地到达了敖德萨。

不管受了多少折磨,马德莫依塞尔终于挺了过来。她瘦了许多,不过这倒随了其心愿,可是她的脸色却显得那么灰暗、那么憔悴,再说她也未曾有机会穿上那两套款式开放的连衣裙和戴上那顶大帽子,更谈不上让自己所期盼的贵族富翁神魂颠倒。

2

他们是在天快黑的时候抵达敖德萨的。去迎接他们的除了朋友、佣人外,还有铸造厂的一些人、伊利娜和她的舅父母,他们是从基辅将伊利娜送回到爷爷奶奶这儿来的。

马德莫依塞尔没有能像想象中那样得意洋洋地来到这里,因为她还感到胃部不适,脚下仿佛踩着棉花。她只是对伊利娜微微一笑,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小姑娘的脸蛋,便萎靡不振地坐到了早已等在港口的车子上,没有再去注意那个12岁的苗条姑娘。伊利娜脸色阴沉、眼神凝滞,只是在与爷爷奶奶拥抱时才表现出儿

童的热情和兴高采烈的样子。尽管马德莫依塞尔在结束海上旅行后还感到身体不适，可伯爵家的那辆大专车引起了她的注意，还有那位身材高大、一头金发的司机，尤其是司机身上的那套制服使他显得十分威武，起码也像个长官。

在到达后的一阵兴奋和热闹之后，伯爵撇下了家人去和铸造厂的一位高级职员谈起了工作，神情严肃而深沉。老人着急地听着他不在期间城里发生的让人惊讶的事情。由无政府主义者或是布尔什维克、或是天晓得是什么人掀起的运动，到处要求增加工资，要求参与决策、减少工作时间、享受假期等等。人们组织罢工、占领工厂，还发生几起野蛮烧毁东西的骚乱。警方已无法控制局面，只得请求军队武装力量出面干预。最后由骑兵团的一支突击队出来才痛痛快快地结束了这一场混乱。不幸的是在镇压过程中发生了流血事件，还造成了几人死亡。不过，大部分闹事的头目已被抓获，并已被送往彼得格勒。

“那铸造厂呢？”

“毫无例外，他们朝办公大楼扔了火把，不过，幸好奥斯特拉科夫中尉的哥萨克人用武力制止，很快就控制了局面。”

“那么死人的事呢？”

“只那么几个，但气氛还相当紧张。或许，伯爵先生亲自去安抚一下，情况会好一些……”

伯爵夫妇、伊利娜和她的叔叔婶婶乘上那辆大专车回奥尔科夫府第，马德莫依塞尔和女佣以及另一些侍从挤坐在一辆已装上一些行李的四轮马车上。其余的行李由一位铸造厂的职工照管送往官邸。

奥尔科夫官邸的雄伟壮丽让克洛迪娜激动不已。那是位于城区边上的一栋庞大的石头建筑住宅，正面是由爱奥尼亚式柱子组成的一条长廊，上面是石头雕刻的官宅徽像。一楼房间全是法国式大窗，二楼卧室的窗子稍微小一些；顶层则是佣人们居住的地方，旁边是一小排烟囱。

寒冷的夜晚更使这座住宅显得豪华、威严，也令人感到不便和拘谨。

大专车在大门口停下，人们都下了车。四轮马车穿过大门洞来到了铺着石头地面的黑糊糊的内院。侍从们以及伯爵夫人的女佣和马德莫依塞尔在那里下了车。她还感到不适、虚弱，更令她难堪的是，那群叽里呱啦讲着她难以理解的语言的人们竟把她冷落在一旁。

最后，一位女佣把她领到了二楼距离伊利娜卧室不远的的一个房间，并给她送来一罐热水，让她稍微收

拾一下后去用晚餐。仿佛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她在听到“用餐”这个词时第一次没有感到恶心。她的确感到腹中空空，但她又担心会再次发生晕船的反应，会在全家人面前呕吐。因此她请那位懂一点法语的佣人向伯爵夫人表示歉意，说她还感觉不适，不能去餐厅用晚餐，只想在自己的房间里吃一点清淡的食物。

她独自欣赏着主人给她的房间。尽管这里的气氛与整个府第一样威严，但房间很宽敞，很舒适。色调柔和的旧红木家具，法兰绒垂地帷幔仿佛才是房间里居住已久的真正主人，黄色的煤气灯给整个房间蒙上一层神秘的气氛。

虽然没有符合马德莫依塞尔的心愿——她更喜欢显得温柔轻松、摆满鲜花、挂着麻纱窗帘的房间，但她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间舒适安逸、甚至有点奢侈的房间。毫无疑问，这是她这辈子从未享受过的。

她坐到摆着红木镜框、铺着粉红色大理石台面的梳妆台前，解开了发束，让浓密乌黑的长发像瀑布似地顺着肩头披散下来。此时她的形象不佳，旅行中的晕船无法让她顾及梳妆打扮，所以显得憔悴，也显得瘦了些。尽管如此，她的身材还是很不错的，消瘦反倒让她感到欣慰，她的腰肢更苗条，她的胸脯更丰满、更高耸迷人。然而她不想——绝对不！——为这种短

暂的优美再次付出代价，因为她尽管很不情愿，但也不得不承认，渐渐发胖的趋势是属于遗传和本身的体形决定的。

自己现在这种模样，不去餐厅用餐是对的。

她相信，第二天一定会好得多。

3

奥尔科夫家的待遇已经让马德莫依塞尔无可挑剔了。她的房间要比一般的房间舒适安逸得多，与伊利娜的房间只隔一个姑娘的小书房，除此以外，从一开始她就被邀请与伯爵夫妇及 12 岁的伊利娜同桌用餐。她受到的尊重显而易见，待遇远比那些家庭侍从们高得多。

尽管这个大宅院里的气氛冷寂而沉闷，但马德莫依塞尔还是感觉不错。她在给玛丽·安热的第一封信中，首先按自己的想象描述了旅行途中的经历，然后使用她习惯表演的夸张手法写道：

“……亲爱的，整个旅行你无法想象。大海的波涛是那样汹涌澎湃，海风更令人毛骨悚然，轮船仿佛要葬身海底。”

“尽管如此，我表现得像个海员，甚至得到了船上官员们的称赞。你知道是什么样的官员吗？我甚至担心自己是否把部分芳心留在了那里。哎呀，好在还完整地在这里……”

关于奥尔科夫一家，她写道：

“伊利娜姑娘是一位又瘦又高、死气沉沉、枯燥乏味、很不可爱的孩子。她虽然才12岁，可因为长得干瘦，加上整天寡言少语，所以显得老气横秋的样子。她讲的法语很不规范，更谈不上我讲的法文语法，她从来就没有学过。可她只喜欢马这类四只蹄子和长尾巴的令人讨厌的动物，我最害怕马的嘶鸣和尥蹶子。你更想象不到她穿戴有多么不讲究！当然，伯爵夫人本人也是非常虔诚的教徒，还保持着维多利亚的传统。她没有什么爱好，穿的衣服不是黑色便是紫色。她让我想起勒阿弗尔的老寡妇。不过，她可是一位仁慈善良的老人。她和全家人对我都非常尊重……”

最后她这样描述伯爵家的府第：

“……伯爵家是豪门大户，府第庞大而豪华，我数不清到底有多少间卧室、客厅和大厅，佣人也多得快满一个连了。亲爱的，我还要告诉你，这里有个管家长得太英俊了。要不是我必须保持表面的尊严，肯定让他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不过，他没有官衔，没有财

富，并不是一个合适的伴侣……

这里的气氛非常沉闷和冷清。自从子爵从马——就是那些可怕的家伙——背上摔死后，尤其是子爵夫人随后又得急性肺炎去世后，宅院里就一直死气沉沉的。这里的人们都说，子爵夫人是因为爱丈夫而随其而去的，可我认为她是因为对这座深宅大院的厌倦而离开人间的。

我希望让这里拥有新鲜的空气，伯爵夫人也很赞同，因为她希望孙女生活得更加快活……

……不过，我对巴黎已充满思念之情，你无法想象……”

马德莫依塞尔编剧式的夸张手法，使她在对人物和事物的描绘时总要有不少偏差。

伊利娜正在经历那段讨厌的青春发育期。她个头长得很快，所以人就显得格外干瘦，长长的脸上颧骨也格外突出。不过，她的相貌还算过得去，而且没有受到粉刺的影响，脸上的皮肤光滑细腻。她的鼻子是直线型的，两片小嘴唇无可挑剔，那双东方人式的眼睛清澈明亮，蓝色的眸子发出金色的光亮，一头浓密的红棕色或叫栗色的秀发简简单单地用一个大花结扎在后脑勺上。这样的发型并不是那位老奶妈巴布什卡所喜欢的，她自然是喜欢用热铁夹把头发烫成一个个

小卷。

伊利娜确实喜欢马：起先她喜欢那匹名叫费奥多（这是原来一位矮胖的红头发钢琴教师的名字，因为他的双腿生得短，走起路来总像马一样蹦跳）的矮牡马，现在又喜欢上这匹名叫“女奴”的牝马。“女奴”确实是一匹好马，又温顺又漂亮。它的鬃毛明亮光滑，身上的毛金光熠熠，丝一般柔软。伊利娜总是骑着它，沿着奥尔科夫家在克拉斯诺—彼列科普斯克的庄园的周围悠闲自得地散步。

她其实并不像马德莫依塞尔所说的那样呆板，只是由于少年时代与老人们生活在一起，没有其他儿童为伴而养成的沉闷的个性，脸上总是带着严肃的神情，在基辅的表兄妹们也难得与她聚到一起。但是，姑娘善于察言观色，偶尔也诙谐幽默一番，或者冷不丁地搞得人无所适从。

伯爵本人仁慈而厚道。他身材魁梧，沉默寡言，留着灰白的扇形胡须，一副爱德华式的长者风度。他用那双明亮的眼睛看着他所宠爱的孙女时就显得更加慈祥。由于他既要为铸造厂劳工工潮担忧又要为所有家业的经营而操心，所以他在平常就餐的小餐厅的饭桌上很少说什么。（他们把那间平常用餐显得过分大而不便的豪华大餐厅留作社交活动用。不过在儿子和儿媳

去世后，仅仅用来招待亲戚。)

伯爵夫人和丈夫相比倒是没有那样的威严。她高高的个子，总是穿着笔挺的深色丝绸服装，最多只配上一个颜色稍稍浅一点的领子或某条带饰。老人也不善言谈，成日里一副庄重的样子，使得周围的气氛更加沉闷。她在指使佣人时总是用干巴巴的严肃的口气，但在和丈夫及伊利娜交谈时语调会变得很温和。尽管老人们平日里总很严肃，但他们对孙女的疼爱却是令人感动的，而小姑娘对他们的敬重也显而易见。不过，这种生活气氛已经影响了伊利娜的举止行为，她总是非常规规矩矩地坐在爷爷右边的靠背椅上（伯爵夫人坐在前面，马德莫依塞尔坐在她左边）。

年轻的女家庭教师的欢快、轻佻、甚至有点故弄玄虚的禀性，难以与沉静严峻的气氛相融合。然而，伯爵夫妇也正是要用她的这种活泼的个性，给这里过分沉闷的气氛带来欢乐，带来活力。当然，老人们知道，这主要是给伊利娜带来好处。

4

奥尔科夫伯爵家里的生活并非永远这么沉闷压

抑。尽管伯爵夫妇和他们的独生子博利斯性格内向，可博利斯来自基辅的法—俄贵族家庭的埃莱娜·德·贝利泽—莱蒙托弗的婚姻给这栋深宅大院带来了从未有过的生气和欢乐。在一个爱好艺术的家庭（还有一位亲戚是作曲家）里长大的漂亮的埃莱娜——这是基辅和敖德萨新闻界对她的习惯称呼——喜欢与艺术家们及生气勃勃、爱好娱乐的年轻人在一起。有了伯爵家的财产和严谨作风的唯一继承人、她的丈夫的支持，当然他无法拒绝女人喜欢做的任何事情，又有了公公、婆婆的允许，他们家的大客厅终于向敖德萨的社会打开了大门，尽管他们对这种乱哄哄的场面难以习惯。

富丽堂皇的大厅里，大型吊灯和烛光在高雅的威尼斯大镜上反射出灿烂的光芒；精选的乐曲声像高山流水弥漫整个大厅，敖德萨黄金时代的青年们正沉浸在轻歌曼舞之中。老年贵族绅士太太们——伯爵夫妇的朋友们——欣赏着眼前的热闹场面，回忆着自己的年轻时代，不由得叹息没有能够充分地享受。

大街上，贫穷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想象着这似乎来自另一个遥远的星球、与他们的生活如此格格不入的场面。他们不用付钱，就能听到迷人的音乐，看到金色的灯光，以及那在阴沉的前辈肖像的惊恐的目光下伴着华尔兹舞曲快速旋转、时隐时现的一对对舞伴

的身影。

在敖德萨报纸的社会栏目中，经常载有伯爵官邸花园里进行网球和棒球比赛的消息，也少不了在庭院深处小人工湖畔举行赛后大型招待会的消息；当然，那些去克拉斯诺—彼列科普斯克大猎场作英国式周末游猎或乘家用帆船游弋黑海海岸的非常有限的请柬，更令人们垂涎不已。

年轻漂亮的埃莱娜作为奥尔科夫伯爵家的女主人，现在成了这个家庭从未有过的活跃生活中的灵魂和动力。由于伯爵或子爵的建议，他们每年都要前往自己的森林猎场去打野猪。尽管埃莱娜并不十分喜欢打猎，但也愿意以自己的美貌和妩媚为此项活动增添一点色彩，同时也可借机展示一下自己的那套黑色骑士装。

可是，年轻的夫人生来体质娇弱，健康不佳，容易生病，再加上各种社交活动的劳累，她的健康每况愈下。她和丈夫尽管性格不同但却真诚爱恋，因此，当博利斯在一次难以理解的打猎事故中从马上摔下而送命后，痛心疾首的她便从此一蹶不振；无论是伯爵夫妇的安慰，还是对才满5岁的小女儿的爱，都无法减轻她的痛苦，终于引发肺结核不治而亡。

家人们平常因得到年轻夫人的善待和关怀而对她

无限爱戴，现在无不满怀深情地说她是为爱情而死；敖德萨上层社会和娱乐界的人们也被这个悲剧深深打动，悲痛的气氛一直延续到一个月后彼得格勒歌剧团来该市举办消夏艺术节。

从此，奥尔科夫官邸陷入了更加沉郁的气氛之中。大厅关闭了，帷幔落下了，大镜子里再也没有折射出大气灯的熠熠光辉，而只是在昏暗的光线下，映出了前辈人的冷峻和神圣的油画肖像，那一个个原本是金黄色的大相框也由于时间的流逝已变得灰暗。

奥尔科夫伯爵夫人从此便身着黑色或紫色等深色服装，沉醉于宗教，对佣人们也更加严厉。伯爵更加沉默寡言，完全埋头于对劳工纠纷的处理和对国家不稳定局势的担忧。

伊利娜就是在这种老人环境中长大的。虽然有着爷爷奶奶和老奶妈巴布什卡的溺爱，姑娘还是由于遗传和周围的气氛造就了忧郁、严肃的个性。她也曾有过不少像她这种姑娘该有的教师和家庭教师。她学会了多种语言（法语是用来和爷爷奶奶、基辅的舅舅舅妈及表兄妹们交谈的，俄语只用来与家里的佣人们和她的那匹心爱的马“费奥多”交谈的），她还学习唱歌和弹奏钢琴。可惜，由于家里的令人压抑的沉闷的气氛，音乐老师们也无法改变现状：他们只能要么听从

吩咐，适应这种忧郁的气氛，要么另寻工作。

5

马德莫依塞尔的出现，打破了那种不单是沉寂而且是萧条呆滞的局面。她那在伯爵夫妇看来太不安稳和过分喧闹的活泼、欢快的性情以及她的聪明伶俐，改变了大院餐桌上单调沉闷的气氛。奥尔科夫夫妇过去一直希望聘用这类人，但未曾料到会出现这种情景。他们现在甚至有点怀疑这样的选择是否仓促有误。不过，伊利娜似乎乐于接受家庭中的新的生活方式。对姑娘来说，马德莫依塞尔老师或许是因为过分善良，或许是为了自己的舒适，所以没有像一般教师那样提出苛刻的要求。她善于采用不是十分死板的、结合实际、令教学双方都乐于接受的教育方法。她拿定主意在日常生活中因势利导、循循辅教。连她自己也曾意识到，自己竟成了现代教育法的先行者。但也因为这样，法文中那些错误的不规则动词还在延用。

尽管如此，伊利娜喜欢的唱歌和钢琴课有了明显的进步。除了音乐教师费奥多的那些枯燥无味的浪漫小曲外，她唱起了勒哈尔和奥芬巴赫的歌剧中的女高

音主题曲。尽管还没有完全到位，但唱得也不算难听。这些都是马德莫依塞尔悄悄放在旅行包中从巴黎带来的。

再说，自从伯爵夫人指责她过分吵闹、无止境地嘻笑和穿着过分袒露后，马德莫依塞尔在老人面前也有所收敛，按照她坐等不如试试看的观点，她建议改变伊利娜的社交生活，也想通过此种途径，改变大宅院的社交生活。

为了促使她的学生结交新的朋友，她开始组织小型聚会、野餐以及网球和棒球比赛，并邀请与伊利娜年龄相仿的孩子参加，当然这类活动都征得了伯爵夫妇无可奈何的允许。她也想通过这一做法和即将进行的种种活动，自己可以接触敖德萨的既年轻又成熟的未婚男子。伯爵夫人看到了孙女的变化，也就不再拒绝马德莫依塞尔的各种建议，还把她的职务扩展成为自己的社交秘书。为了抓紧培养正迅速成长的伊利娜的社交能力，奥尔科夫伯爵夫人不得不违心地组织一些新的社交活动。如在克洛迪娜的热心帮助下，老人举办小型晚宴和酒会，让怯懦拘谨的伊利娜展示自己在音乐方面的才能。

也是在马德莫依塞尔的提议下，他们邀请了哥萨克皇家军队里的中尉奥斯特拉科夫来府第晚宴。就是

他曾果断地镇压了布尔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天晓得还有什么人——在铸造厂引起的骚乱。

伯爵夫妇承认应该偿还人情债，也就这样答应了。

马德莫依塞尔怎么也不会想到，她所寄于全部希望的美好未来，就是从这时开始走向失败的。

6

这完全是由于马德莫依塞尔轻率地、疯狂地爱上了他的原因。

伊戈尔·瓦希利维奇·奥斯特拉科夫的确有着一副骑兵军官的漂亮身材。这位中等偏高、英俊潇洒的中尉从来都显出军人的威武和高傲，仿佛他时时刻刻都生活在军营之中。还有他那两只明亮的眼睛总是闪烁着精明热烈的目光，嘴边金栗色的八字胡浓密而卷曲。他在女士们面前既彬彬有礼又毫不拘谨，总是能用他的幽默和爽朗让他们愉悦和欢笑。伊戈尔很注意讨得与其交往的人的喜欢，不管对方的年龄和性别如何。他还有一副天生的男中音嗓子，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一展歌喉，这使他无论在社交界还是在军营里都享有盛誉。尽管他出生在破落的贵族家庭，但他那无

无忧无虑的豪爽性格和对自己外表的认真打扮，使任何人都看不出他在经济上的拮据。如果他不是对女性过分挑剔和不在军营里就职，他早就成为一名成功的诱惑者了。不过，他也不是马德莫依塞尔理想的择偶对象，因为他无法满足最关键的经济条件，而且，尽管中尉威武神气，可皇家骑兵团的职业并没有让她看到他有什么锦绣前程。然而，感情不需要理智，理智了就没有感情。马德莫依塞尔第一次坠入了爱河，她既感到惊恐不安，又感到无比幸福。

7

在只有奥尔科夫伯爵一家，马德莫依塞尔和他参加的家庭晚宴上，奥斯特拉科夫中尉施展了自己各种迷人的招数。甚至在他讲述军营生活的种种限制和为此付出的代价时，也是那么幽默、欢快和文雅，语言那么流畅，毫无军人的凶悍。就这样，他用自己骑马、驯马的故事让伊利娜高兴，让伯爵夫人因孙女的笑颜而欢心，而他对铸造厂问题的关心和打野猪的极大兴趣又使自己和伯爵先生有了共同的语言。他不用引诱马德莫依塞尔，因为她已经被他弄得神魂颠倒了。他

对餐桌上的饭菜的赞扬使得厨工们心满意足，而饭后几曲高亢或深情的俄罗斯民歌把佣人们也都吸引到餐厅半开的门外边谛听。

中尉答应教伊利娜几招骑马的技术，还毫不犹豫地接受马德莫依塞尔的提议，在以后的聚会中带上自己的马拉莱卡琴（俄罗斯民族乐器三弦琴）。于是，在他起身告辞时，就已经被邀请为下一次晚餐的客人了。

就这样，他多次准时应邀来到奥尔科夫伯爵家，有时会陪同马德莫依塞尔和伊利娜去城里闲逛。他也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提高了小姑娘的骑术。不过，他也为此引起女教师的恼怒。她对马这类大蹄、黄牙的动物害怕得魂不附体，她担心被咬、被踢，因而无法参与骑马活动。

马德莫依塞尔不甘心就此被冷落，于是她提出一个新的计划，建议举行一次音乐晚会，由她和伊利娜弹奏钢琴，奥斯特拉科夫中尉带上他的巴拉莱卡琴，大家一起来演唱那些不太难的法国和俄罗斯歌曲，或独唱，或二重唱，或小合唱。再邀请伯爵夫妇的几位朋友，让他们带上年轻的孩子们来为晚会助兴，人们还可以跳跳舞，最后再以一顿夜宵来结束。

举办晚会的建议让伯爵夫人想起了儿子和儿媳，心里不免感到一阵悲切。她犹犹豫豫地同意了，但

规定晚会必须在对不久前刚满 14 岁的女孩来说是合适的时间里结束。

晚会进行得十分理想，客人们谁也没有在夜宵之前离去，年轻人欢快地跳着舞。尽管不如伯爵夫人的心意，克洛迪娜还是接受了伊戈尔的邀请，幸福地投入了他的双臂。当他们伴着“快乐的小寡妇”舞曲快速旋转时，她已飘飘然、神魂颠倒了。

马德莫依塞尔继续操办着这些晚会、野餐、网球和棒球比赛，以及郊区旅游。然而，不幸的是她不得不拒绝参加游艇类活动，因为她还没有忘记海上旅行时所受的苦难。

8

在没有其它更好的消遣、或者军人的职责允许的时候，后者在敖德萨和平年代里是司空见惯的，伊戈尔便毫不犹豫地参加这种社交活动。马德莫依塞尔也竟然放开胆子与他打情骂俏，或拉手示意，或暗送秋波，总之，用那已经不是非常隐晦的恋人之间的表达方式向他表示着自己对他的爱恋。奥斯特拉科夫中尉虽然年龄不大，但却有着丰富的感情生活经验。从少

年时代起，他从与人的共同生活中就学得了比先天赋予的性情更加深奥的情感交流知识。他与年轻的服务人员、富家小姐以及军营周围的一些妓女都曾有过床第之欢，因而他毫不费劲地明白了马德莫依塞尔的那些明显的、炽热的爱恋的示意，他既感到欣喜，又感到有趣。他不嫌她年龄比自己大，因为她毕竟还是个诱人的年轻女子，高高耸起的胸脯招人动情，圆圆的小脸蛋有着独特的可爱之处。再说，她那巴黎女郎的高雅风度，欢快的性格，火一样的目光以及可以猜想到的谈情说爱的经历，显示了她对男人的魅力，也预示着他会拥有一段新的风流韵事，还是带着异国情调的风流韵事。这对于他在军营里赌钱或喝酒的那种夜生活来说，将是一种很好的调节。与过去他和妓女及下等女人们用钱买来的性爱相比，他的这次情爱一定会令同事们垂涎三尺。

于是他对马德莫依塞尔作出更多的表示，常常拉住姑娘胖乎乎的小手，或者用那以前从未用过的火一般的目光盯着她，那低低的温柔的男中音简直能让姑娘魂不守舍：

“……啊，冰凉的小手……”

就这样，奥斯特拉科夫毫不费劲地说服了她，让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从马棚的小门溜出去，与他幽

会在花园深处的人工湖畔。当然，让马棚的小伙子给个方便，也只需花几个小钱就是了。后来，当马德莫依塞尔的爱情火焰已不足以驱赶乌克兰夜晚的严寒时，他们便在马棚小伙子的房间里幽会。小伙子像个小农民那样，背着伯爵家的人，用那小小的房间做起了这一特殊的小交易，给他们办起了一个临时客栈。

9

伊利娜对女教师的罗曼史并不是没有察觉，这使她更加注意教授自己骑马术的年轻英俊的军官。虽然他教授骑马不算太规范，可却非常有趣。小姑娘还第一次发现自己内心深处隐隐约约有一种难以说清的既令她欢愉又令她烦恼的感觉。

伊利娜从一开始就友好地接受了充满青春活力、善于夸张、甚至不同于一般的性格开朗的马德莫依塞尔。确实，从马德莫依塞尔来了以后，家里的生活出现了她至今未曾见到过的生气（她年龄尚小，无法回忆起父母健在时的生活气氛）。另外，与其他和她年龄相差太大的严厉的女教师们不同，马德莫依塞尔善于与人相处的性格很快赢得了小姑娘的信任，而她们对

法语语法的反感又使这两个年龄不同的人成了可以一起玩耍的伙伴。这种做法是其他教师们绝对不能同意的。在他们眼里，法国女郎的教育方法是非常有害的。

家里的生活气氛没有因为中尉的加入而立刻有所改变。伊利娜还是那样友好地对待他。她认为他是一位能给人快乐、充满热情的理想的朋友。他能逗得她发笑，他们对骑马和海上游玩都有着共同的爱好。

在伊利娜对伊戈尔仅仅是友谊和一般的友好情感中，现在开始掺杂了对马德莫依塞尔的不满情绪，因为马德莫依塞尔太露骨（她认为简直是无耻）地“投靠”年轻军官。于是，她存心让伊戈尔陪自己骑马远行，或者说服爷爷同意他们乘游艇出海，这样，对海上不幸的遭遇心有余悸的女教师便无可奈何，只能不参加了。

然而，伊利娜承认自己没有法国女郎的成熟、活泼、欢乐，没有法国女郎那种诱人的魅力。于是，她对曾经与之友好相处过的马德莫依塞尔进行无声地抵制，常常投去严厉责备的目光，对法语学习表现出明显的不感兴趣——可是，这些并没有引起马德莫依塞尔的注意——而对女教师从心底里讨厌的骑马却越来越感兴趣了。

有一天晚上，当法国女郎蓬乱着头发、用那条黑

边头巾遮着半个脸、气喘吁吁地从外面回房时，伊利娜正手擎银制烛台等在马德莫依塞尔经常溜出溜进的门口。小姑娘嘴角一撇，瞪大的眼睛里充满了无声的指责，这使女教师立刻想起了她的祖母。

马德莫依塞尔一时不知所措，结结巴巴地找着借口，说什么想呼吸新鲜空气，又说想欣赏月亮，随后立即钻进了自己的卧室。伊利娜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也没有动，手中的蜡烛闪着惨淡的光亮，在她秀丽的脸庞上留下了难以描述的阴影。

10

伊利娜还说不出是出于什么样的嫉妒心理，她首先想到的是要向爷爷奶奶告发这个表面老实的女教师。然而，姑娘天生的冷静让她想到一向严厉的老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将马德莫依塞尔驱逐出门，随之也会对伊戈尔关上宅院的大门，那样，自己也就肯定不能再与他经常相处了。最后，她还是没有去告发。

然而，马德莫依塞尔犯了一个她这般年龄和有经验的女人不该犯的错误：她告诉情人，小姑娘曾在她幽会回去时等着她，而且肯定不会相信自己临时胡编

的借口。

伊戈尔听后丝毫没有介意，也没有为了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而担心。相反，这件事情倒引起他对伊利娜的注意。他过去一直认为伊利娜只是一位聪明内向的小姑娘，像一个年龄尚小的亲戚，自己可以通过她更多地接近女教师。

现在他突然发现，两年多来，小姑娘已经变成了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她的个头几乎和自己一样高了，身上已经充满了妙龄少女的魅力：与其说她瘦高，不如说是苗条，瓜子型的脸庞，稍稍突起的颧骨，端正而秀气的鼻梁，匀称的小嘴，大而明亮的蓝眼睛。她脸上的皮肤呈粉红色，没有一丝斑点。而她那如丝的秀发还是像过去一样扎在脑后，或者像在奥尔科夫家的晚会上那样高高地扎在头顶。他惊讶地发现，伊利娜突然显露了斯拉夫姑娘的恬静和高雅，虽然不善说笑，稍稍带点忧伤，但有时也会发表一些鲜明、有趣、几乎是无可辩驳的评论。她从一只“丑小鸭”出落成了一只高傲诱人的天鹅了。这一切发生在他这位经验丰富的人的眼皮子底下，而他竟然没有发现。这简直是不可原谅的。

他自然不能把伊利娜与马德莫依塞尔相比，毕竟法国女郎是位热情欢快、充满活力的漂亮洋妞，还是

位易于相处、经验丰富的情场老手。与她在一起的确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然而，现在他忽然觉得法国女郎的漂亮似乎过分妖艳和矫揉造作，令人厌倦。再说，尽管她费尽心机，年岁还是无情地透过精心制作的美容层显示了出来：红色的胭脂和涂抹均匀的多卡隆粉底霜无法掩盖眼角的鱼尾纹和嘴角的皱纹；为了把乳房高高托起，她不得不拼命地勒紧腰部，那种大胆地敞胸，甚至难以让伯爵夫人接受；还有，她的头发是染过的，皮肤也已失去光泽。于是，奥斯特拉科夫中尉便像所有不再热恋的情人那样，客观而又苛刻地挑剔着对方让他厌倦和困惑的方方面面，什么活泼得太过分啦，有时过分造作啦，演唱意大利二重唱时目光过分热烈、毫不掩饰啦，一些暗示也不顾年龄的差异啦，这些越来越引起他内心的反感。最终，他幻想中的那种谈情说爱也已经不再有什么新鲜感了。不管怎么说，没有那么新鲜了……

随着情火的冷却，他们的二重唱也不再像以往那样热烈了。当伊戈尔高唱起“啊，美丽的姑娘”时，已不再拉住马德莫依塞尔那胖乎乎的手，也不再看着她，而是把目光转向了盯着自己的伊利娜。小姑娘那平时总闪着严肃目光的眼睛里，现在却蕴藏着某种令人难以捉摸的神情。

于是，中尉不顾马德莫依塞尔的失望和恼怒，不顾马棚小伙子的困惑，在马棚小屋里幽会时开始找借口迟到，甚至不打招呼、连句表示歉意的话也不说就随便失约，害得法国女郎不得不羞愧无比地拒绝马棚小伙子为了替代中尉、也为了安慰她而战战兢兢表示的企图。

11

马德莫依塞尔已经感觉到了情人的冷淡，再说，他们在一起时已不再有什么激情，已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这类情况；当然，她也很容易发现伊戈尔对伊利娜的钟情，他们经常长时间地出外骑马，经常因她的出现而中断他们之间的单独谈话，而且她从自己的学生身上也看出某种变化。

尽管她还爱恋着这位身着笔挺制服、钮扣闪闪发光的威武的皇家哥萨克中尉，但现实已经很清楚了。她不得不痛心地看着，如果这位情场老手看上了伊利娜的年轻、柔嫩以及她那恬静的女性美，那么对女人的娇媚比对法语语法更有研究的她、一位半上流社会的女人必然会开始失宠。

晚上，马德莫依塞尔坐在红木梳妆台的圆型镜子前，客观地、不留情面地审视着自己眼角的鱼尾纹、嘴角的皱纹、失去光泽的皮肤、尽管不脱落却已有几根发白的头发、还有那双富有经验的眼睛。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精心塑造的形象、活泼和连自己也觉得有点太显露的妖艳，已不再是与伊利娜的年轻、柔嫩、恬静和财富竞争的武器。真是“后来者居上”。

她明白，与伊戈尔的关系已经注定要结束了。但她还是爱他的，她不由得流下了眼泪。不过，她还是控制住自己，她不愿让泪水破坏自己用一个多小时才涂好的脂粉。

这个晚上，她借口说头疼没有去餐厅用晚餐，只是让人把晚餐送到卧室，但她几乎没有碰一下。

她确实为发生的这一切而伤感。

12

第二天，她平静了下来，慎重地考虑着自己眼前的状况。她不想伤害伊利娜。尽管她认为，小姑娘凭自己的容貌、财富和社会地位，肯定能寻找到更好的婚姻。不过，马德莫依塞尔明白，小姑娘已经爱上了

伊戈尔。为什么不能爱上他呢？就连她，克洛迪娜·阿乌贝格·迪朗这样聪明过人、富有主见和经验丰富的半个巴黎女郎也被年轻军官的魅力所吸引（还曾想赢得他）！

因此，她对伊利娜这种认真的质朴的竞争并不气馁，甚至她也不得不承认小姑娘的为人非常正派：她虽然对自己和伊戈尔的关系了如指掌，却未曾向爷爷奶奶告发。关于这一点，她绝对有把握，因为在她与情人幽会回来时，不止一次发现伊利娜卧室里的窗帘不时地在撩起。

为此，她必须慎重考虑自己目前的处境。

她想到自己已经不能再以家庭教师的身份留在这个家里了。伊利娜快16岁了，已是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而且还正爱着一个她明明知道是——或者说曾经是——自己的情人。要是在法国那种宽容和开放的社会里，这样的局面可能令人难堪，但也可能容易解决，只要不出现什么太大的难以容忍的丑闻，便可以维持下去；然而，在奥尔科夫家的这种尊严桎梏之下是绝不可能的，更不用说两者之间还能保持什么起码的友谊和信任。

再说，过去她接受这一职务的动机是希望能寻找到美满幸福的婚姻，可现在这一切又是那么渺茫：她

还从未遇到过什么王子和大公爵，而且，在敖德萨这种倒退的（她这样认为）社会里，上流的贵族阶层要么与贵族攀亲，要么与有钱人联姻；而有钱人也是要么与有钱人、要么与贵族结婚。这里没有她的机会，并且她的年龄（她不得不承认）已不可能使她得到这种违反社会陈规旧俗的爱情，她与伊戈尔的来往也从未被当作正经的恋爱（现在她不得不承认这个痛心的现实）。她承认，对自己来说，这已经是最后一次风流故事，只是多一个令他难忘而欣慰的恋人（马德莫依塞尔认为，这样说起码也能为自己挽回一点面子）。

她如果继续留下伺候伯爵夫人，给夫人作个伴，也不是不可能，但她对此已不感兴趣。老夫人的严肃和不善交际的性格，并不会给她带来与这个家庭的财富和社会地位相符的社交活动；尽管她已经使这座大宅院的客厅热闹了起来，可那也只是为了伊利娜；一旦伊利娜离开这里，而她只作为夫人的陪伴，那她就只能是无可奈何地任凭年华流逝，陪伴着伯爵夫妇平淡无奇的生活，那压抑无声的一日三餐，还有那大教堂里令人厌倦的十分严肃的宗教仪式。不，谢谢，够了。

她也想到了是否去奥尔科夫家的某个有钱有地位的朋友家，但她不想重新忍受那些笨头笨脑或调皮捣蛋的孩子们，或许，天晓得还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再

说，心怀妒忌的孩子们的母亲，对她能走进他们的天地所拥有的活泼、美貌和魅力并不会好眼相待。伯爵夫人对她倒不无缘无故地妒忌，而忠厚善良的伯爵整天关心着铸造厂的生产、潜在紧张的劳资关系和布尔什维克们在工人当中鼓动的动乱。在马德莫依塞尔来这里干活的4年多时间里，他几乎没有注意到她精心的打扮和显露的魅力、以及她明显表现出的期望。

克洛迪娜凭着她高卢人的节俭习惯，这几年来已有了一笔积蓄。奥尔科夫伯爵夫妇给她薪水时还是很慷慨的，她除了购买化妆品和衣服外也没有其他开销；再说，为了多积攒一点钱，她常常利用给伊利娜买东西的机会夹带着买点自己的东西。这样，她就有了一定的积蓄。这点积蓄如果还不足以置办嫁妆，肯定足以让她回到法国，维持到拥有新的生活来源。

13

第二天上午，不再像平日那样充满活力的马德莫依塞尔找到了伯爵夫人，告诉了她自己的决定：伊利娜已经成人，也接受了相当高雅的教育——她还是这么说了，因为这也不会有损于教师应有的谦逊的美德

——她已经没有什么能再教授的了，她认为自己已经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必要继续担任这里的教师职务；因此，她不想作为无用的负担留在这里，她的使命应该结束了。她感谢——真诚地感谢——他们对自己的尊重，也祝他们全家、尤其是祝伊利娜幸福，然后她提出立即辞职。

奥尔科夫夫人静静地听完了她的陈述，接受了她的辞职请求，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老人对法国女郎的教育方式是否合适心里一直将信将疑，但她承认是这位法国女郎给他们家带来了多年不见的欢乐。在这一方面，她已经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老夫人对女教师的尽职表示了感谢，也祝愿她将来幸福，但没有提出让她担任新的职务，也没有建议她在他们的朋友们家中寻找工作，只是给女教师出具了一份证明信，信中也并没有马德莫依塞尔认为应该获得的那种赞美之词。

伊利娜静静地听着这一决定，既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表示反对。只有老伯爵提议让她继续为夫人作伴，然而面对夫人和孙女的冷淡表情，他也没有再坚持意见。

在最后的那次短短的相聚中，伊戈尔显得有点忧伤，但没有劝慰她，也没有向她表示他的天长地久的

爱。他只是告诉她，与她的这段爱情是他有生以来最伟大的爱情。但无可奈何的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必须接受这一事实。他没有像往日那样邀请她去马棚小屋，而是说人们正等着他回去参加为军营一位同事晋升而举行的夜宵，便匆匆撇下了沮丧的她。

马德莫依塞尔·克洛迪娜·阿乌贝格·迪朗就这样拿着一张一等车厢的火车票，穿着那件阿根廷狐皮大衣（奥尔科夫伯爵夫妇送的礼物），抱着一束夹着朋友伊戈尔名片的红玫瑰回法国去寻找永久的丈夫^①。

啊，是的，她就这样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离开了敖德萨。

14

法国女郎的离去给这座大宅院带来了安宁和令人惬意的平静，也不再有过去的悲伤。由马德莫依塞尔建造的新的生活气氛，冲淡了人们对伊利娜父母的悲惨去世的痛苦回忆，现在从一定程度上又没有了女教

① 几年以后，尽管不如人意，她还是和已经丧妻的卖腊肠的姨父结了婚。这也是命中注定，她终于落入了肉店老板的怀抱。

师那过分的喧闹。伊戈尔继续经常来奥尔科夫家，他用自己的魅力赢得了老人们的喜欢，伊利娜仍然和一些朋友保持着来往。

在马德莫依塞尔离开后不久，伊戈尔就向伊利娜表达了他的爱情，小姑娘不知所措地听着。军官发誓说姑娘是他真正和唯一所爱的人，而且，这是他在如此多变的感情轨道上第一次提出结婚。他们当时正相会在花园深处的湖畔，伊利娜当然没有想到，那些垂挂在湖面上的紫藤树枝是否也曾听到过他向其他人发出的相似的誓言。

伊利娜不用回答他什么，她那盯着军官的严肃的眼神已经替她回答了。伊戈尔亲吻着她，但没有把她带进马棚小伙子的房间。他绝对不能像对待轻浮的法国女郎或其他那些容易到手的女人那样对待奥尔科夫伯爵的孙女和继承人：伯爵的社会地位、财富和在工业、金融及政治界的势力，让他不能使用勾引其他女人的那种轻浮举动。他可不能与奥尔科夫家开玩笑。

再说，事实上伊戈尔也相信自己真的爱上了她。而没有爱情，怎么能相信呢？在伊戈尔眼里，伊利娜的单纯、天真和诚实，她的年轻和涉世不深，使她显得如此脆弱，因而必须以高雅的柔情来对待她。

军官再一次感到奇怪，如此有生活经验的他竟然

没有发现姑娘的变化，她从一个默默不语、并不可爱的小姑娘长成了一个美丽恬静的女人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伯爵夫妇对这件婚事没有特别的反对。老头只是说伊利娜太年轻，还不满 16 岁。但伊利娜说，又不是明天就结婚，在俄罗斯社会里，女人通常结婚早，奶奶也是不到 16 岁就结婚的等等。面对孙女这般坚决和无法辩驳的观点，伯爵马上就妥协了。

对于沙皇军队里的这位军官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他们也适当地考虑了。皇家军队的军官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一般出身于很好的家庭，又与名门贵族联姻，即使不能飞黄腾达（某些与没落大家庭的不幸联姻），起码在要求不算苛刻的军界和政界都能拥有灿烂辉煌的未来，伊戈尔·瓦希利维奇·奥斯特拉科夫这位皇家骑兵团威武的哥萨克中尉，在镇压铸造厂布尔什维克或无政府主义者——管他是什么人呢——的暴乱中显示出果断胆略的有为青年——起码也是一代或几代贵族家庭的后代，再依仗奥尔科夫家的财势，当个俄罗斯某省的省长也不算过分。即使由于什么阻碍不能达到上述地位，他还总可以在企业管理中大显身手，虽然不一定有多么辉煌的业绩，可也起码能做到丰衣足食。

不过，老伯爵在私下里告诉夫人，伊戈尔被城里人说成是“好色之徒”，对此他有点不甚满意。伯爵夫人干脆利落地回答说，没有比这个风度翩翩、年轻未婚的哥萨克军官更好的了。那些事情对于年轻人来说是难免的。有了对伊利娜的爱情，有了对婚姻和家庭的责任，那样的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了。再说，生活当中并不是一切都那么光明磊落，老夫人冷冷地说道，在当地就有一些男人、有些上了年纪的人、有些头面人物甚至社会精英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譬如把歌剧团的舞女当情人……

伯爵本人在上了年纪后也曾有过不算太严重的过失，与一位来敖德萨访问演出的意大利女歌剧演员有过瓜葛，所以他没有再不合时宜地表示反对。为了避免引起人们的闲话，他们把结婚的日子定在六个月以后的某日，还确定了给伊利娜一大笔陪嫁。

15

订婚以后的这段日子像往常一样过得平平常常，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事情发生。婚礼办得十分隆重，与

新娘祖父母的社会地位和财势非常相称。宾客们一个个身着燕尾服或披纱戴羽，军官们则都穿着笔挺的制服。当地报纸的社会专栏上发表了长篇报道，基辅的报纸上也刊登了一条简短的消息，不过，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报纸上未见报道。

婚礼前，伯爵夫人无比激动地把伊利娜母亲留下的、为这个时刻保存的那只单颗大钻戒交给了孙女。伊利娜非常感激地收下了，只是由于当天的幸福和激动而没有过多地在意它；她带着它参加婚礼，并相信这只戒指会伴随她终生。

新郎新娘由一位老佣人陪同，带着很多行李，乘奥尔科夫家的游艇，穿越黑海和地中海到达马赛，开始他们在整个欧洲的长时间而舒适的蜜月旅行，当然，全部费用都由伯爵慷慨开具的俄罗斯银行的支票通过在巴黎的代理支付。显然，幸福的彩云正环绕着他们，让他们生活在激情之中；然而，令人可笑的是，他们成日里手挽手，你盯着我，我盯着你，而对欧洲上空堆积起来的另一些可怕的乌云却一无所知。

那就是 1914 年。

还

魂

曲



第五章

巴黎充满欢乐

1

几年以后，伊利娜对穿越黑海和地中海的蜜月旅行留下的只是模糊的记忆（或许她当时年龄尚小，对既是厨师又是招待的佣人对新郎新娘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和斟上的香槟酒还不能适应的缘故），她只记得在那些清新的早晨和令人发倦的傍晚，他们在温柔的阳光 下，躺在游艇甲板上的帆布长椅上，享受着静谧的欢乐。夜

晚，蓝黑色的海面上洒下一片银白色的月光。伊戈尔弹着巴拉莱卡琴，轻声唱着家乡的歌谣，或者为了赢得新娘那羞涩的一笑，他唱起了军营里的粗俗的小曲。对这些带有双关意思的平庸小调，伊利娜怎么也不能理解。

姑娘感到无限的幸福；她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大的幸福。伊戈尔是那么的热情、温柔、成熟和可靠。与其说他是丈夫，还不如说是情人。伊利娜对他完全是言听计从，从未想到问问他，这些显然不是从书本上所能学到的智慧是从哪里学来的。

对于伊斯坦布尔，伊利娜只记得火一般的夕阳照耀下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晚霞笼罩着的一座座清真寺和高楼大厦，还有那一条条熙熙攘攘、乱哄哄、吵吵闹闹的街市。街市上，一个个留着络腮胡子、身上散发出难闻气味、像强盗土匪一样的小贩，像吉卜赛人那样死缠着游人兜售土耳其无檐毡帽、女人的头巾、土耳其的宽腿裤等。伊戈尔给她买了一个泥塑。小贩以岳母、妻子和子女们的健康发誓——当然是不值钱的发誓——说是从斯密尔纳南部的某个地方出土的，然而泥塑底部却刻着“伊斯坦布尔制造”；伊戈尔还未经伊利娜同意，买了一件阿拉伯女佣习惯穿的镶着金线的半透明的蓝色丝绸裙子。伊利娜微笑着告诉丈夫，

她永远不会穿它。然而到了晚上，面对丈夫执意的请求，她还是尴尬而羞怯地在船舱的卧室里穿上了它。

许多年以后，她还记得希腊那些高耸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面对着湛蓝而平静的海面的白色大殿。还有那次游览阿克罗波，令她非常高兴。他们骑着小毛驴沿着陡峭的山路艰难的攀登。她记得，伊戈尔骑的毛驴在半路上罢了工，无论他那高超的骑马术和秘诀，还是哥萨克皇家军官的威风都无法使那小畜生继续赶路。伊戈尔只好下来步行，还要牵着伊利娜的小毛驴。

在科孚岛上，他们手拉着手，沿着狭窄的街道，穿过一栋栋白色的小住宅，透过阳台看着沙丁鱼女老板们的劳作；他们在那不勒斯下了船，少不了去参观庞贝的遗址；在卡普里，他们乘坐四轮马车，沿着一条令人心惊胆战的弯弯曲曲的山路爬上了阿纳卡普里，从那里眺望美丽的海滩，品尝着当地酿造的味道鲜美的葡萄酒。

在热那亚，他们原计划去圣地游玩，由于伊戈尔认为没有意思而临时取消，决定让老佣人把游艇开回敖德萨，而他们两人从陆路前往圣雷莫、蒙特卡洛、戛纳、昂蒂布，最后终于抵达巴黎。

2

在巴黎逗留的日子是欢乐难忘的。

他们见了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座城市。伊利娜乘电梯战战兢兢地登上了刚建不久的艾菲尔铁塔，眺望全城，她看到了星型广场和凯旋门，看到了一条条在雄伟建筑物中间伸向远方的大街、壮丽的特鲁加德罗广场和杜伊勒皇家花园，看到了环绕城市的塞纳河、高耸的白色圣心教堂的蒙马特山头，看到了郁郁葱葱的布洛民丛林。

由于有祖父奥尔科夫为他们提供的数额巨大的支票，她自然可以对巴黎尽情陶醉。他们住进了里兹酒店的宽敞豪华的房间。尽管伊利娜对舒适的环境并不陌生，但这座酒店的气派确实令她惊讶：宽阔的台阶，大理石的柱子，镀金的装饰品，五光十色的豪华吊灯，门上和墙上挂着雕刻、油画和花束，房间里的家具考究舒适，有来自全世界的高贵客人，厨师的烹饪技术也很高。这一切都令她着迷。

伊戈尔对这样的环境倒显得很熟悉。他自由自在地穿梭于各个大厅，对员工们热情大方，仿佛这里是

的常客。伊利娜不得不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只要在他身边，自己就有安全感，因为他能自如地应付各种场面。

由于老伯爵的慷慨，伊戈尔带着他的女人走遍各家时装店，为各人添置了不少衣服；他们沿着丛林骑马，在塞纳河畔的栗树下手拉着手闲逛，出入著名的饭店、勒阿尔的马克西姆餐厅、法兰西喜剧院，还有什么严肃的或滑稽的歌剧院等等。

由于伊戈尔的坚持，他们到巴黎名声不佳的红磨坊地区观看一场民间舞蹈。这个地区以一位残疾画家而出名。在那里，姑娘们一边跳着，嘴里喊叫着粗俗的话语，一边提起长长的裙子，露出她们肥大的臀部，伊利娜既感到很难为情，又忍不住笑出声来。在伊戈尔的提议下，他们还与那些姑娘和小白脸们一起跳起了磨盘舞。伊利娜轻轻地责备伊戈尔竟然把她带到这种低级的地方来，这里肯定是痞子无赖和娼妓们光顾的地方。伊戈尔听罢哈哈大笑，一把将她搂在怀里，称她为“亲爱的小土妞”。他辩解说，正是各种阶层的人们的这种欢乐的生活，才使得巴黎如此令人神往、魅力无比，才使它成为“世界之都”。

依偎在丈夫的怀抱里，伊利娜很快就忘掉了她那固有的自尊心所受到的伤害。

3

的确，在巴黎度过的日子是欢乐的。他们陶醉在音乐、戏剧、五光十色的彩灯、奢侈生活、鲜美的香槟酒之中。他们用不着去关心支票的款额（伊戈尔的假期没有限制，他建议等钱用光了再回去），他们和生活在敖德萨时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对历史和政治不感兴趣，他们没有注意到欧洲局势的日趋紧张，更没有看到巴尔干动荡不宁。他们认为，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人、黑山人以及其他种族人之间一直纠纷不断，眼前的这一切并不是新鲜事。因此，奥地利对波黑虎视眈眈以及俄罗斯军队的大量扩充，只被他们当作沙皇军队的军官们更快晋升的好机会。那座山麓环抱的三等城市发生的动乱也没有引起他们的警觉，在他们看来算不上什么骚乱，充其量是场闹剧。而弗朗西斯科·费尔蒂南多大公爵及其夫人之死，起初在他们看来也只是那些臭名昭著的无政府主义、或布尔什维克、或塞尔维亚人、或者其他什么人企图搅乱那些达官贵人们的安宁生活而制造的爆炸事件。

然而，情况的快速变化，政治局势的急剧演变，战

争的大动员和大宣战使他们为之愕然。在巴黎这座美丽、刺激、巨大的不夜城里，他们不知所措，到现在才隐隐约约感到了可怕的预兆。

一阵彷徨之后，伊戈尔找到了俄罗斯大使馆的武官处，但那里也已经一片混乱。人们不知国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边境已经封锁，陆路邮递已被切断，海上传递更不可能，形势相当严峻。武官处的人劝他与他们保持联系，或者自己设法与部队取得联系，寻找机会回去。

伊利娜尽管年龄小，处处依赖丈夫，巴黎的环境又那样令人兴奋，但她还是非常惦念着祖父母。她要回到本国去，不管以什么方式，也不管从哪里走。可伊戈尔对能否在这种形势下回去表示怀疑：坐火车已不可能，因为德国和奥匈帝国的联合部队已完全切断了东部的交通，而海运公司谁也不能向他们保证有船去俄国的任何港口。

除此以外，伊戈尔尽管没有明说，但他越来越不想再回到如此混乱的环境中去，他在皇家军队里早就看透了上司的无能和腐败。他选择军队生活，那是因为和平的年代，是因为那套军服的威武和辉煌，是因为那是没有战事的军事生活。那时的任务是对付工人、农民或者哥萨克人的警察般的行动；而现在的情

况完全相反，是对付强大的奥地利—日尔曼联合部队的战争。

因此，伊戈尔主张谨慎从事，等待形势明朗一些。再说，支票上的钱还够用一阵子，即使用光了，他相信奥尔科夫也不会在孙女需要时袖手旁观。

4

与他们的愿望相反，局势并没有明朗化。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参战使他们更难进入乌克兰，而西方战线上传来的消息又并不令人振奋。德国军队迅速推进巴黎附近，然后又转战其他地区，后来又在马恩省受挫，这使人们处于时而失望、时而欣慰的状态，然而更多是对前途未卜的陆地战争的憎恨。

他们日常生活的情况同样不能乐观。俄罗斯银行在巴黎的代理法俄银行已经给了他们最大限度的贷款，但因为他们的均为现金支票，所以银行方面通知了奥斯特拉科夫夫妇的最后的限额。

伊戈尔分析了当时的情况，为战争带来的麻烦而叹息和忧伤：由于国际邮路中断，伊利娜发出好几封信都没有得到敖德萨方面的答复，更谈不上他们所要

求的援助。因此，他们不得不随着那批房客灰溜溜地从里兹大酒店搬进一家三等旅馆，而后，又从那里搬到蒙马特勒比克街上的一个小房间里暂住。到这里后，伊利娜心中惦念着祖父母，整天关在屋里不停地哭泣，伊戈尔为钱发愁，心神不宁，也不停地轻声诅咒。不过，他对妻子还给予了她所需要的关怀和温柔，事实上，他还是爱她的。虽然现在不可能再过以往那种奢侈的生活，不能住豪华酒店，不能进有名的大饭店用餐，不能去欣赏歌剧，不能买时装，但伊戈尔还是想方设法用简单的活动和消遣让妻子生活得开心一些。他们在香谢里涩大街和卢森堡公园散步，到历史博物馆、纪念碑、大吉努尔剧院和戴尔特广场参观。登上圣心教堂眺望巴黎全景。他们常常在住处附近的小饭店用餐，在塞纳河畔的栗子树下品尝热狗。就这样等待着。

然而，奥斯特拉科夫夫妇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老伯爵支票上的钱已经花光了，他们开始借债，可日常的开销并没有明显地减少。伊利娜从来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开销花费都由别人提供，因此，她不懂得钱的价值，对伊戈尔能提供的那点钱更不懂得怎样去掌管。他们欠下了房租，还赔了不少帐。总之，他们不知不觉中已经债台高筑。

伊利娜开始低价变卖自己的首饰。不管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总是有人失去有人得到。她把一件又一件的首饰交给伊戈尔，让他当掉或卖掉。可是，当伊戈尔告诉她已经物色到购买母亲留给她的这个大钻戒的人时，她禁不住失声痛哭，最终也没有把钻戒拿出来。这是她最心爱的首饰。或许它并不是最贵重的，但它把她和过去的生活、和祖父母、和家庭联系在一起。她视它为自己的生命，有了它，就有自己。她认为，等到战争的风暴过去后，一切都会回到过去的样子：祖父还是一心一意经营他的铸造厂，祖母管理着大宅院里的员工，他们还能骑着“女奴”沿着克拉斯诺—彼列科普斯克的大庄园散步，大宅院里还是那么宁静舒适。

伊戈尔惊讶地意识到，他的确需要为生活而工作了。

5

他决定找一个与其皇家军官身份相符的工作，尽管当时他身份不明（开小差？违反军纪？），可总还是沙皇的哥萨克军官。不幸的是，巴黎人对他的身份并

不感兴趣。再说，他对任何工种都不熟悉，战争形势下的经济瘫痪、涌向巴黎的难民日益增多，尤其是他的外国国籍大大地限制了他的机遇。他付出了百般的努力，得到的却是无数的失望。于是，他不得不渐渐地降低自己的抱负，最后接受了五洲大酒店大门侍卫的职务。不管怎样，五洲酒店是帕依斯大街上最好的豪华酒店。从某种意义上讲，他那英俊的身材、潇洒的气质、穿上制服的威武、对待客人的文雅——尤其是对待女士们——以及他掌握的俄语、法语、德语和英语四门语言都用上了。人们对他的军官生涯和音乐天赋并没有在意，因为正如前面说过的，那里既不是军营也不是咖啡音乐厅。

伊利娜看到她的皇家军官丈夫换上了大门侍卫的制服，心头一阵痛楚，泪水夺眶而出，她比他更感到难受。但她又不得不承认，丈夫这样倒也不比过去难看，侍卫的制服他穿着也那么合适。伊戈尔的身材的确很好，适合穿制服，无论是将军制服还是夜晚巡警的制服。他们现在也只能这样等待战争的结束。

对于伊戈尔来说，难堪和尴尬的阶段终于熬过去了，他很快就适应了这种局面。他像绅士一样，潇洒自如地接受着酒店客人们为他这位温文尔雅的新侍卫的友好礼貌的接待和张口“伯爵先生”、闭口“候爵夫

人”的慷慨称呼而施舍的小费。他对女士们当然更为殷勤，使她们不得不向他投来赞许的甚至是挑逗引诱的目光。最终，这个职务让他挣了不少钱。

伊戈尔干这份工作的时间不长。因为没过多久，酒店的一位大堂经理突然去世，他便接替了那个位置。尽管由于没有了小费，他的经济收入没有明显增加，但是工作条件却大有改善。他不再需要长时间地站立在阳光下或暴雨下，而且还可以到酒店的食堂用餐。不管怎样，他都把新岗位当作职务上的晋升。

伊利娜也对他的新工作感到满意。除了工作条件的明显改善，毫无疑问，大堂经理的位置从性质上讲也比大门侍卫要高得多，即使制服不如以前的漂亮。伊利娜提出自己也要找一份工作。过去，伊戈尔没有工作，整天陪伴在她身旁，日子过得很快。新婚蜜月的欢愉——现在似乎已离她很遥远了——还有那些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昂贵和高雅的活动让她没有时间去烦恼。即使后来手头拮据，丈夫也懂得用那些经济而有趣的活动为她消遣。他们甚至步行走遍了他们所居住的那个地区的一条条大街小巷，参观了一座座博物馆和教堂，沿着塞纳河畔散步，去各大公园游玩，还光顾了当地的小吃店，欣赏了那里的烹饪艺术。即使是那个伊戈尔执意领她去的、曾让她仿佛感到降低自己

地位的“风笛舞会”，也让她当作一次有趣的、美妙的、波斯尼亚人的旅游活动，而不是她社会地位下降的象征。

然而，现在丈夫有了工作，整天在外，伊利娜独自一人在家感到厌烦和忧伤。勒比克街上的这个小房间已无法让她振奋。她从来不习惯、也不喜欢做家务。对她来说，日常家务是些单调、枯燥、令人厌烦的愚笨劳动。从来都有人为她打扫房间、整理衣服，有人为她做饭烧菜、洗锅刷碗。在她的学历上，从来也未出现过家庭管理这一课程，她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或许有一天这类知识对自己会有用处。伊戈尔当然也不喜欢做家务。他们的房间只是用来睡觉的；他们在外面的用餐，在外面逗留；在时间允许时，他们便找个咖啡厅或找个电影院消遣一下。这是他们在局势不定的时候选择的新的生活方式。

只是伊戈尔的上班时间不能固定，有时白天，有时晚上。每当丈夫上夜班，伊利娜就在家里躺着，要么看书，要么睡觉。她不敢在天黑后独自上街，因为她曾被人误认为“妓女”。每当白天丈夫在家休息，她就把房间稍微收拾一下，到街头小商店买点东西，绞尽脑汁凑合做成一顿很不像样的饭，然后便出门闲逛，直到在外面吃完饭回家。

可是，如果丈夫白天上班，她便感到厌倦不堪。她不善交际，不喜欢和看门人说话，又不愿意和房东太太聊天。她不和邻居来往，又不上街买很多东西，更不会织毛衣。她即使上街也只是在住区附近，因为巴黎这么大的城市让她害怕。于是，她只好呆在房间里，要么看看书，要么给远方的祖父母写写始终得不到回音的长信——他们能收到吗？——要么长时间地、忧郁地盯着自己在身边的家人的照片。后来，伊利娜开始去住区里的一座教堂，因为俄罗斯教堂离她住的地方太远。她经常是在举行弥撒以外的时间去，这样，她可以静静地在昏暗的灯光下多呆上一点时间。伊利娜不愿说，甚至不愿在脑海中明确自己到底为谁或为什么祈祷。她向所有能帮助她的人祈求，她为自己、为祖父母、为伊戈尔、为战争的结束、为所有人的生存、为他们能尽快返回祖国、回到那已过去多时的宁静生活而祈祷……

每当伊戈尔回到家，伊利娜总是那么高兴、那么亲热地迎接他。这使他感动，也使他明白了妻子对整天呆在家中所感到的苦闷。于是，他们手拉着手上街漫步，就像一对年轻的恋人。

不过，伊戈尔不同意妻子出去工作。或许是受那绅士主义的影响，他不愿意奥尔科夫家的年轻继承人

去寻找工作。他也承认，他对他们现在的处境从某种程度上讲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假如他们不结婚，或者在伊利娜提出回国后就马上回去的话，也就不会落到这种地步。

另一方面，伊利娜到底能干什么样的工作呢？她会干什么？弹钢琴？教语言？……她所接受的贵族继承人的教育没有让她具备工作的条件，或者说根本没有培养她去竞争，在一个几乎将女人拒之门外的市场上去竞争高级职务；而另一些工作，天晓得可能会有多大风险。已经败落的名门家庭的年轻女人可能接受的工作只能是家庭主妇的陪伴或者是家庭教师，而这两项工作都要求是单身女人。另外，在巴黎这样的文化都市里，仅仅能弹奏钢琴和能说俄语、法语和德语（勉强能说点英语），可又一贯讨厌语法和句法的她去教授这些课程也太不现实了。去话剧院或歌剧院，那更不用提了，因为在伊戈尔看来，她尽管有苗条的身材，但没有好的嗓音，也没有那份天赋。事实上，她也的确不是当萨拉·伯恩哈特的料。另外还有一些职业声誉不好，而且，那里的环境也只适合聘用那些名声不佳的女人。

伊利娜想起了新兴的时装模特的职业。但伊戈尔认为，那是一种表演性质的职业，和演员是一样的，或

者还不如演员。而且他知道（他差一点说出“亲身体验到”），那些下等胡安们正像饿狼似地密切注视着年轻、漂亮和毫无防备的女人们。

最后，家务杂活更不应是她干的，这无须考虑！他绝不允许奥尔科夫伯爵家的继承人和皇家哥萨克军官的妻子沦落为女佣！

尽管他不敢断言，但他强调让女人出去干活就意味着现在的处境将永久地持续下去（他曾保证过现在的处境只是“暂时”的），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战争是暂时的，它不可能拖很长时间，参战各方也会厌倦这种没完没了的冲突，厌倦这种乏味的泥里滚、地上爬的阵地战。用不了过多久，形势总会好转，他们就能回到敖德萨，回到奥尔科夫家的大宫殿式的舒适豪华的环境里，回到从前的幸福的生活中。他从五洲酒店挣到的钱还是可以供他们应付到那时的。

伊利娜尽管出自良好的愿望，想为生活而去工作去奋斗，但她确实也为此而担忧，因为她承认自己无能为力。于是，她不再坚持，继续在这种萎靡不振、无所事事的状态中生活。

1917年，突然爆发了十月革命。

像在敖德萨一样，他们在巴黎根本没有意识到遥远的祖国在当时处于何等深刻的政治和社会的不安定状况，对表面上的动乱、罢工、军队和街头扰乱分子的冲突，伊戈尔认为只要哥萨克军人及时有力地干预，是很容易平息的。

对于伊利娜来说，沙皇是坚不可摧的，这仿佛是她唯一可接受的观点（事实上，她也没有自己的看法，只得听从丈夫的意见），特别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

沙皇垮台和家庭衰落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给了他们当头一击，给他们带来了灭顶之灾。起初，他们不愿相信这一切会是事实，伊戈尔还带着一点过时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赶到大使馆，但见那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混乱。谁也不确切地知道国内发生的事情，更不知道是否应将挂在贵宾室墙上的威武、严肃、专横的沙皇和皇后的照片摘下来。

伊戈尔经过深思熟虑，再一次拿定主意要在巴黎等待形势明朗，他认为这才是明智之举。再说，往俄

国去的交通不是继续受阻，就是十分危险，另外，即使没有他，皇家军队、特别是哥萨克骑兵团也能在不久的将来控制局势，恢复秩序，把罗曼诺夫王朝君主们的潇洒、宁静、严肃的照片重新挂到他们拥有神圣权力的彼得格勒冬宫。

伊利娜整天不断地哭泣，她并不是因为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她是为祖父母和自己而流泪。目前这种形势的无限期的延续使她丧失了信心，她再也没有伊戈尔的那种热情，也不像他那样坚信乌克兰哥萨克人会把他们非常尊敬的陛下们重新扶上王朝的宝座；相反，祖父母遭受的危难使她痛心疾首，她的脑海里不时闪现出在孩提时代听佣人们讲述的敖德萨动乱的情景。那些愤怒的民众令她毛骨悚然。

伊利娜开始关心报纸，尤其是上面关于战争前线 and 俄国混乱的局势变化的消息。报纸上每天都出现的亚历山大·捷尔仁斯基、托洛斯基和列宁的名字（尤其是最后一个名字），让她不寒而栗。俄罗斯和中央政权分裂的消息并没有使她振奋，因为这只是意味着斗争转向了内部。而内战比国际战争更加激烈和残酷。

布尔什维克“解放”乌克兰的消息也不可能使她高兴，因为那只是表示奥尔科夫家族和他们的产业面临更大的危险。

尽管如此，大批的难民、贵族绅士、富豪和白俄罗斯的军官涌向巴黎。由于伊利娜的请求，伊戈尔到处寻找这些人，想得到关于奥尔科夫家的消息。然而，要么根本不认识他们，要么没有一点关于奥尔科夫家的消息。伊利娜为祖父母的命运担心到了绝望的程度，她心灰意懒地呆在教堂里，只是一心为他们祈祷，为得到一点消息，哪怕是一丝线索而祈祷。

有一天晚上，伊戈尔上夜班，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她生病躺在敖德萨自己那间闺房里，可房间又简陋得和莱比克街的那间很相似。突然，祖父母出现了，像真实生活中那样，他们手拉着手向她走来，对她温和而凄惨地笑了笑，然后渐渐地消失了。伊利娜梦见得是那么真实，老人们的形象又是那么逼真，不得不使她醒来后还怀疑到底是梦还是老人们真的曾经来过。然而，莱比克街的这个房间里确实没有他们来过的痕迹。于是，她相信这只是个不好的兆头，说明他们已经不在人世，是托梦来向她告别的。她的心口一阵紧缩，仿佛要停止跳动一般，紧接着又是一阵令她疼痛的快速跳动。她把脸埋在枕头里，独自放声大哭，直到黎明时分才昏昏沉沉地睡着。

又过了一段时间，刚从敖德萨来的一位难民告诉伊戈尔，奥尔科夫家的大宅院已被大火焚烧，房主们

的命运谁也不知道。

从此，伊利娜便按固定时间去教堂，参加教堂的各种活动，并坚持为奥尔科夫伯爵夫妇专门做了一场弥撒。

7

巴黎充满欢乐这句话肯定不是伊利娜说的。说这句话的是某个厌世和颓废的文人时代的某个记者。因为那些文人们依仗着手中的美元，整天在法兰西学院露天大酒吧喝着彼诺特酒或苦艾酒，过着安逸、舒适、碌碌无为的生活。

而对伊利娜来说，与家庭的分离、没完没了的战争、经济上的一贫如洗、布尔什维克人的革命、财产的全部丧失、祖父母的可能死亡、还有后来诊断出来的心动过速，都使她在丈夫不在身旁时的生活充满了厌倦和寂寞。

而伊戈尔仿佛对这个刚刚形成的世界轻而易举地适应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被提升为接待部经理，有了正常的工作时间。当然，这也没有妨碍他不回家过夜，他仍然经常对妻子说有要紧的公务要晚回来或在

酒店过夜。伊利娜对他的这种理由的可靠性倒是没有怀疑。

现在他无须再穿酒店的制服。笔挺的黑色上衣配上一条漂亮的裤子，让他这位身材还算匀称的男子显得和以前一样潇洒。一些巴尔扎克女房客曾不止一次地暗示，要与他单独相会。伊戈尔对她们总是表现得温文尔雅。如果发出邀请的女士算得上迷人的话，他会答应去另一个酒店相会——因为五洲酒店的经营者们对与房客在酒店内部有不正当关系的员工处理得格外严厉。在闪电式的例行公事后，心满意足的女房客会悄悄地塞给他一个装着钱的信封，以这种适当的方式表示感谢。

除此以外，伊戈尔始终待人和蔼、讲究礼貌、办事果断、风度翩翩，因此也赢得了不少男房客的好感，他们都与他平等相待，互相称为同伴。伊戈尔也以提供某些小小的方便来回报：帮助他们与某个不太正经的女人或歌剧院舞蹈队的舞女们约会，向某个特种场所提出某项特殊服务，让客人在夜深人静时或违反酒店规定的情况下找机会把某个地位低下的妓女带进房间。男房客在告别时，总要往他手心里塞一些别人不会在意的钱。

有的房客为了感谢他的友好帮助，甚至会邀请他

去观看 20 年代遍布巴黎城的无数个夜总会的某一台晚会。伊戈尔无须征得妻子的同意，他总是借口公务在身，乘机进出这些他当时的经济条件还不允许光顾的消费昂贵的场所。他也把客人们领去观看当时在巴黎很流行的俄国民间艺术团体的表演。当然，他是那里的常客。在那里表演的人原来也是地地道道的俄国贵族绅士，如今沦落为民歌手、乐器手、酒吧服务生或像他曾经做过的大门侍卫。伊戈尔对他们同样亲切而热情，因而也赢得了他们的喜欢。如果他当时心情愉快，又有合适的伙伴，他也不会拒绝弹一曲巴拉莱卡，用他那富有感情的悦耳的男中音演唱一曲对敖德萨美好日子充满怀念的歌曲。

总之，受到伊戈尔这种热情相待的客人们无不感到满意，一个比一个更慷慨地向他表示谢意。当然，他对接受这样的红包已经丝毫不感到难为情了。

8

正是在这样的场合，伊戈尔结识了一个名叫德西雷·迪厄多内的人，朋友们称他为德迪先生。他身材肥胖，热情好客，待人真诚，善于交际，蓄着漂亮的

八字胡子，见了白兰地和女人〔就是按这种顺序〕就垂涎3尺，眼睛里总闪着好色的目光。

德迪早年就去了法国的海外省，在外面也有了一定的积蓄。他最先去的是印度支那，在西贡一家小酒店打工，后来就把这家酒店买了下来；以后他又到上海发展，在法国租界地开了一家“法兰西酒店”，而后，他到新喀里多尼亚的努美阿又开了一家，在那里他还拥有一大片盛产干椰肉的庄园。

德迪先生的热情好客和善于交际与伊戈尔对这类客人的亲切友好一拍即合，因此，他和伊戈尔刚一认识，便闪着狡黠的目光，询问起有什么“新的那种地方……”，还邀请他下班后陪他去水疗。伊戈尔不同意去啤酒店，而是建议到哪个夜总会去。最后，两人去了一家俄国难民经常光顾的歌舞厅。

德迪先生享受着五洲酒店接待部经理的真诚友谊，他几乎每天上午都要为头天晚上的欢乐而表示无比感激的谢意。不过，他为酒店关于单身男客不得带回女伴的严格规定而感到可惜。伊戈尔笑了笑说，他只对一些规规矩矩的朋友给予一些特殊的方便。从那以后，德迪先生每当在外面捕获到某个著名的猎物、并想向她显示自己住在“五洲”这种级别的酒店时，便等待伊戈尔当班，利用他佯装无暇顾及的机会，把女

人推到通往房间的电梯门口。

当他知道伊戈尔已经结了婚，便坚持要见一见他的夫人，赠送她一把从拉斐特大商场买来的极其漂亮的东方扇子，说是可以当作一位上海朋友的纪念。伊利娜对德迪先生的印象不坏，但很有礼貌地拒绝了晚上陪伴他们上街。丈夫既没有反对客人的提议，也没有坚持要妻子同往。于是，他们两人去了一家豪华的夜总会。

当他们喝到八分程度时，德迪先生用胳膊搂住朋友的肩头，结结巴巴、神神秘秘地说道：

“你知道吗？你现在……在酒店接待部……多没有意思。……像你这样的人……应该……起码当个管理所有员工的头，……或者副经理……”

伊戈尔笑了笑，推开了压在身上的胳膊。德迪先生还在继续说：

“就像我刚说的……所有员工的头……”

然后，他用短粗的食指指着胸口说：

“你告诉我……和我一起去……去上海，怎么样？……那才是好地方！……能赚钱，生活……也舒服，再说……还有中国女人……”

他停了停，放肆地打了个饱嗝，又接着说：

“……还有那么多姑娘，哈哈！……”

他边说边把右手的五个指头放到唇边轻轻地吻了吻。

喝得不算太多的伊戈尔又笑了笑，又一次推了推那令他感到不适的胳膊，回答说：

“行，我考虑一下……”

“你要知道，我会出好工资的……。你去当经理……酒店当然没有这个级别……但你可以让它具有这种级别。你夫人会喜欢的……”

“可以呀……”

他们两人又去另一家酒吧，喝了一瓶法国白兰地，还勾搭上了两名长相还说得上过去的年轻姑娘。

伊戈尔把德迪先生的话都当成是白兰地的作用，一个字也没有向伊利娜提及。第二天他就把这事忘在了脑后。然而，德迪先生却又找上门来，只见他精神焕发，钮扣眼里插着一朵玫瑰花，身上带着一股生菜的清香：

“昨天晚上我邀请你去上海我的酒店当经理时是多喝了几杯……”

伊戈尔认为这个法国人肯定是来为他的这一承诺作解释的，于是他打断了对方的话：

“你放心，德迪先生，我已经把昨天发生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不，不是，你听我说完。我是多喝了几杯，但我知道我说了些什么，而且这些是我早考虑过的。我本来想找另一个合适的机会向你提出这件事的，可那酒把我的舌头给调动起来了。我已经对你说过，我有三个酒店，分别在西贡、上海和努美阿，还有一个干椰肉种植场及其它产业。每个酒店都安置了一位经理。但上海的那位人品不好，我发现他欺骗我。我必须尽快把他撵出去。我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把他赶出去，是因为还没有物色到一位能接替他的人。因此，我即使多喝了一杯，但说的是认真的。我认为你是个合适的人选。如果你同意，这位置肯定属于你……只是你必须马上拿定主意。我要尽快把那贼家伙赶出去。拖的时间越长，我就会被他偷得越惨……”

伊戈尔认真而有兴趣地听着。这是他意想不到的事情，甚至让他感到突然——他根本就没有把昨晚的事当真，现在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德迪先生看到伊戈尔犹豫不决的样子，便赶紧把条件都摆了出来，几乎用不着商量：工资是如今巴黎的三倍，年终还要按照利润分红；伊戈尔和伊利娜在上海的食宿费用全包；除了他迪厄内多，这个职务就是酒店最高的职务了。

为了让伊戈尔动心，他又把上海这个东方巴黎的

城市生活描绘得色彩斑斓，还提示伊戈尔可能得到在法国酒店界或其它行业无法得到的某些东西——天晓得，或许有一天能够自己买下这个法兰西酒店；德迪先生又用夸张的口气介绍了上海这座国际性大都市，说什么保证不亚于巴黎，特别是不计其数的、易于到手的东方女人，个个都那么年轻、苗条、迷人，还有着几千年来就会博得男人欢心的手段。

“能给我一点时间考虑吗？”

“当然可以。到这个周末，如何？”

伊戈尔独自考虑了两天时间，最后觉得这个机遇是利大于弊。巴黎的生活对他来说并不坏。虽然薪水不丰，但加上那些受到他关照的住客们的小费也就足够了。另外，酒店的环境很高雅，与上等人接触的机会要比他原来想象的多得多，这使他更加留恋这座 20 年代的疯狂、热闹的城市，还有和那些腰缠万贯的富豪们一起进出夜总会、参观民间艺术馆、听听音乐、品尝伏尔加、与俄国难民们聊聊政治局势，这一切都使他与这里更加相融。为此，他对是否去另一种环境犹豫不决。尽管条件诱人，但毕竟没有保证。难道真的像德迪先生说的一样？

最终他拿定了主意，还是值得冒一下险。他先把自己的决定通知了未来的老板，然后才告诉了伊利娜。

伊利娜对既成事实没有任何异议。她从小就生活在家长制的社会里，性格软弱，对丈夫又盲目顺从，当然会毫无保留地接受丈夫的决定。另一方面，她在结婚头几个月里对这座“世界之都”、这座色彩斑斓的城市的迷恋已不再存在，现在的这座城市只是她这位贫穷的难民的黑暗和荒凉的居住地。尽管现在的情况稍微有所好转——他们搬进了同一条街上的另一套小公寓，但这里连热水也没有，加上她不会当家，不懂得怎样合理安排伊戈尔挣得的那点钱，因此经常缺钱，她的生活里充满了为房租、看门人工资、赊帐和打更人费用的担忧和烦恼。去上海或许能让她逃避这一切，谁知道，或许她能生活得比这儿欢乐一点。那里的生活即使赶不上在敖德萨时的幸福和欢乐，起码会是能让人接受的生活。

办完了难民署规定办理的手续，伊利娜把自己仅有的那点东西装在箱子里，小心翼翼地把她带着的几张全家福照片放好，深情地看了看从未摘下来过的那只漂亮的大钻戒，然后又去巴黎的俄罗斯教堂为祖父母点上一支蜡烛。

两个月后，他们避开了那些成天上门要债的债主，拿着德迪先生预先订好的二等舱船票，满怀希望从勒阿弗尔登上一艘驶往东方的远洋轮。

还

魂

曲



第六章

法兰西酒店

1

不管伊戈尔怀着怎样的好意去审视，法兰西酒店肯定只属于二级的酒店。整个酒店，无论从它处于和霞飞街垂直的地理位置，还是从它的保养不当的五层楼房，无论从它的设备，还是它的员工、服务及住客，所有这些绝对只算得上座二级酒店。不太客气地讲，新经理想说，酒店的级别也和其老板的级别完全相

符。

一个普通的前厅显得很窄小，房间的大小还算说得过去，但里面很脏，家具破破烂烂，下水管嗤嗤作响，电器设备及线路乱七八糟，服务不冷不热，厨房空空荡荡。甚至一楼舞厅里的舞女大部分也只是二流货色。

客人当然也只不过是这一级别：路过上海的日本、朝鲜、香港、澳门及新加坡的小商人，还有少数几个刚刚到达上海正等待长期安置的资金不多的欧洲人。

伊戈尔为眼前的这一切感到失望，但是他立即拿定主意提高酒店的标准。他从上到下巡视一遍，从员工的工作间到食品储藏室，从两个套房到厨房和餐厅，明白了哪些是可以立即着手改善的。考虑到公司的不富足的财力，他向巴黎之行回来处于高兴状态的德迪先生提出了建议，对方并没有过多阻拦和斤斤计较。为避免矛盾，德迪先生决定去照料其它的产业。

于是，伊戈尔和伊利娜在两间套房中挑选了一套（一间卧室加卫生间，另有一个封闭式阳台可当作小厅）安顿下来后，便开始了行动计划。首先从员工管理下手。在这里，伊戈尔的军事生涯和酒店工作的经历倒是格外的宝贵。上午，他把员工们召集到一起，排着队，从每个人脏兮兮的手指甲到该擦油的皮鞋都检

查了一遍，狠狠地训斥了他们一通，警告他们再不允許邋邋遢遢。他给员工们规定了他们不曾习惯遵守的纪律，引得他们个个牢骚满腹。但伊戈尔提醒他们，谁要是把怨气带到工作中，就别想在这里继续干下去。事实上，他真的毫不犹豫地开除了一些屡教不改、上班迟到和做事笨头笨脑的人。

让伊利娜担忧的是丈夫过多地在意了舞厅的舞女们，他要求她们必须行为高雅、仪表端庄；对姑娘们有时穿的欧式服装他并不喜欢，因而索性要求她们穿用能显示其纤细身材和高雅风度的旗袍；对那些不够标准的姑娘，他禁止她们单独进酒店，除非陪着某个客人。

他招聘了新的员工，后来还高薪雇佣了一位法国人当工头。

为了不影响酒店的营业，他逐渐地进行着必不可少的翻修。购置了新的家具，改善了卫生间、电器和水管等设施；安装了新型吊扇，添置了厨房的炊具、碗筷和杯子。他还翻修了小客厅和舞厅，最后改观了酒店的前厅。

为了这一切他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和远比预算多得多的开支，但伊戈尔不担忧德迪先生回来后的责备，因为成果明显摆在这里。

果然如此，当德迪先生在西贡和努阿美呆了很长时间后经悉尼回来时，对酒店的改观非常满意。酒店即使不能称为豪华，也可以说是靠近一流，说不定还能在下期报纸上出名呢。伊戈尔谦逊而实事求是地认为，最多可以称它为同等酒店中的佼佼者。

2

伊利娜现在又怎么样了呢？

酒店老板在巴黎对他们夸张吹嘘的美好前景，让她幻想着丈夫能像小沙皇那样掌管一座比里慈酒店规模少许小点、起码也会和五洲酒店差不多的酒店。然而，法兰西酒店的简陋，那一副衰落和不洁的状况，没有信誉的客人以及不冷不热的服务，使她大失所望。

除此以外，当看到“那种女人”时而进出舞厅，还拉着男住客去他们的房间逗留时，伊利娜恼怒了。

她忍不住在丈夫面前表示了自己对此的厌恶，并请他立即结束这种丑事，否则就搬出酒店去住。伊戈尔立即答应了。住在单独的公寓里也更好些，那样，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家庭生活。他还停止把房间租给舞女们，因为那意味着把酒店变成了那种地方。但是，他

没有过分要求那些来住店的客人出示结婚证明，否则会受到惩处；当然，如果某个不错的客人看上了哪位舞女，他也只要在他们走向电梯时把头偏向另一边。

伊利娜的这些顾虑得到了解决，她生活得相对的安定幸福，可这种一定程度上的舒适，使她又辛酸地想起了以往的日子；现在佣人们把早餐给她送到床上，她可以在玻璃封闭的阳台上喝上一杯热茶，不用收拾房间，不用操心厨房，不用担心欠债，衣柜里挂满了20年代的时髦服装，她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餐厅或舞厅，客人们在客厅里向她频频点头致意。伊戈尔当上酒店主管的“显要”地位，这一切毫无疑问意味着他们开始回到过去曾经拥有过的美好生活，回到她的出生和教育所注定她应获得的社会地位。

每当晚上伊戈尔在舞厅里搂着她跳起当今非常流行、几乎不太庄重的探戈舞时，伊利娜既感到无限的幸福又感到有所内疚。

3

按照预定的计划，奥斯特拉科夫夫妇及时搬进了酒店外面的一座公寓。

为了便于管理和保持适当的开销，他们没有租用院宅，而是选中了远离法兰西酒店，但还在法国租借地以内的一座现代化高楼里的公寓房，有现成的门卫，还有电梯。对于这种选择，伊戈尔有他自己的理由和看法，他认为公务生活和家庭生活最好是分开。而已经长时间失去舒适安逸的家庭环境的伊利娜，对现在自己的这个家当然更加赏识。只是里面配备的家具似乎更符合丈夫的喜好，而不是她的情调。她很想要一套上世纪末流行的古色古香的家具，那样更接近祖父母家的环境。然而，伊戈尔认为，作为精神疗法，应该忘却过去，于是选择了白色对称的甚至带点好莱坞风格的现代家具。她仿佛觉得自己家更像一个干干净净的牙科诊所。不过，不善料理家务的她也不再挑剔。她把从敖德萨带来的照片放在镜框里，挂在客厅桌子上方的墙壁上。这样，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照片也终日陪伴着她。

在经过了前几年的贫困后，对伊利娜来说，上海的生活又让她见了阳光：她雇佣了一位厨师，两位临时的佣人，这样保证了她按时吃到可口的饭菜和有了一个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家庭环境。

伊戈尔每天很早就起来去酒店上班；伊利娜躺在宽敞松软的床垫上，一直等到佣人阿妹把早餐用银制

托盘和日本细瓷碗具端到房间，然后靠在两个大枕头上，舒舒服服地品味着咖啡奶和抹着黄油的羊角面包；就这样一边享受着新生活的滋味，一边阅读着上海时报社会专栏里的文章。中午，她稍微吃点东西后，便开始对着镜子穿试那一件件 20 年代最流行的、直线条不缩腰的时装，戴上垫起的胸罩和遮到鼻子的帽子。她对着镜子笑着，觉得这种打扮不错。高高耸起的“姑娘”的发式，小巧玲珑的脸庞和苗条瘦高的身材令她颇有当时时髦的假小子特点。她过去曾如此羡慕马德莫依塞尔的高耸的胸脯，现在时髦的打扮已经让她拥有了理想的佳人美貌。

伊利娜离开家，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转转这家大商场，买点东西，到国泰酒店或其它上等西式咖啡店喝杯茶。傍晚，坐上出租车来到法兰西酒店，与丈夫在酒店餐厅或去法国租借地内另一家餐馆或国际饭店的餐厅用晚餐；如果伊戈尔还要回酒店，这是常事，伊利娜便在家看看报纸或者听听收音机；如果酒店没有事，没有人找他，两人就去某个电影院或观看某台感兴趣的演出。

经德迪先生建议，他们还加入了上海俱乐部，又重新玩起了还是在敖德萨时玩的网球。伊利娜几乎已经不适应了，肌肉疼痛。尽管她只能当个很一般的舞

伴，但在与朋友们的晚餐聚会上，还算得上是位善于交谈招人喜欢的伴侣。

总之，生活到底是如愿以偿了，伊利娜一边站在镜子面前左右前后端详着自己苗条瘦高的身材，一边想着。她又理了理脚上的丝袜，把长长的珍珠项链在脖子上绕了两圈，把帽子稍稍往左边押了押，拿起小包出了家门。

4

具有非凡组织才能的伊戈尔·瓦希利维奇·奥斯特拉科夫这样恰如其分地评论翻修改造后的法兰西酒店：员工基本上符合标准、工作勤奋；酒店房间基本上舒适、干净、整洁；客厅里的两个中国大花瓷瓶里栽种着矮矮的棕榈树，几张椅子更让人流连忘返。不过，优质管理上的“天才”，主要体现在对舞厅—餐厅的彻底翻修改建上，甚至连名字都改成“巴黎咖啡厅”了。伊戈尔只把它稍微改建得豪华了一些，不过价格却翻了几番。对此，新任经理有其自己的解释，说是为更好地选择客人。他还给它配备了昏暗的灯光，两支分别是俄国人和菲律宾人组成的爵士乐队演奏柔和

的音乐。由法国人阿尔方斯专门指导的百分之百的法国式烹调堪称一流水平。经伊戈尔精心挑选，由德迪先生亲手检查通过的职业舞女们个个漂亮文雅，合身的旗袍两边开着大口，大大方方地让人欣赏到她们细腻光滑的大腿。

除了乐队的歌手外，伊戈尔也时常利用上海的演员组织一两场专场“晚会”，邀请法国租借地和其它租借地内的官方机构参加，他还适当地在电台和报纸上宣传，什么“俄国之夜”——当然他本人也会是主角——什么“法国之夜”，“美丽的时代”，化妆晚会等等……

巴黎咖啡厅就这样渐渐有了信誉，成为人们乐意光顾的场所，人们传说那儿的老板和蔼可亲，那儿的女人高雅迷人，那里中午有方便的工作餐，晚上有欢乐的晚会，在上海的外国人士不但可以在那里尽享美味，还可以大出风头。不过，那里的一切都很昂贵。

于是，为翻修改善酒店而投入的资金渐渐地产生了利润；虽然起初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可随着信誉的扩大和生意的发展，就越来越明显。随着酒店利润的增加，伊戈尔的经济状况也日益得到改善。除了固定的薪水收入和利润提成外，他还得到许多推销人员的不入帐的私下馈赠。再说，他那双即使在甜蜜的新婚

时期都不曾安闲过的猎眼，现在更可以在无数年轻漂亮的姑娘中间寻找猎物。对于那些寻找工作的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迷人的姑娘，他可以垂手可得；尽管她们不是全都算得上一流，可也能供法兰西酒店经理舒舒服服地享用。

总之，对伊戈尔来说，生活也算称心满意；他不再提到敖德萨和其它的美好时光，也不幻想罗曼诺夫王朝复辟，让什么沙皇的最小女儿上台，也不再想夺回奥尔科夫家的财产。生活是指今天的生活，是指在这个城市里的生活。这个城市比乌克兰的任何城市都更加迷人，它是一个多民族混杂、生活自由自在、不讲究伦理道德的城市，一个让他觉得如鱼得水的城市。他不在意是否身处社会最高层，是否被邀请出席欧洲或美洲著名社团的酒会或各类仪式，那些地方他确实只在承包酒席时偶尔光临。但这一切并不妨碍善于交际和热情待人的他与洋人世界里的各个阶层甚至官方或领事机构友好相处，令他们不请自来地光顾他的巴黎咖啡厅。

20 年代末期，奥斯特拉科夫的境况大有改善。这位前沙皇军队中的哥萨克族中尉，尽管不穿制服却把酒店提到了正式二流的水平，还上了报纸，这使德迪先生充分信任了他的管理才能。德迪先生把法兰西酒店的管理全部托付给了伊戈尔，自己一心一意发展西贡和努阿美的事业。当这位矮胖的法国人有一次偶尔途经上海时，伊戈尔告诉他，有人让他去某个一流酒店当经理（这确有其事）。德迪先生考虑了又考虑，最后建议伊戈尔购买酒店 49% 的股份。

这一下轮到伊戈尔思考了又思考。他面临着两道难题：他不愿意继续当别人的下属（再说还是他把酒店提到了现有的水准），另一方面，他马上告诉德迪先生他资金不足。然而，法国人很是够朋友：以优惠价格出售，还允许他按低息贷款。

法兰西酒店经理要试一试。条件真的不错：实事求是，他从下属变成了合伙人，地位有了根本的变化；另外，49% 的股份的利润可比现在的薪水多得多。再说，或许他能购得小股东们的一些股份，那样就会占

有大部分的股份。而且，不管怎么说，始终由他真正掌管着酒店。

伊戈尔不费劲地从当地银行弄到了支付底价的贷款。这要归功于酒店的声誉和巴黎咖啡厅的几位常客的友好帮助。在告诉伊利娜之前，他已经把自己扶上了几乎是法兰西酒店的老板的宝座。

30年代初期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对伊戈尔的影响不算很大。这时，他已经还清了银行的贷款；德迪先生的欠款要得也不急。伊戈尔明白，事实上，在这种非正常的跨国联营中，合伙人的承诺是可以拖延的；况且，他们现在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而他伊戈尔才是舵手；他的境况的恶化也是所有股东们的结局。

法兰西酒店度过了危机，除了上等客人暂时减少外，没有受到更大的冲击。当然，另一些客人虽然层次低一点，但他们都会大手大脚花钱：因为他们都是些靠赚外块发迹的人。

他们在30年代的生活还是那样的欢乐、安闲、富足和无忧无虑，对别人的痛苦和这座中国城市的贫穷无动于衷。

伊戈尔和伊利娜只知道同享他们的美好生活。丈夫不许妻子工作，伊利娜只得把下午的时间用于打网球、逛戏院、转商场、进茶馆。晚上，如果丈夫能脱

开繁杂的酒店事务，他们便与在上海俱乐部结识的朋友们聚会在一起消遣娱乐。巴黎那些凄惨的日子早已被他们丢在脑后，连伊利娜也不常想起敖德萨的往事。客厅小桌上方镜框里的照片已不再引起她的回忆，只有在请丈夫从酒店保险柜里取出那颗大钻石戒指时，她脑海里才闪现出对奥尔科夫伯爵夫妇的一丝温情，一丝的思念和感激。

6

在上海，他们又一次陷入迷惘！

和在巴黎一样的迷惘，和在敖德萨一样的糊涂。

生活在人为美好的小天地里，终日沉浸在赚取利润、社交往来和某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中，那个封闭社会里的宠儿们，全然看不见身边这辽阔的国家里正卷起的暴风骤雨，更不知道这个充满地主、官僚、买办权势、腐败、嫖娼、吸毒和贫穷的城市的另一头已经风暴临门。

一般鬼佬们对这块世外桃源的治安是坚信不移的，他们认为“那些事情”是当地的常事。“中国人”从来就是你争我夺的。

然而，黑压压的乌云正在地平线上渐渐升起，而且越来越密，越来越近。

内战在整个中国铺开。一群外国留学归来、热衷于建立社会新秩序的激进的理想主义青年播下的种子，在生活在贫困和饥饿中的绝大部分民众当中找到了肥沃的土壤，而且已经生根发芽。

蒋介石与共产党为敌，把他们赶到了西北边区；又同既反对他又反对共产党、自己内部混战不断的军阀作战。日本已公开暴露了它的扩张主义野心，不久前，它已占领了朝鲜、福摩萨和阿瑟港。现在轮到傀儡政权“满洲国”的满州里了。战争在整个沿海区域进行，中国上海到处是硝烟和死亡。

有权有势的鬼佬们照样无忧无虑、趾高气扬地生活在花天酒地之中。

伊戈尔继续专心经营着他的法兰西酒店，为巴黎咖啡厅挑选着一批批舞女。

现在经济上的富裕，使他拥有了在巴黎避难时不敢梦想得到的生活。

他在饮食上格外的挑剔和精心，仿佛自己永远能生活得如此心满意足、随心所欲。

当然，他对膳食的精心和俱乐部的网球场的光顾，使他保持了生来就均称的瘦高身材，使他在迈入中年

后还显得那样矫健和潇洒，令上海的那些肥胖的欧洲男子羡慕不已。将近 45 岁的年龄，只是从他的眼角、额头发线上移——他也已惊诧地发现——以及那双白白净净的绅士手上突出的脉管上体现出来。

不过，他欣慰地发现，开始发白的两鬓并没有影响他天生的高雅风度，而对所有女人胡安式的殷勤，不但使他在自己圈里的西方女人们面前毫不逊色，而且在那些年轻的舞女们面前依然魅力无比，她们毫不犹豫地（而且他相信是很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为她们入选巴黎咖啡厅而进行的“实际考验”。

伊利娜尽管对丈夫盲目忠诚，但她早就发现了他对她并不忠诚，理所当然她为此感到痛苦。

过去，她曾伤心落泪，对丈夫的这种行当当面提出过指责。但丈夫把他搂在怀中，向她发誓说，只有她才是他一生中唯一的女人，所有其他的女人，不管从前的还是将来的，不管先来的还是后到的，只不过是出于他天性控制不住才形成的过眼烟云。就这样，对这种难以令人信服也颇让人不快的辩解，天主教徒伊利娜居然像逆来顺受的穆斯林那样轻易理解和接受了。

当然，尽管伊戈尔有无数次的的不忠行为，但他对妻子一直还是不错的。婚后已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各

自的生活习惯、终日相伴、夫妻生活以及互相完全的了解，使新婚时的爱情烈火熄灭了，或者至少减弱了。不过，虽然没有了挚热的爱恋，他依然对妻子相敬如宾、热情体贴。而且，除了他力所不能及的或者绝对不合情理的事情，伊戈尔总是对她百依百顺；现在他让妻子拥有了即使在敖德萨都不曾享受过的生活，对妻子的大手大脚和不善管钱，他显得很慷慨大方，从不计较。

因此，伊利娜只得无可奈何地接受丈夫这种沾花惹草的行为。

在家长制社会里长大的她，以其女性的本能认为，与丈夫作对或不给他这些方便，只能使他离开自己。而他绝对是她的一切，是她在这个难以明白变化无穷和令她心惊胆战的世界上的唯一支柱。她从丈夫那里得到了安全，得到了今天享受的荣华富贵；自己生活在他的保护之下，当然只能接受他；自己所发出的光亮全是丈夫的功劳。

尽管深知自己高雅恬静，算得上是个富有魅力的女人，但伊利娜明白，要是去报复或者与那些光顾巴黎咖啡厅的年轻美貌、轻佻的女人们争斗，既徒劳又危险。她一定会一败涂地。再说，她也确信丈夫的那些猎物一个个都像流星，在他下一场风流开始时便会

消失。这是丈夫的本能和天性。热衷于寻花问柳已是他本能的需要，已经成为恶习，是性激素亢奋造成的。而 20 和 30 年代的上海，正是他施展其男人魅力和智慧来引诱女人的广阔天地。到处是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女人，公共租借地区到处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环境。而丈夫对其施展诱惑的范围又从不挑剔。他可以与年轻姑娘鬼混，甚至更下层的女子他也是来者不拒。只要招人喜欢，只要漂亮，他都能接受；如果是个其他民族的女人，那异国风流对他来说更是锦上添花，有特殊的情调，更大的刺激。

丈夫的风流艳史是那样的多，又更迭得如此频繁。他总是“永久”地爱上 3 个月。无论是一见钟情的爱，还是稍微长久的暧昧关系，都不会让他认真。每当感到自己的猎物企图长期占有自己，他便客客气气地冷淡对方：某次幽会失约，减少应有的关心，或者难以令人信服的道歉。如果在这一系列示意后还需要善意的提醒，那么就在某个公开场合带上一位新的女人。

总之，或许是对他一生付出的伟大爱情的报答，伊戈尔拥有大束的红玫瑰……

他像一位有着皇家血统的王子那样纵情地风流着，而实际上他也只是一个依靠不多的小费发迹的二流酒店的勤奋的员工而已。

7

1937年，日本和中华民国的正式开战并没有引起伊戈尔的特别注意。

他们在战争状态下已度过了不少的日子。在他们看来，现在只不过是官方对这种战争疾病公开承认罢了。

无论怎么说，公共租界地是不可侵犯的，从自己在该区的经济利益出发，日本也会承认它。

只是他们这些人——特别是现在无家可归的白俄罗斯人——必须保持中立，不得介入到冲突中去。为此，他拒绝了一些激进爱国人士让他加入中国军队的邀请。他向人解释说，自己恪守中立，只关心法兰西酒店的生意。

另外，虽然没有说出来，他对日本人的纪律和效率暗暗佩服，尤其是日本军队不费吹灰之力把企图抵抗的各路军队打得节节败退。

不过，中国军队既不尊重国际中立公约，也不管租界地内外国人应有的安宁，他只能望天哀叹。在军队里的中国民众阵线的一些恐怖分子用欺诈或几乎疯

狂的手段制造一个接一个的愚蠢事件：用自制手榴弹袭击公共租界地内的军队、苏州河上的军需运输船和日本汽轮，暗杀汉奸分子和上海维持会主席罗柏洪，捣毁日本人在上海的纱厂，还把手榴弹扔进了威海威路上的日本总领事馆。

在一处意料之外的地段发生的事件在上海的外国人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一位英国官员失去理智，愤怒地撕毁了日本人的旗子，从而开始了一场外交冲突。日本军队以占领国自居，在公共租界地巡逻，还在各通道口筑起铁丝网，检查来往电讯函件，还对外国人执行死刑……简直是明目张胆、蛮横无理！

8

伊利娜尽管还对丈夫盲目相信，但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冷静。她对 30 年代末期越来越感到惶惶不安。

虽然伊利娜看不清政局，也不信算卦，更不敢幻想未来，可上海这里从中国人居住区延伸到公共租界地的战乱已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人民阵线的一次次行动、自制手榴弹疯狂而盲目的投掷、警察当局紧急而无效的措施、公共租界地的

日本当局为报复而进行的蛮横的武力镇压、欧洲的女人和孩子们的纷纷逃离，都使她心惊肉跳。当国民党的飞机公开违背租界地中立的公约，有意无意地大肆轰炸法国租界地时，惊恐和担忧又一次让她感到心脏不适（前不久她已经感到过一次俄国革命那一阵感到的心律不齐）。

（伊利娜听到了好像从酒店那儿传来的爆炸声，便赶紧离开家里，乘上出租车朝法兰西酒店奔去。不过，伊戈尔安然无恙，酒店也毫无受损。被炮弹击中的楼房——一栋普通公寓住宅楼——还在酒店前面，只是部分被毁。）

伊利娜终日提心吊胆地生活着。她不再遵循一般的生活规律，也不再去中国人住区，甚至不敢乘出租车去公共租界地，迫不得已时才偶尔出门，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收听电台的消息，或者专心捕捉她的心率不齐。

伊戈尔向她保证用不着担心。说什么日本当局会尊重租界地的中立地位，而且或许对他们这些流亡者更加有利，他们不属战争的任何一方。另外，只要酒店不缺当天的物资，它就会运营得比以往更好。

一些外国人或感到在中国人住区不安全，或为了膳食的方便，纷纷住进了酒店。不过，巴黎咖啡厅的

常客们却几乎都不再来了。代替他们的是一群戴着眼镜、镶着金牙的日本军官。这既让伊戈尔高兴又令他担心。日本人是因冲着这著名的酒店、闻名的餐厅和诱人的姑娘而来的。当然，或许排列次序不一定如此。傲慢霸道的日本人花销不狂，但付款却从不拖拖拉拉。

尽管如此，伊戈尔还是担心会给酒店扣上亲日本的帽子，从而招致中国游击队的报复。

他不知道自己的忧虑是多余的。原来，在“他的”舞女中，有几位是属冯文华领导的某个人民阵线游击队的成员。她们在日本人中间为游击队收集情报，由一位餐厅的伙计递交出去。游击队是不会取消这个情报收集站的。

然而，银行现金亏空、一次又一次的暴力事件，使酒店维持营业的困难日益加剧，甚至黑市的供应都不足，再加上法国厨师阿尔丰斯先生在上海感到不安，决定及早去努阿美施展自己的才能而突然离去，使得伊戈尔也考虑过是否应该寻找更好的去处。

就在他踌躇不定时，连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他拿定了主意。

爱国者们在巴黎咖啡厅背着伊戈尔从事的爱国活动被日本反间谍机构发现。日本人采取了果断的行动，逮捕了全体员工，对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审问。两位

舞女和一位伙计被关押，不得与任何人接触。不过，伊戈尔和其他人总算被释放了。

不久，伊戈尔获悉法兰西酒店被列为怀疑对象，还禁止它对日本人营业。他明白已经到了他不能维持的时候了：他被游击队视为亲日派，而日本人又把他视为是游击队的掩护人。

他把所有的资金变换成现金，又把现金换成硬通货，决定关闭酒店和巴黎咖啡厅。

按照惯例，他支付了员工们的工资和应得的赔偿；伊利娜准备着行装，藏好所有的细软（为了安全，她把大钻石戒指藏在从黑市买来的旁氏面霜下面），登上了去香港的“朝日”号客轮。

这是 1941 年的 11 月。

还

魂

曲



第七章

澳门插曲

1

那是一次恶梦般的旅行。

“朝日”轮是一艘半客轮，只有五六个简陋的寝舱。大部分难民都挤在甲板上、小客厅里。甚至把底舱也改成了大寝舱。

尽管他们靠着伊戈尔的关系弄到了一间二等寝舱，可周围全是为抵御秋末寒冷的海风而蜷缩在一起的饥饿的人群，局面惨不忍睹。

与他们一样，大家犹如是人类的弃儿，为渺茫的前景烦恼愁苦。而他们比其他的人们更加感到孤独，因为他们没有祖国、没有证件、也没有家，只有两个人的互相依恋。

在这种情形下，只有伊戈尔给伊利娜带来唯一的安全保障，他仿佛是她在大海中遇到的救生港口。他们裹着上海没有处理掉的皮衣，依靠在低矮肮脏的舷壁旁，避着晚上的寒意。伊戈尔鼓励她，说什么他们两人在香港开始新的生活，会有希望的——四十不惑嘛，他们的年龄正是开创事业的年龄。生活中这扇门关上时，总会有另一扇窗子打开——，他要让妻子相信，在这疯狂的世界里，总还有一方净土。

2

办完了当局卫生部门的检查手续，伊利娜怀着激动而又害怕的心情，跟着伊戈尔沿着颤动的舷梯，随着“喂，喂”的喊声登上了海运公司码头。他们顺利地与当地移民局取得了联系，法国签发的难民证件很顺利地被接收，海关也只对他们的行李作了简单和例行公事的检查。

“去格洛斯特酒店。”

伊利娜真不知道，像他们这种前途未卜的难民是否应该去住一般的酒店。

然而，不管怎样，伊戈尔还是一如既往，保持着精神抖擞、热情洋溢的状态。这里虽然没有上海大都市的繁华，但香港城市的气息、不同地方的特点以及他对新猎物的渴望鼓励着他，也刺激着他的雄性欲望，他可以拥有新的生活。

再说，他们在箱底夹层里带来了法兰西酒店最后几天疯狂挣得的现钱，有美元、英镑、法国法郎和瑞士法郎、少量的德国马克，甚至还有一些日元和贬值了的中国纸币。只有金钱而没有国籍的人都没有民族感（他不无羞涩地承认），更谈不上什么政治上的忠诚。

除此以外，他们还带着一些金条和金币，伊利娜还保住了自己的首饰，除了那颗家族留下的大钻石戒指，还有不少在上海时购买的其它细软。

因此，他们不是绝对没有钱的人。

另一方面，从来都遇事乐观的伊戈尔不相信日本胆敢真的与盟国的军事势力抗衡。在他浪漫的想象里，日不落大不列颠王国永远坚不可摧，大不列颠总能战胜任何风浪。而且，美国强大的战争机器和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军已经表示了他们会提供援助，还有，尽

管中国四分五裂，但广大的民众还是要抵抗的，“朝日帝国”肯定不敢冒太大的险。

于是，伊戈尔准备在香港安安心心地等待上海战事的结束，或者索性决定在这块英国殖民地定居。他没有为他们的未来急着寻找工作或其它什么生活来源。他觉得住在这种带有英国传统的高级酒店里很舒适，只是这里的气氛过分严肃了些。

不过，从广东过来的大批难民聚集在这里的一家夜总会里，每天都呆到很晚。这种状况，说明了附近的战争也很激烈。从上海、北京、福建和广东逃亡过来的不同种族的女人与这个殖民地里的年轻可爱的姑娘们抢着生意，由于供过于求，有关服务的价格大大降低。伊戈尔倒是如鱼得水。

他以寻找工作为借口，每天晚上离开房间，进出于歌舞厅，很晚才回来。伊利娜心里十分明白他的这种生活和他所光顾的地方的气氛，当然拒绝一同前往。丈夫似乎显得有点遗憾，但马上同意她不去那些确实不是女人该去的地方。于是，他穿上白色马甲，敞着扣子，露出标致的领带，胸前带上一朵小花，草帽稍稍往后抬起，然后仿佛按照某一个音乐节奏，挥动着手杖，心安理得地走出房门。

伊戈尔似乎对大不列颠的这块殖民地面临的危险前景毫不在意，继续过着他那无忧无虑、轻浮放荡的生活。

可是，金钱也就这样从手指缝中流失了：他必须支付酒店住房费，餐厅、酒吧的费用，还有另一些男人不可缺少的寻欢作乐的花销。再说，在这种前景不明朗的时候，也很难找到适合他的工作。没有任何其它收入，只有付出，于是他们带来的钱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没有了。更令他头疼的是，不但中华民国的纸币不能使用了，就连上海租借地的钱币也遭到拒收。他们只好先花带来的美元和欧洲货币，后来动用黄金，现在已经不得不变卖伊利娜的金银首饰了。

伊利娜一直听天由命，任凭丈夫花天酒地、肆意挥霍。但当男人又一次想要卖掉母亲留下的那只大钻石戒指，还说什么她不会有机会戴这种价值十分昂贵的首饰，戴了说不定会招来灾祸时，伊利娜像捍卫自己的孩子那样又一次坚决地明确表示反对：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她永远不允许他变卖她的这件首饰。对

于她来说，大钻石戒指不仅是一件昂贵的首饰，更意味着自己的身世，也是她与过去、与失去的家庭及其他人或他们两人之间所有一切的见证。她心痛地承认，如果卖掉了大钻戒，她便只是无数难民中的普通一员，会感到更加孤独无助。

伊戈尔承认妻子的这些理由，他在巴黎类似情形下曾听过她的陈述。但他不明白妻子对这颗价值如此昂贵、却又毫无用场的二氧化碳化合物为何如此钟爱；他只好耸了耸肩膀，像巴黎街头的花花公子那样用草帽画了个圈，微笑着离开了家，去“猫街”的一家古玩店变卖妻子那件蓝色的狐狸皮大衣，这在香港气候温热的12月初是用不着的。

然而，这种温和的日子也只延续到1941年的圣诞节。

灾难突然降临。

日本人对香港以及紧接着对新加坡和珍珠港的突然袭击，尽管对密切关注政局的人来说并不是意料之外的事，但对现今搬到九龙尖沙嘴某客栈的奥斯特拉科夫夫妇来说却如一个晴天霹雳。

伊戈尔对欧洲的军事威慑力量的充分信任和所寄予的无限希望一下子化为乌有，随之而来的是他在香港的生活也无法支撑了。即使如此，他也没有想到应

该对这块大不列颠的殖民地稍尽一点忠心，加入自愿者团体，勇敢地去捍卫这座岛屿。而是像其他没有国籍的人一样，他宣称自己不会忠于任何事物和任何人，他只忠于自己的生存。

伊戈尔势利地回到客栈，帮助伊利娜收拾那点仅有的行李。这一次他们登上了澳门海运公司的客轮。客轮满载着惊惶失措、身上散发着汗臭的人们，驶向葡萄牙的海外领地，那是因为葡萄牙的中立才得以保存的最后一处战争流亡者的避难所。

伊利娜裹着卖剩下的一件狐狸皮外套，依靠在一等舱外的舷壁边，仿佛忘掉了当前沉沦的世界，呆呆地凝视着轮船右前方奔腾翻滚的珠江江面。

4

他们在澳门的生活并不容易。

城市小得可怜，弹丸之地几乎没有什么救济机构。破烂不堪的难民区挤满了每天乘客轮、木船或舢板甚至步行来到的难民，他们有的来自中国内地，有的来自上海和香港，天晓得还有来自其他的什么地方。

葡萄牙政府对葡萄牙籍难民早已给与了援助和支

持；其他国家驻澳门的领事们也力所能及地关心着各自的同胞；只有没有国籍的人无人照顾……

起初，伊戈尔和伊利娜住进了巴萨尔区的澳门酒店。然而香港的那种生活已经大大削弱了他们的经济能力，使他们不得不很快搬到新桥区内的更加经济的住所。

伊戈尔过去和那些流亡在外的俄国人团体中的某些成员的关系现在发挥了作用。那些人像他们一样各自设法来到了澳门，还在公共救济处弄到了社会房屋或者在贫民住宅区有了住处。

他们一概忘掉了过去的社会屏障——没有祖国的流亡者都对社会有一种极大的恐惧心理——力所能及地生活着；他们既互相帮助，又互相争斗；既互相爱护，又互相憎恨。

从此以后，无论是短暂而寒冷的冬天，还是潮湿而闷热的酷暑，每当夜幕下的伊戈尔抱着幸存下来的巴拉莱卡琴，用还算动人的男中音深情地唱起小曲时，在这小小的俄罗斯流亡者王国里度过短暂的欢乐时光。每当这种时候，他们对远方祖国的思念都如此热切，如此明显，又如此渺茫。

对于他们，澳门当地人只能是无可奈何地忍耐，日益严重的饥荒使当地的食品供应也变得极为有限。每

天清晨，警察署的收尸车沿街拉走一具具头天晚上饿死在屋檐下的尸体。有的尸体甚至已被肢解，用来填饱另一些不幸人的肚子。

伊戈尔和伊利娜现在靠着变卖剩下的那一点点东西维持生活。

在他们的同胞中，有一位叫弗拉基米尔·贝利阿切夫的白俄罗斯人。他生于上海，现在靠着难以说清的手段挣钱生活。他以一位开拓者的智慧成立了一家小小的公司，既无总部也无章程，而是根据社会上不可明言的需要，进行某一种“娱乐和交易”，为澳门的娱乐场所提供欧洲和中国的舞女。这些舞女不愿意在一般小店里挣钱，便为那些经常光顾“国际”夜总会或中央酒店五层歌舞厅的单身客人及无所事事、寻欢作乐的大兵们服务，按小时挣钱。

伊戈尔正是在这里认识了贝格·贝姐。

5

夜总会半明半暗的灯光下，她比任何其他舞女都引人注目。那不是因为她多么漂亮或风度不凡，而是因为她肥大的身躯。她的身材高大魁梧，就连穿在那

双后跟已经歪了的平底皮鞋里的脚也是那么肥大，她坐在夜总会一角空荡荡的桌旁，盯着自己两只瘦长的大手，对周围其他中国舞女们——澳门日报的广告词里及经营许可证上都这样称呼她们——的交头接耳或轻蔑讥笑全然不顾、无动于衷。

这时候，这里的客人还不多，伊戈尔马上找到了位置。

中国姑娘们继续坐在那里小声交谈着，只是斜着眼睛盯着这位长得不错的欧洲男子，期望得到他的某个微小的示意，或者通过招待员发来邀请。就在这时，贝格·贝姐站起身，迈了两步，来到了男人身旁。她没有等对方邀请，便坐了下来。盯着他们的中国姑娘们一个个脸上露出气愤的神情。

“你能请我喝杯什么吗？”

“如果还够替你支付的话，小姐……”

“我的运气不算好……”

他们用英语交谈，因为英语是当地的通用语。伊戈尔好奇地审视着她。眼前的女人确实没有什么女人的诱人魅力，好在他从来不会过分地苛刻要求或者贸然拒绝。

“喝什么？”

“对不起，白兰地。”

既然战争期间法国庞大的饮料市场不景气，送来的自然是两大杯葡萄牙产的白兰地。

“祝你健康！”

伊戈尔对澳门娱乐场所的这种带点做作的客套不太适应。

“你是葡萄牙人……”

他用的几乎是肯定的口气。贝格·贝姐没有回答。

“英国人？”

“不是。”

“中国人？”

女人笑了笑，说：

“我像中国人吗？”

“为什么不呢？护照和种族不需要一样……”

“你在意这些？我们不都是一样的人吗？还是不一样？不过，这几天来，我开始怀疑……”

“你别介意……，我只想随便说说……”

“我没有生气。你是好人，还请我喝葡萄牙白兰地，也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拒绝我。如果我不抢先过来，你可能就对那边叽叽喳喳的某只喜鹊感兴趣了。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我算什么人。我是俄国人，出生在别洛戈尔斯克。你不知道那地方吧？没关系，没有人知道……今天或许已经叫其他什么名字了……我随父母逃离了

那场革命，逃离了那些劳动者的天堂，现在在这里吃别人的施舍或勾引愿意上钩的人……你呢？不是葡萄牙人吧……”

“你怎么知道？”

“不像。而且你的英语也不地道，是法国人？”

伊戈尔笑了。他喝了一口酒，用俄文说道：“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姐姐。我也是俄国人，和你一样，没有祖国。”

贝格·贝姐无奈地耸了耸肩膀。说不定等一会还会来一个衣衫褴褛的俄国人。她叹了口气说：

“你也来俱乐部吧。不管怎么样，能听到我们自己的母语，尽管你说得很文雅，和我不一样……”

就这样，一同被现代风暴卷到中国东南角落的原皇家军官、贵族及因婚姻关系差点当上了钢铁巨富的继承人的伊戈尔与老练而不诱人的妓女开始了一种特殊的友情。

“你愿意随我去吗？我这个人其实并不像我的长相那样令人讨厌，甚至还会一些不一般的‘小菜’……”

伊戈尔有趣地盯着她。这女人无法让他动心，她没有任何吸引他的地方。但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后来为什么接受了。是怜悯？好奇？还是绝望？

“我们走吧……”

贝格·贝姐没有把他带到酒店的房间。

“你去我的住处，行吗？这可是禁止嫖客入内的地方，可你不是一般的客人：你几乎是朋友。我把你称作朋友，不介意吧？”

伊戈尔心里一阵激动。贝格·贝姐并不是为了第二天的生活在寻找某个客人，她只是想找一个朋友帮她战胜寂寞；他明白，像她这样的人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生活在不同种族、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们中间有多么不容易……

贝格·贝姐的住处位于巴波沙住宅区的一座公共救济楼宇内。那是一楼的一间狭小、昏暗的小屋，只有一个厨房和洗手间。这还是她早就登记才幸运得到的。

妓女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没有留下丝毫与她所从事的职业及她的生活有关的痕迹。

“进门前，先擦擦鞋底。”

伊戈尔在门口的毡子上擦了擦鞋底，迈进了狭小干净的房间。屋子里的家具寥寥无几，且没有一样是新的。一张桌子和两张椅子是新加坡木料的，一张二手货带轮靠椅已经摇摇晃晃，一张不高的床，一个绿色的玻璃花瓶里倒是插着一支漂亮的花蕾。玻璃柜里

摆放着虽然已不成套、但却明净锃亮的瓷器；柜顶上的木板上贴着不知从什么杂志上剪下来的圣像，制成了一尊神龛，上端还插着一段烛头。从叮叮老那里买来的一把吉它——算得上是她唯一的奢侈品——挂在一边的白墙上。不过，无论她如何精心保护，潮湿的气候也已经在白墙上面留下了一块块的霉斑。

伊戈尔从墙上摘下吉它，拨弄了几下琴弦。然后，他紧了紧琴弦，问道：

“你会弹吗？”

“会一点……”

当贝格·贝姐在小厨房按俄国人的习惯用小茶炉煮茶时，伊戈尔哼起了小曲“迷人的你”。

女人站在房间门口，听着他浑厚而动人的男中音的演唱。在这样的夜晚，在如此昏暗摇曳的灯光下，随着歌声，一股忧伤的思念在心中油然而生。

她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在男人身边的小板凳上坐下。

“这么好的嗓子！唱得这么动听！你可以去哪个乐队演唱挣钱。你想到过吗？”

过了一阵，女人不好意思地随着伊戈尔用不善唱歌的嗓子低哑地哼唱着，不过，节奏却掌握得很准。

于是，他们回忆起一首首的俄罗斯民歌，长时间

的哼唱着。寒冷和昏暗的夜晚，还有家乡的小曲，使他们越来越觉得悲伤。

出于本性，伊戈尔讨厌忧伤。他决定斩断他们对俄罗斯大草原或者乌克兰广阔农田的悠悠情思。他站起身，女人也随着站立起来。他们尴尬地站在那里。他看着眼前这个粗壮得几乎有点太蠢的贝格·贝姐，不知如何是好，手中的茶水已经饮完。对他这位对所获猎物的外表魅力要求苛刻的人来说，面前的这个女人身上没有一点能撩拨他情欲的诱人之处；他不禁自问，自己是如何接受了这种女人的邀请。

妓女也一时不知所措。尽管他们各自所走过的道路不同，但刚才的相处和对以往的思念使他们有了相同命运的感触，有了同志之情，甚至有了友谊之情，这种情感和开始在夜总会时所想的纯商业性交往绝对格格不入。

还是伊戈尔打破了尴尬的沉默局面，说道：

“你别介意，是这些歌曲弄得我情绪很低落；我不想……。再说，我妻子还在等着我……。不过，你别担心，我会给你钱……”

用伊利娜作借口使得他们两人都局促不安。贝格·贝姐用她的大手按住了男人那只已经抬到口袋处想要掏钱包的手。

“没关系。我不要你付钱。我愿意再一次听到家乡的歌曲，那样比付钱更有意义……是我应该谢谢你……”

她停了一下，继续说道：

“我希望还能见到你……只是为了跟你聊聊，或者听你唱歌。你夫人真有福气……”

伊戈尔耸了耸肩膀。有福气吗？他从来还没有想过，也从来没有评价过自己的夫妻行为。毫无疑问，他是为了爱情才结婚的。但也不能排除他是为了有个好前程（这是奥尔科夫家的姓和财富会给他带来的），有个非常荣耀、毫无危险又毫不费力的辉煌的军人生涯。然而，接踵而来的暴风雨，使他的希望变成了泡影。虽然这一事实没有直接影响他对妻子的情感，但他们的性格不同，伊利娜的忧郁、过分的自尊、对道德和宗教的恪守与他轻浮放荡、乐于生活、无所顾忌和非道德观的性格难于相投。更何况他也承认自己的确不是那种循规蹈矩、遵守一夫一妻制的男人。他是“多情”的男子，一旦有诱人和可以得手的女人出现，他那丰富的情感就会溢出，就会变换。对伊利娜的爱情早已不存在了。他对妻子现在只有友情，一种无可奈何又令人厌倦的情感。他接受了维多利亚的享乐主义的观点，最多的享受人生，最少的表面尊敬。

让他从事歌唱的建议引起他的思考。伊戈尔一边刮着胡子，一边对着镜子思忖。这漂亮的胡子使他增加了果敢精明的气质，使他令女人们倾倒，也与男人们投缘。他知道自己青春年华早已流逝，但身材还未臃肿，浓密的头发还没有脱落，只是稍许发白。另外，他那男中音的嗓子还那么圆润动听，甚至变得更加饱满、更加深情。他善于演唱，每一首歌都是自己先把握住调子学唱，然后跟着钢琴抑场顿挫地练唱，最后再加上自己的颤音，使得听众们情不自禁地加入那热烈而欠协调的大合唱。他的音乐天赋使他擅长弹钢琴、拉中提琴，还会击鼓，他能非常轻易地掌握各类民歌的演唱特点，尤其是很流行的歌曲，俄罗斯的，法国的，美国的，甚至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因此他能成为任何一个爵士乐团的主要成员。于是，经过了几次试唱，替别人演唱了几次，伊戈尔终于成功地被中央酒店五楼夜总会窗口演出团接纳为正式成员。他就是在这里认识了贝格·贝姐的。

贝格·贝姐经常来到这家夜总会。对于经理来说，

既谈不上欢迎，也谈不上讨厌。因为尽管这女人高大粗壮，但多一位欧洲妓女会给夜总会增添国际气氛。再说，即使她不能招徕很多男人，可也不影响什么。有时还在夜深时，应伊戈尔邀请，伴他唱上一曲流行歌曲，使得在场的客人们跟随着哼唱起来，继而便是一阵欢饮。

与贝格·贝姐的联手表演使伊戈尔产生了让伊利娜加入乐团的想法。虽然伊利娜的嗓子不能与他的完全相配，但算得上是一位音色甜润悦耳的女高音，也善于演唱流行的抒情歌曲。

夜总会经理对伊利娜的加入并不热情，他不是嫌她缺少表演才能，而是担心增加开支。然而，伊戈尔的表演的确给夜总会赢得了利润，更何况他对伊利娜的报酬要得也不多，经理最终接受了他的建议，只是同意先试用一段。不过，经理内心也承认，不管怎么说，即使伊利娜年过四十，但一位有教养、招人喜欢的欧洲女歌手会为他的夜总会增色几分……

然而，伊利娜对这一建议感到不安，她担忧自己能否成功地演出。她也知道自己受过训练的嗓子不算难听，战争的环境又使她保持了苗条的身材，看起来，还是那样婀娜多姿。不过，三等歌厅的低级趣味以及遮遮掩掩聘用妓女的地方令她反感。

可是，最终她还是妥协了。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任何经济上的贴补都是求之不得的。另外，有了这份工作，还可以在酒店一楼的金色餐厅享受一顿热乎乎的晚餐。同时也有利于自己和伊戈尔的共同生活，因为她已经感觉到丈夫与她越来越疏远了。

如果说伊利娜的表演并没有取得轰动性的成功，但也不能说是完全的失败。在富有经验的丈夫的指导下，她娴熟地运用嗓子，巧妙地与乐队配合，又对所演唱的歌曲进行精挑细选。伊利娜爱好演唱法国抒情歌曲，她认为那些歌曲与她的文化教养和性情相投。鉴于许多葡萄牙军官和海员光顾夜总会，她唱的这些歌曲远比当时城里流行的英国或美国歌曲令他们感到亲切，因此她的表演几乎保证会受欢迎。每当伊利娜随着伊戈尔的钢琴伴奏表演独唱时，台下的军人们便情不自禁地伴随着唱起：

“我等待着，

白天

黑夜。

我永远等待着，

你的归来。”

令伊戈尔好奇而惊讶的是贝格·贝姐对伊利娜那么真诚和特别友好的情感。

贝格·贝姐尽管自己也说不清楚，可她从伊利娜天生的高雅气质和文明举止，感觉到伊利娜是一个不同于另一些被安置在巴波沙区社会救济房屋或筷子基本屋里的俄国女难民。那些女人靠给望夏或嘉思栏军营里的军人们卖淫为生，有时甚至到关闸附近农村的岗楼去做皮肉生意，这可是连福隆街上的花姑娘们都不愿去的地方。

不用说，伊利娜一看就是另一层次的女人。她性格忧郁、风度高雅、举止得体，这些都表明她比其他被战争和劳动人民的伟大革命抛掷到澳门的不幸女人们要高贵得多。

贝格·贝姐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与伊戈尔结婚的女人到底属于什么样的一种女人，自然就不允许他与年轻漂亮的舞女们狼狈为奸，轻易地背叛伊利娜，就像不能原谅自己差一点无意识地伤害她一样。

贝格·贝姐对伊利娜的情感不是低级的或不正当

的，她只是把自己作为一位涉世已深的大姐，只想帮助伊利娜减少贫困生活带来的烦恼。对贝格·贝姐这样近乎羞怯隐晦的情感的表示，伊利娜只是稍微有所感觉。当她在那间临时搭成的化妆室更衣时，贝格·贝姐总是伸出胳膊举着大毛巾充当围帘，让她更快地换上那件从上海带来的晚礼服，或者在演出后重新换回原来穿的便装。

伊利娜对她的这种友好表示总是报以微笑，客客气气地与她交往，还尊敬地称她为贝姐小姐。然而，贝格·贝姐尽管口口声声称呼伊利娜为奥斯特拉科夫太太，却坚持让伊利娜叫她贝姐。一天晚上，她告诉伊利娜说：

“我的名字不叫贝姐。我叫哈娜·卡伦斯基。但在澳门，人人都称呼我贝格·贝姐这个绰号，意思是指大战中德国的一种大炮。你看，有趣吧？而在葡萄牙文中，大炮又意味着长得高大难看，没有魅力的女人……”

伊利娜对这位被葡萄牙人讥笑讽刺的对象，这个长得高大、粗壮、确实不具女人魅力的妓女充满了怜悯之心，她伸手按住对方的胳膊，说道：

“别理睬他们。男人们都不是东西……”

“没有关系，我已经习惯了。更何况在这种不幸的

生活中，我宁愿不让人们知道我的真名。贝格·贝姐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它只是战争时期的一个名称……”

伊利娜的眼睛里盈满了泪水。夜总会大厅里已经响起了乐队奏起的序曲。她轻轻握住女人的手，说：“我必须走了……”

9

这天晚上，夜总会里来了不太寻常的客人。一群在利维旅酒店用完晚餐的葡萄牙人、澳门土生及其他民族的人，包括两对英国夫妇，来到中央酒店的夜总会，庆祝其中某人的生日。

伊利娜与往日里一样，不好也不坏地演唱着她的歌曲。与喜好为别人歌唱、并且随着听众的热情更加投入的伊戈尔不同，伊利娜只是无可奈何地为谋生而表演。然而，即使她是淡漠的演唱，那些在澳门不常听到法国歌曲的葡萄牙人对这位风度不凡、举止高雅的俄国歌手的演出还是报以热烈甚至稍带醉意的欢迎。伊利娜一字一句地唱着：

“……

然而，
我等待着，
你的归来……”

这些人通过一位伙计告诉她，他们邀请她去他们那里饮杯香槟。伊利娜开始本想拒绝，当然她也担心那样会惹得夜总会经理的不悦。她觉得自己只是歌手，而不是酒店的舞女或那种女人。然而，伊戈尔却让她接受邀请，到那些看来满不错的人们当中去，而且还有女士们在场，不会有任何危险。面对丈夫的执意坚持，伊利娜最终还是不太情愿地去了。

当她走过去时，绅士们一个个都站起身，并作了自我介绍。伊利娜微微一笑，只是低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伊利娜。”

然后，她仿佛觉得不应该自我介绍得如此简单，便接着说：

“这是我的演出名，不含姓字。”

她接过香槟，同其他的人一起向那位过生日的中年葡萄牙女人举杯祝贺。那女人来自上海，是英国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正自由自在地抽着雪茄，那样子令她惊讶。随后，伊利娜与其他的人一同唱起：

“祝你生日快乐，

.....

祝你生日快乐，亲爱的辛蒂娅……”

亲爱的辛蒂娅是个身材矮胖、举止带有男性味的女人。不过，虽然容貌不美，也不让人讨厌。她用沙哑的嗓子唱着，最后举起酒杯为自己干杯：

“为亲爱的辛蒂娅，干杯！”

又是一轮敬酒，可这次是威士忌加苏打，当然是掺假的。伊利娜谢绝了，当着这些陌生人，特别是当着那么多男人，她感到很不自在。这是她第一次充当这种既是被邀请的客人又是酒吧女郎的双重角色。

（光顾这里的日本人和中国人还从未邀请过她，当然她也绝对不会接受他们的邀请。）

眼前的男人们都规规矩矩，看起来欢乐快活。她为自己后来渐渐觉得在他们当中感到自在而意外。男人们愉快地交谈，带点醉意，却毫不过分。如果在他们接连不断的欢笑中有什么一语双关或弦外之音，伊利娜因为不精通英语（交谈语言），也就没有什么反应，当然不会出现窘迫的场面。

乐队奏起了一首流行音乐，在座的达希西奥·古特雷斯先生，也是冰岛驻澳门的名誉领事和当地的工商界名人，邀请伊利娜跳舞。她犹豫了，但对方坚持着：

“难道有什么不妥？”

伊利娜只好尴尬地站起身，跟着他来到舞场。乐队里的伊戈尔一直盯着她，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他对她风趣的微微一笑，仿佛告诉她这一切都很正常。接待顾客也是她工作的一部分，再说与一位虽然半东方化却有教养的葡萄牙男人跳舞也没有什么不妥。不过，丈夫对她的微笑和轻轻的点头示意都不足以减轻她心里的紧张，自然舞步也乱了。这男人和伊戈尔年龄相仿，高高的个子，身材魁梧，舞也跳得不错。倒是伊利娜感到自己身子沉甸甸的，没有了平日里的轻松自然的步伐，还不止一次踩着了对方的脚，令她羞涩不堪。

达希西奥看出了她的局促不安，真诚地问道：

“你不太想跳舞，是吗？我们回去坐吧……”

为了给自己的这种尴尬神态解脱，伊利娜对他们以后的风趣和优雅的交谈听得更加专心致志了。

辛蒂娅的性格与其模样相符，不算和蔼，但人倒不坏。伊利娜感到他们都没有把自己当舞女看待，没有把她和其他那些与客人们坐在一起或独自等待着客人的女人混为一谈。

贝格·贝姐独自坐在远处的一张桌旁，不时向她投来微微一笑。

小小的乐坛上，伊戈尔继续用其男低音和抑扬顿挫的时代风格热情地唱着：

“当心头燃起火焰，
你就会感到
浓烟迷糊了你的双眼
……”

10

第二天晚上，达希西奥又来到夜总会，不过只是一个人。他让招待送给女歌手一束红色的玫瑰，附带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向你致意，达。”

挤在吵吵嚷嚷的人群中在一家面包店前排了一个上午队的伊利娜对此只报以惨淡无奈的一笑。

“战争时期的红玫瑰?! 他从哪里弄来的?”

伊利娜没有把崇拜者对自己的敬意隐瞒丈夫。而丈夫对客人向妻子（现在他们可都是演员）表示的敬意也毫不介意，还更实惠地说：

“首先来一斗‘米’……”

伊利娜没有搭话，把花插在了花瓶里。当她再次上台演唱时，那件黑色镶着金线的连衣裙的“V”字形

领口多了一朵红玫瑰：这是她对绅士表达的谢意。当她用低柔的嗓音演唱那首法语歌时，对达希西奥来说，仿佛每一句唱词都是为他而唱的：

“我等待着，
白天，
黑夜，
我永远等待着
你的归来。”

11

贝格·贝姐察觉到了达希西奥的用意，出于对伊利娜的友情，她认为最好还是先提醒他。等伊利娜演唱完，她走近达希西奥的桌旁，好像让他请自己喝点什么的樣子。但她没有坐下，只是停留片刻，留下了一张用不太规则的英语写的便条：

“请注意，她是那位男歌手伊戈尔的夫人。你如果需要按摩，我可转告她。”

达希西奥惊讶地看着纸条，猜度着。他相信贝格·贝姐是建议帮自己转递便条，而并非是按摩（英文中二者写法相近），于是他从纸条上撕下一块，在反面

写道：

“电话：3315。”

他没有署名。

然后，他付了款，走过贝格·贝姐的桌旁，留下了那张纸条，离开了夜总会。

当伊利娜来到大厅，想对他的致意表示礼节性的感谢时，看到桌旁已无人，男招待正漫不经心地收拾着还盛有威士忌的酒杯。她似乎感到有点沮丧。

贝格·贝坦为猜中了浪漫故事并介入了这件事正处在兴奋之中，她马上悄悄地对伊利娜说：

“我有事告诉你，但不能在这里。等乐队演奏时，到后台化妆间。是关于他的事……”

伊利娜尽管知道这女人是为了自己好，但对她的介入并不满意。她不允许别人干涉自己的私生活，更不允许出现什么风流韵事或给人以搬弄是非的机会。她微微皱了皱眉头，没有说话便离去了。过了一会，贝格·贝坦来到了化妆间；

“他走了，因为知道了伊戈尔是你的丈夫，可他留下了这张纸条。”

伊利娜猜到了是妓女告诉了他有关自己的婚姻状况，也知道她这么做绝对是出于好意，是为了避免发生任何尴尬或不宜的场面。即使如此，她还是不愿意

贝格这种过分的干涉，使用比平日里更加干巴巴的口气回答道：

“不管我和谁接触，都不关别人的事……你不应该插手此事……”

贝格·贝姐没有生气，解释说：

“我不是出于坏意。不过，你听我说，战争时期，任何武器都不应该扔在一旁。他可是这里的大班，他能帮助你。再说，你知道吗，我要对你说：你的丈夫不值得你如此忠诚……”

妓女叹了口气，接着说：

“……如果他对我有意，……还巴不得呢……可我这模样……”

伊利娜从心里怜悯面前的这个女人，后悔刚才对她的粗鲁态度。等妓女出去后，她才看了看字条。只有这几个字：“电话：3315”。她猜度着这张简单的便条的意思，感到有说不出的羞辱；她认为写此纸条的人把自己当作了风月场上的女子，可以像舞女、妓女们那样招之即来的人。她把纸条撕得粉碎，扔进了肮脏的洗手间。然后，她坐在那里，耐心地等待着伊戈尔表演的结束。当乐队奏起“古老的塞纳河”的优美旋律，结束这晚的演出时，伊利娜穿上那件大外套——那件还没来得及送进旧货店的高级御寒衣——，脑子

里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贝格·贝姐的话语：

“……战争时期，任何武器都不应该扔在一旁……”

纯属胡说八道！

然而，“3315”的数字不久又在脑海里出现。

12

第二天，达希西奥没有来，但让贝格·贝姐转赠了一合巧克力。

“巧克力？！我可真的没有想到现在还有巧克力……”

她听从了贝格·贝姐的建议，忍住了食欲，让妓女拿到黑市卖掉，好换回一些大米和食用油。这虽然是庸俗之举，却是填饱肚子的实用做法。就这样，她没有拒绝接受赠品，也没有给“3315”打电话。

达希西奥继续热切而慎重地向她表达着爱慕之情。他不时光顾夜总会，有时邀别人同往，那样方便他邀请她跳舞，以免引起别人的议论。当她几次接受邀请与他共舞时，他都急切地对她说：

“我那么需要和你在一起谈谈……”

或者，这样说：

“我很想邀请你吃顿晚餐……”

伊利娜只感到自己被一种难以表达的情感煽动着，这种情感并不令她讨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使她想起了姑娘时代（马德莫依塞尔也是这样的？），她觉得脑子轻飘飘的（难道是香槟的作用？），模模糊糊中又仿佛感到了罪过（可我什么也没有做呀……）

尽管如此，伊利娜不想让自己在这偶然的事件里走得太远，心中坚定地想着：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走着瞧吧……”

就这样，她把拒绝的原因归咎于导致自己和伊戈尔结合到一起的命运。这与达希西奥的看法几乎没有两样，在他看来，伊利娜之所以没有被他执著的爱慕倾倒，仅仅因为她是已婚女子。在当时这种困难时期，夫妻之间这样的传统的束缚和忠诚，倒使她更加令人敬佩和喜爱。

毫无疑问，他知道伊利娜不是一般的歌女。从她的风度、品性及高雅的言谈举止，达希西奥料想她绝对不会来求助他这位与她不属同一阶层的外乡人。他不禁自问，与她在一起时感到的那种可笑的和捉摸不定的、令自己感觉年轻的骚动，难道是爱恋的一种表现？或者像他开始时想象的那样，只是因为这位让人

深不可测的女人、她那与众不同训练有素的嗓音、她那稍带含蓄的微笑以及那温柔和平静的眼神撩拨出的新的“风流”的冲动？……

在夜总会的工作虽然缓和了他们经济上的紧张程度，但没有给夫妇俩的生活带来他们所期望得到的那种改善。

伊戈尔大手大脚，从不会精打细算，再加上伊利娜又不会计划开销，他们原本微薄的收入几乎全部花光。战争时期澳门的经济迫使她为得到一份掺杂砂子的大米、一块烤得半生不熟的面包、一升麸子、一把干瘪的蔬菜不得不排上几个小时的长队。城里已经看不见肉店，连猫和狗也看不见了，甚至警察们在清晨沿街收尸时，发现死人的某些内脏也不翼而飞了。人们挣扎着生活。

当初在大酒店里用餐的奥斯特拉科夫夫妇后来降到了去一般饮食店吃饭，再以后改去了大排当里买粥喝。晚上，只能随便找个街角上的烧煮摊上买点蘸有栗色调料，气味浓重的当地小吃当晚餐。

随着资金的渐渐消失以及小首饰的逐一典当，伊利娜（她还拼命地保留着那颗漂亮的大钻戒）不得不为保住那些仅有的可以保存的财产而奋斗。

起初，她曾感到自己的身价一落千丈，竟然需要

冒着澳门冬天的严寒或者夏日的闷热排几个小时的长队，挤在贫穷、肮脏、浑身散发着汗臭、还不时吵架斗殴的人群中，被人推来推去地等着买到一份军人们用剩下的那点粮食，有时，挤到店门前，东西却已卖光，便只有一无所获、失败而归的绝望和痛苦。

富裕的人们当然不用发愁，他们从黑市购买高价的商品，这是任何类似局势下司空见惯的现象，或者让雇佣人为他们去排长队。

不懂周围语言的伊利娜，明显地感觉到自己与众不同，尤其是她那欧洲人的身材和某种无法形容的气质，使她在队伍里显得尤为突出。在这些贫穷的处境下，如果身旁出现另一位西方女人，她们无需说什么话，立刻就会产生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

当了歌女后，伊利娜为逃避排队找到了足够的理由：她不能花那么多时间，顶风冒雨地去排队。他们经常从黑市用高出几倍的价格购买那点可怜的食品。当然随之而来的是债台高筑。他们不得不向伊戈尔的熟人借钱，向夜总会经理提前支取那点微薄的薪水，向弗拉基米尔·贝利阿切夫、甚至向贝格·贝姐贷款，后者从来都是毫无怨言地慷慨解囊。

他们出于无奈在新桥区租住了一间破旧肮脏的小屋，也已经拖欠了好几个月的租金。每次夫妻俩出门，

都得想方设法不惊动那位中国女房东，否则她会挥着两只拳头，粗鲁地厉声索要房租；为了表明她的厉害，这位衣冠不整的矮胖女人会从黑色裤兜里掏出几张破旧的澳元，在他们眼前摇晃示意。

14

一个闷热的夜晚，当他们乘着三轮车回到住地时，惊讶地发现房门已经打不开了。那位讨厌的女房东已经让人换掉了锁。

他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伊利娜惊惶失措，伊戈尔怒不可遏。他用尽力气推门，又用拳头砸门，惊醒了住在周围小平房里的住户们。

女房东来到一楼的小窗户前，透过窗户木栅栏滔滔不绝地朝他们漫骂起来，声音远远盖过了砸门声。被吵醒的人们对这一切既感到好奇，又为深更半夜被吵醒而气恼，便都一起加入了这场大合唱。

伊利娜为此感到无地自容，丈夫却好像习以为常，亮出他那标准男中音的嗓子用俄语和房东对骂，把还能记起来的当年军营里咒骂的语言全都搬了出来。

对这种社会陋习很不适应的伊利娜，终于看到了

自己从未在丈夫身上发现的另一个侧面，她急得差点晕了过去。她忘记了没有人听懂俄语，赶紧拽着丈夫说道：

“行了，伊戈尔！太难为情了，脸都丢光了！”

丈夫被她拖拉着，嘴里还在用俄语骂骂咧咧，仿佛是件有趣的事。当离开女房东的距离已经保证自己不会受到任何威胁时，伊戈尔朝着从窗口伸出拳头冲自己厉声喊叫的女人作了一个国际公认的下流动作，并用他那唱歌的嗓子骂了一句平常学到的广东话：

“我操你妈！”

15

夜渐渐平静了下来。他们互相对视着。

“现在怎么办呢？”

伊戈尔耸了耸肩膀。

“我不知道……回到夜总会已经太晚了。这个时候，那里肯定没有人了。或许酒店可以让我们进去；要么就去警察署投诉房东……”

伊利娜不赞成丈夫的建议。即使是投诉，与警察打交道就意味着她身价的跌落，对她来说，那样就和

天天进出警察局的人没有两样。再说，像他们这样没有祖国的难民，没有领事馆的保护，带有的证件也已经失效……何况，那可恶的中国女房东是有理的！

“去警察署？不！我求求你！”

伊戈尔没有再坚持。他和从事不三不四活动的弗拉基米尔·贝利阿切夫保持着不明不白的关系，他自己的职业也会引起警察的注意，他明白自己不会是警察机构尊敬的人，所以，去警察署不会对他有利的。

“我们去找贝格·贝姐，让她今晚收留我们一下，怎么样？她住得离这里不远。明天我们再想办法……”

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弄得精疲力竭、心灰意懒的伊利娜此时更想不到丈夫是如何知道妓女的地址的。

他们步行到巴波沙，轻轻敲了敲门，不想再惊动左邻右舍。几分钟后，贝格·贝姐从打开的窗户木栅栏后探望着问道：

“谁呀？”

“是我们，伊戈尔和伊利娜。我们可以进去吗？进去再说……”

妓女立即请他们进屋，无须任何解释。

她赶紧套上一件已经开线的连衣裙，说：

“请进，请进……发生了什么事情？”

伊利娜倒在椅子上。她感到心脏跳动异常，呼吸困难，胸口一阵阵绞痛。是因为劳累、痛苦，或许是因为惊吓，她这么猜想着。

“能给我一杯水吗？”

“当然，奥斯特拉科夫太太。我去给你冲杯茶。”

伊戈尔掏出一支烟，烦闷地吸着。他觉得眼前的一切令人可笑。乘正煮水的时候，他解释说：

“是那个寡妇把我们关在了门外。我们的东西还在里面……”

伊利娜没有说话，步行、劳累和难堪已让她憋得喘不过气来。

“为什么？”

“说我们欠她的房租……”

贝格·贝姐没有再追问事情的真假，她很了解中国人的实在，也了解伊戈尔的挥霍，事实上他几乎向所有认识的人借了债。

茶水端了上来，伊利娜只喝了一口。不过，上有屋顶，身旁又有贝格·贝姐的真挚纯朴的爱护，她的心开始平静了。她环视了一下窄小干净的房间，目光停留在旧柜子顶上的圣像上。她终于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把头埋在双臂里，痛苦地哭了起来。那无声的哭泣，只有从她肩头的抖动才看得出来。

伊戈尔不知所措。他习惯了夫人长时间的沉默不语，习惯了她无声的绝望，习惯了她的顺从和忧伤。但他从未看到她像现在这么痛苦，这么无助，这么失去保护。

还是贝格·贝姐应付了这种场面。她坐到伊利娜身旁，一只胳膊搂着伊利娜的肩膀，一边像对一个在人群中走散的无人关心的小孩那样劝慰说：

“别难过，一切都会有办法的。哈南不会不管你们的……”

她像念经书似地用沙哑、低沉的声音劝说着，仿佛在催眠一样。伊利娜逐渐安静了下来。妓女充满爱怜的关心和单调的俄语安慰，仿佛使她回到了孩提时代：每当她的什么愿望不能满足时，她便去大厨房找那位瘦骨如柴、不讨人喜欢的老奶妈，听着她絮絮叨叨的抚慰。

伊戈尔默默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找不到恰当的话语，也拿不定主意。他感到无可奈何，连贝格·贝姐提起的哈南是什么救世主都想不起来了。但是，他看到这位不被人看重的妓女具有的姐妹或母亲般的爱抚的特别作用，这是伊利娜现在正需要的保护。

“你过来休息一会儿……”

说完，她用另一条已经开了线但洗得干干净净、熨

烫得平平整整的旧床单换下了现在铺着的那条旧床单。

无论伊利娜还是伊戈尔都没有想到她会如此热情，但他们无权享受，因为现在妓女自己也没有睡觉的地方。

贝格·贝姐像奥尔科夫家的老奶妈那样坐在“孙女”伊利娜的身旁，一直到她精疲力竭地睡着。

16

“那位老蠢婆换了锁，让我们进不了屋，制造了这场恶作剧，吵醒了左邻右舍。她经受不了这种场面，也从未见过这类事情。这一切还都不是因为那几个可怜的房租……”

贝格·贝姐听着伊戈尔的诉说，没有再说什么。她明白了这男人为何赢得了伊利娜的欢心，现在他那动情的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为的是不惊醒隔壁睡着了的妻子（他们两人已经来到了用单层木板隔出的厨房）。

“到底欠她多少钱？如果付清了钱，老太婆至少会让你们把东西拿出来……”

“我也不知道……几个月的房租吧……”

“有钱支付吗？”

伊戈尔做了个难言的鬼脸。

“你知道我没有钱。我一直就缺钱……”

贝格·贝姐不想提起他与那些朋友以及夜总会的舞女们一起胡乱挥霍的事。

“或许还能典押我夫人的一些东西。不过，也已经不多了，剩下的那点宝贝她也不允许我变卖了……”

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因为什么没有明确地说出那只钻石戒指。

“不管怎样，你不付给房东钱就无法进屋。”

“你不能再借我一点吗？”

贝格·贝姐低声笑了笑：

“你看看周围，有什么东西可以典押的吗？我的钱总是今天挣今天花。你是知道我如何生活的。我从来就不是这一行业的成功者，现在就更不用说了。战争把那么多的‘牲口’抛向了生活，还有谁要我呢……”

贝格·贝姐这种自我嘲贬的语调不但让伊戈尔产生怜悯之心，也令他感到难堪。他现在竟然想把一只“饿狗”拴在这位可怜的妓女身上！真是不堪设想！……

“这次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或许应该去找一下贝里阿切夫……”

“你不能去找他。听说他与贩毒有牵连，警察正盯着他呢。你可千万别惹麻烦。明天我就去帮助你们想办法。你和伊利娜就在这里一直呆到去上班。”

17

第二天一大早，贝格·贝姐穿上最好的衣服，认真地梳理了头发，但没有化妆。然后，她给不远处南湾大街上达希西奥·古特雷斯的公司大楼里挂了个电话：

“可能先生已经记不得我是谁了。我是夜总会的贝格·贝姐。我需要与你谈一下伊利娜的事情。她正处于非常困难的时候，需要你的帮助……”

达希西奥的回答弦外有音，贝格·贝姐明白肯定是有别人在场。

“好吧，我同意你的建议，但我必须说明几点。现在我暂时不能接待你，一刻钟以后请你再给我挂电话。”

贝格·贝姐在大楼门口等着。没过多久，她看见“H·古特雷斯继承者”公司的雇员恭恭敬敬地领着达希西奥的夫人，一个身穿昂贵麻纱连衣裙、雍容华贵

的金发女人走出公司大门。汽车轻轻地启动，然后在新马路路口拐了出去。

贝格·贝姐再一次拨通了达希西奥的电话，这一次他在电话里既礼貌又直接了当。贝格·贝姐从他声音中感觉到了男人的不安。

“是的，是我，古特雷斯。发生了什么事？”

“我需要和你谈一下，可不能在电话里谈。是件很急的事。”

“那好吧，不过你别来这里……”

他想了一下，又说：

“你认识市政厅前地的‘龙记’酒家吗？在里面有一个单间。你一刻钟以后直接进去，不用问任何人。我肯定会在那里等你。”

贝格·贝姐真想提醒他无需如此谨慎，甚至他可以在公司里像接待任何人一样接待她。但现在达希西奥的神秘态度倒也不令她这位对罗曼蒂克式交往感兴趣的人讨厌。再说，她最关心的是赶快解决伊利娜的问题。

贝格·贝姐等了几分钟，来到了达希西奥指定的地点。他的确已经先到了，在酒店里面靠近厨房的一个小单间里，手里端着一杯热茶——因为还没有到喝威士忌的时候。小小的厨房还算干净，里面向外飘逸

出一股香味，让贝格·贝姐想起已经是饮早茶的时候了。

“你喝点什么？伊利娜发生了什么事？”

贝格·贝姐坐了下来。她本想拒绝对方的邀请，不愿让他认为自己利用奥斯特拉科夫太太的不幸而沾光。不过，她还是改变了主意，决定要点早茶。这点小花费对于达希西奥口袋里的钱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再说，熬过了这一夜，她确实感到精疲力竭。

“谢谢，来一碗鸡粥，一点炒面。再要一杯茶。”

然后，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给达希西奥叙说了奥斯特拉科夫两口子的遭遇。

“他们不知道我找了您。这是我自己的主意，请您相信……我看她那么可怜，那么无援……她丈夫虽然是个好人，却是个没有头脑的男人，一个成天跟在女人裙子后面的多情种。我真是难以想象她怎么选择了她。我从没有问过她来自哪里，但你也看得出来，她很有教养，举止高雅。可是现在却如此不幸……”

达希西奥不得不佩服面前的这个女人，她竟然把伊利娜的不幸看得比自己的还重。于是，他几乎让贝格·贝姐感到意外而又高兴地直截了当地问道：

“需要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确切的数字。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只说欠了几个月的房租。但没有说到底欠多少。”

达希西奥没有去想过这女人是否会骗他，她那着急的样子和直截了当的做法足以证明她的真诚，决不会有意骗他。于是，他在钱包里翻了翻，说：

“你看，我这里只有五百多澳元，我忘记多准备些钱了。你先把这些拿去，如果不够，请再告诉我。要是房东还找什么麻烦，我去找警察署的埃斯达尼斯拉中尉，他会帮助解决的。”

他停顿了一会，想说“别告诉她是我”，然而他对俄国女歌手的实际用心和兴趣并不全是利他主义的，因而减少了他的这一崇高的冲动：在他精心编织的情网中，无须再获得什么奖杯了。不过，他还是对贝格·贝姐表示了自己的想法，用另一种不卑不亢的方式说道：

“或许别向伊利娜提起我更好……”

妓女立即明白了男人的意思，按住他的手背说：

“上帝保佑你……”

达希西奥等待着点心上来，贝格·贝姐不客气地加上了点烧麦、叉烧包和水饺。他付了款，陪伴着俄国女人，而她觉得，当着这位尊贵的男性伴侣的面，自己不能显得狼吞虎咽的样子。

“你不吃点？这可是你付的钱……”

“我已经用过早点了。”

隔了一会，他说道：

“贝姐，我能求你一件事吗？”

他在称呼她时，去掉了前面的贝格。

“你说。”

“我让伊利娜给我打电话，可她从未打过。我想见到她，或许你能帮助我？”

贝格·贝姐轻轻地喝了一口鸡粥，说：

“你知道她是最讲脸面的人。她不习惯那样的生活。她又是已婚女人，一个虔诚的教徒，绝对忠于自己的婚姻。上帝保佑她。可就是她的丈夫与她太不般配……”

贝格·贝姐似乎是在演戏。她还很少这样在别人命运的关键时刻介入，更何况是介入一桩婚外恋。可为什么不呢？虽然她这种引进丘比特的角色既可笑也不受欢迎（但她不允许将她视为拉皮条的女人），或许在她心灵深处觉得自己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得到点什么；在一切还没有明朗之前，过分的指责是罪过的。

“我会对她说的，你放心。以后我再跟你联系……”

贝格·贝姐不想在刚开始后就被排除在整个剧情之外，也不想让对方认同自己的作力，仅此而已。

然而，达希西奥对她还想继续插手并不满意，他似乎隐隐感到了她拉皮条的作用；如果说这种事对于风流场上的其他人是无所谓的话，对伊利娜可绝对不行。

因此，他干巴巴地回答道：

“你只需告诉她给我打电话。号码是 3315。”

说完他站起身走了出去。

18

贝格·贝姐坐在酒店的桌子旁，继续享受了一阵。她又要了一杯不用花钱的热茶，还买了一包烟。然后漫不经心地抽着烟，直到烧尽最后的烟蒂，脑子里盘算着马上要开始的行动。她看了一下旁边大厅里的挂钟，时针已指着 11 点 20 分。凭她对伊戈尔的了解，她估计这男人一定不会陪伴伊利娜到上班的时间，肯定已经不在自己那寒酸简陋的小屋里了。

这也正是她所希望的。

贝格·贝姐乘上去关闸的公共汽车，在离巴波沙最近的那站下了车。真如她所料，只有伊利娜一人在屋里。她还是那么心灰意懒，身上还穿着昨天晚上来

后套上的自己的那件又肥又大的睡衣。丈夫说是去夜总会排练了。

“奥斯特拉科夫太太，你该振作起来，一切都已经解决了。”

伊利娜怀疑地盯着她。

“已经有了支付拖欠房租的钱了。只要付她钱，老太婆肯定不会拒绝你们了。”

然而，伊利娜的轻松只是暂时的。事实上，那位中国婆娘已经不再要他们作房客了。她收下了拖欠的房租，让他们取出里面的东西，不再让他们住下去了。贝格·贝姐用不太地道的广东话百般恭维及请求，那妇人才同意他们先付房租后，可以把东西再放一个星期。如果到时不搬， she 就把东西扔到门外。

她不会再接受他们，想都别想。她不要他们在那儿，也不会给他们新的钥匙。否则，她会再换一把锁。

她甚至在房租上加上了为他们换锁的费用。

贝格·贝姐付了钱，嘴里嘟囔着：

“中国蛮婆……”

这也是对房东称她们为鬼婆的报复。

妓女为了不让伊利娜为难，当即决定让他们住到自己家里，她知道他们住不起任何酒店，也不可能在这样的战争时期人口突然猛增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找

到合适的房子。当然，他们还是需要共同分担房租。

奥斯特拉科夫太太真不知道如何感谢妓女。她只觉得自己很无能，而伊戈尔丢下她不管又让她感到孤单凄凉。如果没有贝格·贝姐，她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直至现在，她还没有来得及想过妓女到底从哪里或者如何弄来的钱。）

既然主意已定，贝格·贝姐觉得没有必要为存放东西浪费一个星期的房租费。再说，肯定不少东西是马上在她家里就用得上的。从达希西奥那里借来的钱不单够支付拖欠的房租，还够他们搬家的费用。于是，她告诉中国房东太太说出去找车。半小时后，她带着一辆货车和两位光着膀子的苦力回来了（伊利娜颓丧和痛苦的模样终于让女房东有了怜悯之心，她同意伊利娜坐在关着的房门外等候）。

她们草草地把奥斯特拉科夫夫妇那点东西全部装上了车，离开了那里。跟着贝格·贝姐的大步子，伊利娜走得气喘吁吁。她手里拿着首饰盒，已经看过了一遍，母亲留下的那只钻石戒指还安然无恙。

到了家里，贝格·贝姐又一次显得那么精明能干。

为了减少开支，妓女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绝不使用苦力。伊利娜的帮忙是微不足道的。贝格·贝姐把自己的床挪到了厨房，本来就窄小的地方现在更加磕磕碰碰；她在自己原来放床的地方支上了奥斯特拉科夫夫妇的双人床；把用不上的东西整理安置好。随后，她才带着奥斯特拉科夫太太去一家大排挡吃了中午饭。当然还是吃的中国面点和一些最好别问从何处弄来的肉菜。

有了早晨龙记酒家的早茶，贝格·贝姐自然没有再吃午饭。她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了精打细算的习惯，因而决不会在不需要花钱的时候乱花钱。等到吃完了午饭，伊利娜仿佛才清醒过来，问道：

“哈南，你是从哪里弄来的钱？”

伊利娜是唯一用妓女的真名称呼她的人，这是因为伊利娜认为妓女在战争时期被人称呼的名字是对她的侮辱，也极易令人联想到她那不光彩的职业。

贝格·贝姐知道很难简单地对伊利娜道清楚自己

所做这一切的动机。因为，在伊利娜眼里，自己过去和现在的生活都是无脸见人的。就她自己而言，什么行为规范、道德标准、宗教信仰和法律意识都已经模糊不清。在她日复一日为生存而奔波的过程中，这些东西都变得渐渐淡薄或者消失了。从一定程度上讲，代之而来的是厄运中建立的友谊和真诚。她甚至也奇怪自己如何有了这不为自己牟利的善良仁慈。

为此，她思忖着要讲的话，尽量不伤害朋友：

“请夫人原谅我的冒昧，可我看到你当时如此绝望和痛苦，而你丈夫又毫不在意，所以我才决定去找达希西奥·古特雷斯先生，告诉了他这一切。我还对他说了你并不知道我去找他。他当即把身边所有的钱都交给了我。他没能多给，是因为我没有提前告诉他。他甚至请求我别告诉你是他帮助了你……”

贝格·贝姐还是拿定了主意，把真实情况，包括自己的想法如实讲了出来。的确，伊利娜认为妓女的做法绝对是对她私生活的干预，而这位澳门企业家的态度在她看来只是为了不让她因欠他的人情债而难堪。

即便如此，伊利娜还是觉得无地自容。不过，当她想到达希西奥竟然对贝格·贝姐所说的一切不用证实，便毫不犹豫也丝毫不想回报地慷慨解囊，从心底

里油然翻起了一种甜蜜和慰藉的感觉！啊，如果我们都是自由人……

“真难为情！他会以为是我让你去的……”

贝格·贝姐干脆振奋地回答：

“胡说！你可别这么想。我清清楚楚告诉了他，夫人你不知道这一切。”

停顿了一下，她用温和的语调说：

“以后呢？如果他真的那样想又怎么样？他是为你好，这你是知道的。你看，与你能给他的相比，他值得你……比你的丈夫更值得……”

伊利娜不想指责朋友，可这样的交谈实在无法令她开心。

“哈南，我们换个话题吧。我是个教徒，对于我来说，婚姻是神圣的。如果我们不尊重自己的价值，最终会让自己失去尊严……”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仿佛她真的考虑着所说的价值。伊利娜再次固执地说道：

“……再说，这种尊严已经是我们仅剩下的一切了……”

贝格·贝姐对这些价值的看法是模模糊糊的。对她来说，自尊也好，尊重别人也好，都是她很少想到的事。她于是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道：

“那好吧，对我来说，已经一无所有……，我只求能够活着，能看到战争的结束……我也不明白为了什么，但总抱有一丝希望……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他请你给他打电话，号码是 3315。”

“我知道……”

伊利娜未经思考立即回答了，但马上又感到后悔，自己竟然如此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心中从没有忘记的事，虽然表面上是这样的无动于衷。

20

这天晚上，伊利娜很想在那件在上海最幸福的日子里穿的黑色敞领、掐腰、镶金线的晚礼服插上一朵红色玫瑰。然而，巴波沙附近的摊市和红街市上从未见到过这种奢侈的消费品，因为无论这里老百姓的消费水平还是战争时期的经济状况都无法让这些市场销售这类奢侈和浪漫的商品。

伊利娜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贝格·贝姐，这一位立即想出了一个既现实又经济的办法。傍晚，在去夜总会上班的路上，她们提前在塔石下了车，然后顺着上坡慢悠悠地爬上还没有关门的西洋坟场，伊利娜的

心脏不允许她走得更快。

她们坐在小教堂门口的石凳上，等待着一场葬礼的结束。

女歌手虽然还不明白她们为什么等在那里，但墓地的安宁和静谧的气氛与她忧郁的性格和斯拉夫人的宿命情绪倒也相吻。

她们最后离开教堂，并在那个新的坟墓前停留下来。花圈上简单地写着：“母亲阿德利娅·瓦斯千古，安息。1943年8月18日。”两人在胸前划了个十字。贝格·贝姐环视了一下周围，不慌不忙地弯下身子，从那只有几支玫瑰的花束中摘下了两朵看起来更加鲜艳水灵，似乎也正等着让别人将其用于更加浪漫的目的红色花蕾。

伊利娜用手捂住了嘴，想挡住自己难以控制的笑声。贝格·贝姐在一旁说，如果死者知道了送葬的家人们千方百计弄来的玫瑰花被派上更加欢乐的用途，一定会感到幸福的。

她们又在那里呆了一会儿，然后走出坟场，在荷兰园街乘上去夜总会的公共汽车。

21

达希西奥曾考虑过，如果自己要显得高尚潇洒一些，他当晚就不应该去夜总会，免得让伊利娜无可奈何地答应自己的要求，或者迫不得已地向他表示单纯的感激之情，因为他相信贝格·贝姐肯定向她通报了自己解囊相助的事。然而，在战场和情场上往往会鬼使神差，什么战略都用得上。再说，他“猎获”俄国女歌手的想法由来已久，现在甚至已经让他迫不及待了。

事实上，在这战争时期的昏暗的日子里，他生活得紧张而又忙碌。情感上的潮起潮落比他赠送给伊利娜的红玫瑰的花开花落还要快。在战争条件下，由于经济上的需要，使得当地有了大量的便宜货。从中国农村或者广州、上海、香港及其他大都市逃亡过来的无数的年轻姑娘，足可以让上了年纪、经济上富裕而又想玩弄女人的绅士随心所欲地挑选。而达希西奥这位50岁的工商界名人、冰岛的名誉领事、国家功臣奖章获得者、社会精英也不是什么清教徒，更不会为此有过多的顾虑。

长期以来，他和他的妻子在经济上舒舒服服，感情上却平平淡淡。

妻子热衷于她的社交及不多的一些慈善活动；她只要求他尊重她，特别是在“外人”面前表现得说得过去，即使不那么相爱，也不能相憎；除此以外，经济上的收入自然使他们的生活保持在相当好的水平上。

他们夫妻早已分床就寝，用女人的话来说，这是他们这一阶层的人应有的生活习惯。

作为妻子的玛利娅·马法尔达，对丈夫的工作丝毫不感兴趣，更确切地说是从来就没有真正感兴趣过，当然除了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领事职务，就是把冰岛渔业打进远东市场的事业中为冰岛共和国立下汗马功劳后荣获的特权。从那以后，那枚冰岛国家勋章和另一枚功勋章以及它们的精致的别针都展示在所有的官方和外交仪式上。

即使在现在的战争年代，达希西奥的生活仍然是富裕的。在位于南湾大街的府第举行的宴会，依然是澳门屈指可数的豪华宴会之一。尽管他亲英情感明显，但从来都热情接待各国驻本岛的外交人员，包括那位长相可笑却谈吐高雅、彬彬有礼的日本总领事。

达希西奥身上具有典型的生活在东方的葡萄牙人

的性格，这倒使他在情感上极易满足，因为他已经有了那位陈安娜。这是一位在战争刚刚开始后不久从上海逃亡过来的女人，她得到了他的保护并被他安置在二龙喉附近一座住宅里。他每星期只去探望两次。

可是，如今可供有财有貌的男人挑选的女人如此之多，品种如此丰富，他怎能无动于衷。当然，他承认自己已到中年，体格也太肥胖了些（他真应该多抽点时间去网球场，少参加些工作晚宴）。

现在，达希西奥也庆幸自己对宗教模模糊糊的虔诚，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不时落入诱人的情海，只需在每年4月的斋戒律中轻描淡写地忏悔一下就行了，甚至比洗衣婆三婶清洗领带还要容易。

从良心上讲，他仿佛认为无须忏悔。他只不过是利用一下自己感兴趣的女人而已，而且他还那么谨慎，不影响自己的夫妻生活，甚至也不影响她们的夫妻生活，或者说她们根本还没有夫妻生活，或者她们的夫妻生活也像他的那样平淡无奇。

那么，在他的这张情网中，伊利娜到底占有什

地位呢？

达希西奥一边思考着，一边挑选着西服：一套深颜色的，另一套是薄面料、做工考究的（日本人占领香港，给他们寻找好裁缝带来了诸多不便）浅灰色西服，玛利娅·马法尔达曾经说过他穿上这套西服显得过于年轻。

他自认为深蓝色的那套令他更加显得庄重，也不显臃肿，可浅灰色的那套的确让他显得年轻几岁，增加了男子汉的青春活力。

他选定了浅灰色的那套，还配上了那条颜色稍深一些的名牌领带。

他从栗色桃木梳妆台前的花瓶里摘下一朵玫瑰花蕾，插在胸前，这些花可都是从玛利娅·马法尔达亲自指导、阿平精心管理培植的常年鲜花不败的庭院花圃里摘来的。然后他又抹了抹已经用战前剩下的名牌剃须膏刮过两次的腮颊。最后，他辞掉了司机，自己开动了那辆小跑车。玛利娅·马法尔达正在澳门区法官家里的桥牌桌上，并已经通知说不回家吃晚饭了。

刚才考虑的不易回答但必须回答的问题现在又回到了他的脑海中：伊利娜在他至今还是简单铺下的情网里到底占有什么位置呢？

夜总会里的客人不很多。闲着的舞女们懒洋洋地围拢在一张空桌前，有的心不在焉地修理指甲，有的涂抹着鲜红的嘴唇，一边向那些单身的男客们投去勾魂的目光。

达希西奥选中了一张不引人注意的桌子，要了一包黑市上价格贵得惊人的英国烟，拒绝了那位大胆走上前来服务的年轻姑娘。另外的小姐们自然不再对他抱有任何希望。

音乐轻轻奏起，伊戈尔用那最佳男中音深情地唱起了那首“情感之旅”，抑扬顿挫，节奏分明。一位葡萄牙军队的少校拽着一个瘦小的中国姑娘，让她贴在自己胸前，随着他的大步，踉踉跄跄地旋转着。没有舞伴的小姐们在一旁独自扭动着腰肢。

伊利娜终于出场了。她还是穿着那件垫着肩、镶着金线的黑色晚礼服。“V”字型领口上端端地插着两朵红色玫瑰花蕾。尽管贝格·贝姐给它们撒上了水，可依然显得有点枯萎。

伊戈尔早已毛遂自荐作了乐队的艺术指导。在他

的指挥下，女歌手今天演唱得更加柔和亲切。伴着小号的低声演奏，柔弱的女歌手走下舞台，走到每张桌子面前，仿佛她是在为每位在场的客人专门奉献的。

当走到达希西奥的桌前时，她悄悄地把一朵花蕾放在了他面前那块已经不很白净的餐巾上，两眼盯着男人朝她投来的目光，情不自禁地在自己最喜爱的歌曲中加上了一句歌词：

“我等待着，
白天，
黑夜，
谢谢……”

伊戈尔仿佛没有发现歌词的变化（伊利娜也有意压低了声音），而达希西奥尽管对法语只知一二，却也理解了女人的谢意。

仅仅只是感谢？

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间，倒也足够让他用只有伊利娜才能听得见的声音对她说：

“我需要和你谈一谈，对不起……”

伊利娜还在继续唱着：

“……我等待着，
你的归来……”

然后，她走向了其他的桌前。

演唱结束，她走进后台，没有留下任何示意和口信。

达希西奥犹豫不决，也不无失望。他又一次自问，伊利娜在自己变得越来越复杂和越来越难以表达清楚的小小的感情世界里到底占有何种地位？

24

玛利娅·马法尔达过去是，现在依然是社交活动中的一个精明能干、十分令人满意的伙伴，尤其是在冰岛名誉领事的外交活动中更是难于寻觅的伴侣（达希西奥每当想到这外交职务时不免觉得好笑）。

从他的性生活来说，二龙喉那里藏着的陈安娜的殷勤和温柔已让他心满意足。那女人年轻，皮肤柔嫩光滑；再说，当他春心骚动、想换换猎物时，偶尔从当时如此众多的女人中找个把寻欢作乐的女人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那么，伊利娜呢？到底是她的什么说不清的魅力吸引着他呢？

他性格豪爽、体魄健康、思路敏捷，但仿佛与那种年轻人习惯的浪漫式情爱无缘。在这方面，甚至年

轻时他都未曾经历过。难道现在已经 50 岁的他会在自己如此舒适安稳的生活中需要增添些“浪漫”？真可笑！简直是胡扯（如果让玛利娅·马法尔达猜着，她一定会这么说。好在她仿佛又聋又瞎，对此全然不知道……）！

可是，他现在不能抗拒自己要给予这位俄国女郎物质和情感方面的保护和体贴（他心里暗想，或许他是自作多情，多此一举）。他甚至希望自己能某张咖啡桌上抚摩一下她的手，能与她坐在某张点着蜡烛的桌旁一起喝杯香槟酒，或者在月光下与她手拉手散步在公园的大树下，倾听着远方传来的忧伤情歌“我等待着……”

这不是罗曼蒂克又是什么？他承认这是“毫无实际意义的浪漫”，是与他这位社会精英、商场上精明果敢的男子汉的本质完全不符的浪漫，犹如电影中想象出来的幼稚的浪漫。对他这样的人来说，感情生活只不过是用来填补处理进出口生意、纺织和印染经营、海运公司以及即使只担任荣誉职务的冰岛领事馆事务之余的那部分时间的……

达希西奥差点问自己，在他那犹如青春情感的萌动中，到底是否真有性欲望。他承认女歌手有她独特的魅力，这种魅力如此自然，也不引起别人注意，只

有格外在意，才会发现。

她不是非常漂亮，也已经不很年轻。对于达希西奥来说，无论从上海来的还是香港来的，无论是中国的还是欧洲的姑娘中，或者是从他结识的女人中寻找漂亮女人，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可是，这位女人的魅力是内在的，纯朴的，她不仅有标准的容貌、瓜子型的脸蛋、高高的前额、直线型鼻子、匀称的小嘴、斯拉夫女人的白嫩的皮肤、充满了温柔恬静美的绿眸子。她还有端庄稳重的言谈举止，她那长长的双手总是端庄地放在桌上，脸上的表情总是那么含蓄。正是她的这种宁静和不引人注意的动人之处，使他真想把她拥抱在怀里，就像和她跳舞时那样；或者能在合适的时机和地点亲吻她，不是贪婪的狂吻，而是那种充满情感和爱抚的亲吻……

他真的爱上她了！！

但在他自己的年龄段，可能吗？！

然而，伊利娜至今也没有流露任何意思，仅仅是一朵比自己胸前佩戴的花蕾更枯萎的花朵（当现在许多私人庭院都被迫改成菜园或果园时，她从哪儿弄到的玫瑰花呢？），还有歌词中加上的一句表示感谢的话：

“我等待着，

白天，

黑夜，
谢谢……”

他理智地继续热切而又不安地期待着。然而她没有再在大厅里出现，也没有对他作出任何爱的（或其他）示意，只是以非常有教养的姿态对他的帮助表示了感谢。

达希西奥又等了一阵，最后失望地站起身，把喝威士忌的钱放在桌上，走了出去。

他手扶着方向盘，思考着去向。然后耸了耸肩膀，把车缓缓地朝二龙喉开去。

25

当伊利娜第二次出场看见达希西奥的桌旁已空无一人，威士忌酒杯和付的酒钱都已被侍应生收走，心里不禁感到一阵沮丧。但当她看到那朵从西洋坟场那里摘来的玫瑰花蕾也已不在时，心里又有了稍许的安慰。是他带走了？还是侍应生把它连同空酒杯和慷慨的小费一起收走，然后把它当作一朵平平常常的枯萎的花朵或者某个不切实际的梦想扔进垃圾箱了？而她竟然还没有对他今天上午的慷慨解囊表示应有的感

谢！

然而，在感到沮丧的同时，伊利娜又感到了某种内疚，感到了某种使她逃避了一次令人不安的危险后的轻松。

伊利娜并不完全是生活在不食人间烟火的世界里，对达希西奥这种含蓄的却又明白不过的、几乎只是为了几个小时的愉悦、为了以后给他这样的东方式男子汉留下点虚荣的回忆，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目的和结果的示意，她也并不是都看不清楚。

难道除此以外还会有其他任何事情？

伊利娜认为，那纯粹是无稽之谈。他们两人认识的时间如此短暂，相互了解甚浅；可以说，除了在作为公共场合的舞厅里手指轻轻触摸，或者一束头发在散发着胭脂芳香的脸庞上掠过，还没有任何身体的接触。最多是发生在战争时期一位富有而风流的中年男人和她这样一位一贫如洗、丧失祖国、没有今天也不指望明天的女难民之间的一个偶然的艳遇，她怎能期望有其他什么结果呢？显而易见，那样做是卑鄙而可耻的。

而她又怎么样呢？

她是带着家庭和上帝的祝福，为了爱情缔结了婚姻。尽管丈夫并不是与自己性情相投，但为了爱情，她

承受了，她还承受了颠簸坎坷生活的种种酸甜苦辣、起起落落，当然苦难远远超过了幸福……

按照斯拉夫人的宿命论，她认为婚姻是神圣的，是不容拆散的圣事，就像祖父母以及短暂而悲惨的父母们一样，婚姻将她与伊戈尔联系在一起，他们只能同甘共苦、白头偕老……

她又怎能接受一位结识不久、但毫无疑问是慷慨大方、举止高雅、甚至相貌也令人舒服的男人——她不得不承认——的风流约请？

他又怎能期望用那么几百澳门元的资助就足以让她成为他的情人，哪怕是几个小时的情人？

那样和可怜巴巴的贝格·贝姐抓住某个嫖客出卖自己的肉体有什么不同？甚至比她还不如，因为贝格·贝姐是别无选择才不得不那样做的。

这难道就是达希西奥所期望达到的目的？

伊利娜对此没有思想准备，她也绝不会接受这样的“邀请”。不过，即使这样，也不能为此影响自己对他的慷慨援助表示应有的谢意。随即她又有点担心，害怕自己赠送给他表示致谢的那朵玫瑰会引起致谢以外的误解。

26

第二天，伊利娜给达希西奥去了电话。正急切盼望着与她联系的达希西奥兴奋地拿起话筒。

“古特雷斯先生吗？我是伊利娜，天窗乐队的歌女。”

“请你别称我为古特雷斯先生。就称达希西奥吧。也请你允许我称你伊利娜，行吗？”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达希西奥着急地说道：

“没有任何其他意思……”

伊利娜为这种亲密的称呼稍稍感到不安，但没有拒绝他：

“那好吧……哈南，哦，是贝格·贝姐给我讲述了你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不能不对你表示感谢。原谅我只是用电话来致谢……”

达希西奥绝不能放过这次机会：

“要我原谅，有一个条件……”

“一个条件？”

她的声音里仿佛带点不安或者有点生气。

“是的，一个小小的条件：请你当面对我表示感谢。

或者用更好的办法：不用对我讲这些，你只要同我一起用午餐。”

他停顿一会，赶紧又解释说：

“……没有其他意思。再说，我必须同你谈一谈，不过通过电话并不合适。你能同意与我一起用午餐吗？”

能够像回忆中的某个过去的好时光里那样，在舒适的饭店里享受一顿丰盛、可口、热气腾腾又不用担心付费的午餐，这对她来说确实是一种诱惑。不过，她还是推辞了：

“我认为用不着……”

“请别客气，伊利娜！不会让你觉得欠我什么人情的。我确实需要同你谈些事情……”

他稍带神秘的口气说道：

“……与你有关，也与伊戈尔有关的事情。”

他的话中提起丈夫的名字，这使伊利娜惊慌不安。难道警察要找什么麻烦？

“那好吧，我同意。当然，没有其他的意思。”

“非常感谢。你想象不到我有多高兴。你指定一个饭店吧。”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不想让人说闲话……”

这是出于她的谨慎，她担心在澳门这个小地方的

公共场合被人看见她与达希西奥这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在一起。

而达希西奥也有同样的担心，于是他赶紧抓住了机会说：

“我也不想如此。你看，我倒有个建议。澳门宾馆的菜很不错，也对外开放。你觉得在那青松环抱、远眺海景、没有城市喧闹的地方午餐如何？”

伊利娜又一次担起心，城外的宾馆？就他们两人？达希西奥的居心似乎再明白不过了。

“就我们两个人？！”

达希西奥让了一步：

“不绝对是。你可以带你想带的任何人……”

伊利娜赶紧思索着。在这战争的年代里，贫穷司空见惯，长长的队伍、推推搡搡、散发着汗臭的人群为了一点食品都拼命地你争我夺，更何况要在一个天堂般的地方用餐。她应该带谁去呢？

“我能带伊戈尔去吗？”

达希西奥感到一阵意外。当他答应请第三个人时，本想对方会冷静下来，最终自动取消陪客，或者最多带上贝格·贝姐，毕竟还算得上是个不碍事的陪伴。可现在竟然是她的丈夫？！难道她有什么不善的企图？不过，他马上排除了这种不合理的猜想。

“伊戈尔？当然可以……那么，就明天中午吧。我去哪儿接你们呢？”

伊利娜犹豫了。她不愿意在贝格·贝姐的住处接待达希西奥，倒不是因为那女人的低贱，也不是因为自己与那女人的职业有所牵连，而是必须避免引起与那女人的职业有关的任何联想。

“在大酒店的前厅吧。”

27

伊利娜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她突然发现了自己灵活的外交才能。有丈夫陪同出席，她终于准确地按自己的意愿处理了同达希西奥的关系。看来他的援助只是一种慈善行为，最多是为将来建立某种友谊——至少对他来说是这样——因此，她永远会感激他。一旦她和伊戈尔有了条件，一定会偿还的，但这一切不会给予他任何权利来对自己存有不能接受的期望。

另一方面，她要告诉伊戈尔这些钱的来历（的确，他难以理解，尽管他还没有流露出疑惑），还邀请他一起去他们已经多时没有光顾、甚至已经不习惯的高雅豪华的饭店享受一顿丰盛的午餐。种种顾虑现在都悄

然消失，对其他人的敬重，特别是对达希西奥的崇敬丝毫无损。

她轻松地舒了一口气。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伊利娜对自己谨慎作出的决定又产生了怀疑。她至今没有看见达希西奥想在两个男人之间建立友谊的迹象（她绝对相信他没有这种意思），那样或许会让性格轻浮的伊戈尔把对方视作取之不尽的聚宝盆？

真丢脸！

随着这种担心增长，她更加烦恼痛苦。

或许事情还会更糟。如果伊戈尔把这种关系当作三角恋，把达希西奥当作她的一位受人尊敬、明白事理、可以依赖的、富裕的情人，那么，这位轻浮、放荡、好色的伊戈尔会不会屈尊当个挂名的丈夫？！天晓得他是否会把自己当作小白脸、皮条客，甚至出卖自己妻子的角色？！

伊利娜想到这里，羞愧得满脸通红。为了避免后悔莫及，她重新给达希西奥打去了电话，只是说丈夫不能出席，没有更多解释，并希望他去澳门古老的庙堂——观音堂大门口接她，尽管观音菩萨并不是她自己的宗教和思想上所信仰的那个上帝（事实上，所有的上帝不都是同一个人的变化吗？！）。

达希西奥又一次像年轻人那样激动得坐立不安，甚至为自己接到电话后的兴奋而感到可笑。他不需要研究电话里所说的原由，也不需要任何解释，便让他的临时司机、对处理同类事情有着丰富经验的阿林对幽会地点进行必要的布置，使得那里的气氛既舒适又浪漫。那是隐匿在东望洋南山坡上绿树丛中的一座漂亮的别墅，是达希西奥同当地富裕的土生及中国人共同购置并专门用于这类约会的地方。

他承认，要是再能安排一顿晚餐，在那银白色的月光下，伴着在别墅浓密的树丛里闪烁的点点烛光，面对着远方的大海，倾听着从客厅窗户里飘出的唱机里播放的悠扬的乐曲，那样，岂非更加方便，更加浪漫。

但不可能。起码现在还不可能。或许过些时候……

28

伊利娜对着贝格·贝姐的小镜子审视着自己。看看自己的容貌，她感觉自己处于最佳状态。

衣柜里并没有可供她选择的衣服，这倒也省得她为挑选衣服而左右为难。她穿上了从上海带来的真丝裙子和真丝衬衣，金黄色的头发虽然过早地出现了一

束灰白，但她把它们在前额高高耸起，在脑后盘上了一个松松的发髻，倒显得端庄大方。她希望这样的打扮能与她在歌厅里的歌女形象有所不同。为脸部化妆时她稍稍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抹了一层淡淡的口红和胭脂。她再次对着镜子照了照，仿佛嫌自己有点卖弄风骚。出门之前，她在圣像前站住，低声说道：

“我的主，保佑我别走错路……”

她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担心什么，到底害怕面前的还是将来的什么危险，但她真心祈求上帝的保佑。尽管她坚信自己是个不容易接触的人，可她还是隐隐约约感觉到了某种危险，或者，至少预感到会给自己不久的将来带来某种变化。那么，达希西奥呢？

当伊利娜来到观音堂时，“古特雷斯继承人”公司的奥斯汀汽车已经等候在人行道旁。阿林手扶着方向盘耐心地等待着。伊利娜并不认识那辆汽车，她在观音堂前停住脚，但稍微避开了前面大路上排着长队等待兵营里分配食品的人群的注意。

司机看到了她，走出车子，用不太流利的英语对她说：

“是奥斯特拉科夫太太？古特雷斯先生让我来接你。”

她明白达希西奥的谨慎，也感激他没有亲自前来，

也没有用他那辆全澳门都熟悉的鳄鱼牌汽车来接她，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奥斯汀汽车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朝着隐蔽的别墅开去。

奥斯汀开进一个铁栅栏大门，爬上斜坡，把伊利娜送到一栋别墅前。这别墅远离大马路，隐蔽在长满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的院子里。

达希西奥早已微笑着等在了那里。既使在别墅里，他还是那么注意衣着打扮：一条浅色的裤子，配上一件短袖细麻衬衣，没有系领带。这套衣服没有能掩盖住他的肥胖（他承认确实是稍微胖了些，早应该多去网球场），他的头发倒还没有开始脱落，只是前面已经开始发白。棕色的皮肤与其年龄相符，脸庞长得很匀称，那双黑眼睛里闪烁着半东方人的目光。

他扶她下了车，用伊利娜几乎已经不太习惯的殷勤吻了吻她的手，只说了句：

“谢谢你的光临。”

伊利娜没有马上抽回被她握住的手，对他笑了笑，说：

“谢谢你邀请我。”

“乘阿林准备餐桌，你不愿意参观一下我的庭院吗？”

歌女喝了一杯谢里酒，达希西奥还是习惯喝着加

苏打的威士忌。他们端着酒杯，沿着松树、大槐树和金合欢树树荫下的弯弯曲曲的小径转了一圈。清新凉爽的庭院似乎有那么点原始的味道，像一个远远超脱了现实的世界。

“这么漂亮的地方！我都忘记自己是在澳门了……”

伊利娜的话，使达希西奥感觉到了一位漂泊在异乡的难民的贫穷和生活的艰辛。

“很宁安，是不是？”

他扶着伊利娜沿着小路爬上平台。她的心脏不允许她用力过猛。

“我要慢慢地上，你知道吗？我的心脏已经不年轻了。”

伊利娜说这话本没有其它意思，然而在达希西奥听来却很浪漫而意味深长。

“你别这么说。我眼里的伊利娜可一直是一位妙龄少女……”

“妙龄少女？……”

午餐的饭菜都很清淡，数量也不算太多，没有伊利娜想象的那么丰盛。她原本以为有了这顿午餐，或许晚饭都可以省了。

阿林把那张不大的桌子摆放在树荫下，在上面铺

上洁白的台布、细瓷盘子和明亮发光的水晶玻璃杯。那气氛显得那么高雅。再说，酷热的盛夏已经过去，10月的天气真是秋高气爽，再加上大树的荫凉……

用过午餐，他们坐在平台的椅子上，一边喝着咖啡和正宗的法国阿尔马克纳陈酒，一边透过枝叶空隙，远眺午后波光粼粼的海面。伊利娜又一次感慨而凄凉地说：

“这么漂亮！真不像是在澳门……”

她抿了一口酒，问道：

“你怎么能在这种时候弄到这么好的酒？”

达希西奥微笑着说：

“你别见怪。这是我存放在库里为特别的朋友预备的。”

“谢谢你把我算作特别的朋友。”

“对于你，怎么客气都不过分。”

他们谁也没有再说话。过了一会儿，伊利娜赶紧打破沉默，她不想把谈话引入危险的境地。

“这么安静！谁也不会相信，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会有战争。如果在月光下，这里的景色几乎能与奥尔科夫的相媲美。”

“奥尔科夫？”

“我祖父母的大庄园。在离敖德萨不远的克拉斯诺

—彼列科普斯克。在那里的松树林中也有这样一个面对大海的平台。”

她凄凉地笑了笑，接着说：

“已经那么遥远，生活也经历了那么多颠沛。我仿佛觉得那是上一辈子的事情了。有时，我甚至怀疑到底是否有过那样的生活，过去是否是一场梦……”

伊利娜不再说话，仿佛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达希西奥没有打断她的思路，只是默默地陪伴着她。

近年来的生活已使伊利娜不习惯喝太多的酒了。今天虽然喝得不算太多，却给她带来了兴奋，甚至使她产生了年轻人的那种依恋的情感（依恋谁呢？伊戈尔？还是达希西奥？），她竟然忘掉自己的手依然被握在男主人那只棕色的有力的大手中。她感到脸上渐渐发烫：

“真热！……”

“这时候是比较热的。可惜我们不是在月光下……我们进去吧，里面凉快一些。”

他们把球型酒杯放在平台的矮围墙上，走进屋里。宽敞舒适的客厅里，栽种着几棵大槭树，窗户都打开着，屋顶的大吊扇发出均匀的吱吱声，大束的鲜花插在花瓶里，香槟酒瓶放在银质的冰桶里。这里的气氛显得凉爽而清新，在伊利娜略带几分醉意的眼中，这

一切正召唤着她那娴静、高雅但又有少许罪过的情感。

达希西奥扶她坐到沙发上，自己走到唱机旁放上一张悠扬悦耳的音乐唱片，然后贴近伊利娜身旁坐了下来。由于酒精的作用，也是由于对这类事情的生疏，伊利娜竟然没有看出这些就是传统的诱惑场面的最简单和最易识破的开端。看来，这位曾经轻易猎获过为数不多的几个女人的企业家，并不是一个多么浪漫的情种。

他抓住伊利娜的手，把她拉向自己怀中。伊利娜勉强地拒绝着，她忽然想起了达希西奥曾经说过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告诉她。

“你要告诉我什么事情？”

“这些可以等一会儿再说。你先来跳舞吧……”

“我想，可能我不行了。我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

“不可能！好酒是不醉人的。”

达希西奥在两只杯子里倒上了香槟，冰镇过的香槟酒在杯子里吱吱作响。他递给伊利娜一杯，随后举起了自己的酒杯：

“为你干杯，伊利娜，为我们干杯，为我们的将来……”

达希西奥按他所预先设计的那样，悄悄地张开了

他的情网。伊利娜尽管什么也没有说，但她举起了酒杯抿了一小口。

过了一会儿，在他的坚持下，他们跳起了舞。达希西奥紧紧地搂着伊利娜。由于酒精的作用，由于周围的气氛，由于生活的艰辛，伊利娜此刻变得脆弱不堪，她只能跟随着身边这个高大、强壮的男人挪动着脚步。她感到这个男人身上的淡淡的香水味是那样的好闻，那样的庄重，那样的友善，那样的可信，那样的令她尊敬，那样的……，那样的与伊戈尔不同。几乎在她没有感觉到的情况下，他已吻着了她的双唇，还是在她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他已将她带到了隔壁的房间。

过了一会儿，伊利娜抬起朦胧的双眼说：

“不，伊戈尔，请不要……”

听到伊利娜嘴里念着丈夫的名字，达希西奥犹豫了一下。他知道她并不完全清醒。突然间，他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可耻，简直是个混蛋；不过，那只是一瞬间的感觉。天晓得，或许这是唯一的一次机会……

屋顶的吊扇翻动着屋里的空气，转动发出的吱吱声盖住了从门缝里传进来的音乐声。

在别墅的院子里，办事谨慎的阿林正洗刷着午餐用过的餐具。

达希西奥的这次艳遇时间不长，比自己原来希望的和估计的还要短。

伊利娜对于他来说有一种奇妙的诱惑力。这种诱惑使他这位 50 岁的男人又一次焕发了青春——当然，体态上已无法改变。在这位澳门社会精英的唐·胡安式闲逸的生活经历以及次数不多的艳遇中，还从未有哪个女人引起过他如此骚动的情绪。除了那个对他百依百顺、温柔体贴的正式情人陈安娜，他也有过几次艳遇：一两个小瓷瓶式的年轻苗条的中国姑娘，一个厌倦了香港社会生活的英国女人，还有澳门上流社会的两个太太。但所有这些都像是过眼烟云，只是几个小时的欢愉而已。

可是伊利娜却不同，他也难以解释清楚。

这个女难民早已过了人们所爱慕的妙龄少女年代——他认为是老驴遇上新草地，平淡无奇——，而那女人的皮肤虽然白净却已经没有了弹性，由于生活的艰辛和市场上护肤品的缺乏，所以谈不上对皮肤的护理；满头浅棕色的头发上留下了不能经常光顾美发厅

的迹象，也露出了一缕缕银丝，眼角旁隐隐显露出难以形容的金黄色鱼尾纹；鼻子两旁的两道皱纹已隐隐伸向嘴边。

如果是另一个女人，这一切足以使他对其失去兴趣。然而在这个女歌手身上，却成了他格外同情怜悯她的理由：透过这些时代留下的痕迹，达希西奥看到了这女人凄凉痛苦的生活经历，尽管这对于成千上万的其他女人来说并不稀奇，但放在伊利娜身上，却让他心头产生一种痛苦难忍的滋味。

实实在在地说，她对于他并不是性爱的诱惑。澳门任何一个从事那种职业的女人都能让他风流快活一番。就拿陈安娜来说，她是一位完全继承了东方传统思想的女性，绝对顺从男人的意愿，对达希西奥的性情嗜好都了如指掌。她无论在性生活方面还是在日常的生活里，都令他感到非常满意。

可是，伊利娜身上仿佛浮现着一种神奇的征兆，使达希西奥某种从未经历过、或者说起码至今还处在沉滞状态的浪漫的梦幻。他曾试图从他们不多的几次涉及过去的——她一般不愿意谈及往事——谈话中，想象出那些遥远的地方、遥远的城市，想象出她那冒险的经历，想象出她那如同国际间谍般的（天晓得？）离奇的世界主义生活。当然，这种想象或许只是他的过

分的猜疑而已，达希西奥转而又这样叹息。

他爱她吗？难道能同时爱上陈安娜和伊利娜两个女人吗？甚至，如果算上对玛利娅·马法尔达的平淡无奇的爱，难道能同时爱上三个女人吗？

这些在他脑海里纠缠着他而又难以理清头绪的情感，倒没有让他失去睡意。达希西奥叹了一口气躺到舒适的红木席梦思双人床上，关灭了暗淡的床头灯，静静地进入了梦乡。

30

对于伊利娜来说，她的这次外遇却给自己的心灵带来不小的创伤。

带有维多利亚人传统的祖父母的行为的影响，还有社会的、道德的和宗教中的清教主义的影响，以及她自身的斯拉夫民族的忧郁性格，这些，在她的成长的过程中已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这些烙印，没有因为马德莫依塞尔·克洛迪娜的那些毫不掩饰的赤裸裸的行为，没有因为伊戈尔的漂泊和放荡不羁，没有因为她曾经经历过的世界性大都市的生活，也没有因为她那今天的或过去的坎坎坷坷、大起大落的命运而

消失。总之，在大家眼里（无论在丈夫眼里，还是在贝格·贝姐和达希西奥的眼里），伊利娜都是一成不变的那种人。

于是，第一次对神圣的婚姻的背叛给她带来心灵上的创伤，即使自己的婚姻是那样的痛苦。

伊利娜在心底里祈求伊戈尔的饶恕。她用双手捂着脸，双膝跪在贝格·贝姐小房间里的圣像前，或者面对着贾梅士广场旁的圣安东尼奥教堂里的祭台，低声祈祷，不断请求得到宽恕。

这一切并没有给她带来抚慰。她又来到观音堂，在某个她不知名字的菩萨面前点上几柱香。可是，那天下午，正是从这个观音堂的大门口的台阶旁，她迈向了那个罪恶的别墅。

然而，她的一切努力都没有有什么结果。

她发誓再也不见达希西奥。可是，这样的誓言却又把伊利娜的思路引到了“情人”身上。

（难道一个只同自己在半醉半醒状态下有过一次肉体接触、一次根本谈不上多么惬意痛快的风流的男人，可以称之为“情人”？）

她又一次陷入了沉思。

她爱他吗？她不得不承认，澳门的这位企业家确实是一位令人羡慕的男人。他那爱德华式的身材，当

然是太肥胖了一些，他那堂堂正正的脸庞、炯炯有神的眼睛、洁白无暇的牙齿，他那神气潇洒的风度、令人感激的慷慨，这些都无不令人羡慕，伊利娜叹了口气，还有他那在她看来无法估量的财富。

对达希西奥的财富的估量又一次使伊利娜心头发痛（或许是胃部，她也说不清楚）。

真不知羞耻！——伊利娜自责道。

她已经降到了贝格·贝姐的地步，然而，她却没有贝格·贝姐当初接受他们夫妇在她家居住时所表现出来的慷慨。

（根据当初的协议，他们应该交给她部分房租和日常生活的部分共同费用。难道这就够了吗？从伊戈尔那里不能再指望什么了，他总是把天窗乐队歌手的那点微薄的薪金统统花光。即使跟他商量，也是白费劲，他肯定会拒绝。当然，绝对不能向达希西奥开口——上帝保佑我！如果向达希西奥开口，就等于出卖自己，而且是这一古老行业中最卑下的一着，更何况自己表现得又是如此的低劣。）

黑暗中，伊利娜禁不住笑了。她静静地躺在旧新加坡木床上，硬梆梆的床垫和里面的高低不平的弹簧硌得她全身酸痛。睡在她身旁的丈夫发出平静均匀的呼吸声，没有任何忧愁，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或是

明天，也没有任何猜疑。

那么，伊戈尔现在怎么样呢？

伊戈尔睡得那么平静，完全置身于这纷繁复杂的情网之外，对她给他戴上的这顶尴尬的绿帽子全然不知。他曾鼓励伊利娜演唱要投入，表演要细腻，特别是对观众要认真，对达希西奥也是一样，演唱时仿佛要用“等待……”这一歌词对他们传递某个信息，甚至某一个低等的邀请，更有甚者，还放下一朵半枯萎的玫瑰花蕾；这就是现在的她，就是那个像在澳门的社会上、生意场上和为人处世方面受人敬重的达希西奥一样的、又非常虔诚、带有维多利亚传统的奥尔科夫伯爵的孙女。她竟然成了达希西奥这位举足轻重、待人温和、受人尊敬的人的情人，成了爷爷的情人（胡扯！）；而自己的丈夫伊戈尔却是那样不学无术、轻浮放荡、朝三暮四、不负责任，他现在如此安稳地酣睡在她的身旁，可她却至今还爱着他。

只有上帝才知道这是为什么！

难道能同时爱上两个男人？

伊利娜迟迟难以入睡，只好呆呆地盯着黑暗中的贝格·贝姐房间的天花板。

她成了贝格·贝姐的同事……奥尔科夫伯爵的孙女躺在妓女的床上……多么大的讽刺！

不学无术、轻浮放荡、朝三暮四的丈夫……

受人尊敬、深沉稳重、可依可信的“情人”……

此刻，她躺在妓女黑糊糊的小房间里，在她看来，达希西奥已经是自己的“情人”——尽管只有那唯一的一次肉体接触，而且是在她半知半觉的时候（她确实喝多了一点）——她已经陷于这奇特的三角恋中，即使自己还没有完全的投入。

31

达希西奥对伊利娜的爱恋，在以后的几天里还是一如既往。有时，他作为女歌手的崇拜者出现在夜总会里，有时，当他知道伊戈尔去了娱乐场所，便直接去伊利娜的住所，给她送去一些从黑市上买来的或从自家仓库里取出来的、在当时很珍贵却又不很实用的东西：如一瓶香水、一瓶香槟酒、一束鲜花、一盒巧克力等等……

伊利娜每次都立即把东西交给贝格·贝姐，让她拿到黑市上换回几元澳币，再买回一些更加实用的生活必需品：如大米、面包、肥皂等等……

伊戈尔对于这些突如其来的东西，采用他一贯的

态度，既不怀疑，也不过问，而是统统接受。

如果说他已经感觉到这些东西是别人赠给妻子的物品，或者已经猜到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他也没有表现出来，更没有去过问。甚至，他好像还在为伊利娜提供更多的空余时间。他把她的排练安排在演出前的一段时间，可其他人则不行，这样，伊利娜整个下午就可以自由活动。他自己是上午早就离开了家，要到晚上才在夜总会与妻子会面。

一天晚上，达希西奥又来到夜总会，还是坐在那张不引人注意的桌子上，端着他习惯要的威士忌酒杯，等待着女歌手出场表演。等到伊利娜走过他身旁时，他交给她一张小纸条，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请给我打电话！”，然后过一会儿就走了。

第二天上午，女歌手给他去了电话。

“伊利娜，我们还没有谈过我现在最担心的事。我们还能再见一次吗？阿林去老地方接你，中午行吗？”

中午，不太引人注意的奥斯汀轿车又一次在观音堂大门口的台阶旁等候着她，然后把她送到东望洋山坡上的别墅，让她去享受一顿名副其实的午餐。这是一次更加清醒的幽会，因此，也是更应受到谴责、更加罪恶的幽会。

达希西奥向她表明了自己的关心：

“你不能继续住在贝格·贝姐家里了。我相信她对你的友情，可这种局面会让你不清不白，对你的名誉不会有好处，这是明摆着的。那里不是适合你的住处。”

“这我知道，但我又能怎么样呢？我能去哪里找到房子呢？当然是我付得起房租的房子……”

“我也想过这些，我是仁慈堂的会员，我已经和那里的主管谈过了。我为你弄到一小套房子，还配有一点家具，但仍很简陋。这是唯一的一套空房子，房主已经去世。”

“啊，真是太好了！”

伊利娜丝毫没有为某位澳门土生老太婆的去世而难过，她只想到自己马上就可能有房子住了。

“房租呢？”

达希西奥犹豫了一下。他曾想过替她支付这笔对他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房租，但他担心，他这么做会被看成是需要什么情感上的承诺，是企图巩固这种她并不太情愿长期维持的情人关系。他还担心，那样会令伊利娜难堪，她会把此举当作他用金钱收买感情。再说，她也无法向伊戈尔解释清楚。

“我曾想过替你支付房租，但担心你丈夫会对白白得到房子感到奇怪。不过，我争取到了优惠的房租，你只需每月支付 25 澳门元的租金。你可以向你丈夫解

释，这是仁慈堂拨给难民的住房，房租有限。”

伊利娜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他们默默地坐在高雅的小客厅里，百叶窗半开着，气氛是那样的宁静。

一贯办事谨慎的阿林早已悄悄地到后院去了，只剩下他们两人在那里品尝着盛在水晶杯里的、还是战前留下的冰凉的美酒。

达希西奥把伊利娜拉到自己怀里，亲吻着她，再没有感到她有任何拒绝的意思。

32

对表面上看来是源源不断的好运，伊戈尔还是没有流露出有什么怀疑。

他像以往一样，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位于塔石附近的隆街上的新居。房子比贝格·贝姐的要稍稍好一些，里面有一些家具，还有死者给仁慈堂留下的一些家产。但屋里的布置似乎很让人感到不习惯。

在别墅里的幽会越来越频繁了，而达希西奥还是照常去夜总会，或请乐队的人喝威士忌，或给女歌手赠送一些礼物。不过，他不会让她陷入困境的，因为

那些礼品都是可以送给任何一位歌手的，是什么花呀，巧克力呀等等。而另一些意思深远的礼品自然要留到别墅里再给，例如一只小戒，一块当时极难找到的纯丝绸布，一条珍珠项链。等等。

起初，伊利娜在接受这些赠物时还推辞一番，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幽会使她渐渐忘掉了自责和内疚。她习惯了接受这些小恩小惠，习惯了从前的生活中所熟悉的这种爱宠，习惯了舒适、幽静、清新、高雅的小客厅的情调，习惯了从银质冰桶里拿出来的冰镇香槟。

有时，她也问自己，难道伊戈尔对此毫不怀疑吗？说这些突然多起来的财富只是用工资买的，是解释不通的，还有那些她常常粗心大意忘记藏起来的新的首饰，难道他就不起疑心吗？更有甚者，在缺钱花时，他竟然毫不犹豫地拿起任何一件新首饰去当铺，因为原有的首饰也只剩下那只她无论如何不同意典当的大钻戒了。

然而，伊利娜就是看不出丈夫在同自己相处中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他还是那样，对她既关心又不完全在乎，脾气还是那样好，对于她的冷漠还像往常那样无动于衷，与此同时，他的消沉或气馁的情绪似乎越来越少见了，而他们夫妇也不经常作爱了。

伊利娜无法对丈夫顺从接受这种境况的态度不加

怀疑，她对这种表面上的平静越来越担忧了。

33

在山坡别墅里的方便而又频繁的幽会，使达希西奥和伊利娜罪恶的婚外恋情渐渐地由浪漫变得家常便饭那样平淡。

随着这一变化，达希西奥也对伊利娜的忧虑、内疚及悔恨的不稳定的情绪渐渐产生了厌烦的感觉。对于他来说，艳遇只不过是一时的风流，为的是让双方都感到高兴而又不伤害任何人。可是，伊利娜一方面为自己违背了她那神圣的婚约、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无法自圆其说而处于内疚和自责之中，另一方面又对达希西奥确实有爱恋之意，也对他所给予的舒适的条件和经常赠送的礼物十分喜爱，尽管它们越来越缺少浪漫，越来越不实用了。

为满足她的心愿，达希西奥为她找到了一份教授法语的工作。但她对此似乎并不热心，还是像从前那样，尤其对法文的精确的语法毫不留意，总是那样马马虎虎。

可是，这点工作就足以让伊利娜有了不去夜总会

工作的理由。因此，难民中的另外一些更加善于交际的年轻的歌女们立即将她取代了。

伊利娜并不为自己丢掉这份本来她就认为是矫揉造作的工作而可惜。与伊戈尔相反，她认为这类职业与自己的宗教信仰以及家庭的道德准则相悖，而且，她现在越来越多地考虑家庭的道德准则。

伊利娜至今还难以弄明白自己和达希西奥之间的关系性质。

作为情人，达希西奥远比丈夫强得多。可是，他们之间却只是像上层社会中的同事。他待她彬彬有礼，他的慷慨大方能使她生活得不像过去那样的贫困凄惨。这些，都使她产生一种离不开他的感觉。

这难道是爱情的一种？这种感情同她对伊戈尔的感情不完全一样，因此，这也算得上是爱情吗？

伊利娜不敢回答。因为她感到自己就像是个应召女郎，是和贝格·贝姐同等档次的人，尽管她现在不再去夜总会，也很少见到妓女了。她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对那浪漫的婚外恋抱有贪图财利的目的，越来越明确地觉得自己的行为纯属是卖淫。于是，他又一次感到内疚，又一次情绪低落。对达希西奥来说，这一切已经令他厌倦，他又开始经常去找陈安娜，重新回到她那轻松甜蜜的怀抱里。

位于南湾大街的公司办公室里，达希西奥坐在那张雕花的古色古香的大红木办公桌前，翻看着夹在胖乎乎的手指中间的那封信。一个平平常常的信封，没有丝毫痕迹能让人看出寄自谁人之手。信封上用蓝墨水笔书写的大写字母，一看就知道是假装的笔迹。信封上只写着“达希西奥·古特雷斯先生”，而在信封上方用斜体字写着“绝密”的字样。信纸是一张不算太好的白纸，上面用英文大写字母简单明了地写着：

“我知道你与奥斯特拉科夫太太的恋情。如果她丈夫知道了会怎样呢？杀死她？还是杀死你？还有，你夫人会怎样呢？要我保守这一秘密的价格是二万元。你必须把这笔钱送到烧灰炉前面的第二张椅子那里。”

达希西奥把这封恐吓信认认真真地看了三遍，企图找到作案者的蛛丝马迹。然而，他没有丝毫分析案情的经验，即使在年青时代，他连阿瑟·科南·多伊尔的侦探小说都没有读过。不过，在这件具体的事情上，他可以集中自己丰富的经验和智慧进行思考和分析。

恐吓信是用印刷体大写字母写成，这说明作者企图让别人无法辨认其笔迹；但这反倒说明这个人害怕自己平常的笔迹会被人轻而易举地认出。于是，达希西奥认为这封信肯定是某个与自己有关系的、认识自己的人写的。

其次，信是用英文写的，这样可以排除自己周围的中国人：那位司机只会说几句蹩脚的英语，但他不会用英文写信的；还有别墅的管家、中央酒店的以及其它几家公司的中国职工，都可以排除在外。当然，也不可能是澳门土生职工，他们一般都用葡萄牙文，除非想造成假象，让达希西奥不排除这种可能。

他感到奇怪的是，他们这样小心谨慎地秘密幽会，除了那些中国佣人和贝格·贝姐，还有谁能知道呢？

当然，他也想到，或许伊利娜一时马虎，在不注意的时候把自己的外遇过分地显示了出来，并且丝毫没有想到其后果：一旦这事被周围的人知道，那么，这个小小的澳门社会就会很快把他们千方百计想保守的秘密公诸于众。

达希西奥把知道他们幽会的人挨着个儿清理了一遍，很快他就排除了司机阿林和别墅的看门人阿昆，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是他的忠实的佣人，再说，在他以往发生同类寻花问柳的事情时，他们也都是经得住考验

的。

那么，就只剩下贝格·贝姐了。达希西奥知道妓女对伊利娜很关心，也了解伊利娜的这桩婚外恋。的确，他对妓女的道德品质不完全了解，但起码她的职业就不会让人不对她起疑心。

达希西奥似乎觉得应该提醒伊利娜他们所面临的危险。

对于他来说，与伊戈尔决斗，进行一场血淋淋的厮杀，倒并不使他太担心。达希西奥不是什么英雄，但也不是胆小如鼠的人。但是，从这么长时间看来，他认为这位俄国男人与其说是个残忍的复仇者，倒不如说更像个顺从的丈夫。

最使他感到惶恐不安的是有人要向玛利娅·马法尔达告密。

尽管他们夫妻之间早已经没有过性生活了，但按照默契，他始终把自己的婚外恋情，和陈安娜的长久的关系，以及婚后多年中或因为性欲突发、或因为花心难收而偷香窃玉的事谨慎地保守着秘密。

可以说，达希西奥对妻子给予了令其满意的敬重，因此他不愿意让妻子也卷入这场肮脏的交易之中。

当然，他也不想把伊利娜牵连进这可怕的纠纷中来，但他又无法让她避开。他必须提醒她，或许应该

减少——或许应该结束他们之间每周的约会？

一瞬间，达希西奥似乎觉得，他们的关系如此结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令他痛苦。甚至，说句心里话，这样倒可能给他提供一次并不是违心的摆脱的机会。

达希西奥感到自己或许会因为这种残酷的想法而内疚，于是，他重新又把思路集中到手里拿着的这封信上。

有人敲响了办公室的门，一位公司员工从门缝里探了探头。

“我这里有一份发往泰国的货单，如果达希西奥先生可以签署的话……”

“现在不签，你在别的时间再来找我……”

小伙子瞪大着惊讶的眼睛离去了。达希西奥为自己这种出乎意料的粗暴态度而后悔，但他的确不愿意有人打断他刚才对恐吓信的分析思路。

他又一次看着匿名信的信纸。这是一张平平常常的信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在战争期间，各公司甚至政府部门大多数用的也是这种质量不好的纸张。

信纸的三条边是机器切割的，而第四条边裁得不太整齐，仿佛是用裁纸刀或另一类器具裁过的。这说明信纸是从某个记事簿上撕下的，然后重新裁了一下，

或许是为了裁掉某些能证明其来源的印记。

难道是来自另外的渠道：另外某个公司或某个酒店，可能是中央酒店。达希西奥把怀疑集中到妓女贝格·贝姐身上。她作为天窗夜总会的妓女，自然和一楼大厅门卫容易接触。

他越是怀疑，也越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为什么不是她？理所当然，贝格·贝姐因为自己未能得到应有的好处而悔恨在心，而且现在奥斯特拉科夫妇有了自己的房子，她被完全排除在这段“艳史”之外，因此，她孤注一掷，采用这种方式，以求得到其拉皮条的报酬。

达希西奥决定赶紧通知伊利娜。

就在当天上午，达希西奥让司机阿林绝对小心地去和隆街等着，在俄国佬出门后赶紧把一封短信交给伊利娜。信上只写着：“十分紧急。今天下午三点钟。”

现在，他们已经在别墅里会面了。虽然达希西奥像平日那样接待了她，但无法掩饰自己的不安，这让伊利娜一下子就看穿了。

“怎么啦？”

“今天上午，我收到了这封信。你先看看吧。”

伊利娜打开信纸，默默地看着，两道眉毛渐渐地紧锁到一起。那种全神贯注的样子是一封短信难以解

释的。她把信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顿时感到眼前发黑。她气愤地站起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又坐了下来。她一只手捂着脸，但没有哭出来，另一只手抚摸着胸口。她仿佛感到缺少空气，呼吸困难，只是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伊利娜把信还给了达希西奥。

“请您给我一口水。”

尽管他们之间已非常亲密，但她还是没有称达希西奥为“你”，就像现在用法语对他称呼的一样。

“现在怎么办呢？”

“最好是付钱。如果付了钱，我相信她就不会去告发了。”

“她？”

“当然是贝格·贝姐。还可能谁？”

伊利娜半张着嘴，扬起眉毛，睁大眼睛盯着达希西奥。他的没有根据的指责深深地刺激了她。

“贝格·贝姐？！哈南·卡伦斯基？！不可能！您简直是胡乱猜疑！她绝不会这么干。我丝毫不怀疑，她绝不会干这种下流勾当。”

“请原谅我，伊利娜。她是你的朋友，或许是装出来的，你不要过分天真……”

“不是她，我能确信不是她。您把信再让我看一遍。”

伊利娜的两只眼睛长时间地死死地盯着手里的信。

“别付钱，达希西奥。请您别付钱。如果您为了我好，就别付这笔钱。”

接着，伊利娜用几乎难以让人听见的法语说道：
“这个混蛋，无赖……”

达希西奥为伊利娜说出这些话而激动。伊利娜的眼睛里发出暗淡的光芒，脸上的肌肉在微微抽搐，瓜子型的脸上呈现出他从未见到的痛苦而又坚定的表情。他等待着她的其它反应，等待着她的害怕、绝望、悔恨的表情。

“如果我不付钱，她会去向你丈夫告发我们。我并不害怕什么，但我不愿意看到在你身上将要发生的一切。”

“我不管。但就是不能付钱！”

“数目不大。二万澳元，不算大数……”

“求求您，别付。我求您了，行吗？”

“可伊戈尔会知道……”

“我不管……”

在一阵痛苦的沉默之后，伊利娜说道：

“……他已经知道了……”

这一次，是达希西奥惊讶不已：

“他已经知道了?!”

伊利娜什么话也没有说。她坐在沙发上，用双手捂着脸抽噎起来，两个肩头在不停地抖动着。

达希西奥渐渐地明白了原委。

“是伊戈尔?”

伊利娜没有立即回答，继续痛苦地沉默着。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擦了擦眼泪说：

“这是他的笔迹。当然，他伪装着写的，但我认得出来。”

“可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这并不困难。不幸的是，我是个粗心大意的人。您的礼品，新的住处，我也说不清楚……再有，在夜总会里我对您的格外的在意，我真的说不清楚……求您，别付钱给他……”

伊利娜竭力控制着自己，好像是呼吸困难似地断断续续地说着。

达希西奥没有回答。他把信叠好，放在了上衣里面的口袋里，然后握住了伊利娜的双手，说道：

“你先休息一下，一切都会好的……”

他最终是一位理智的、坚强的、负责任的、遇事不慌的男子汉。伊利娜倒在了他的怀里，把脑袋靠在他宽阔的肩膀上。达希西奥双手抱住伊利娜的肩头，轻

轻地吻着她的头发。在这种爱抚中没有丝毫的性爱，却充满了父兄般的保护和亲昵。而伊利娜也想起了在孩提时代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祖父所给予她的这类爱抚。

“我认为，我们最好在这段时间里不要见面，等到事情过去了再说。造成冲突，对任何人都不利。你让我按照我的办法去处理。你看我怎么解决。但请别告诉贝格·贝姐我对她的怀疑。不要无端地伤害她。”

伊利娜点头同意。阿林用奥斯汀 40 把她送到塔石球场旁边。伊利娜像是个机器人，晃晃悠悠地从那里独自走回和隆街的住处。

35

达希西奥站在公司办公室的大写字台前，一动不动，神情镇定自若。

昨天晚上，他到中央酒店前厅，付给门卫 10 澳门元小费，说要一张纸写个便条送到“天窗”夜总会。年轻的门卫收下 10 元钱，立即拿来一沓信纸。信纸的质量不很好，左上角还带着黑色的酒店标记。达希西奥摸了摸信纸的厚度，确定这信纸的大小、现状都和匿

名信所用的裁去上条边的信纸相似。

他用刚劲有力的笔体、要别人必须服从的命令式的口气写道：

“明天中午 12 点，我在南湾大街的我的公司办公室里等你，讨论你所感兴趣的事情。但你的妻子不应该知道此事。”

最后他签上了名字：达·古特雷斯。

他让小伙子送了上去，并一直等到他回来证明已经送到。

他又给了小伙子 5 澳门元小费，然后才离开了那里。

现在他正沉着冷静地等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办公室里的家具显得坚实而高雅，就像它们的主人一样令人敬畏。墙上挂着几张由玛利娅·马法尔达挑选的古典版画——在这方面，达希西奥总是同意妻子为自己增添一点高雅的气派，还有好几个档案柜。

达希西奥让人把这张雕刻着中国图案的红木办公桌上平日堆放的文件纸张收拾得干干净净。在多年使用得油光锃亮的桌面上，只放着那封打开的匿名信。白色的信纸在光亮的大桌面上尤其显眼。可以肯定，伊戈尔一进门就能看得见。

他的私人秘书轻轻地敲了敲门，在门口探着脑袋

说：

“奥斯特拉科夫先生到了。”

伊戈尔像平日里那样迈着轻盈的脚步，微笑着走了进来。

他的衣服尽管不是新的，但穿在身上显得颇有风度。一条旧的但很整洁的裤子，运动牌上衣是战前留下的，袖子胳膊处已经有磨损的痕迹，胸前的上衣口袋里插着一块白手绢。

伊戈尔那轻快的脚步，使人看不出他已是50岁开外的人了。

或许是大自然的作用，或许是他个人的努力，或许是战争带来的磨难，才使他保持了如此年轻的体态，尤其是他的脚步几乎像专业舞蹈演员一样灵活。他的鼻子微微向上翘起，胡须刮得干干净净，嘴角的轮廓分外鲜明，头发显得黄中带灰，那双海蓝色的眸子里闪烁着唐·胡安式的狡黠的目光。

达希西奥对原沙皇军队的哥萨克军官的与年龄不相称的苗条的身材感到某种妒忌。

他怎么能和这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既无任何顾忌又无道德约束的集花花公子、冒险家、流浪者为一身的情种竞争呢？

然而，此时此刻，达希西奥这位澳门企业家、社

会精英、冰岛驻当地领事，绝对没有为自己所扮演的情人角色而感到罪过，相反，却为那位被嘲弄的丈夫而感到难过。

伊戈尔伸出手，微笑着走上前来：

“古特雷斯先生，很高兴见到你……”

达希西奥没有伸出手去，也没有回答伊戈尔的问候。

沉默了一会儿，他仿佛感到眼前的局面有点尴尬，有点可笑，他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法官，判定对方是个戴绿帽子的男人。

俄国佬的目光落到了办公桌上的那张打开的信纸上，那只伸出的手尴尬地放了下来。

他的脸红了一下，默默地看了一眼面前的这位澳门人，既没有提出任何质问，也没有作出任何辩白。倒是澳门人用干巴巴的低沉的声音说道：

“你夫人对此一无所知；我希望你什么也不要告诉她。这里是你要的钱……”

达希西奥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沓一百元一张的钞票，统统装进了一只大纸袋里。最后，他把那封匿名信叠好，也装进了那只大纸袋，以证明这些是被敲诈的钱，也证明他对俄国佬的敲诈行为毫不怀疑。

习惯搞些恶作剧、玩世不恭的伊戈尔此时却不知

所措，无地自容。

他满脸通红，却始终没有作声。一阵犹豫之后，他还是伸出了那只贪婪的手。他接过纸口袋，把它装进上衣内兜，然后僵硬地转过身，径直朝门口走去。

还在为自己充当了这样一个法官角色而感到可笑的达希西奥紧绷着脸站在那里，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在绅士们眼里，通奸自然是一件非常见不得人的丑事，但它却肯定不如敲诈勒索那样令人愤慨。

在俄国佬走到门口时，达希西奥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你妻子和我不会再见面了。但如果我再收到类似的信件，就要交给警察处理……”

听到达希西奥的话，伊戈尔停住了脚步，但还是没有说什么。他打开办公室的门，踌躇了一下，走了出去。

伊利娜和达希西奥再也没有在东望洋山南山坡的别墅里会面。对于伊利娜来说，这段恋情不仅是自己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而且是自己一生中充满苦涩与甜

蜜的一段经历，当然，苦涩的滋味远远胜过甜蜜的感受。对于达希西奥这位受人敬重的公民、名誉领事、社会栋梁来说，这段恋情只是与其它的几次罗曼史稍有不同罢了，它以自己一时迷恋上了一个40开外、生活经历丰富而神秘的女郎开始，最终又以被女郎那下流放荡的丈夫的卑鄙的敲诈而告结束。

除了富有戏剧性地支付了二万澳门元外，达希西奥坚信伊利娜在这桩肮脏的敲诈勒索案中是无辜的。为了友情，也为了圆满地结束这段恋情，他送给她一只两克拉重的钻石戒指，一朵从玛利娅·马法尔达花园里偷偷摘下的盛开的红玫瑰，并附上一张便条：

“为了永远不可能的爱情。达。”

伊利娜想的可要比这简单的话语多得多。她从中看到，达希西奥并没有把自己同一位流浪在外、陷于贫困中的真正的俄国贵族女人的来往当作一般的逢场作戏，而且，他也承认了她对导致这段恋情结束的那个卑鄙下流的原因一无所知。

她没有流泪，因为事实上她的爱情一直是、也仅仅是——只有上帝才知道是为什么——留给伊戈尔的。尽管如此，伊利娜还是叹了口气，为自己生命中的这段既充满浪漫、又充满罪恶感的恋情的结束，为自己随着那个不负责任、不仁不义、放荡不羁的丈夫

漂泊他乡、贫困交加时所拥有的物质享受的结束而感到一点沮丧。

在伊戈尔花光了伊利娜不知道来历的那二万澳门元、纠缠着企图卖掉这颗他不知道来历的新钻戒时，伊利娜像对待那颗家传的大钻戒一样，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

（伊利娜没有告诉过他有关钻戒的事，伊戈尔也从来没有问起过。）

37

那段短暂的插曲，在战争年代的捉襟见肘的日子里，确实使伊利娜在澳门的生活达到了相当宁静、甚至是高雅的（对于她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水准。她不用去为那点几乎发霉的面包，为那点质量很差、甚至还掺着沙子的大米，为那些难以下咽的食品去排那长长的队伍，而且，还奢侈到拥有两辆私人小车，还能去商品价格令一般人望而生畏的黑市市场。可是现在，伊利娜又要艰难地去适应仅仅依靠那几个无精打采、心不在焉的学生付给的那点微不足道的工钱和丈夫时有时无的那点补贴的三等公民的生活。

她遵循基督教的教义，想方设法使自己能随遇而安，因为还有许多人的生活远不如他们：数不清的中国人处在饥寒交迫之中，他们带着衣不蔽体、蓬头垢面的孩子沿街乞讨，由于严重缺少营养，他们要么骨瘦如柴，要么全身浮肿，要么遍体鳞伤，实在令人同情。

凌晨，警署的车子继续沿街收着尸体，而在澳门作暂时“休整”的日军军官们在澳门最豪华的天窗夜总会和国际大酒店的酒吧里搂抱着妓女和舞女，尽情地寻欢作乐。

就连贝格·贝姐也猎获到几个日本小军官。他们只想品尝一下这个高大的欧洲女人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新的刺激。

伊利娜却丝毫没有怀念自己的那段被迫无奈的歌女生活。

与丈夫相反，她从来没有迷恋舞台、表演、舞池和被别人追随的彩色光环。她不喜欢招引别人的注意，一旦发生这类事情，她就会感到不知所措，甚至感到内疚而自责。

因此，伊利娜为自己能用既令人尊敬又不必抛头露面的法语私人教师的工作来代替那短暂的光彩照人的歌女职业而感到心满意足，尽管她的五六个学生成

天浑浑噩噩，难以掌握那些不规则动词的用法和高卢人的繁杂多变的法文句法。

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学生由于成绩不佳，一个个中断了学习，而她再也没有找到新的学生。尝过贫穷滋味的伊利娜，决定重新登台。好在现在还在夜总会乐队里既能组织又能表演、近似于一名专业导演的伊戈尔也鼓励她重新登台。他倒不是愿意夫妻双双工作在一起，而是为了让她去挣些即使是少得可怜但也能贴补家用的钱。家里始终入不敷出，尤其是现在失去了达希西奥的那些尽管有时显得高雅得配不上用场的慷慨的礼物后处于艰难的困境。

他们也不知到底多久没有支付房租了，不仅欠了仁慈堂的债，也欠下了一些不了解他们底细而轻率地借款给他们的债权人的钱。但他们终于在动荡不安的澳门熬到了1945年上半年，熬到了战争的结束。

还

魂

曲



第八章

美国大兵酒店

1

像千千万万其他人一样，日本投降给地狱中的奥斯特拉科夫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在那激动人心的时刻，伊戈尔兴奋不已，这倒不完全是因为远东民主获得了胜利，民主并没有令他兴奋，他兴奋的是自己可以回到上海，可以拥有战前的那种舒适的生活。

伊戈尔好不容易筹集到去上

海的费用——他在澳门交易所的信誉不佳。他本想自己单独回去，先打听打听那里的情形怎么样，可是夫人一反常态，不同意他的意见。女人的生活应是在上海，不管那里的情形如何，他们二人也要同甘共苦。伊利娜坚决拒绝留下。

于是，伊戈尔尽管心里不痛快，但还是拼命设法筹足两人的盘缠。他变卖了夫妇二人仅有的一点家产，甚至卖掉了那位原房主留给仁慈堂的遗产，加上从贝利阿切夫那里弄来一些来路不明的钱，终于凑足了两张去上海的船票钱。

伊利娜激动地告别了贝格·贝姐。她们谁也没有提及达希西奥。伊利娜带着苦涩，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期盼，就这样离开了澳门。

2

尽管如此，他们还算是幸运的。

法兰西酒店曾经被日本军占领，并被作为日军指挥部和军官宿舍。军官们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和严肃的纪律，所以酒店没有怎么被糟踏。

酒店倒是在后来日军投降后每况愈下，简直被弄

得面目全非。国民党军队也把它当成了指挥部，然而他们的自由散漫、野蛮霸道和不拘小节的陋习在短短的时间里都暴露了出来。

法国租界刚刚恢复，酒店便被收了回来，重新由伊戈尔掌管。这个在日本投降后的几个月中被糟踏得不成样子的酒店，伊戈尔也只能是依稀可辨。

尽管如此，伊戈尔毫不气馁。

根据自己在东方生活的经验，伊戈尔明白，不能对国民党军队对占领和毁坏酒店作出赔偿抱有任何希望。于是，他把要求日本人补交租金的申请送到了美国驻东京的领事馆。

果然，伊戈尔成功了。他信心百倍地投入了重建法兰西酒店的工程。

伊戈尔利用战前在当地享有的声誉，很快在当地筹集到一部分贷款，又得到了一部分在日本人占领前后都没有流散的员工的支持，巴黎咖啡厅重新开始营业。但是，只有一个小歌厅，还有几个房间，里面只配有被国民党军队糟踏剩下的简陋的家具。

真是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然而，不管怎样，起码酒店还在。

当然，它已是今非昔比。

供货渠道已被破坏，各种原料奇缺。

餐厅首席厨师阿尔方斯没有回来，伊戈尔已多年与黑市失去了联系，人们不愿意接待他。战前酒店的老客人也不见了。国际租界已不复存在，外国殖民地还没有重建，现在只有法国租界刚刚艰难地恢复。

现在酒店的营业简直无法和战前相比。过去光顾酒店的那些社会名流，那些善于品尝酒焖子鸡的美食家以及那些钟情于咖啡厅舞女的客人，都已经不再露面了。

今天的客人与过去的客人全然不同：他们是些年轻、有钱、爱说爱闹的人，主要是在上海度假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海员和驻日本的美军大兵。他们来到酒店，与其说是来享受 1935 年的法国布尔戈尼红葡萄酒，还不如说是对这里的姑娘和烈酒更感兴趣。不过，这些人倒是舍得在咖啡厅花钱，也愿意为歌女们掏腰包。因此，这里的姑娘们现在倒是前所未有的忙碌。

“巴黎咖啡厅的生意和战前完全不同了。”伊利娜叹息道。

“我倒觉得不错！”伊戈尔却这样说。他正暗暗庆幸美国大兵们在他这里挥霍钱财。

“那还不是些只知道玩弄女人和饮酒作乐的粗人。”伊利娜用几乎能让自己听得见的声音说道。

“可他们比其他任何人都舍得花钱。”丈夫补充说。

事实确是如此，那些被姑娘们称作大兵的年轻人对女人和烈酒仿佛永远都贪得无厌。当然，伊戈尔费尽心机从黑市上弄来的烈酒在这里卖出去的价格是原价的好几倍。根据这群新客人的喜好，伊戈尔索性把咖啡厅改名为“大兵厅”。

尽管战争刚刚结束、存在着很多困难，奥斯特拉科夫夫妇还是把酒店的客房重新装修了一遍，在把自己的公寓安顿好后，便开始了酒店经营方针的调整。过去让姑娘们随嫖客去其它酒店或其它的什么临时住处，而自己的酒店却空闲着，白白地让大量的钱财流走，这简直是愚蠢之举。

现在，只要酒店有房间，便禁止姑娘们随嫖客出去，而且，“暂住房”的价格也大大地提高了（实际上法兰西酒店现在也没有其他客人住宿）。

伊戈尔的利润在不断地增长，但酒店的层次却在不断下降。

3

伊利娜为此而感到烦恼。

他们在短时间内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总算可以为

熬过艰难战争时期而喘一口气了。然而，伊利娜并未觉得轻松，相反，她为这些利润、这些钱财的来源而焦虑。

丈夫不让她插手酒店的业务，说她的任务就是呆在家里，法兰西酒店的管理只由他一个人负责。因此，她从不去现在改名为“大兵厅”的巴黎咖啡厅，但她也不可能没有感觉到它的层次的下降。

伊利娜从此一心一意管理好家务。由于伊戈尔还像过去一样慷慨大方，她便渐渐沉浸在经济条件允许范围内的享受之中。再说，上海的市场供应也渐渐恢复了正常，她为家里添置了新的家具、窗帘、瓷器、水晶制品、德国的施奈德银制餐具，还雇了两个女佣和一个男佣。

伊利娜的衣柜里当然也增加了不少新的衣服。尽管伊戈尔并没有痛痛快快地答应，她还购置了一些首饰，以补充在战争年代的漩涡里流失的那些首饰。

尽管如此，伊利娜并不真正感到幸福。现在他们在经济上是宽裕了，但过去的那些社会交往活动没有了，如“国家俱乐部”的晚餐，网球场上的比赛，以及和欧洲朋友们聚会的欢乐。

伊利娜感到他们夫妇俩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社会的重视。不管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她都把它归咎于酒

店营业道德水准的下降。

无可奈何的伊利娜把自己的爱好全部转移到集邮上。

4

另一个忧虑也使伊利娜对生活感到压抑。

这一次，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盲目。他们发现政治地平线上重新出现了乌云，并且越积越厚。

日本人的投降并没有结束中国大陆激烈的动荡。

国内战争加剧，解放军步步逼近，国民党士兵要么开小差，要么投降，官僚买办阶级既要对付其它阶级又要继续自己内部的你争我夺。传到上海的消息真是五花八门。

共产党的各种组织的成员在暗中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控制了广大的农村，还深入到工厂组织罢工、停工，破坏生产，预告旧世界的灭亡。

不过在美国大兵酒店（当然其正式名称还是法兰西酒店），人们的生活还仍然是热烈、疯狂、无忧无虑的。

商品流通已经恢复了正常，上海这座城市的脉搏

跳跃得欢快而热烈。

“大兵厅”的歌女们个个年轻漂亮、妩媚动人，个个迫切想挣钱；大兵们人人身材高大、体魄健壮，个个目标单一、慷慨大方；而租界区的警察对大兵们并不苛刻，对卖淫嫖娼的事也装着没有看见。

法兰西酒店越来越堕落，伊利娜为此越来越忧虑。

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这种不顾廉耻、不讲道德的现象，与伊利娜所受教育中的社会和家庭的价值观、行为举止的准则、宗教信仰的标准是完全格格不入的。更让她感到痛心的是，他们在新形成的欧洲人的社团中不再受到尊敬和关注。

尽管他们也参加了红十字会和宗教团体组织的为救助战争难民的慈善活动，但伊利娜感觉到了人们在接待他们过程中的那种谨慎的态度。她为他们被本属于他们的社团生活排斥在外而惋惜。

伊利娜为此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因此，她默默地抵制着，拒绝再去“大兵厅”，整天把自己关在集邮的天地里。

伊戈尔对妻子的反对态度毫不理会。相反，妻子不在身旁，他更加可以随心所欲，更可以尽情地亲自检测那些纷纷涌向酒店的歌女们的天赋。

德西雷·迪厄多内出乎意料地来到上海。他显得老多了，也胖多了，但对夜总会里的中国姑娘们却格外痴迷和疯狂。

他是来征收自己的股份红利的，但对伊戈尔重新装修酒店所作的努力和将他的到期的或在期的股份红利又作了投资的做法给予了理解。

不过，他愿意用最好的价格清算他的那些股份，从而来结束他的酒店营业生涯。他已经卖掉了西贡和努美阿的酒店的股份，现在只剩下新喀里多尼亚的椰肉干农场，战争时期他一直生活在那里。

那块殖民地当时也加入了戴高乐的自由法兰西运动，而战争的需求却给这块土地带来了繁荣。他轻轻松松地发了财，最后与一位肥胖的法国当地混血女人结了婚。那女人尽管没有给他生下一男半女（或许还没有到时候），但倒也给他带来了幸福。

现在，德西雷·迪厄多内只想返回法兰西度过余生，为此，他正在物色一位能够管理农场的人，现在的这一位既无能又懒惰。

他希望来看看自己在年轻时代曾经生活过的上海。然而，现在的上海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上海了，它的前景令人感到一片黑暗，东方的巴黎正在军队的包围和共产主义思潮中挣扎。

那么，伊戈尔又想如何干下去呢？

的确，伊戈尔还没有好好地考虑。

伊戈尔尽管也感觉到了他的这种生活面临着威胁，但他还是像以往一样盲目乐观。他相信，国民党军队即使在节节败退，但在强大的美国战争机器的支持及原子弹的新的威力下，他们一定还会重新部署，决不会让那些破衣烂衫的赤脚军队有喘息的机会。

可是，他又能干些什么呢？

战争卷走了一切。他失去了财产，现在也只能是在修补战争的创伤。

除此以外，他没有能让自己落脚和保护自己的祖国。

这位俄国流浪者只好耸耸肩膀。唯一可行的办法便是等待和观望。尽管如此，他还是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尽可能地安排好眼前的生活。

德西雷先生向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想不想去他的农场担任管家？与现在的那位长得獐头鼠目、整天有气无力的管家相比，他对伊戈尔充满信心，这在酒

店经营中已经得到证明。有了伊戈尔，他德西雷先生就可以在法国南部舒舒服服、悠闲地过自己的日子，毫不费力地获取利润。新的管家一定能完全保证他的生活。尽管那里的住宅不算太舒适，但只要有个女人收拾收拾就行了。那里的气候也不算太坏，生活也不困难。不过，那里的女人的确比不上上海的“蝴蝶”们妩媚，但她们个个百依百顺，极易得手。当然，凡事总有得有失，各有利弊。

伊戈尔答应德西雷考虑考虑，但请他不要把此事告诉伊利娜。

过了不久，伊戈尔对德西雷的友情和所给予的机会表示感谢，但认为现在放弃盈利甚丰的酒店不合时宜，也对双方不利。对于他来说，应当充分利用有利的潮势。

伊戈尔再一次表示了感谢，并保证，如果上海形势恶化，他肯定会接受德西雷的好意，无论担任什么职务，总会尽一切努力把他的农场经营好。

说罢，伊戈尔和德西雷一人拉走了一位温柔可爱、细声细语的中国姑娘。

6

上海的生活继续动荡不安：从四面八方传来各种各样的消息、流言，在人们当中流传，工厂里经常罢工，银行里不时被抢提存款，政治谋杀、抢劫的事件时有发生。

“大兵厅”里的姑娘们一如既往地引诱着自己的客人，一杯又一杯地要着威士忌或者其它价格昂贵的酒。一旦时机成熟，便领着客人来到酒店高层的房间小憩。当然，除了收取她们个人的钟点服务费之外，房价几乎比一整天的还要高。

可惜，伊戈尔对军事和政治形势的乐观的预计并未能实现。毛泽东的军队尽管衣衫槛褛，但目的明确，纪律严明，把国民党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这在比较富裕的人们中间引起了恐慌。

上海发生的事件接连不断，天空布满了乌云。

银行提空，外汇流失，货币贬值，外国人纷纷撤离，所有这些，加剧了老百姓的惶恐不安，也影响到了伊戈尔一贯的乐观。

和伊戈尔相反，生来就有着斯拉夫人忧郁性格的

伊利娜早就对动荡的局势焦虑不安，她也不想掩饰自己的悲观情绪。

再说，她深知法兰西酒店的经营道德已经堕落到几乎像一个临时客栈的水平。毫无疑问，极端民族主义和左倾主义的政权对一个旧沙皇军队的反动军官、因厌恶兄弟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政权而移居上海、依靠剥削和蹂躏那些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腐败堕落的恶习中苟且偷生的中国姑娘而发财的伊戈尔是不会好好相待的。

尽管这样，伊戈尔还是犹豫不决。

酒店以临时租用客房、使用卫生和化妆用品为由增加提成，引起了夜总会姑娘们的不满。她们决定罢工，以示抗议。这一事件倒促使伊戈尔拿定了主意。他以比实际价格低得多的价格把酒店卖给了别人，寄走了德西雷应得的部分，把所有的财产尽可能地兑换成现金，带上了伊利娜的首饰和邮票，带上了银制餐具，乘上了满载不同肤色的难民的“海上使者”号前往香港。

这是 1949 年的夏天。

还

魂

曲



第九章

堕入地狱

1

伊利娜喜欢坐在房间外面的大阳台上。这个房间是习惯于大手大脚花钱的伊戈尔在佳景酒店订的最佳位置的客房。

她坐在那里，喝着茶，吃着烤面包片，一面欣赏着眼前美丽的景致，悠闲地度过下午的时光。

她仰靠在带轮子的软椅上，两眼透过阳台庄重和谐的拱门，凝视着远方那平静的世界。蔚蓝

的海水仿佛与天空连在了一起，远处是那层次分明的岛屿。

晴天，从这里看到的景色就像一面扇子在眼前展开。近处，妈阁山头清晰可见；远处，可见那雄伟的大屿山以及隐隐约约的太平山顶，直至湾仔的小山头；海面上布满无数的小岛（这些小岛仿佛是谁无意中种下的，只是为了告诉人们岛上面是天，岛下面是海），氹仔岛上的山坡犹如龙脊蜿蜒，旁边隐现的是那深绿色的路环岛。

从佳景酒店往下望去，茂盛的金合欢和万年青簇拥着的民国大马路蜿蜒在西望洋山下，通向当地土生们的一座座小楼。

总督官邸圣珊泽犹如一副淡粉色的水彩画镶嵌在郁郁葱葱的半山坡上。

再往前，妈阁山披着绿装，镜子般平静的海水映照着它那婀娜多姿的身影，从而勾画出了这座城市的南端。

伊利娜对这里的景色百看不厌。

这景色能使她回忆起多少年前在克拉斯诺—彼列科普斯克度过的那段非常相似的日子。在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那里，祖父祖母也拥有一座庄园。

然而，她脑海中的这些星星点点的回忆，都是属

于过去，属于那个遥远时代，有时她不得不怀疑到底是否真的存在过。不过，当穿着白色长褂、黑色裤子的中国佣人给她端上那杯琥珀色浓茶时，她的思绪更加翻腾起来。虽然这茶杯和祖母的大茶壶不同，但足以让她暂时想起了古老的奥尔科夫的大宅院中那倍受呵护的舒适的生活，想起了那位对伊戈尔·瓦希利维奇抱有无望的爱恋的马德莫依塞尔·克洛迪娜·阿乌贝格·迪朗的那些法语课，想起了花园里绿草坪上的网球赛，想起了周末的家庭聚会以及一个个学习骑马的下午。

过去的画面一个接着一个地在伊利娜的脑海中闪现。她竭力想把它们留住，可它们犹如飘浮不定、正在消失的烟雾，那只是些对过去的金色时光的美好回忆，它们存在于那个遥远的时代，一个几乎和现在的自己的周围毫无联系的世界，城里铸造厂的工人们和奥尔科夫大庄园的农民们如何表示他们的不满，那突然而至的风暴如何将她卷进了另一个世界和另一种生活漩涡、最后把她带到了眼前的这个庄重宁静的带有拱门的大阳台。

由于从中国大陆逃来的难民日益增多，香港当局限制他们在香港停留。

于是，他们决定再一次留居澳门。不知是出于仁

慈还是由于考虑不周，澳门接纳了所有到达这块弹丸之地的人们。挥霍成性的伊戈尔挑选了佳景酒店里的这间最好的房间，这正是伊利娜上一次就曾经想住的房间。

这是一个一面朝南一面朝西的套房，有一个大阳台，从这里可以眺望外面的美景。

丈夫曾解释说，在他收到迪厄多内对他请求去农场或做其它工作的答复之前，他们只是暂时在这里居住。

过了一段徘徊不定的日子，伊戈尔明白了澳门的疲软现状无法让他再开创上海那样的生活。

重新经营酒店纯属非分之想。弹丸之地，经济萧条，旅游业没有任何前途。原有的大酒店，如中央酒店、利维旅酒店、国际酒店以及他们现在住的佳景酒店住客率也很低；另外，那些无数的小酒店和中国式的小客栈足以满足了旅游业的需要，满足了从香港来澳门赌场的那些常客的需要。

由于在香港的花销太大，伊戈尔的经济状况已不允许他再有多大的建树，再说，他在当地银行的声誉也不怎么好。

他不可能再对酒店业有什么兴趣。

伊利娜为丈夫的决定而感到轻松。她正担心伊戈

尔再次卷入酒店行业。法兰西酒店的腐败让她想起来就不是滋味，无论如何，她都不愿意让他在澳门再做这种生意。

然而，迪厄多内先生的答复也并不令人满意。

迪厄多内告诉他们，可以将伊戈尔“安排”在庄园工作，但根本不存在安置夫人的可能。那里的住宅已年久失修，无人照管，最后一位管家与当地的一个女子结了婚，把住宅弄得更无法让人居住。最好是伊戈尔先生先去看看因为那里的气候状况，还有现在正流行疟疾的情况肯定不适宜夫人。最后他建议在伊戈尔去那里考察工作条件时，夫人留在澳门。回信的结尾还再次表达自己对他们夫妇的敬重、崇拜和关心。

伊利娜不愿意看到夫妻分离的字样。她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和情感方面的影响是要永远伴随着丈夫，共同去承受新生活的甘苦。

伊戈尔表现得心情沉重，起码不能让妻子怀疑是他与迪厄多内合谋想将她撤下。但是，他又清清楚楚地让妻子明白，在对起码的工作条件没有把握之前两人一同前往是愚蠢的行为：这意味着要白白花掉一笔本可以不花的钱。最好的办法是妻子继续住在这还算舒适的佳景酒店，由自己去新喀里多尼亚，弄清那里的生活条件，把住宅进行适当的修缮，到那时再把她

接去。

伊利娜尽管不愿意，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妥协了。

这是他们夫妻第一次分离。伊利娜虽然很不情愿，但她也承认丈夫说的也有道理。再说，她身体不算健康，脆弱的心脏也不允许她有多大的付出，还有，那里的热带气候是那样恶劣。或许这样才是最好的办法（她从心里承认）。

伊利娜从未想到过去市政厅那座古老的图书馆里寻找一些资料，了解新喀里多尼亚的气候和生活条件。然而，正是在那块她轻易听信了别人后以为是艰苦的土地上，安稳、健康地生活着三十多万欧洲人。

伊利娜无可奈何地同意暂时留在澳门，但她建议搬到其它便宜一点的酒店或换一间一般的房间。然而，伊戈尔却坚持要她继续住在这套房间里，享受眼前的优美风光。

最终，她也接受了丈夫的意见（几乎像誓言一样），只从夫妇俩在大丰银行里的共同帐号中取出飞机票钱和到新地方所必须的费用。就这样，她感到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因为，如果她不能马上去的话，丈夫还会给她汇钱，足够她维持现在这样的生活。

伊利娜在佳景酒店居住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她的预料，也肯定比她所希望的要长得多。

从伊戈尔那里传来的消息并不令人振奋。那里的气候特别差，疟疾肆行，农场位于岛的边缘，根本没有安置她的必要条件。她最好还是继续留在澳门，等待形势好转，等待生活条件的改善，或者等待寻找更好的工作。尽管如此，他还会继续给她汇来相当的费用。

那是1950年的澳门，夜幕像天鹅绒般地静悄悄地向它降临。

太阳从金红色的彩霞中消失了，大横琴岛和小横琴岛只留下黑糊糊的身影，犹如日本的版画；天边，粉红色的霞光渐渐变成几乎看不出来的蓝色。海湾浅水区的水面仿佛如一面银色的镜子，而巍峨的大屿山在灰白的天空下变成了深紫色的一抹。两只中国帆船，扬着两片由多块布缝制而成的深色大帆，在海面上缓缓航行。

伊利娜叹了一口气，起身去用晚餐。

就在这同一时刻，在新喀里多尼亚农场那舒适的办公室里，精神抖擞的伊戈尔正在给伊利娜写最后一封信：

亲爱的伊利娜：

我真不知道如何下笔……

伊利娜是在仁伯爵医院急救室的病床上醒来的。一阵阵痉挛仿佛要把她的五脏六腑全部撕裂，嘴里喷吐着灌入胃里的液体，整个身子都在承受着这种痛苦的煎熬，以此来换取她那并不期望的生命。

是每天早上打扫房间的阿珍由于着急和好奇而救了伊利娜。

阿珍是因为伊利娜的拖延会影响她这天上午的工作安排而着急。她第一次敲了伊利娜的房门没有听到回答，便转身去打扫同一层的另外两个房间，然后又回到伊利娜的房门前再次敲门，还是没有回答，她便轻轻推开房门。

她见伊利娜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姿势有些异常，床上放着一封信，旁边大理石桌子上放着一只开着盖的装安眠药的空瓶，还有一个只剩下一点水的杯子。

阿珍生来就十分害怕看见死人。她一下子惊惶失措起来，扔掉手中的扫帚，也忘记了应该走工作楼梯，而是慌慌张张地沿着铺地毯的主楼梯跑了下去，一边尖叫着经理的名字，结结巴巴地说四号房间的夫人死

了。

严厉的经理一边阻止了阿珍的叫喊，一边赶紧来到伊利娜的房间。他摸了摸伊利娜的脉搏，仿佛已经不再跳动。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凭他的一点知识和本事还不能作出判断。他又把手放到伊利娜的鼻子跟前，似乎觉得已没有多大希望了。

但他还是想起了自己毕竟是经理，不能乱了方寸，必须管住那些在门口好奇窥探的下人。

他厉声训斥道：

“你们就没有事干了吗？赶快去干活！”

经理随后给医院打了电话，说明了情况，要了一辆急救车，因为客人还活着。

为了不惹上麻烦，他又赶紧把这里发生的一切通报了治安警察署刑事侦察处的埃斯塔尼斯劳·德尔加多中尉。

当时仁伯爵医院门诊部不算太忙，值班医生正在心不在焉地阅读澳门日报。

值班医生来到酒店，立即给还有呼吸的伊利娜打了一支强心针。他看到了装安眠药的空玻璃瓶和那杯子里喝剩下的水，知道了扔在床上的那封信的内容，回到医院后，给伊利娜进行了彻底的洗胃。

为了防止女人心脏病发作，值班医生将她安置在

一间一级病房，他认为本来就住在澳门最豪华酒店之一的这位外国女人是有条件接受的。

拥有单独卫生间的小病房干净、舒适，油漆地板光滑锃亮。病房朝西，从那里可以眺望从东望洋山向大炮台延伸的澳门城市，耸立在大炮台山顶上的17世纪古老、庄重、安全的城堡，在炮台山到望厦山之间的大片农田形成的穷人住宅区，海峡对面只有少数渔民村庄的光秃秃的湾仔，拱北那边中国人的大片水稻田，以及远处像半圆型舞台的布景一样环绕澳门岛的一座座深蓝色的山峰。

伊利娜躺在病床上。床单虽然布料粗糙，却洗得干干净净，两个枕头把她的脑袋微微托起。尽管她平日里非常喜欢欣赏远处的景致，现在却毫无心思。技术高超的医生虽然能使她死而复生，却无法医治她的心灵，即使医院病房管理处的那位瘦小和蔼的修女本温达的悉心照料，也无法给予她任何安慰。

伊利娜把脸转向窗外，但她丝毫没有看见大炮台山上的那座对古老的望德圣母堂没有起到任何保护作用的深色的城堡，两行热泪倒顺着苍白的面颊流了下来。

上帝甚至连最后时刻的安宁都拒绝赐予给她。伊利娜极力不让自己再想什么。要能睡着就好了！啊，仅

仅只要睡着觉……

3

正是那对于能睡着觉的渴望、对令人欣慰的忘却的寻求，使她作出了绝望的举动，犯下了一个几乎无法挽回的错误。

伊利娜是在下午收到那封信的。像往常一样，她坐在阳台上的带轮椅子上。

起初，她还没有体会到这封信给她带来的全部打击。

只是在第二遍看完信时，伊利娜才惊恐地明白了伊戈尔要与自己彻底分居。无论根据澳门实行的葡萄牙法律，还是根据新喀里多尼亚实行的法国法律，他们的宗教婚姻是绝不能离婚的。

伊戈尔的信不长，只是阐述了一些理由。他说他对自己作出的决定感到痛心，但生活逼迫他们从感情上分离（——这不是真的，这不是事实，伊利娜默默地抗辩着）。现在他已遇到了另一个女人，他准备和她一起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那么我呢？！我怎么办呢？！伊利娜内心无声地呐喊着）。不过，他还会根据

自己的条件继续给予她经济上的支持。他请求她原谅这一切，并祝愿她幸福。

信掉落到伊利娜的胸前。她僵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声不响，眼里没有掉下一滴泪水。

（——这是怎么回事？我的上帝，这是怎么回事？现在我怎么办？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随着伊利娜越来越清楚事情的严重性，她的呼吸也越来越急促。

孤独、绝望的感觉从她的内心深处渐渐升起，变成了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她感到一阵恶毒的阴风悄悄向她袭来，一股毒液仿佛注入了她的心灵，慢慢地、无情地侵蚀着她的整个身躯。

她的生活道路真是坎坷不平，好一段，坏一段。然而无论如何，始终有人在她身旁支撑她。失去了父母后，还有祖父母；俄国革命后，失去了祖父母，但还有伊戈尔，在澳门，在战争期间，他一直守在她的身旁。即使在那最难熬的黑暗日子里，即使他是那么轻浮、放荡、不负责任、自私自利，可他毕竟是她的支柱。就连他在困难的日子里对一位平常只能弹奏巴拉莱卡琴的女歌手所表现的那种轻佻举止，也使她对未来有了信心，相信将来的生活一定不会像当时那么困难，生活一定会继续。不管怎样，伊利娜总会摆脱斯

拉夫人特有的烦躁和郁闷的心境。

可是现在，现在怎么办呢？就这么被人抛弃啦？

4

夜幕降临了，男伙计推开了一条门缝，用蹩脚的英语问道：

“夫人，用晚餐吗？”

“不用。谢谢你……”

伊利娜呆呆地站在房间里，凝望着窗外，但再也看不见那往常令她安宁的万盏灯火，再也看不见从东望洋山灯塔中射出的那划破整个夜空的光束。外港码头的一块块填土工地，勾画出这座城市周边的南湾大街和民国大马路，还有妈阁山旁军事俱乐部的微弱灯光，都不能在她眼中出现。

不但绝望和痛苦的心情缠绕着她，现在一阵阵的头痛又使她不得不憋住呼吸。脉搏的每一次跳动，都像一个被残暴的权贵操纵着的铁锤重重地敲击着她的脑袋。

如果能睡着就好了！哎，只要能睡过去就好了……！

她脱掉鞋子，和衣躺到床上。她一心要让自己睡着，几乎到了失去理智的地步。她需要睡着，或许睡完一觉醒来，她的生活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漆黑，像现在这样令她害怕，像现在这样绝望。或许，天晓得，就不用醒过来……不再醒来……

在绝望中瞬间闪现的这个无形的念头渐渐有了一个轮廓：没有任何痛苦地睡过去，任其做一个美梦，将自己沉湎于这个能使她忘记一切的夜晚，不再醒来……

伊利娜拼命想理清自己的思路。刚才的想法简直是发疯了，简直是罪过。是要睡觉，但睡觉是为了明天再面对这种局面。

她感觉到心脏跳动异常，脑袋还是随着脉搏的跳动和思绪的变化而一阵阵剧烈地疼痛。

“我必须睡觉……”

她从床上爬了起来，光着脚来到洗手间，找到了安眠药瓶，倒了一杯水，回到了床上。

她吃了一片药，一动不动地仰面躺在床上，紧闭着眼睛，期待着药片能发生作用，再没有理会身旁的信。

然而，一切依旧。

痛苦、恐怖和孤独的感觉再一次向她袭来，绝望

涌上她的心头，随着不均匀的心跳，又是天崩地裂的头痛。

尽管不符合用量说明，她又吞下了两片安眠药，随后回到床上僵直躺着不动，拼命地不让自己再去想什么。两片安眠药……不，加上第一片一共是3片……而她的心脏已经如此的疲惫……失去了祖父母，上帝呀，我怎么3片安眠药还是睡不着……难道就再也无法睡着了吗？……她抬起头，抓住药瓶，把剩下的药全部倒在了手心里。她看着手心里的药片，想到会不会由于吃了这么多的药而引起心脏病发作致死，致死……

这些话到底有什么意思？死亡早已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伊利娜非常想知道那无法证明但可能会造成的后果。

或许真的会睡上一觉……或许真的不再醒来……也不一定真的会那样不幸……

伊利娜将剩下的四片安眠药全部扔进了嘴里，用杯子里的一大口温水吞了下去。

她把脑袋倒在了枕头上。也不知道为什么，她的眼前突然出现了祖母的身影，祖母严肃地端坐在奥尔科夫府第大厅里的晚餐桌旁，身上穿着那件高领子的黑色丝绸连衣裙……

但是，伊利娜没有看见伊戈尔的身影。

5

泪水顺着伊利娜苍白、憔悴的面颊静静地流淌。她既不想遮掩自己悲伤的心情，也无心去擦干这止不住的辛酸泪。倒是亲切和蔼的本温达修女来到她身旁，替她擦去了脸上的泪水。

修女用不太熟练的英语安慰着她：

“怎么样，好点了吗？生活并不像你所想象的那样残酷。上帝在没有给你打开窗子的时候是不会把门关上的。等着吧，一切都会好的……”

修女虽然不了解眼前的这个已不算年轻的女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幸，但看到她走到如此绝望的地步，便可知她是何等的痛苦。

修女只知道这个女人是个外国人，一个俄国流浪者，这是医生告诉她的。她不知道这个俄国女人信什么教或者是否信教，但在眼前这种情况下，那些都不重要。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子孙，而那些由于无法理解和不便问及的原因走上迷途的人们更加令人关爱。

本温达抚摸着伊利娜的手，用和蔼的语气问道：

“我能帮助你吗？”

伊利娜勉强微笑着回答说：

“我想找一个神父谈谈……”

本温达的话起了作用。

“珀西瓦尔神父正在这里探访另一个病人。我这就去请他过来。”

珀西瓦尔·费尔南德斯神父可是上帝的化身。他身材魁梧、红光满面、诙谐风趣、声音洪亮，特别喜欢喝威士忌，还有人说他那双眼睛见了女人总是色迷迷的。但他却有着优美的嗓音，仁慈的心肠。

神父已经知道了伊利娜住院的原由，没过一会儿就来了这里。

“这位姑娘在这儿干吗呢？”

伊利娜对眼前出现的这位神父的欢乐情绪和洪亮的声音有点感到意外。在她眼里，这位神父并不是她想象中的能治疗心灵创伤的人，更不是她现在所要寻找的神父。然而，珀西瓦尔神父已经抓住了她的手，毫不客气地在床前坐了下来。

“你别怕我。实际上我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粗鲁。有时候，我正是某个病人心里所寻找的人。”

神父的话令伊利娜不知所措。她原想拒绝他，可是神父那开朗直爽的态度就像某一位她从未有过的兄

长或朋友，能让她信任，或许，谁知道呢，还能得到他的保护。

这种印象和感觉使伊利娜感到自己更加懦弱，不由得又一次热泪盈眶。伊利娜用另一只手擦了擦眼泪。神父马上放低了声音，和颜悦色地问道：

“姑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如果这么哭下去，也会传染给我。我要是放开嗓子一哭，就会吵醒这层楼里的所有的病人……你看，我可是个爱哭、会哭的人……”

尽管珀西瓦尔神父的英语别人一听就知道是半路出家，伊利娜听了不得不露出了微笑。

“先生真的是神父？你是什么教派的？”

“哦，我的女儿，我是一位不循规蹈矩的神父……”

男人说着发出爽朗的笑声，不由得让伊利娜感到心里涌进一股暖流。

伊利娜沉默了一阵，低声问道：

“你能听我忏悔吗？”

神父立即严肃起来，用低沉的、平静的、父兄般的语调回答：

“当然啦。”

伊利娜真不知道从何讲起。过了一会儿，她用喃

喃喃自语般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向神父讲述了自己主要的生活经历。

这次的忏悔不同于珀西瓦尔平常所进行的忏悔。在心灵之窗打开之前，女人的叙述与其说是忏悔还不如说是心理医生的心理分析。

神父全神贯注地听着，没有任何插话。

伊利娜讲述了自己的童年，自己与伊戈尔的爱情，自己如何受到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冲击，如何失去祖父母，以及自己在巴黎和上海的流浪生活；她讲述了太平洋战争中自己如何逃难，以及在澳门的艰辛生活。虽然有些犹豫，她还是简要地向神父坦白了自己与达希西奥那段短暂的婚外恋，不过她没有说出对方的姓名，也没有请求饶恕；她讲述了他们如何回到了上海，法兰西酒店的肮脏生意，最后如何重返澳门。她说，即使有过再多的痛苦和辛酸，有伊戈尔在身旁，夫塌下来也能支撑。无论伊戈尔是多么轻浮放荡，多么的不愉快，当然他几乎始终是乐观的，也常常能改变伊利娜过分忧郁的心情，使她感到生活的艰难要比实际程度轻一些，容易忍受一些。可是现在他抛弃了她，她感到绝望了，不会再有什么未来。因此，她痛苦到了极点，作出不理智的举动。虽然是不理智的，但她只想在那个漫长、寂寞、孤独的夜晚得到安宁。然而，可

惜的是，自己连这一点都未曾得到，现在又担心会再次去做那样的事。

难道上帝也要抛弃她？难道就不能得到饶恕？

在讲究实事求是、性格乐观的珀西瓦尔眼里，伊利娜的忏悔中出现的神学和心理学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她现在需要一位更加精通神学和心理学的人，而他不管在神学院的哪一科，都算不上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他自知知识有限，只能承认事实。

于是，他只能用极其简朴的、平静的、充满怜悯的话语。然而，不知为什么，这些却正是伊利娜所需要的。

“我的女儿，我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也有过错的小神父，知识浅薄，对神学和人类心灵的奥妙并不精通，甚至对人生的领悟也并非透彻。但是上帝是最能理解人的，它不会让你处于这种绝望的境地。另一扇门会朝你打开的……”

伊利娜心不在焉地听着，眼睛里充满了泪水。然而，神父那乐观、低沉的话语与窗外对面湾仔的昏暗及整个夜晚的宁静交融在一起，起到了镇静和麻醉的作用。

“……我也为一些救济难民的组织服务，如天主教福利院，如果需要，我们可以给你一些帮助……”

“谢谢你，神父……”

珀西瓦尔神父为伊利娜作了宽恕。他端详着女人清瘦的脸庞，露出了一个连自己也难以言明的奇怪表情。然后，神父在女难民额前吻了一下，吻得那么自然，那么纯洁，连伊利娜也没有感到有任何异样。她只把她当作是一位能呵护自己的兄长的吻。于是，她又用几乎只能让自己听得见的声音说：

“谢谢……”

6

伊利娜的苦难并没有就此完结。

第二天，伊利娜出了医院回到酒店。身着黑色西服的值班经理在交给她钥匙的时候，脸上堆着尴尬的笑容。他彬彬有礼地通知她不能再住在这个酒店里了，因为酒店员工不愿意伺候一个企图自杀的人，说得明白一点，她是个曾闯过鬼门关的人。因此，希望她寻找新的住地。

伊利娜听着这个要求，没有表示反对。医院用的镇静剂或许已使她变得不容易受刺激。

她请求给自己一个星期时间来寻找住宿的地方，

然后便走到拐角处的大阳台上。尽管外面气候温和，伊利娜还是靠在背风的地方，眼睛呆呆地望着远处的景致。虽然她平日里百看不厌，可现在却什么也没有看见。

她无法让自己静下心来考虑眼前的问题，只好呆呆地站在那里，任脑子里一片空白。

安眠药瓶子已经不见了。伊利娜记得自己已经把瓶子里的药片全部吃光了，再说，她现在也没有勇气再去寻死了。过了一阵，她勉强地思考起来，承认自己确实已没有财力继续在酒店住下去了。

她强迫自己在房间里吃了一点东西，然后躺了下来，等待着能让自己得以安宁的困意。

第二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在这样的天气里，伊利娜可以把自己的情况考虑得更周全些。

首先，她必须弄清自己的资金情况，然后才能见机行事。但不管如何，佳景酒店是不能住下去了。

伊利娜明白，应该找一家比佳景酒店便宜一点的酒店。可是，像澳门宾馆、利维旅酒店这样稍微像样一点的，价格昂贵，她是不能住的；像中央酒店和国际大酒店，她在现在这种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也是不敢去住的。除此以外，就剩下那些中国人开的小酒店、小客栈和小饭店。可是伊利娜认为那都是些既

名声不好又无安全可言的地方，她无法接受。像她现在这种被人抛弃的独身女人（想到这里，泪水又一次盈满眼眶），不能再有什么风险了。

如果能找到一间像她和伊戈尔住过的仁慈堂的那种小公寓就好了，甚至，哪怕从某个正经的家庭里租间房子也可以啊……

伊利娜回想着自己在澳门认识的不多的几个人。她首先想到的是达希西奥，但立即把他排除了。在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她绝对不允许自己去求他帮忙，起码现在还没有到走投无路的时候。

伊利娜尽量让自己的思路停留在对澳门往事的又辛酸又甜蜜的回忆之中。

她始终把达希西奥当作绅士，也希望他将自己当成淑女。她不希望他将自己看作是一个不安分守己的女人，一个实用主义者，一个令人厌烦的人（——我的上帝！），更不想让他以为自己又企图与他重新开始一段在战争时期曾经发生过的既无前途又无任何结果的插曲。她从上海回来后还没有见到过他，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如果遇到他将会是什么情形。

伊利娜又把过去与之有过关系的人数了数，确实少得可怜。在俄国流浪者当中，许多人已经移居到或许更有希望的其它地方，另一些人仍然留在此地生活，

其中有些人生活得还和当初一样贫困。弗拉基米尔·贝利阿切夫曾在市政厅前碰到她时绕了过去，哈南·卡仑斯基，也就是贝格·贝姐还继续靠卖淫为生，生活得比以前更加艰难，更加贫困。想到这里，伊利娜下定决心，不再去找过去的关系。

第二天，她去了大丰银行。然而使她吃惊的是，她和伊戈尔的帐户上只剩下了 8 百多美元，合 4 千澳门元。

伊利娜一时不知所措。忽然，她想起了珀西瓦尔神父，想起了他处世乐观、无忧无虑的性格，想起了他对命运寄予的希望。她来到了位于福隆街上的一座管理不善的楼房，在一层找到了神父的办公室。

神父穿着衬衣，还像平日那样热情地接待了她：

“上帝保佑你。看到你康复真令人高兴，怎么样，一切都好吗？”

“并不像希望的那样好……”

“哦……生活不会总那么艰难的……，请坐，请坐下……”

神父用椅子套拍掉了那张已经快要散架的红木椅子上的灰尘，说：

“你坐下，别害怕，这椅子还经得起。请原谅，这里乱七八糟。你已经看到了，我就是这么个没有条理

的神父。”

神父说着发出了牵动人心的爽朗笑声。

“到底是什么原因把你带到我这儿的？”

伊利娜犹豫了一下，她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利用自己的难题增加神父的负担，可是她又急于要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佳景酒店经理给的短短的几天期限以及神父乐于助人的态度促使她拿定了主意。她用疲倦的声音说：

“首先，我要感谢你的那番话对我的帮助和所起的作用。其次，虽然我难以启齿，可还是要求你再帮我一个忙。”

伊利娜用低缓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向神父讲述了自己所面临的困境。不但是佳景酒店的经理不允许她再住在那里，就是她自己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她住在那里，甚至连稍微像样一点的酒店也住不起。无论如何，她希望租一套小公寓，或者在某个人家里租一间房子也行，房子简陋一点没有关系，只要那家的名声不坏。或许教会和仁慈堂还有这样的地方……

神父全神贯注地默默地听完伊利娜的讲述，想了想说：

“我也不知道是否有空闲的房子。你也知道，大批的难民涌进，都已经都塞满了。不过，不管如何，我会

努力的，总会有办法解决。我在一两天之内给你打电话。”

果然，神父第二天就给伊利娜打了电话，非常遗憾地告诉她，没有找到教会、救济会或仁慈堂的房子，但是他找到了茹韦纳利娅·马尼昂太太。马尼昂太太是一位土生葡人，她的丈夫生前是汇丰银行的职员，她本人是教会热心的合作者，受人敬重。她愿意租给伊利娜一间房子，可以一直住到找到其他合适的房子时为止。

伊利娜立即跟新房东取得了联系。马尼昂太太和伊利娜年龄相仿，长得矮矮胖胖、结结实实，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家庭主妇，在烹调方面是澳门土生中的佼佼者，也是麻将桌上的一把好手。尤其是现在，她独自一个人生活，无牵无挂，更是整个下午整个下午地坐在麻将桌上。

房东愉快地接待了伊利娜，让她看了看房间，告诉她自己是完全因为出于对珀西瓦尔神父的尊敬才把房间租给她这样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住的，再说，她确实也没有什么必要出租房子。有丈夫留下的遗产和那家银行的股份红利，她不需要任何其他外来收入。另外，房子只能出租不长的时间，因为在美国学习的儿子再过几个月就要回来了。尽管这样，可她不能拒绝

神父的请求。伊利娜只需预付 50 澳门元的房租。

伊利娜答应了房租的价格，并表示了感谢，但不好意思打听到底能租给她多长时间。

酒店的帐款多得令她出乎意料，现在的经济状况又一次让她感到惶恐。她让人送来了大箱子，沮丧地开始了新的生活。

7

伊利娜心情沉闷地坐在床沿上，打量着这个小小的房间。

房间要比佳景酒店的房间小得多，而且，窗户是朝着望厦山方向的爹利仙拿街。确实，这是个很简陋的房间。

房间里的家具倒挺干净整齐，说得过去，一切都体现和证明着家庭主妇的精明能干。

铁床架涂上了白色的油漆，同样白色的铁架子上放着一个花瓷洗手盆，一个不算太大的柚木衣柜，柜门上还带着一面镜子，一把显得很陈旧的软椅，显然是从前放在客厅里的。

伊利娜的大箱子摆放在窗台下，箱子盖上放着伊

戈尔和其他家人们的照片，为房间增添了一点人情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人触景生情。

搬来的当天，茹韦纳利娅·马尼昂太太为了让房客不感到过分的孤独，邀请伊利娜一起吃晚饭，尽管她已经清清楚楚地说过房租中绝不包括伙食费。晚饭是澳门土生习惯吃的便餐，一碗菜汤和一盘炒饭。她这样做只是为了减轻房客的孤独感。

伊利娜接受了邀请，并表示了感谢。尽管饭菜简单，但她喜欢有人作伴，喜欢这种人情味，这样减少了她的寂寞和沮丧。

不过，她并没有对女房东畅所欲言——刚刚认识，不可能改变她斯拉夫人内向性格，再说，多年来生活的艰辛更使她变得孤僻——不过，伊利娜还是讲述了自己上海的有趣生活，战争时期在澳门的日子以及自己担任临时歌女的经历。为了使晚餐的气氛更加轻松一些，也为了让女房东更加开心一些，伊利娜还讲述了过去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感情插曲，但她没有透露达希西奥的名字，也没有提及那段感情插曲是发生在澳门。

马尼昂太太最终还是认为自己请房客吃饭是做对了，只是为伊利娜不会打麻将而感到惋惜。

“你连加纳斯塔牌也不会?! 如果会打，你就可以

加入澳门俱乐部我的小组。”

伊利娜无可奈何地笑着说，还是在战争年代，她为了狂欢节的演出去了俱乐部，坐上了麻将桌，最后把银行里剩下的一点存款都输光了。

对于伊利娜来说，她就这样拥有了无法估量的友谊，或许是她整个下半辈子都会保持的友谊。

马尼昂太太经常邀请她吃饭，还同意她需要时使用自己的厨房，只不过伊利娜宁愿按照自己特殊的、没有规律的、而且肯定是不讲营养保证的习惯用餐。她除了偶尔在城里的廉价餐馆里吃几顿正餐外，平时不是烤面包就是饼干加茶。早晨把这些东西做好，放在一只中国产的草编保温桶里，可以吃上一天。

伊戈尔已经不再给她写信，但还是按时给她寄些钱来。伊利娜就是靠着这点钱，以及从基督慈善协会领取的食物和衣服，艰难地生活着，期盼着连自己也弄不清楚的将来。

她想找份工作，但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些什么。她所受过的教育，她那一口流利的外语，她那多年来几乎已经忘却了的钢琴、演唱、网球、骑马的技术以及社会交往的能力，在当时的形势下一无用处。

托珀西瓦尔神父用葡萄牙文在澳门日报和号角报

上刊登了那则她可以提供法语、德语或俄语家教的广告，但至今没有一个人提出聘用她。

伊利娜甚至想去给人家做佣人，可事实上她的一生中从未对此有所准备。当她一帆风顺时，身边有的是佣人，她只需吩咐罢了。即使在困难的日子里，她也是随遇而安，过一天是一天。

再说，尽管伊利娜没有明说，她到底还是不愿意“降到这种地步”的。

受人尊敬和社会地位价值等观念是伊利娜从孩提时代起就接受了的根深蒂固的东西，即使在她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也没有放弃。

然而，她从来就不曾是一个好的家庭主妇。她从不做饭，也不喜欢干家务活，自然在这些方面也从不上心。

这给马尼昂太太带来的简直是灾难：伊利娜的房间永远是乱七八糟。换下待洗的内衣要么随便搭在洗手盆上，要么扔在沙发上，外衣扔在床上，鞋子东一只西一只满屋乱放，空食品袋堆在那里也不收拾。

尽管马尼昂太太对伊利娜寄予不少同情，但伊利娜太不会管理自己的生活，使马尼昂太太最终下决心结束租房。

如果说伊利娜这种乱七八糟的生活习惯仅仅是在

她自己房里，房东虽然不喜欢，但可以不去看它：关上通道的门，看不见里面也就算了。然而，当伊利娜不拘小节到把外衣随便扔在哪张椅子上，报纸丢在客厅地上，用过的碗堆放在厨房的水池里，这一切就做得太过分了。

伊利娜（当房东太太不客气地提请她注意时）也曾尴尬和真诚地保证要收拾，可是俄国女人天生不会料理家务，所以保证过后一切还是老样子。

房东太太最后只好推说已经接到了儿子要回来度假的消息，所以需要用房。再说，她当初也只承诺出租几天，而到现在已经过了几个月了，已经到时候了，伊利娜确实应该找一个长期、安定的住处了。那样，也不会影响她们作为朋友相处，她本人也会帮助伊利娜打听从哪儿能租到住房。

又要搬家了，伊利娜又要经历过去曾经经历过的烦恼了，又要担心自己的前途了，又要惶恐地感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

可是马尼昂太太的决心已定，并且也已开始行动了。

利用她在当地的许多熟人的关系，她的热情和不折不挠的性格，当然主要是下决心要摆脱房客的信念，马尼昂太太找了不少地方。但那些地方要么房租太贵，

要么不具备住人的起码条件。最终她看上了高士德大马路上一个底层带凉台的住处。如果那位中国房东同意的话，可以找一个熟悉的木匠把凉台的一角改成一个小小的卫生间。

伊利娜感到十分沮丧，这倒不是因为新住房的简陋，而是为不久的将来自己独自生活的寂寞而悲观、忧伤。

又矮又胖的土生房东太太这次毫不动摇，她告诉伊利娜，新住房的房租可能比付给她的还要低，尽管伊利娜至今还没有付给她房租（这位好心肠的房东始终没有好意思提醒伊利娜支付拖欠的房租）。那位中国房东遭到了马尼昂太太的严厉威胁，这个又矮又胖的女人说要叫人来重新估价房产让中国房东缴纳房产税，迫使中国房东最终把房租降到每月 45 澳门元。

朝着大马路的宽敞的凉台几乎可以用来做小客厅；门口就是公共汽车站；街那头就是街市，街市上的商品很丰富。这里生活极其方便，而且离马尼昂太太的住处也不远，需要的话随时都可以找她。还有比这更好的吗？另外，土生女人让伊利娜把床、衣柜和洗手瓷盆带了过来，因为她要给儿子添置新的家具。她还要把厨房里的一部分餐具也送给伊利娜。其他日用品可以去巴萨尔街或旧货店买，那里的东西不错，价

钱也便宜。问问经常见面的专员博士就知道，他可是经常出入新桥和宝塔巷那一带的市场，寻找一些所谓的古董和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物品的。

还没有容伊利娜说出自己的意见，土生房东太太当天下午就结束了她们的租房契约。第二天上午，她带上伊利娜和多年的老佣人阿凤，拿着水桶、刷子、碱水、肥皂等，对高士德大马路上的那间底层住房进行了一次大扫除。

她们还让木匠赶紧在凉台的一角用木板隔出一个卫生间。还去巴萨尔街购置了一些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

于是，在第二个周末，手足无措、心灰意懒的伊利娜在马尼昂太太这种坚定的态度下，终于搬进了她的又一个新居。

8

伊利娜要适应新的生活真是困难重重，消沉的情绪屡屡出现。她感到自己孤独无助，常常蜷缩在床上，忧伤地看着伊戈尔和祖父母的照片，任眼泪在面颊上无声地流淌。

伊利娜瘦了，也变得越来越懒惰。

她不再按时吃饭，只是到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才随便找些罐头食品、饼干或什么点心，要么烤片面包，喝口中国浓茶。

有时她强迫自己走出家门，到红街市附近的某个茶馆或粥面店喝一碗馄饨汤，在那里一直坐到中国人叽叽喳喳的吵闹声让她忍受不下去时才离开。

随后，伊利娜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转悠，常常走进某个教堂。澳门的教堂不像欧洲的教堂那样阴森和威严，显得明亮和轻松。虽然那里不是她思考问题的地方，但她却觉得那里安宁平静，坐一阵子后自己总感到心情会好些。

尽管她接受的完全是俄国宗教，澳门没有他们的教堂，但天主教的礼仪同样满足了她的需要，看来她很容易转变。她像一位新教徒那样参加着一个个宗教仪式。

过了一段时间，伊利娜熬过了艰难的日子，渐渐习惯了眼前的生活，便不再去想自杀的事了。

她总算战胜了危机。

马尼昂太太(现在她们亲热得已经互称名字了)还经常请伊利娜去饮茶，星期四假如不跟朋友约会时，便邀伊利娜去吃顿晚饭。

伊利娜每次去都为自己无法回报而感到歉意，伊戈尔寄来的钱只是那么一点。

老房东作为朋友建议伊利娜利用自己所受过的教育去寻找一份工作，尽管她现在也没有什么把握。

然而，伊利娜对自己的能力还是有所怀疑。不过，朋友的建议还是有道理的。于是，她又一次找到了珀西瓦尔神父，求他再帮助自己一次，因为她既需要经济上的平衡，也需要精神上的平衡，用做点事来消磨时光，免得整天毫无目的地在澳门街头游荡。

一贯热情的珀西瓦尔神父倒了满满的一杯威士忌酒递给伊利娜，说：

“喝点这酒，会对你有好处。对我来说，它总能让精神振奋。当然，这样说不一定准确，可是，人最终是脆弱和渺小的动物。”

神父说完这句无奈的话，又喝了一口酒。

尽管神父是开玩笑说的，但那句“人最终是脆弱和渺小的动物”的话无意中触痛了伊利娜。

她感到真的是这样。人是渺小的！对她来说，除了孤独、贫穷、被伊戈尔抛弃，现在最难受的是觉得自己被人看不起，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甚至连自己都不尊重自己。最终，她想自己只不过是难民，没有祖国，没有家庭，没有财产，没有任何价值……可是

自己还死守着孩提时代接受的教育，死守着祖父母那种顽固的不容争辩的自尊。这些本该遗忘在敖德萨的遥远的年代里。

伊利娜的沉默和神父的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老人马上明白过来，认真地问道：

“怎么样，你生活得好吗？”

伊利娜叹了一口气，说：

“现在我倒是习惯了孤独和贫穷。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我觉得贫穷是容易承受的。我也说不清楚，即使在战争年代，我在澳门好像也从来没有失去过希望。再说，我丈夫的性格总是乐观、欢快，对一切充满信心，正像您一样……”

她停了一下，眼睛盯着用双手捧在胸前的威士忌酒杯。神父默默地看着她。

“……可是现在不同。尽管您和马尼昂太太对我如此热情，帮了我很多忙，但我还是觉得生活得没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呢？”

伊利娜用英语低声说着，语调柔和，彬彬有礼，与神父欢乐的高嗓门截然不同。

“马尼昂太太劝我去找工作，随便什么工作，即使是一点小事，也会对我、对我的生活有帮助，特别是能得到一点尊重。这是我最不愿意失去的。因此，我

又一次来找您。”

“你说下去……”

“我也愿意有点事做，随便什么，只要能对别人有点用处的事。可是，您也知道，靠登广告没有用，谁也不会要我。所以我来求您帮忙，给我随便找个什么工作……”

神父考虑了一下她的请求，但这对于伊利娜来说，仿佛过了特别长的时间。

“你一定会得到我的帮助的。我只是在考虑你干什么工作更合适。现在的机会并不多。中国人不聘用西方人，政府只聘用葡萄牙人，这是规定。圣·罗萨学校或许聘用人，可是都被修女们占满了。教会的工资太少。商业性翻译一般用英文，可这儿的人几乎都会说英语；德语和法语在澳门用得很少，俄语就更别说了。不过，你是得找个什么工作做，你自己的想法呢？你希望去哪儿？”

伊利娜沮丧地耸了耸肩膀：

“我也不知道。我接受的教育从一开始就错了，我是被教育成什么事都不干，或者说教育成只是为了适应一门富贵的婚姻。当时就是这样，我们谁也没有预料到将来。我不知道我们当时怎么那么糊涂，没有预料到俄国会发生革命。我想，我是否可以给什么太太

当个伴，但可能性不大。”

“是呀，澳门不时兴这个。富裕的人家都是大门大户，有的是家人。要让你当管家也不容易。独居绅士们需要的伴侣不是你这样的人。干家务杂活更不用考虑，你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你在这方面比不过那些中国女佣……”

伊利娜为神父一开始就排除了这一令她难堪的办法而感到欣慰。她承认自己不行，当然她也排除了像战争时期迫于无奈担任歌女的想法。再说，她也明白，她的年龄已经不适合再干那一行了。

“我会给你找个事做的。不过，你可以先去帮助塞莱斯特修女做些天主教慈善会的工作。薪水少得可怜，我们的预算很少，主要靠别人援助。但起码可以帮助你消磨时间，而且总还可以得到我们派发的食品。”

9

第二天，伊利娜立即满怀热情地开始了与塞莱斯特修女的合作，接待那些来这家国际慈善机构求助的各种贫穷的人。

然而，除了热情，伊利娜的参与几乎毫无价值，有

没有她都一样。她不懂中文，不能和被救济的人沟通，又缺少连续好几个小时地干着单调的接待工作的必要的耐心，也不会帮助维持穷人们排着的长队的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她觉得不顺心，虽然她已付出了努力，还是分不清那些令人心烦的低声下气苦苦哀求的人中哪些是真正没有能力的，哪些是真正的穷人，哪些是乞丐；最后，她惊讶地发现，尽管自己受尽艰难和贫穷，却对这些不幸的人们缺少理解和爱心。

简而言之，她对自己干的这份工作感到厌倦了。

伊利娜常常迟到，还经常在自己拿不出主意时停止接待这些来这里求助解决各种问题的人。过不多久，尽管塞莱斯特修女对她也寄予基督教徒的同情，但还是希望她能早日离开。

伊利娜终于又来到珀西瓦尔神父这里，道出自己的不满。神父既没有说她什么，也没有安慰她，只是叫她不要再去做那种和穷人打交道的工作，而是把她安排在自己身边，做一些办公室的工作，处理处理小文件。然而，她只会用两个手指头打字，一点也不熟练，她打的文件神父还要仔细检查。神父还替她联系为澳门政府或其他国家驻澳门的领事机构担任法文、德文或者俄文翻译，因为这些语言在当地用得很少，所以翻译报酬还说得过去。澳门阿波罗电影院和首都电

影院偶尔上演俄国电影时，伊利娜甚至还被请去翻译英文字幕。

这种工作对于伊利娜来说是痛苦的，也是她不愿意接受的。听着俄语，激起她对祖国、对乌克兰大高原的深深思念，也为俄国农民的艰辛劳作而感动。然而，她从电影中已无法看到自己的俄罗斯，无法看到奥斯特拉科夫宅院里的生活，无法看到她所熟悉的人们。她已经是一个快 60 岁的人了，那些多年来一直沉睡在她心底的回忆，如今又一次清晰地在她的脑海中闪现。

在这些工作中，伊利娜最愿意为外国领事机构工作。

那里恬静的气氛，优雅舒适的工作环境，还有工作人员的修养，人们低声交谈的习惯，上午 11 点的早茶，这仿佛是她曾经失去的、是她羡慕和向往的、是她或许能寻找回来的世界。哎，可暂时还是不可能的。

于是，伊利娜朝思暮想能在某个领事馆（冰岛领事馆除外）谋得一个长久的职务，不管级别多低，报酬多微薄。当然她最看中的是英国领事馆。

正是在这种时候，伊利娜意料不到地遇到了那位在战争时期去窗口夜总会过生日的辛蒂娅·萨莱斯，也就是在那次聚会上伊利娜第一次认识了达希西奥

的。

伊利娜很容易就认出了辛蒂娅。她依然矮矮胖胖，脸蛋虽不漂亮却也匀称，花白的头发剪成男式短发，沙哑的笑声也带有男性的特点，仿佛这还不够，她还乐滋滋地抽着雪茄。

辛蒂娅在联合王国总领事馆工作，除了个别的任务外，主要负责总领事馆公共关系处对葡方的联系事务。

她那令保守性格的英国人打颤的豪放和容易与人打交道的性格，表面上看起来毫不费劲的工作效率，尤其是她在桥牌桌上显示出的聪明才智，使史密斯先生和夫人把她当成了家庭里的一位重要的和受尊敬的成员，因为与她在一起可以抵消正式的外交场合中的枯燥的礼仪所带来的烦恼。

尽管如此，辛蒂娅·萨莱斯在某些地方有着和伊利娜相类似的经历。

辛蒂娅也曾在上海生活过，确切地说，她是在上海出生的葡萄牙人。和大部分葡萄牙社团的人一样，她是因为太平洋战争才逃难来到澳门的。

然而，她还是比没有了祖国的伊利娜要幸运。

虽然在那段时间里她也经历了贫穷和艰难，但葡萄牙护照给她提供了伊利娜未曾享受到的保护。她和

其他许多人一样被安置在佳景酒店，有政府保证提供的食品，有卫生司提供的免费医疗，有当地一家修女团体的精神安慰，还有一些亲戚朋友的关系。这位葡萄牙籍女难民在澳门的生活远没有伊利娜的艰辛。在一定程度上，辛蒂娅的生活算是说得过去，也有点意思。她还轻而易举地组织了一个爵士乐队，在南方夏日炎热的夜晚，他们在酒店的露天咖啡厅又唱又跳，谁也不去想明天将会如何，只顾短暂的今天。

后来，她有幸在英国领事馆谋到了一个职位。她精通英语和葡萄牙语，又拥有广泛的关系，因而成了领事馆不可缺少的工作人员。所有的领事们都对她很友好很尊重，领事馆其他有关人员对她也不错，因为她那张不好看但也不令人讨厌的面孔不会给任何人的和谐的婚姻带来威胁。这可是一个不小的原因。

辛蒂娅一开始并没有认出伊利娜。她只见过伊利娜几次，更没有想到这位过去的窗口夜总会的歌女、曾经在一个早就忘在脑后的生日晚会上一起喝过一杯香槟酒的女人，竟然在为领事馆干一些零活。是伊利娜犹豫着提醒了她。于是，她想起了那个辉煌的年代，想起了上海的巴黎咖啡厅，她曾在那儿品尝过阿尔方斯厨师的烹调手艺，还有幸欣赏到酒店那位穿着水兵服的英俊热情的经理弹奏的巴拉莱卡琴，那琴声和深情

的“黑眼睛”的歌声把在座的人们都深深陶醉。啊，那是无比欢乐的时代！

现在提起这些，更使她回忆起天窗夜总会小乐队的男歌手，他总是衣冠楚楚，一个真正让人倾倒的男子汉，只是她想不起他的名字。他现在干什么呢？

或许是辛蒂娅的谨慎，伊利娜从内心感激她，因为她没有谈及达希西奥。也或许是对方根本就不知道伊利娜与他的那段短暂的故事。

10

经常出入领事馆，又建立了新的友谊，特别是与辛蒂娅的友情使伊利娜的情绪大大得到了改善。

她开始被人接纳，也开始“属于”那个世界了。

她们尽管都是在别人的国土上，但一些共同的回忆和对伊戈尔得到认识足以让她们之间建立人与人之间应有的联系，并培育了友谊之根。

另一方面，对于天生性格开朗、甚至表面有点粗鲁的辛蒂娅来说，她们的接触令人愉悦。她特别愿意听伊利娜不时回忆自己几乎忘却了的在俄罗斯帝国的生活或度蜜月时在巴黎没有来得及好好享受的美好时

光。

伊利娜甚至在收到丈夫的那点补贴或者拿到干零活的报酬时，还奢侈地邀请辛蒂娅和马尼昂太太去佳景酒店宁静的廊厅里聚一聚，喝点茶，要上几块精致的蛋糕（当然那位辛蒂娅一定会要一杯苏打威士忌的）。

然后，她们在民国大马路或南湾街上散步，喋喋不休地议论着一切，又似乎总是没有说够。

这三个女人走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令人好笑的群体。两个矮矮胖胖的女人中间是又高又瘦的伊利娜。珀西瓦尔神父一天下午在烧灰炉附近正好碰上她们，不无诙谐地打趣说：

“三位美人！一点不错，真像一套漂亮的调味瓶。”

三位女士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不过，以后却尽量不再让伊利娜走在中间了。

马尼昂太太还是喜欢经常邀请朋友们到家里聚会，而不愿操持家务的辛蒂娅则把两位女友拉进自己的朋友圈，不时去澳门俱乐部的古老大厅或者利维旅酒店的廊厅里饮茶。

有了这样的运气，又有了新的社会活动，伊利娜的情绪振奋了，然而她对珀西瓦尔神父那里的工作越来越不用心了。

珀西瓦尔神父尽管待人热情和蔼，但也不得不提醒伊利娜那些忘了去做的、或者拖延去做的、或者做得不像样子的事情。伊利娜虽然也诚恳地接受这些提示，也承认自己的工作效率太差，也保证以后尽量注意，但过不了几天又会回到她那根深蒂固的老样子。

非常耐心的珀西瓦尔神父喝了比平时多一倍的威士忌，鼓足了勇气对伊利娜说：

“你去向美国申请移民吧。在美国有一个保护俄国难民的协会，总部在纽约。或许它能帮助你去美国，还可能帮你找到工作。谁说不行？或许你可以当陪伴或者管家……我可以帮你联系，去向香港的美国总领事或者联合国难民署代表直接提出申请……”

“可是，我在美国举目无亲。”

“嗨，你在澳门不也没有亲人吗？美国可要比这儿富裕……”

“那伊戈尔呢？我对我们破镜重圆还抱有希望……”

神父抓住了时机：

“这可是你要得到他的一个好机会。如果你拿到美国的签证，那里是富贵的国土，你看他将如何奔向你的怀抱……”

“你认为他真的会这样吗？他们会给我签证吗？”

“试一下又不会丢掉什么。你向他们诉说你失去祖国、被苏联共产党追踪、现在被丢弃在这块被众人遗忘的角落的处境……你肯定能作为政治避难拿到签证……他们对这些问题比较敏感……”

神父虽然开始时还不十分有把握，但他说着说着，自己也坚信此举能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能解决伊利娜的困难，又能解决他的负担。

“……再说，你可以相信，我会帮助你的。我可以帮你领回那些表格，教你填写，再帮你给难民署写封信。”

尽管让伊利娜重新得到伊戈尔的想法并不完全出自神父的真心实意，而只是用来让她听信他的巧计，但却使伊利娜产生了热情。珀西瓦尔神父抓紧时机获得了多方面的信息，也确实帮她拿到了一大堆的申请表格。他帮伊利娜填好一份份的表格，还替她打开了一个个有关政府部门的大门，例如民事厅、卫生司、警察署犯罪登记处以及救济处等，尽快地取得了所需的证明文件。神父又用自己的钱为伊利娜支付了各项印花税和手续费，而伊利娜自然是想不到还神父这笔钱的。

那时是 1959 年的年末。

11

起初的几个星期，伊利娜抱着热切的希望去邮局，查询有没有美国领事馆寄给难民署的回函，仿佛有了回函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她甚至主动为他们打开邮箱。

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伊利娜始终没有等到回信，她又一次失望了。珀西瓦尔神父鼓励她说，办理这些事情是需要时间的，尤其是像她这种特殊情况，对方要作一系列调查，如健康状况、宗教信仰、政治观点、工作能力、反共情绪及是否属纳粹或法西斯组织等等；还有移民人数限制问题。对像她这样的无国籍的人数额究竟是多少，神父也不知道。

伊利娜虽然明白神父所说的理由很充分，但还是唉声叹气，又一次显出斯拉夫人常有的沮丧悲观的神情。

尽管如此，伊利娜的生活倒是在日益改善。伊戈尔虽然不再给她只言片语，但按时给她寄来一定数量的钱。加上她偶尔作些翻译能得到一些报酬，还有难民署发给她微薄的薪金，另外还可以从教会慈善组织

那里领取一些食品。虽然中国房东对她不增加房租非常不满，但她也不愿意搬出高士德大马路上的那间住房。一方面是因为她承受不了其他更高的房租，另一方面，这条大马路宽阔、笔直、漂亮，马路中间生长着一排高大的树木，那茂盛的枝叶向两旁送出诱人的荫凉；公共汽车站就在她的门口，与大马路顶端的红街市也只有几步路的距离；再说，嘉路米耶圆地附近的集市上的小吃车和大排挡为她提供了用几个硬币就能吃饱的便餐，她也已经习惯了中国人喜欢吃的各种面食和中国烹调。

现在，伊利娜已经能够用广东话和小贩们交谈，甚至讨价还价。

周围商店里的和在街上摆摊的中国人也都认识了这位外国女人，他们习惯称呼这个高高瘦瘦、白皮肤、花白头发、长着一对猫眼睛的女人为“鬼婆”。他们也已习惯她抠抠索索地买点食品，或者走进某家大排挡，坐在没有靠背的方凳上同他们一起吃点什么。

随着自己社会地位有所改善，伊利娜开始改在家里吃饭，尽管家里的条件也不比外面街上好多少。

她从某个饭摊上买碗炒面或者炒米饭，用那种不黑不白的纸打包带回家，伴着热茶用餐。

伊利娜还是很少自己做饭。她从来不喜欢烹调，也

不善于收拾厨房。再说，简陋的房间里只有一个单口煤油炉（那时还没有煤气炉，而她也没有能力购置电炉），所以她根本谈不上学习烹调。于是，伊利娜只是用炉子热热饭，烧烧开水，泡上茶放在中国式的保温瓶中。这样，热茶伴着抹上黄油的面包便是她的早餐。

随着地位的变化，伊利娜又渐渐想到了自尊。

伊利娜开始怀疑自己从祖父母那里遗传下来的、对行为举止和社会交往有着深刻影响的尊严，认为这对她来说几乎是一种残酷的嘲弄。因为作为难民的她，这一辈子都注定了无法具有这种尊严。在巴黎，她感到伊戈尔地位的低下和卑贱，原沙皇帝国哥萨克军队的军官竟然当起了五洲酒店的看门人和接待处的侍员。到了上海，当他们可以获得国际社团里的令人羡慕的地位时，丈夫却把法兰西酒店改成了“鸡窝”。虽然生活豪华，但毕竟是妓馆。然后是战争和在澳门的贫穷日子，丈夫充当了一家三星级酒店乐队成员，她也随之成为临时的歌女，甚至成为或几乎成为令自己都厌恶的妓女。

现在，新的流亡生活也不知要经历什么样的曲折！

尽管过去经受过被那个负心人抛弃的无限痛苦，现在又面临着种种困难，伊利娜始终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不可逾越的界线。

因此，不管她走到哪里，她也不去求达希西奥、贝格·贝姐、贝利阿切夫或窗口夜总会的任何其他成员。

也正因为这样，她一直很注意把从基督慈善组织领回的物品用当地小商人的不黑不白的纸袋装得严严实实，不让人发现。

总之，她要让别人承认她和其他人是一样的，她不想把自己归属于处于社会底层的难民群体，她需要属于她有权属于的社会。

因为在难民署里有一份微不足道的、自己还没有完全做好的工作，伊利娜便把自己当成是救济人而不是被救济人；偶尔给领事馆干一点细小的杂活，又让伊利娜想入非非，她仿佛也是属于那一特殊和高雅的群体，或许还能成为外交家，虽然连她自己也不十分有把握。

尽管伊利娜也从心底里承认自己不是他们那一族的成员，但他们倒是很和蔼、很友好地接待了她。

这样，伊利娜最终找回了认为本是自己的生活环境、自己的社交和文化。

即使是“偶尔”的几次，可她觉得总算是“属于”了。

还

魂

曲



第十章

请 柬

1

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在 6 月的那个炎热的下午，伊利娜既激动又意外地从地上捡起那份从门缝里塞进来的请柬。硬皮封面上清清楚楚印着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领事馆的凸出的字样，而且是寄给澳门高士德马路伊利娜·奥斯特拉科夫夫人的。

伊利娜没有立即打开信封，而是把请柬夹在手指中间来回翻

看着。

辛蒂娅每当需要她做什么事时，总是给难民署打电话，或者用个小信封写一张便条寄给她，从来都是客客气气的。可伊利娜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么大信封的函件（足有6英寸长5英寸宽），还带有烫金的英国国徽，高傲凶猛的雄狮和独角兽从两旁扶着金色的大不列颠皇冠。

伊利娜轻轻抖了抖信封上的灰尘，用大拇指抚摸了一下信封上的这些礼仪徽记，然后打开了信封。

里面是一张尊贵的英国女王伊莎贝尔二世的总领事乔纳森·皮尔斯·史密斯先生和夫人的请柬。

请柬是用那种奶黄色厚纸印制的，上面用凸出的字体写有请她光临6月18日17~19时在澳门为女王诞辰举行的酒会。

请柬还要求她给领事馆打电话，说明能否出席。她一看电话号码，便知道那是辛蒂娅的电话号码。

伊利娜坐了下来，她激动得有点发颤。

虽然她的处境最近有所好转，但她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即使在上海那段最风光的时期，伊利娜也从来没有参加过大不列颠领事馆的正式招待会（法兰西酒店不干不净的经营业务使伊戈尔早就被列入不宜邀请的人的名单了）。

伊利娜怀疑这中间有辛蒂娅在帮忙——肯定是——不管如何，请柬还是清清楚楚由总领事亲自签发的。或许应该是由他签发的。

要在当天打电话说明去还是不去并表示感谢已经太晚了。这是她在第二天一到难民署就要做的第一件事。

2

接着，给伊利娜带来的便是烦恼。

她不知道去参加酒会时该怎样穿着打扮。她打开大箱子，翻看着里面的一件件衣服。那些连衣裙，要么不适合这个酒会的时辰，要么已经和自己的年龄、或者和现在的季节、或者和当今的潮流不相适宜了。

偶尔有一两件还算说得过去，可又被虫子蛀了洞。

她翻出了那件狐狸皮大衣，抖掉了上面的灰尘和已脱落发白的毛，这是从那些被典当的贵重首饰、皮毛衣服中幸存下来的。另一件“视野”皮衣与从俄罗斯带到巴黎的“沙布雷”却遭到厄运，一起送到当铺，只当了原价的一点零头。

当时的季节和气候用不上穿皮衣。澳门的6月既

炎热又潮湿，只要一想到皮货就能出一身汗。

她的确找不出可以穿的衣服，必须买一件像样的连衣裙。

那双黑皮鞋虽然后跟有点磨损倾斜，但还可以凑合，只要换个后跟，擦好油，马马虎虎就能穿。

可是，缺少一件合适的连衣裙。

她又想起了帽子。上帝呀，还缺礼帽！

在这种正式场合，在这种时辰，还是要戴礼帽的。

这是澳门总督夫人规定过的，参加晚上8点以前的正式活动时都要戴礼帽。可是澳门没有卖礼帽的！那些有社会地位的贵妇人都是从香港甚至从里斯本买来的。不过，即使澳门有卖的，伊利娜又如何能承受这笔费用呢？她在银行已经没有帐号了，因为就伊戈尔寄来的那点补贴费和她在难民署工作的那点薪金，还有偶尔给领事馆翻译的报酬，也不值得开帐户。这些钱刚刚够应付日常开销。

最好的办法是找个借口不去参加酒会。

不去参加酒会的想法令她又一次感到悲伤而落泪。

她在社会的底层生活了这么久以后，现在终于有机会让自己回到受人尊敬的、自认为属于自己的社会阶层时，却因为没有合适的衣帽而不能加入进去。

哎，生活太残酷了。

不能，绝对不能让这个机会失掉，她重复着。

伊利娜决定找马尼昂太太商量一下，她一定会帮助自己的。可是伊利娜又担心马尼昂太太可能没有接到邀请，那样会伤害她的自尊心，因此，会找一个什么借口拒绝帮助自己。

伊利娜还是打消了自己的顾虑，就在当天晚饭时找到了老房东。

（伊利娜心底里还真有点暗喜——不过，后来她感到后悔了——她可以向好朋友老房东显示一下，她这位从来什么也不是的人，终于被邀请参加连房东这样的人都不能去的社交活动。）

然而，老房东的确心地善良，为人热情。尽管为伊利娜接到请柬而感到惊讶，又为自己没有被邀请而感到有点沮丧，但她还是请伊利娜一起用了晚餐，还让她从自己的衣柜里随意挑选。可惜的是，两个人的身材不同，喜好也不一样，所以伊利娜没有能挑选到一件合适的连衣裙，更别说鞋子了。

至于礼帽倒并不太难，每个人的脑袋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什么样的帽子都能戴得上。

马尼昂太太首先提出了做连衣裙的建议。

她们可以去“猫脸”制衣店，那里的老板是位非

常有名的女服裁缝，几乎整个澳门的人都穿他做的衣服，而且有房东的介绍，老板会很客气。伊利娜或许可以做一身套装，甚至还可以配顶帽子，系上一根丝带或别上一朵与套装相配的胸花，那样就可以有一套像样的套装了，而且伊利娜还可以分期付款。

伊利娜不用为手提包而发愁，房东朋友答应把自己那些黑色手提包中最好的借给她，这样就能与黑色皮鞋配套。

房东朋友还要把手套借给她，即使不合适，伊利娜也可以拿在手上。

伊利娜有了信心。她们要了辆出租车，直接去了裁缝店，伊利娜还抢着付了车费。裁缝店不大，位于去老楞左教堂的必经之路龙嵩正街的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段。店里面灯光灰暗，摆放着三台缝纫机，一堆布料，有的已经裁好，有的还没有裁。

“猫脸”老板对这桩生意显得热情不大，因为手中的活太多。然而，马尼昂太太可不是容易打发的。她是这家裁缝店的老客户，她不能理解为什么拒绝她的要求，使她在朋友面前丢了面子，再说，她的朋友还是一位被英国大使邀请参加女王诞辰酒会的重要人物（马尼昂太太操着一口广东话，为达到目的，不遗余力地夸耀着情节）。但她有意把分期支付布料费和手工费

的事拖到最后才说。

老裁缝一脸稀疏的胡子多日未刮，穿着一条半长的宽腿裤子，露出他那瘦骨嶙嶙的两个膝盖和细长的双腿。他终于答应了下来，与其说考虑到伊利娜这时的特殊的社会地位，或者什么大不列颠女王陛下的威严，还不如说是想尽快摆脱马尼昂太太喋喋不休的纠缠。

马尼昂太太建议为伊利娜制作一套既与这季节又与时尚相适宜、既适合她的年龄又能让她显得年轻的浅色真丝衣服。然而，真丝衣服对于伊利娜来说太昂贵了，也太浪费了，穿不了几次。她愿意衣服的颜色更加柔和一点，款式能适合多种礼仪场合，这样也好在将来应邀时配上用场。因为对伊利娜来说，社会仿佛已经朝她打开了大门。

她们最终选择了一块深蓝色上面带黑色大花纹的真丝，这样可与从马尼昂太太那里借的皮鞋、手套、手提包及黑礼帽相配套。

她们选择了二件套的款式，上衣袖长四分之三，这样可用于澳门的任何季节。

马尼昂太太还告诉裁缝，她会让人把帽子送来，请他用同一种衣服丝绸面料配上一条饰带和两朵饰花。谈妥了这一切，马尼昂太太才告诉已经无可奈何的

“猫脸”店老板，这位夫人要分期支付所有费用。

这位中国裁缝已经非常厌烦了，他轻声嘟囔了一下，没有再说什么，只得同意。

两个女人轻松愉快地走出了裁缝店，慢慢悠悠地沿着西望洋街的石子路爬上了佳景酒店，在那宽敞的阳台上美滋滋地享用了一顿由伊利娜请客的茶点。

3

伊利娜在马尼昂太太的衣柜大镜子前仔细地端详着。

裙子很合适，偏深的蓝色丝绸布上印着黑色的大图案，总体上与她的个头及风度相称，显得她身材挺拔但不显傲慢。她又把礼帽稍微戴偏一点，露出了由美发师阿三精心梳理的头发。

她的头发刚刚开始发白，呈蓝灰色，虽然使她无法隐瞒自己的年龄，却也令她显得与众不同。伊利娜并没有刻意追求，她只想让自己的外表和自我感觉一致，只想比现实生活环境给予她的稍微好一些。

她企图从镜子里的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身上，找到40年前被一位英俊潇洒的沙皇骑兵军官热恋和追

求过的（毫无疑问）16岁窈窕淑女的形象。

生活真是残酷啊！

丝绸上衣的宽袖子遮盖了手臂上的明显衰老的皮肤，淡淡的化妆和头上戴的礼帽也盖住了脸上的皱纹，但脖子上的皱纹就无法遮挡了。不过，伊利娜经过仔细审视后，觉得基本上已无法挑剔了，尽管皮鞋是新换的后跟（穿上还挺舒服），手提包和礼帽都是借的（当然别人不知道），身上的套装还没有付钱。她从镜子里又看到了一个温文尔雅、端庄大方、令人喜爱的“夫人”，这是她内心从来就认为应该是这样的形象。

她没有戴首饰。如果有一串珍珠项链，那肯定是不错的，但她的那条早已卖掉了！丈夫走后不久她曾想过，只要有可能再买一条。

她想起那颗家传的大钻戒，但由于一次偶然的失手，白金戒环被弄断了，至今还没有送去修好，她又不肯交给一个不认识的首饰匠。

无论如何，她（前后左右上上下下仔细端详后）认为自己的穿着确实“得体合适”，并为此而感到高兴。

伊利娜看了看手表，已经到了该出发的时间了。

她不想到得太早，但也不想迟到。

去这种场合，乘出租车更合适。

伊利娜对马尼昂太太再次表示了谢意，在马尼昂太太家里，她才能准备得如此充分（甚至“猫脸”老板把做好的衣服也是送到马尼昂太太家里，当然还留下一张数目可观的发票，伊利娜为支付这笔费用还得去想尽办法。想到这里，她不由得叹了口气）。她终于来到街上，开始等车。

可是，那个时辰街上的车并不多，即使有车，也都载着客人。

伊利娜等着等着，开始紧张了。她看了一下手表，可是手表常常走得不准。

她来回走了几步，又一次看了一下手表。

两条腿已经开始酸痛。她也觉得，自己身上穿着连衣裙、头上戴着微微倾斜的礼帽站在大街的人行道上，样子真有点可笑。

20分钟过去了。

她决定先要一辆人力三轮车，让车夫“快点、快点”拉她去南湾。到了南湾，一定会要到出租车的。干瘪的车夫脸色黄中带紫，看得出来是个吸毒者，这使她回想起童年时代的那匹费奥多矮种马。

车夫的回答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她仅仅听到了她能听懂的“鬼婆”两个字。车夫开始时慢腾腾地蹬着，但逐渐用力加快了速度。

她的眼睛一直盯着手表。她感到自己已经急得满脸通红了，尤其是当她觉得腋下开始流汗时便更加坐立不安。当三轮车到达圣珊泽总督官邸时，她想起了附近有个出租车站。于是，她让三轮车夫停了车，付了5角钱车费，另加了5角钱小费，免得瘦男人唠叨不满。伊利娜用双手扶着头歪斜不稳的帽子，急匆匆朝出租车站走去。

幸好有两辆小型空车停候在那里。她钻进其中一辆，让司机朝南湾方向开去，然后用手势指路。

已经过了6点了，伊利娜坐在后排座椅的前沿心急如焚，仿佛她着急就能加快车的速度。

“快点，快点……”

“好的啦，好的啦。”

好在澳门街上的车辆不算太多，司机又加快了速度。当他们的车经过通往圣珊泽总督官邸的那条衣湾

斜巷时，伊利娜一眼就看到了上面竹仔室斜巷尽头那辆深灰色大奥斯汀正徐徐驶下，车前的葡萄牙国旗迎风飘动。

“快点，快点。”

为了下车时更快一点，伊利娜把早已握在手中的一元钱交给了司机。但车子在总领事官邸斜坡的大铁栅栏门前停下来时，伊利娜没有等司机找回两角零钱。

正当伊利娜满脸通红、心脏比正常速度快得多地跳动着开始爬坡时，那辆大奥斯汀汽车又出现在大路的拐弯处。它是那么豪华，那么庄严，它又是那么无情。

还

魂

曲



第十一章

墓志般的结局

1

伊利娜·奥斯特拉科夫的死亡，在所有参加尊贵的女王伊莎贝尔二世陛下诞辰酒会的要人中间引起了普遍的惊愕和不安。当然，与其说是为了她的死亡，还不如说是因为她的死亡给社交场合造成了混乱；而对于澳门其他的人们来说，她的死亡只是引起了他们一般的好奇。只有澳门日报的读者们显得格外热心，因为

或许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新闻，他们用大字标题刊登了女难民这种戏剧性死亡的消息。在中国人社会里，一个既无政治影响又无经济地位的鬼婆的意外死亡，没有引起他们任何反响。

珀西瓦尔神父为伊利娜的不幸人生感到遗憾，但他按照哲理思考得更加深远，认为她的死亡比她的人生更应予以同情，因为她正是在自己渴望得到能享受尊重的场合死去的。这真是对命运的嘲弄！

神父为摆脱自己的悲伤端起了威士忌，但马上又联想到了另一位生活在澳门的白俄罗斯人弗拉基米尔·贝切阿切夫的处境，他一直是自己工作中的一个难题。

马尼昂太太对此更是惊愕不已。

收到请柬给伊利娜带来的本能的激动曾令她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感受。尽管自己的丈夫在汇丰银行谋得了一个助理会计师的职务，但从来没有被列入英国殖民地为庆祝女王诞辰的招待会的邀请者名单，也从来没有被列入英国驻澳门总领事的酒会的邀请者名单。因此，俄国女难民收到请柬一事曾令她感到意外，甚至，即使她不愿意明说，还为自己被遗忘而感到某种程度的气恼。尽管如此，她还是为女友的高兴而高兴。

可是，正当伊利娜仿佛要最终恢复早已远离自己

的社会地位和尊严时，死亡残酷地降临了。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讽刺。

除此以外，伊利娜还糟蹋了自己的手提包、真正的羊皮手套和礼帽，尽管她认为那顶帽子对于伊利娜并不是太合适（她戴了仿佛有一种痛苦的样子）。按照她这个半东方人的迷信思想，她决不会再去使用这些死神碰过的令人倒霉的东西了。

于是，马尼昂太太认为，伊利娜已经远去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或许是她活着时需要适当乔装打扮的世界好得多的世界了，还恰恰穿着那件为女王伊莎贝尔二世陛下的伟大诞辰而精心准备的连衣裙。如果这件衣服能值得引起注意，那么，一切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造物主就更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了。

辛蒂娅·萨莱斯更加惊恐不安。

她为伊利娜的死亡感到格外悲痛，因为她认为，从一定程度上讲，自己对伊利娜的死是有责任的。

事实上，是她利用总领事糊里糊涂的批准，把伊利娜包括进最后的那批邀请者名单的。

如果她不这样做，或许女友今天还活着。

辛蒂娅把自责和悔恨告诉了珀西瓦尔神父，因为他是自己和伊利娜共同的朋友。神父用一支雪茄、一杯威士忌安慰了她，劝她说，伊利娜死了比活着更加

幸福。

塞莱斯特修女也对自己那位不愿意干活的助手的死亡表示了惋惜之情，并衷心祝愿她在来生获得今生未曾拥有过的尊重和高贵，祝愿她在天国里学到一点今生未能掌握的办事能力和效率。

达希西奥·古特雷斯以其社会精英和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冰岛名誉领事的双重身份，带着第二夫人陈安娜·古特雷斯来参加女王诞辰庆祝酒会，但他没有认出伊利娜，或许他还没有来得及看见她。后来，当侄子古特雷斯·德·雷梅迪奥斯告诉他死者是谁时，他感到诧异，也感到有点惋惜，甚至把这当作是对自己将来命运的一种启示。他带着忧伤、真诚的感情，简洁明了地说出了一句可以当作墓志的话：

“可怜的人！”

葬礼举行得简单而短暂。在一个酷热的下午，珀西瓦尔神父主持了伊利娜的葬礼，参加的人有茹韦纳利娅·马尼昂、辛蒂娅·萨莱斯、塞莱斯特修女以及难民救济署的其他工作人员。

在西洋坟场（圣·米格尔坟场）小教堂后面的一排凳子上有贝格·贝姐粗壮的身影。她弯着身子，没有胆量与其他人坐在一起（她不知从哪里知道了“天窗”夜总会过去的那位歌女死亡的消息）。她那染过的

头发有点蓬乱，连衣裙已经开线，脚上的笨拙的皮鞋后跟已经磨损，两只干瘦的大手正拨弄着一串黑色的念珠。

给墓穴填完了最后一锹土。墓穴前既没有十字架也没有墓碑，这里仅仅留下了一组数字“127”。没有人接受安慰。在场的人一个个离开了墓地，嘴里重复着达希西奥的那句令人伤感的铭文：

“可怜的人……”

2

葬礼后过了两个星期，始终热情洋溢的珀西瓦尔神父到我办公室找我。

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但我钦佩他的为人和他的工作业绩。他那慷慨和热情的性格，他那急别人之急的高尚情怀，他那易感染别人的欢乐以及那能够掩饰其弱点的纯朴，特别是对苏格兰大麦芽的偏爱，使他变得格外讨人喜爱。

他敲了敲门，但没等我回答便推门走了进来，一边大声说：

“尊敬的检察官，我可以进来吗？”

由于神父那欢乐开朗的性格，刚才他对我不太严谨的称呼就显得很诙谐，我还没有想到怎样回答他就进来了，但我还是想对他的风趣报一点类似的反应：

“不必客气。我最尊敬的神父阁下，这儿是你的家……”

“哦，免了吧！既不要说什么尊敬的，也不要说什么阁下，我只是一个可怜的坏蛋！”

神父爽朗地笑着，一边擦着头上的汗，坐到了身旁那张绒布套已经开了缝的破椅子上。房间里的空调震颤着发出叽叽嘎嘎的声响，仿佛是在作最后的喘息。它是从尊贵的法官办公室留下来的。而法官先生又是在总督更换新机器时从总督办公室那里接过来的。房间里的温度还是降不下来。尽管已经生锈的落地式电风扇仿佛与空调比赛着发出嗡嗡的噪声，也带来了一阵阵的微风，掀动着办公桌上的那些待批发的散页文件。

我抱歉没有威士忌为他驱热，可珀西瓦尔神父又一次大声笑着回答我说：

“我亲爱的先生！你听说过吗，除了盲人，司法也会走进酒杯？”

“这么说，你来这里有事？”

神父这才认真地说：

“我还是为了奥斯特拉科夫太太的事。你知道，她曾在难民救济署工作过，她的不多的信件也是寄到那里的。她死后，我们收到了他这些信件。因为她的事情还正在处理中，我认为应该把这些信件交给你。”

一共有两封信，一个信封上盖有澳门电力公司的印章，另一信封上带有美利坚合众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秃鹰标徽。

作为葡萄牙及受托处理伊利娜·奥斯特拉科夫遗产的不在场当事人代表，我认为自己有充足的理由当着珀西瓦尔神父的面打开信件。

第一封是澳门电力公司的第二次催款通知，告知她如果不在最后的7天之内交付电费，将切断她的电源。

第二封是某位美国副领事署名的信件，说很高兴地通知她，她作为无国籍难民移居美国的申请已作为政治避难而获得移民局的批准。因此，她应立即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办理有关证件。

珀西瓦尔神父听着我念完信件的内容，脸上露出了同情甚至悲伤的表情。他无需给我讲述他为实现伊利娜的心愿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只是无可奈何地叹着气说：

“到这时候才来?! 可怜的伊利娜……”

在为拍卖奥斯特拉科夫太太留下的那点可怜的遗物而打开她那穷困的公寓房门之前，古特雷斯·多斯·雷梅迪奥斯递给我一份授权书，死者的丈夫伊戈尔·瓦希利维奇授予他所有法庭权利，并申请作为妻子的唯一继承人的资格及接收所有遗物。

这件事没有遭到任何异议，所有财产都合法移交。

几个星期后，伊利娜·奥斯特拉科夫的死亡已不再是什么新闻了。

一天下午，我与古特雷斯·多斯·雷梅迪奥斯博士一起，在旅维利酒店的长廊里他习惯就坐的桌子旁喝着咖啡，谈论着一些很有趣的人间琐事。

从敞开的窗口，我们忽然看到了南湾大街上贝格·贝姐高大的身影。她迈着男人的大步，正朝着萨拉扎大街走去。

看到她，让我想起了死去的伊利娜。于是我向雷梅迪奥斯博士问起了死者的财产处理情况，特别是那只大钻戒的下落。

律师微微一笑，喝了一口他习惯喝的威士忌，告

诉我说：

“她丈夫伊戈尔·奥斯特拉科夫来澳门接收妻子的遗产。他付了我律师费用和各项遗产登记手续费用。说要把银制餐具、集邮册、小钻戒以及其他的一些不知什么东西拿到香港去变卖，把破旧家具和衣物送到澳门旧货店。他只留下那只大钻戒，要赠送给当地那个可以做他孙女的半法国半土生的混血姑娘。现在他已取得法律上的自由，可以正式同她结婚了。

博士停下话头，沉思片刻，又喝了一口威士忌，无意中又重复了那句他认为简洁明了、能说明不公正命运的警句：

“可怜的人……”

(全文完)

还

魂

曲



跋

这套丛书旨在向中国读者介绍以葡萄牙语写作的名著。葡萄牙 1143 年脱离邻国，成为独立的国家，自此开始拥有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因此其文学是欧洲最古老的文学之一。

葡萄牙位于欧洲的一端，版图呈长方形，两面濒临大西洋。这样的地理位置对葡萄牙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根本的影响。西班牙把葡萄牙与欧洲的其它部分相隔离，这决定了葡萄牙的航海家不得不走出狭小的疆域，去寻找新

的发展空间。因此，葡萄牙的航海家征服了前人从未航行过的海洋，发现了陌生的土地，并为所遇到的不同文化和民族而惊叹不已。如果说在曲折的历史中，葡萄牙人曾占领过土地，统治过他国人民，那么可以说他们真正征服的是大海，他们是这场人与自然的生死搏斗中的胜利者。

葡萄牙人身上体现出敢于面对困难的勇气和抵御痛苦的能力，葡萄牙著名诗人佩索阿在《葡萄牙海》这首标题意味深长的诗中，淋漓尽致地道出了葡萄牙人的这些品质：

啊！葡萄牙海，你咸涩的泪水
 饱含着葡萄牙人的多少悲伤愁苦。
 为征服你的万顷波涛
 多少慈母把泪抛，
 多少儿女徒劳祈祷，
 多少姑娘未成秦晋之好，
 啊！大海，一切都是为了让你属于我们！

葡萄牙被誉为诗人之国，自 12 世纪到现在，诗歌一直繁荣不衰。葡萄牙的叙事文学也有悠久的历史，尤其在航海大发现时期，远航至印度和日本的航海家创

造了大量作品。目前，许多葡萄牙诗人和散文作家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文字。

澳门文化司署与花山文艺出版社自1994年开始实施这套丛书的出版计划，迄今已出版了20部著作，成功地使中国读者对在欧洲享有声誉的葡萄牙文学有所认识。

现在，由于东方葡萄牙学会和积极向中国读者介绍外国作家的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的参与，这套丛书的出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东方葡萄牙学会总部设在澳门，但与葡萄牙国内的许多机构联系紧密，她的参与表明了葡萄牙方面，特别是资助翻译作品出版的葡萄牙图书馆暨图书学会对这套丛书的鼎力支持。

值得强调的是，为这套丛书撰写评介文章的人士除了在葡萄牙高等院校任教的知名教授外，还有长期从事葡萄牙文学译介工作的中国专家和教授。

林宝娜 姚京明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还魂曲

作者= 贾乐安著 喻慧娟译

页数= 3 6 8

S S 号= 1 1 9 5 8 2 0 9

出版日期= 1 9 9 9 年 0 2 月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晚宴上的波默里酒	
伊利娜·奥斯特拉科夫的还魂曲	
第一章	女王寿辰
第二章	伊利娜的遗物
第三章	马德莫依塞尔
第四章	盲目的敖德萨人
第五章	巴黎充满欢乐
第六章	法兰西酒店
第七章	澳门插曲
第八章	美国大兵酒店
第九章	堕入地狱
第十章	请柬
第十一章	墓志般的结局